怀念廿篇

李锐

怀念廿篇

李锐

生活·讀書·新知三联书店

责任编辑：胡　靖
封面设计：马少展

怀念廿篇
HUAINIANNIANPIAN
李　锐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发行
北京朝阳门内大街166号
新华书店经销
北京新华印刷厂印刷
787×1092毫米32开本　10.25印张　194,000字
1987年10月第1版　1987年10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 00,001—10,000
书号3002·257　定价2.00元



涂正坤（一九三八年）

何　斌（一九三三年）



郭　亮（二十年代初）

田家英（一九五九年夏）



文立徵(右)和本书作者在汉口(一九三六年一月)



周小舟在长沙
(一九五一年九月)



周恩来和本书作者观看三峡水利设计图（一九五八年三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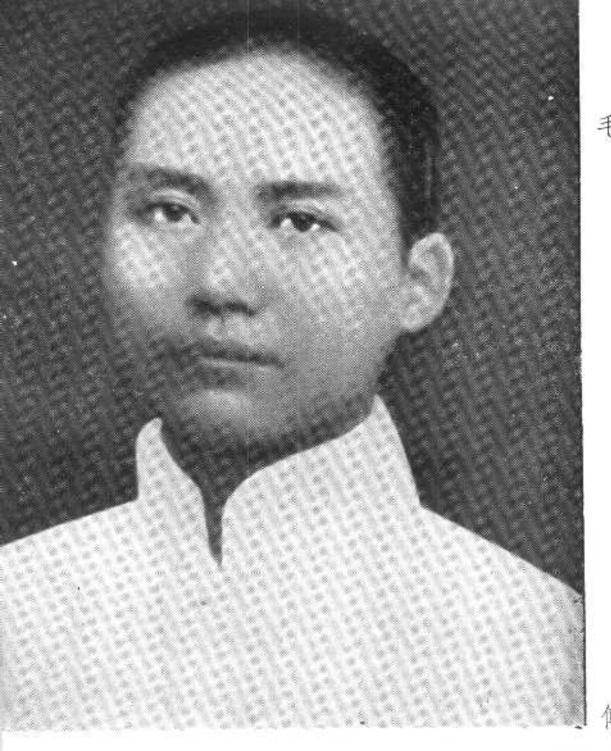
彭德怀在北京西郊吴家花园（一九六四年）



刘澜波(右)、周恩来和本书作者在北海水电展览会上(一九五六年)



谢文耀在鲁西南(一九四七年八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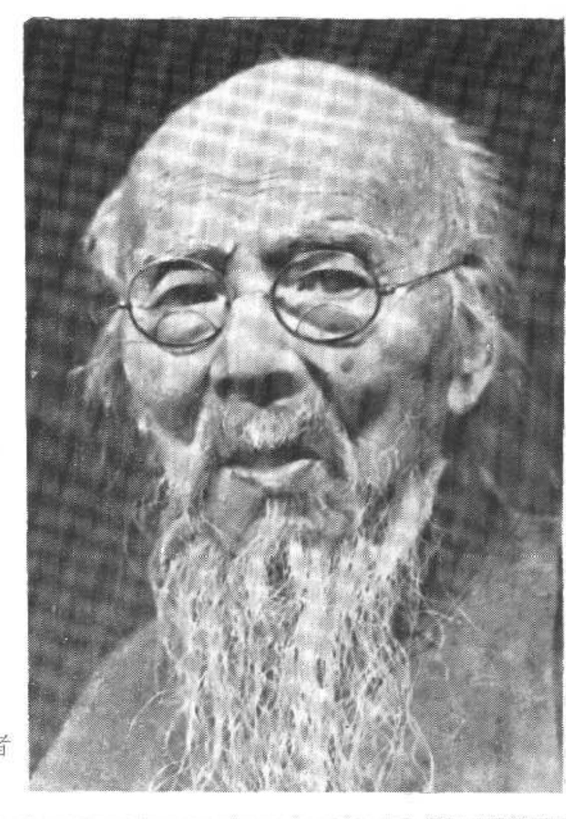


毛泽东（一九一七年）

傅任敢（一九八〇年）



齐白石（五十年代）



范寿康（右）和本书作者
（一九八二年）





吴 觉（一九七九年）

士人須有江湖氣
坐客能談山海經

抗日戰爭時同吳覺同志共事淮海區沂橫書此聯以贈之三十五六年後重遇南京雖經劫難重發而精神不減當年回京後為書同志告以聯語回事錄寄之當共一笑而言一段歷史不可沒也 李一氓於北京一九八零年元旦

李一氓书赠吴觉

张闻天(左)和工作人员在庐山(一九五九年七月)



李六如(一九五二年)



钱宗仁在胡杨树前
（一九八四年）

丁玲和本书作者
（一九八三年）

序　言

收集在本书中的二十篇文章，前十篇曾以《怀念十篇》为名，于一九八三年出版。那本书的《序言》开头说道：

> 四十年代到五十年代初，由于工作的关系，经常要熬夜握笔。登在报刊上的那些行云流水的东西，大都早已记不起来了，但怀旧的文章，却始终不能忘却。收集在这本小书中的十篇文章，最早的一篇《悼念涂正坤》，写于一九三九年八月，最后一篇《忆谢文耀》，写于一九八二年八月。前后四十三年！这四十三年的中国，真是充满了硝烟和血腥，战斗和创伤，苦难和欢乐。应当说，这十篇文章，都从一些侧面反映了这个时代的面貌吧。
>
> 做新闻工作的同志，大概都有这样的经验：有许多文字并不全是出自肺腑，而主要是出自义务即逼出来的。可是，这十篇东西都是我的理智、尤其是我的感情迫使我非写不可的。其中记录了我钦敬的、亲近的同志的血迹，也记录了我的心的痛楚，更多地记录了我的铭刻于心的怀念。可以说，没有一篇是奉命而作，而是自己以为非写不可才命笔的。

近三年来，尤其是一九八五年退居二线有了握笔时间后，或由于约稿，或由于“非写不可”，又陆续写出性质相似的文章十篇。因《怀念十篇》已经脱售，三联书店愿意将两个十篇合成一集。想不起更恰当的书名，只有名符其实，曰《怀念廿篇》。有两三篇文章是纪念性质，但异曲同声，也都编入了。

这后十篇多数比较冗长，有几篇只是材料汇集而已。不过为求实存真，如见其人，也别无他法。相信读者不会因此见怪：如此堆砌成文。

《怀念十篇》出版之后，颇有反响，得到鼓励。尤其戴文葆同志为文褒奖；聂绀弩同志赋诗推荐，使我感激，也使我不安。只是绀弩同志已经作古，不及见此书新版了。

《怀念十篇》序言中，曾将每篇写作的背景略加说明，后十篇也援前例，现一并作为《后记》，附于书末。全书二十篇文章，按写作时序排列。

作　者

一九八六年五月八日

目　　录

悼念涂正坤

今年六月十六日左右，我在邵阳见到三个在湘鄂赣边区参加国民党军队政治工作的青年朋友，他们是被迫离开的。涂正坤同志有一封介绍短函（十一日写的），说明他们原先在新四军工作，而不见容于现在的部队。

他们十三号晚上经过平江嘉义。离嘉义十多里的路上，碰到一个熟识的老乡，匆匆告诉他们：昨夜新四军驻平江通讯处的六个人，全被驻在对面的杨森的特务营杀了，有几个还是活埋的。里面有一个是"涂书记"。

这真是晴天霹雳，一个不可想象的消息。虽然抗战以来，湖南发生过很多磨擦事件，但从来没有如此严重之事。当时我不敢相信它是真的，极力找理由，总想老乡的报告不可靠。我们都十分清楚，新四军通讯处同各方的上层关系都很好，尤其是涂正坤同志，不单是地方老百姓爱沿用历史回忆亲热地叫他"涂书记"，就是平江的地方政府与各友军也都很尊重他。住在通讯处对面杨森的特务营，虽然常使人很担心，但通讯处同他们处得也相安无事，经常同他们的长官有来往，怎么可能竟……

尽管我们都希望"这是不可靠的流言"，然而沉重的不

安和凄然之感终究压在心头。那三个年轻的朋友受了我的影响，感到这个消息带来了一个何等严重的后果。他们三人怀着无限深情，谈起“涂书记”的种种来了。说涂跟他们见过几次面，怎样和蔼、细心，怎样安慰和鼓励他们，怎样帮助他们了解社会，说服他们的急性病，教导他们正确认识统一战线的问题，注意工作和生活作风，特别谈到平江的老百姓怎样敬仰“涂书记”，涂在平江的威望如何高，等等。这三个受了不少折磨的青年，显然是带着最崇高的感情，来怀念这位革命前辈和群众领袖。我越听他们讲下去，心情越沉重，越痛苦。

我很谨慎地将这个消息传出去（告知湖南省委的同志），大家都不敢相信，然而都很焦急地等候着确切的消息。

一连几天，办起事来，我的精力总不能集中，老是爱回忆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同涂正坤同志见面的情形。那正是武汉沦陷后，长沙动荡的日子，差不多每天有警报。我们在一个仓库的防空壕内开始了谈话。他的个子很高，我们弯腰坐在洞口。我们是同乡（我是平江长寿街人，离嘉义只三十里路），都为这次相见感到特殊的喜悦。然而我当时的喜悦跟他不同，是他所不了解的。由于国民党的反动宣传，社会上一般对平（江）浏（阳）大都怀着一种恐惧不安的心理（平浏是出共产党“暴徒”的地方），可是，在我的心灵中，早在长沙读中学时就已对这些艰苦斗争中的人们怀着模糊的英雄崇拜，并且有过各种各样甚至一些

幼稚可笑的想象。如今同这个高个子蹲在一起，我象一个小孩子经过一场哭吵获得了他所心爱的东西，贪婪地来端详这个高个子说话的神情和他的动作。我们畅谈着家乡的一切，关于我的老家那个地方的情况，他比我清楚得多。他是南方三年游击战争的坚持者，平江的山山水水，人情事态，他了如指掌。他谈到抗战爆发后，奉令在平江县整编零散的游击队伍，准备开赴江南前线时，地方上的震动是多么大，发生过哪些令人发噱的笑话。说到这些，他仍忍不住哈哈大笑起来，一种极自然的笑，并没有一丝骄傲与讽刺，而是充满了安慰与宽大。我们又谈到平江的现状以及一般群众和青年的情况，他充满了乐观与希望："好的特别好，坏的也特别坏；但是对于坏的，我们仍旧是尽量争取他们到抗战队伍中来。就是那些杀过我们的亲属、害怕我们回去报仇的人，我们也是用最宽大的态度对待他们，甚至用更多的时间去接近他们，让他们彻底了解我们是不算旧账的，我们今天只有一个共同的敌人——日本帝国主义。"最后他还谈到平江农民的斗争性，一般群众有丰富的打游击战的经验。他的沉着而急速的语调，使我感到千万平江农民正站在他后面，响应他的号召。

由于战争形势的紧迫，第二天我再去看他时，他已乘车走了。

这样沉重不安的生活经过了六、七天，终于确切的消息传来了，平江的"快邮代电"到了我们手中，我怎样再去

寻找“不可靠”的根据呢？

当我的手战栗地拿着那张“快邮代电”时，我马上想到那本《日寇暴行实录》中那些悲惨的画面：手执钢刀的“皇军”，被绑着活埋的中国人民……我没法抑制愤怒，我不敢也不忍去想象涂正坤、罗梓铭等同志被枪杀、被活埋时，是怎样的一种情景。我想世界上再没有比这更悲痛更残酷更令人不敢置信的事件。

听说平江的群众愤怒极了，当地政府以及国民党其他各部队中大部分的人也都极为不满。墨写的谎言掩不住血写的事实。我们不必要待历史的定评，我们只要去问一问湘鄂赣边区千千万万的人民，问问平江几十万农民，就知道这一次亲痛仇快事件的损失有多么巨大！

涂、罗等几位同志的遇害，这不仅是中国共产党的重大损失，也不仅是新四军的严重损失，而且是中国全体同胞在抗日救国伟大事业中沉痛的损失！湘鄂赣边区的千万人民尤其直接感到，这对他们是一种多么重大的打击。

为中国民族解放，为中国人民的自由和幸福，涂正坤奋斗了一生，因此也就引起了日寇和反动派的无比恐惧和仇恨。涂正坤等同志在反动派的屠刀下牺牲了性命，然而他们的神圣事业、光荣传统和英雄气概是永远不死的，永远为我们后辈的楷模的！

一九三九年八月

附记：

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平江惨案》（吴定邦作）中，有涂正坤

的简历和牺牲的经过，摘录如下：

涂正坤，原名涂正生，湖南省平江县嘉义区谢江公社人，一八九七年十月十六日出生在一个贫苦的缝工家庭。一九二五年五月加入中国共产党。一九二六年组织农会支援北伐战争，为北伐军攻占平江作出了贡献。一九二七年大革命失败后，参加了平江县委组织的秋收暴动。后潜回北乡，以缝纫业作掩护，继续进行革命活动。一九二八年七月，担任党的平江四区区委书记，参加了彭德怀、滕代远、黄公略领导的平江起义。一九二八年九月，在党的湘鄂赣边界特委领导的红军游击队中担任领导工作。一九三〇年调任平江县委书记。一九三二年至三七年，在湘鄂赣省委任保卫局长、组织部长、省委书记和省苏维埃主席等职。一九三八年，湘鄂赣游击队编入新四军开赴抗日前线，湘鄂赣省委改为特委，划归江西省委领导，涂任江西省委副书记兼特委书记，并以新四军上校参议的身份主持设在平江嘉义的新四军留守处的工作，一九三九年六月十二日在平江惨案中遇害。母亲何九莲任党的交通员，一次在执行任务时为敌所捕，为了保护党的机密，惨死于敌人的酷刑之下。女儿涂凤文，十八岁参加新四军，一九四一年在皖南事变中牺牲。

涂正坤遇害的经过：一九三九年六月十二日，驻防平江的国民党第二十七集团军总司令杨森，按照蒋介石的密令，派兵突然包围新四军平江嘉义留守处，枪杀和活埋了涂正坤、罗梓铭等六人。这些天，他们正在积极参加破坏公路的活动，以阻滞日寇的进犯。这天下午三时左右，杨森部特务营中尉侦察员张绍奇来到新四军留守处驻地，毕恭毕敬地“报告涂参议”，诡称杨森要他到嘉义乡公所开会，“杨长官在那里等您，请您马上去一趟。”涂正坤即穿上衬衫，拿起一把蒲扇，同张绍奇走出了留守处。当走到离留守处约三十米的“秀记”杂货店时，张绍奇大声地咳了一下，接着巷口应声响起了几响乱枪声，张绍奇喊一声“有匪”，就溜进了附近的“洪源生”杂货店。这时，预先埋伏的刽子手孙家慧抡起快枪，朝着正在步下石阶的涂正坤猛烈扫射。涂正坤身中数弹，壮烈牺牲。同日，包围留守

处的杨森部捕杀了吴渊，活埋了罗梓铭、曾金声、吴贺泉、赵禄英(女)等四人。惨案发生后的三、四个月里，平江县十五个区委和五十八个支部，几乎全部被破坏。据不完全统计，被杀害的共产党员六十八人，群众七十余人。

纪念何斌

一九三九年的夏天，重庆八路军办事处曾费尽心力开了个小规模的追悼会，纪念平江惨案中殉难的烈士。《新华日报》第二天登出了醒目的新闻；匆匆印出的纪念册，也在国民参政会开会时散发了。这同现在禁锢得象罐头一样的情形相比，是令人感慨无已的。

就在这个追悼会的前几天或后几天，我在红岩咀同何斌见了面。他刚从鄂南逃出来，光着头，穿一套黑布中式短衣裤，象一个商店的学徒。

何斌原名何功伟，一九三六年上半年在武汉被通缉，即离开学校去上海。之后，我们便通起信来，然而一直没有见过面。在这次短短的一个多月的相聚中，我们尽情畅谈，似乎要弥补过去三、四年的阔别。

他是一个没有拿到高中毕业文凭的学生，在家乡的青年中却有很大的号召力。武汉失守之前，他便回到鄂南去了。战争来临，他曾同地方同志们一起，千方百计动员和组织鄂南人民，投入战争。可是历史的不幸夭折了他们的英雄事业。几个夜晚，他详细地同我谈到他在鄂南一年多的生活，从开辟上层，深入农村，直到几个同志的被杀和

自己的亡命。他谈得很缓慢，他经过的那些事情会令人觉得同这个学徒的外表如何不相称。我所感受到的一种力量，是越来越重的；我头一次严重地意识到自己的"少不更事"。我们离别前的一次长谈，是在临江的一个小茶馆中。他苦恼于自己的神经衰弱和恋爱问题没有得到解决，他羡慕我的身体好，祝福我们的新婚。当时我是很不安的，深深愧疚自己的"庸人多福"。这种心情我没有告诉他。我们谈得远远的，肯定他会找到很好的伴侣。我们做着美丽的梦，设想几年后形势的变化，大家相聚的欢乐。他起劲地笑着，脸色也不显得那么苍白了。

他决意回到环境日益艰难的鄂西去，便搬进城里住了。我也没法最后送他上船。

延安的生活是安静的。由于不直接接触第一线的成败斗争，人有时也会因循起来。然而对于南方故人的悬念是与时俱增的。去年秋末，便听到何斌在鄂西被捕的消息。据说他本来是可以避免这个遭遇的，他早就该离开那个地方，他自己已经知道有十几个家伙在跟踪他。

在南方，虐杀青年的事情，年来愈演愈烈，大小屠伯们都在磨他们的钢刀，血迹遍布于大后方各个地方。例如重庆的防空洞也变为拷打审问的场所，这是取其"秘密安全"与阴森恐怖，企图以此影响受难者的心理。据说武汉时代互讲统一战线的青年，如今竟在这种场所又碰了面。但情形却大有改变：一方面是操着生杀予夺大权的新贵，被训练着以杀人为业；另一方面是阶下之囚，被教育着不

慑于死之恐怖。这是如何惨痛而严正的历史画面。

当权者未能变更其"死之恐怖"的政策，这倒是极其可悲的；他们永远想不透革命者虐杀不完的道理。是一种什么样的力量在支持他们呢？地位、金钱、女人、亲属……任何东西的引诱都失去作用？市侩与战士的分野就在这里：前者奴颜婢膝以贪生，后者为真理而从容赴难。

"马日事变"后的长沙街上，常有"帝打打帝打打帝帝帝"的冲锋号音吹过，几个或十几个男女青年，被粗绳捆着，有的是赤膊，颈后都插了一支朱（笔）标，被一大群如临大敌的兵士推着跑。不管跑得怎样急，这些青年总是激昂地一呼一应地高叫着口号；这些口号如同闪电划过暴风雨中的黑夜长空，令人惊心动魄。这种情景，给予我——一个十岁孩子的心的撞击，是对英雄的崇敬多于死的恐怖的。这种封建遗产，让死囚在就刑前豪语的"恩惠"，现代权力者早已醒悟到这对自己的不利，他们知道恐怖和威吓只能慑服"良民"。因此，抗战以后，虐杀的方法就更转为绝对的秘密。"在暗室中毕命于几个屠夫的手里，一定比当众而死更寂寞。"（鲁迅语）是的，从群众中来的人，他总希望当着群众表明他的结局。不过近年来，这种"暗暗的死"，对于战士已极其熟悉，他们随时准备着接受这种"寂寞"。当死已成为时刻在威胁着他的存在时，死的方式真也就无足轻重了；何况死者自己也知道，他是不会死的，因为他将永远活在人们的心里。

我不能不写出，我们的战士，二十六岁的何斌的死讯。

这是无可奈何的事情。最近证实了，他在去年十一月被枪毙了。

何斌被捕后，便关在当地的“劳动营”中。后来地方最高当局（按：地方最高当局，系指当时国民党的湖北省主席陈诚）找他去谈话，许以“领导”该地青年的全权。这当然没有任何结果。于是最后将何斌年老的父亲从远处找来，“说服”这个结婚不到一年的儿子。但是这位老人所能做的事情，只是带出了他儿子的两封遗书：一封是向他的心灵所寄托的队伍告别；一封是给他的比他更年青的妻子，她刚刚分娩，他惦记着她。

何斌一生中最后一年的经历，现在所知道的，就是这一点点，然而这也就够了。

他的告别辞，他向我们，他的亲爱的战友们说了些什么呢？虽然我们没有亲见遗书，但我们是如闻其声的。

“先烈的‘死’，是后人‘生’的唯一的灵药。”鲁迅的话，也正是向着我们说的。

一九四二年四月

〔附录〕

《何功伟烈士诗文笺注》序言

何功伟（何斌）以二十六岁的华年，牺牲于敌人的黑狱之中，已经四十五年了。记得一九四二年六月七日延安为他开追悼会时，会场四周挂满了挽联，我的挽辞是："你永远活在我们心中"。这句话没有说错，功伟一直活在人们心中。我同他相见，是在一九三九年七、八月间，他从湖北到重庆来，向南方局汇报工作。我们同属抗战前武汉秘密学联的先后负责人。一九三六年上半年他被通缉，到上海去了。我们之间只是通信，没有见过面。在通信中，我曾同他谈过在武汉建党的问题，我们当时估计，他在上海一定已找到党的关系了。这次能在重庆会面，同住在红岩嘴，几次聚谈，两人都十分愉快。一九三八年六月，他被派回鄂南家乡开辟游击战争根据地，在十个县建立了党的组织，深入农村，发动群众，同地方国民党上层周旋，同日寇作武装斗争。平江惨案之后，国民党开始杀共产党员，他在鄂南终于呆不下去了。功伟不过比我大一岁多，这时我感到他比我要成熟得多，经历也比我要丰富得多。八月间，他就离开重庆，调到斗争艰苦的湘鄂西区党委工作去了。一九三九年底，我也撤退到延安。

功伟是一九四一年末在恩施被秘密杀害的，时任鄂西

特委书记。这消息过了好几个月才传到延安。借用鲁迅的话来说，当时"我沉重地感觉到我失掉了很好的朋友，中国失掉了很好的青年"。他留给我的印象是这样的深：开追悼会时，找不到他的照片，我凭着记忆，为他绘制了一幅很大的近乎木刻的遗像，挂在主席台上。在追悼会之前四月廿八日的《解放日报》上，我发表了《纪念何斌同志》一文。文章不长，因为他的事迹我知道的实在太少，但是我的悲愤，我对他的钦敬之心，还是写出来了的。当时是所谓统战环境，报纸上还不大直接对国民党点名指责，文中说道："在南方，虐杀青年的事情，年来愈演愈烈，大小屠伯们都在磨他们的钢刀，死者遍布于大后方各个地方，例如重庆的防空洞也变为拷打审问的场所，这是取其'秘密安全'与阴森恐怖，企图以此影响受难者的心理。"虐杀的方法就更转为绝对的秘密。"当权者未能变更其'死之恐怖'的政策，这倒是极其可悲的，他们永远想不透革命者虐杀不完的道理。是一种什么样的力量在支持他们呢？地位、金钱、女人、亲属……任何东西的引诱都失去作用。"文中写到当时国民党湖北省主席陈诚诱降的失败，被找来"说服"儿子的父亲，"只是带出了他儿子的两封遗书"。这篇文章当时引起重视，人们认为是一篇阶级教育的好材料。前两年我把它编进了《怀念十篇》小书中。

还在当年的通信中，我就感到功伟有文才，文字简洁精密，不蔓不枝，而且"笔锋常带感情"。五十年代的《革命烈士诗抄》收过他的一首《狱中歌声》。我曾想过，如果

能把他的遗书、遗文集印起来，留给后人，是一件极有意义的事情。现在，何惠文、吴培根两同志把这一任务担当起来（不幸的是，何惠文不见此书出版，即已去世），他们不惮烦劳，搜求遗文，为便于青年阅读，复加注释。我看到这个稿本，真是如见故人，心情一直不能平静。正如编者所云，集中所收远非全璧，这也是无可奈何的事。即如当年他给我的信件，倘能保存下来，编入集中，又该多好。其实也不必求全，集中所收，虽不过是几封信，几首诗，有些还是断简残篇，但也足以看出作者的浩浩正气、铮铮铁骨了。我愿意向读者着重推荐烈士在狱中写给他父亲的两封信，这真是情文并茂的绝世文章。读这样的文章，就令人想起文天祥的《正气歌》，想起林觉民的《与妻书》；这些惊天地泣鬼神的诗文，表明我们共产党人与我们民族历史上的精英是一脉相承的。当敌人无法叫这个落在他们手中的囚徒屈膝时，便把年迈的父亲找来，想以亲子之情来软化他。可是，他对父亲说的是："儿献身真理，早具决心，苟义之所在，纵刀锯斧钺加诸颈项，父母兄弟环泣于前，此心亦不可动，此志亦不可移。""揆诸宁死不屈之义，儿除慷慨就死外，绝无他途可循。为天地存正气，为个人全人格。成仁取义，此正其时。""儿决心牺牲个人，以利社会国家，粉身碎骨，此志不渝。案决之后，恳大人携被褥以俱来，与儿同居数日，少伸骨肉之情。此番生离，或即死别。"这是何等的气概，何等的情操！我们民族出了这样的人物，是我们民族的光荣；我们党有这样的党员，

是我们党的光荣。现在,我们要建设社会主义的精神文明,要向青年一代进行理想教育,何功伟烈士的诗文就是一种极好的教材,像他在狱中给父亲的信,我看是可以编入教科书,给中学生读的。因此,我认为这本书的出版,不仅有纪念的意义,而且有现实的教育的意义。

何功伟其人其文的光彩,早有目共睹,又何待于我的序言。编者和出版者嘱我撰序,使我得以又一次缅怀亡友,发些感慨,是给我的荣幸,也是给我们这些幸存的后死者的鞭策:不要愧对死者。四十四年前我那篇纪念小文最后一句话是这样写的:

> 先烈的"死",是后人"生"的唯一的灵药。鲁迅的话,也正是向着我们说的。

一九八六年清明节

记郭亮

一

二十四年前的今天，一九二八年三月二十九日黎明之前，郭亮被国民党反动政府杀害于长沙司门口。

郭亮是三月二十七日深夜在岳阳被捕的；二十八日下午四点钟左右，被戴上脚镣手铐押到长沙。他坐在人力车上；街上的人都看得很清楚：这是省总工会委员长。立时全城就传开了这个消息。到达“铲共法院”的监狱后，他看见全院惶惶不安，监狱门口围得水泄不通，就对狱吏说：“不要怕，我如果沿途交代几句，这法院就会不得了。”用阴谋残忍手段夺得政权的国民党军阀，这时惊魂未定，马上宣布特别戒严，如临大敌；他们害怕群众暴动劫狱，就在二十八日午夜以后，偷偷地将郭亮杀了。

郭亮，这是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湖南全省人民群众最亲切的、也是反革命分子最恐惧的一个名字。

三月二十九日的白天，国民党反动政府将这位二十八岁的共产党员的头颅和尸体，放在闹市中心司门口示众；后来并将他的头颅挂到他的家乡——他最初从事工人运动

的长沙铜官示众。三月二十九日这天，另外还有八个共产党员和青年团员在教育会坪被杀害，他们的尸体也同样示众。可是这种“示众”，同屠夫们的打算恰恰相反：不仅未能造成恐怖与慑伏，反而成为人民英雄的品格的宣传，成为坚不可摧的共产主义事业的示威。

关于郭亮与另外八个共产党员和青年团员的被杀害和示众，鲁迅曾怀着极其沉重和愤慨的心情写过两篇杂感（《头》和《铲共大观》，载《三闲集》）。下面是《铲共大观》文中抄下的当时《申报》的新闻：

> ……是日执行之后，因马（淑纯，十六岁；志纯，十四岁）傅（凤君，二十四岁）三犯，系属女性，全城男女往观者，终日人山人海，拥挤不通。加以共魁郭亮之首级，又悬之司门口示众，往观者更众。司门口、八角亭一带之交通为之断绝……

鲁迅先生这样写道：“革命被头挂退的事是很少有的！”

《申报》记者把当时长沙的群众都写成看热闹的人，其实，无数的工人和学生是怀着悲愤，挤到司门口去向他们的领袖告别。后来在铜官，更有许多工人不顾一切到郭亮的家中致哀，并且冒险偷埋好他们最可敬的朋友的头颅——这一颗英雄的种子。

二

人们都知道，蒋介石曾用最野蛮的屠杀来对付共产党人，企图杀绝共产党人。“马日事变”之后，那是一个何等

突然而来的黑暗时期。长沙的教育会坪和识字岭等处，终年血迹不干。但是，正如毛泽东所说："中国共产党与中国人民并没有被吓倒、被征服、被杀绝，他们从地下爬起来，揩干净身上的血迹，掩埋好同伴的尸首，他们又继续战斗了。"郭亮在牺牲之前，就是这样的共产党员，他不愧为毛泽东最早的学生和战友。

郭亮在岳阳被捕后，即由国民党军分校的一连学生手枪队，专车押回长沙。在车上，他宣传革命理论，讲共产党员是抓不完、杀不绝的；这些学生被他讲得无言可答。押在"铲共法院"后，其他"犯人"见了他，都很紧张。其中有的同志几乎要喊出声来了，但马上被他的镇静和示意制住了。他谈笑自若地在狱中过了三四个钟头。审问时，他昂首说道："我承认是总工会委员长郭亮，你们就可以杀了，不必多问！"审讯者还想追问党的组织，郭亮幽默地说道："开眼尽是共产党人，闭眼没有一个。"

这就是当时传出至今仍一字不差地留在许多人的记忆中的郭亮的"口供"。

被杀害之前，他向他的妻子李灿英（解放后担任衡阳市妇联主任，一九五〇年四月逝世）写了几句激励来者的遗书：

灿英吾爱：

亮东奔西走，无家无国。我事毕矣。望善抚吾儿，以继余志！此嘱。

临死郭亮

这封遗书辗转送到上海中国共产党中央机关，后来影印在秘密出刊的《烈士传》中。

三

郭亮号靖茄，长沙县铜官区西华乡射山冲文家坝（今属望城县）人，生于一九〇〇年。他十一岁进铜官东山寺小学，后转学靖港第四高小。一九一六年考入长郡中学（现为长沙市第二中学）；由于家庭经济困难，两年后休学，在家帮助哥哥种地。

在长郡读书时，他很善于写作；全校八百学生会考，他取第八名。《湖南通俗报》出版后，他曾投寄反映农民痛苦生活的文章。

“五四”运动期间，毛泽东在长沙创办《湘江评论》，给他的影响很大，使他开始有了明确的革命思想，更加仇恨这个丑恶的社会制度。一九二〇年，他考入第一师范第二部（专为小学教员进修设的，二年毕业）。这时毛泽东在一师附小当主事。郭亮很快就认识了这个他所敬重的人，并且立即参加了毛泽东领导的“新民学会”。于是他读到各种宣传新思想的刊物、报纸以及有关社会主义的书籍，内中有上海共产主义小组出版的《共产党》期刊。一九二〇年末或一九二一年初，他又参加了毛泽东领导的社会主义青年团。

这时的第一师范有与北京大学类似的情况：充满了青春的朝气，有一批进步的教员，学生组织的各种团体极多，

自由研究的风气浓厚，社会主义思想公开传播，爱国情绪高涨，校内外社会活动频繁。

郭亮和夏曦（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湖南省委负责人之一，一九三五年长征中牺牲）住在一个寝室。他们多半时间参加校外的革命活动，常常深夜不归，有时几天不上课。在毛泽东领导下，一九二一年他们组织了长沙人力车工人的罢工。在这些初上战阵的活动当中，郭亮就已表现了他的极善于接近和鼓动群众的才能。

这个刚过二十岁的青年学生，已经成了坚强的活跃的共产主义的革命战士和工人运动的领袖。

中国共产党正式成立以后，郭亮由毛泽东介绍入党，是湖南最早的党员之一。

四

一九二二年在第一师范毕业后，郭亮就以全部身心投入了沸腾的工人运动。这一年正是全国也是湖南工人罢工的高潮年份。七月，党派他到粤汉铁路的新河（长沙北门外）和岳州（即岳阳）站，做铁路工人的工作。他起初开办工人夜校，出版《工人之路》周刊。到八、九月间，粤汉铁路的长沙、新河、岳州和徐家棚四地，就先后成立了工人俱乐部。他自己担任新河和岳州工人俱乐部的秘书。

九月上旬，为了反击路局对工人俱乐部的破坏，并要求增加工资、改良待遇，他领导上述四个地方的铁路工人举行了罢工。

九月十日，一列火车自武昌开到岳州。郭亮即率领工人横卧在铁轨上，阻止列车开行，他自己卧在距机车最近的地方。这样坚持了一天一夜以后，路局买通了军阀萧耀南的北军一个连，将工人一顿乱打乱杀，当场死六人，伤数十人。郭亮和其他二十多个工人被捕，押到武汉，监禁在“陆军监狱”。

这次罢工坚持了半个月，在湖南、武汉和全国工人的声援下获得全胜。

郭亮等人关了一个多月才被释放；其间，毛泽东曾通过各方面的活动来营救他出狱。

他回到长沙后，许多铁路工人和他们的家属都来慰问，一些妇女和老人对他说：你被抓去后，我们天天都为你求神拜佛。

五

一九二二年，在毛泽东领导下，湖南有组织的工人达三万多人，单在长沙就成立了粤汉铁路、泥木、机械、理发、铅印、人力车等十几个工会。十一月六日，湖南工人统一的战斗组织——全省工团联合会成立了，毛泽东任总干事。郭亮是毛泽东最得力的助手之一。

一九二二年的十二月，他被派到他的故乡铜官，组织陶业工人。原因是长沙县加重了对陶业工人的盘剥。

郭亮去的时候带了一个“法宝”——“省长”赵恒惕颁布的“省宪法”。这个“宪法”是赵以“联省自治”之名，来维持

自己的地盘的。可是这里面有“人民有言论集会结社自由”之类装点门面的条文，却为毛泽东紧紧抓住作合法斗争的武器，它逼使“赵省长”在工人组织工会和罢工等方面，也不得不一时作点让步。郭亮一到铜官，就在东山寺召开工人群众大会，根据“省宪法”来组织工会，坚决反对长沙县的苛捐杂税。工人们选他为工会的筹备主任，同时他创办了第一所工人子弟学校和工人夜校。

一九二三年三月，在东山寺召开了三千多工人的大会，宣布正式成立铜官陶业工会，举行了盛大的游行示威。安源、水口山、长沙的纺织厂、铜元局、泥木、人力车等工会，都派了代表前来参加。

在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铜官工会是湖南全省最先进最有威势的工会之一。这个地方的党组织在全省也是站在前列的，培养出来许多优秀的工人干部。在抗日战争前夜，湖南的白区工作中，只有这个地方还保留了一个以袁仲贤同志为首的特委的组织。

六

毛泽东于一九二三年离开湖南，郭亮继任工团联合会的总干事。党内他任省委委员兼工农部长；后来工农分为两部，他专做工人工作。

一九二三年“二七”惨案以后，全国工人运动转入低潮，赵恒惕政府对群众革命运动的压迫摧残日紧。例如一九二三年十一月曾武装镇压水口山工人，有一个工人被

枪杀。但在党的正确领导下，湖南的革命力量依然日益发展壮大，工人运动尤其如此。

自"二七"惨案至一九二六年北伐军进入湖南这一个时期，郭亮所直接领导的工人运动的情况，在他自己所写的一九二七年一月出版的《湖南工人运动之过去与现在》中，有如下简略的叙述：

……湖南工人同遭厄运，集会结社，概被禁止，水口山矿工会及长沙各工会多被封闭，工人遭惨杀，工人运动饱受巨创。但革命的湖南工人运动，却并未因此而低落，公开的争斗，秘密的组合，曾不稍懈。"五卅"运动突起，全国工人阶级与帝国主义肉搏血战，湖南工人一致奋斗，工人组织数量增至七万余人。"五卅"运动被帝国主义、中国军阀打落一下，湖南不获幸免：如安源、水口山工人之遭惨杀，工会被解散；第一纱厂工会工人之被拘囚；长沙铅印工人罢工受压迫等等。但在此情形下，尚能扩大秘密组织，工会人数增至十一万人。在全国工人阶级反攻军阀的争斗中，驱逐赵恒惕的运动再接再厉（按：赵恒惕于一九二六年三月十三日，被革命群众力量赶出湖南——引者）。至北伐军入湘，安源、株萍、粤汉、长沙、醴陵、湘潭等地工人均努力参战，并竭力巩卫后方，成绩卓著。北伐军胜利，开国民革命发展之新局面，湖南工人组织也日益强大，至今日已达四十万人了。现在一面努力彻底铲除封建余孽，继续反抗帝国主义的工作；一

面努力而迫切地从事于建设民主主义的新湖南的工作。

在这个期间，郭亮的活动并不限于工人运动，例如一九二三年长沙发生"六一"惨案，向日本帝国主义作斗争时，各群众团体联合组成的外交后援会即由他任主席。他还参加党员训练班的工作，选派成百的优秀工人干部到广州去……。

在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前夜，郭亮就已经是湖南工人和广大革命群众所拥戴的群众领袖了。

一九二六年十二月全省工人代表大会上，工团联合会发展为全省总工会，郭亮被全体出席代表一致选举为全省总工会的委员长，在党的"五大"上被选为候补中央委员。

七

在一九二六年到一九二七年这一段翻天覆地的轰轰烈烈的日子中，中国人民及其代表——共产党员的革命魄力和才能，有了一个飞跃的发展。

二十六、七岁的青年郭亮，这个不及中等身材的被同志们昵称为"郭矮公"的人，在湖南革命群众中享有极高的威信，他的名字真是妇孺皆知。他的令人心折的通俗的煽动的讲演，他的坚定的勇敢的对敌斗争的气概，他的朴实的联系群众的作风，普遍地深入地感染着千千万万的人。这时我是长沙楚怡小学五年级的学生，童子团的小队长。每次开大会，游行示威，下乡宣传，我都兴奋地参加。教

育会坪开大会时，台上那个矮个儿讲演者的形象，至今留在记忆中。

当年曾同他在一起工作过的同志，都久久不能忘却他留下的深刻印象。我从这些同志处听说过的就很不少：

他平易近人，从不疾言厉色，讲话时总是诚恳地看着对方。他的谈话和指示工作，使人信服，使人不敢对他讲假话；谁反映的情况不真确，就会被他几句话戳穿。

他最会讲话，具有煽动的天才，非常吸引人，在群众大会上可以讲得不愿动的群众动起来。

他在总工会时，每天很多人来找他谈问题，每一件事他都亲自处理，都给对方一个答复。他做事很细心，很敏捷，从不拖拉。一九二七年“五一”节游行，他事先检查，传单印不出来，他就告诉经办的人：“不要当买卖做；去和印刷厂的工人说，这是工人自己的事情。”结果如期印出了。

他精明强干，有巨大的工作精力。当时工人运动中许多宣言和文件都是他起草的，《湖南工人运动的过去和现在》那个小册子是两个通晚写成的。高文华同志告诉我，一九二六年他在益阳做工人工作时，曾接过郭亮一封写了十一张信纸的指示信。

他是一个勇敢而有智谋的人。一九二五年十二月，长沙的局势很紧张，有一次几个警察到工团联合会（在宝南街）来抓他。警察已到了楼下，他在楼上听见了，便布置成他根本不在家的样子，从窗口跳上邻家的屋顶，逃走了。

八

在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的日子里，郭亮领导省总工会和内外反动派作了坚决的斗争。

汉口收回英租界的运动发生后，湖南英商企图用开除工人等办法扰乱我后方；总工会领导了对英商的总罢工，扩大经济绝交运动，使英国设在湖南的工商企业，完全陷于停顿。日商的日清公司、戴生昌轮船公司等处的买办也跑了，都由中国职工自己组织起来管理。

工人运动中最严重的问题，是原来在反帝爱国运动中与革命群众站在一起的工商界，这时抵制工人的适当改善待遇的合理要求，以停止营业为手段，使许多工人和店员失业；他们同时收买工贼，制造工会内部的纠纷，并故意提高货价，使社会对工人、店员不满。在外县，土豪劣绅与贪官污吏，也极力破坏工会，有的勾结团防、土匪，谋杀工会领袖。在总工会的领导下，全省广大工人群众团结起来，及时地给少数为首的罪大恶极的反革命分子以应得的惩处。长沙粪码头一个封建把头，把持肥料，纠集流氓，惨杀工人，郭亮坚决主张要处理此人。后来他亲自主持"特别法庭"的公审大会，接受工人要求，当场判决了这个恶霸分子的死刑。

在《湖南工人运动的过去与现在》这个小册子的结尾，郭亮写道：

在帝国主义、封建余孽、资本家各方面围攻中的湖南工人，我们应如何救护这个革命的队伍，如何能使这个队伍扩大并加强他的革命战斗力，这是目前湖南工人运动的严重问题。我们应该分析敌情，决定攻取，要用各种方法去教练工人，使个个工人都能知己知彼，向帝国主义及封建余孽一切反革命派，毫不妥协地进攻。同时叫醒资产阶级，要在打倒洋货的销场、取消苛捐杂税上去发展企业。更联合一切革命民众的势力，来完成国民革命。

郭亮在一九二六年驱逐赵恒惕运动时，就已深知武装工人的重要，北伐军未进入长沙时，工团联合会就组织了一千多工人成立保安队，维持城内秩序，并缴了叶开鑫残部一些枪支。后来这些武器虽被北伐军第八军收缴了，但工人仍暗地留下一些没有交出。

一九二六年十二月全省工人代表大会上他所起草的重要决议之一——《工人武装自卫案》，曾这样明确地指出："统治阶级借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等为他们的武装，时刻向工人阶级进攻；工人阶级要想抵抗这种进攻，用和平的方法，磕头叩拜的哀求方法，以启发统治阶级之'仁爱性能'，是绝对没有希望的。列宁说：'要以武力方能打破武力。'本此，工人阶级不求自救则已，不然必须有武装自卫的组织，这个组织是十分迫切的需要。""工人阶级为要实现他所负担的革命的历史使命起见，非有武装组织不可……就以现在北伐期中而论，工人阶级的武装组织非常

必要。”决议案并具体要求：首先给长沙的工人纠察总队发枪一千支，子弹十万发；各县市亦应从速组织武装纠察队。但是由于湖南省政府不肯批准工人武装的要求，加上陈独秀实行让步投降政策，对此还要横加指摘。郭亮就只好领导工人自己想办法。总工会每月的经费是很有限的，他仍用节余下来的钱，买了十二支短枪和八十支步枪，后来又通过各方面的活动弄来一百多支步枪。因此在马日事变之前，长沙工人纠察总队算是掌握有二百多支步枪（总队部设在东长街，即现在蔡锷中路）。这个数目是太有限了。但是在马日事变的晚上，工人纠察总队幸而有这些枪，才能与许克祥部激战了一夜，才有可能在快黎明时撤退到河西。

郭亮也是在这晚深夜出城的。

九

五月下旬，为了反击敌人的白色恐怖，郭亮在长沙四郊和铜官一带活动，他组织的工农自卫军和湘东、湘南的农民武装一同围攻长沙。后来他还率领一百多人，袭击猴子石，并破坏过铁路。由于陈独秀的右倾投降路线，围攻长沙失败。随后他又潜伏在长沙、湘阴边界左家塅、谭家园、杨桥一带活动，组织工农武装。后来实在无法立足，才转到武汉，参加贺龙的部队，做政治工作。

“八一”南昌起义，郭亮也是参加者之一。起义失败，他随贺（龙）叶（挺）军进入广东。潮汕战役失败后，他

与少数同志潜赴上海，找到党中央的关系。

一九二八年一月，党决定恢复湘鄂赣边平江、岳阳、湘阴、铜鼓、修水、蒲圻、通城、崇阳、咸宁等十几县的工作；长江局派郭亮任湘鄂赣边特委书记，调了二十多个干部先后在岳阳集合。他化装成农民，到岳阳建立特委的机关。

有六个干部先来，住在河街的一个旅馆里。郭亮来后，原来决定一天的下午五点钟到这个旅馆开会。但在开会前半点钟，这六个同志被捕了。八点钟，街头就贴出了“罪状”；郭亮九点钟上街，看到这六个同志的血肉模糊的尸体横在路上。

在二十天当中，小小的岳阳城内被捕和遭屠杀的共产党员和青年团员达三十多人。

经过特委几个同志的努力，机关算是建立起来了。郭亮在街上租了间房子，并在河下预备了一只船。其他同志有的晚上到木筏上去睡。另外开了个饭铺，作特委的交通机关。

据当时和郭亮在一起工作的人说，他不同意盲目的报复行动，认为必须艰苦地耐心地来重新创建党的工作，有计划地打击敌人。

三月间，岳阳桂系驻军下级军官中的党员，由于暴露了身份，坚持起义，特委分出一大部力量——二十多个干部去领导这个起义（即岳阳麻塘起义，后来因未与地方农民运动结合，失败了）。这时特委和汉口长江局的联系中断。

郭亮将所有的钱都交给参加起义的同志，他自己只留下一条一两多重的金链，想用它支持一时（附带说明，这就是郭亮被捕后，反动派在长沙报纸上大造谣言，说郭亮如何用金链子作裤带等的"根据"）。

郭亮的被捕，是由于派到长沙找湖南省委关系而被捕的叛徒苏先俊的告密。一九三〇年红军攻入长沙时，将这个叛徒捕获处决了。

十

一个灿烂的春花怒放的生命，一个正走向成熟的革命家，突然夭折了！

这样的民族精华，真是死得太多了！太多了！

然而作为共产主义的精神和事业，所有的先烈们当然是没有死的，他们永远作为一种动力活在我们的心里。不是吗，湖南人民谁能忘记郭亮呢？

郭亮在屠夫们的面前所写的"以继余志"的遗书，自然是借家书的形式，向我们全体共产党员和革命人民写的。但是也许大家仍不能不关心他的嫡亲后代。他的儿子生下时，取名"多难"；在国民党反动派斩草除根的政策下，"多难"在养育方面自然经过许多的困难，后来获得机会送到莫斯科学习去了。去年十一月，湖南省委宣传部接到从抚顺寄来的一封信：

我是郭亮的儿子郭志成（多难），今年六月底才从莫斯科回国，现在在抚顺发电厂工作，当主任工程师。

从乡下伯伯的来信，说是你们在搜集材料编订我父的事略；如果这件材料已经出版了，请寄给我一份。……虽然我是郭亮的儿子，可是我所知道的父亲的事略是很少的。

郭亮永远活在湖南人民的心中。

一九五二年三月

附记：

七十年代初，在秦城狱中回忆到这篇小文时，作了下面这首七绝，特附于篇末：

北伐军来满地红，长沙谁不识英雄。
未闻革命悬头退，鲁迅声音夜半钟。

怀念田家英

跟家英是在延安时就认识的。延安当年是一个“莫道都穿粗布服，称呼同志一家人”的地方；人们相互间很容易熟识，没有什么戒备（整风审干填“小广播”表，那是后来的事情）。一九四一年后，我在《解放日报》工作，他在中央政治研究室，有文章寄来，必经我手，于是也就成了“文字之交”。延安的生活，值得人们回忆的事情是很多的。如“粗布服”这个题目，就很值得写一篇文章。那时每年只发一套单衣，衬衣裤是不发的。夏天人们都爱下河洗衣、洗澡或找水深之处游泳。有一次，家英在河里洗澡，碰见一群女同志来洗衣，他在水中起不来了，因为他只有一条裤衩，刚洗过晒在河滩上。

文字之交后来一直保持着。解放初期在湖南工作时，我写过一篇《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湖南的革命与反革命》，家英在《长江日报》上见到，压缩了工人运动等部分，改名《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湖南农民运动》，推荐给《学习》发表了。原来我还以为是《学习》哪一位编辑多事。一九五二年调北京后，我转到工业系统工作。第一次见面时，我把过去搜集到的一大批有关近代、现代史的书籍，

全部送给他了；表示从此“洗手”，同文字生涯告别。可是仍然留下一个“麻烦”：离开湖南前夕，我匆匆写了本书，《中国青年》要连载。于是将这个“麻烦”交给了家英，由他全权处理，他的工作岗位也便于处理此事。一九五六年此书出版时，对他删改的一些部分，我有不同意见，又恢复了原状，但他并不坚持己见。

由于“隔行隔山”，同在北京，却不易见面。大概是一九五五年或一九五六年，有一天晚饭后，我们同另外一位共同熟识的朋友碰到一起了，天南海北，古今上下，乱扯了一阵；意犹未尽，肚子又有一点饿，于是一同到西四牌楼的消夜摊，吃小菜，喝老酒。家英是四川人，龙门阵摆到深夜两点。七十年代初，在京郊那个所谓隔离审查的地方，有一天忽然想起这件事，感慨系之，哼了四句：

咫尺天涯见面难，只缘都在作京官。

百年不遇龙门阵，西四牌楼消夜摊。

几天之后，犹感伤不已，估计总有一天会再经过西四牌楼的，于是又哼了一首：

何处再寻消夜摊？四牌楼下景非前。

曾经有句怜遥梦，相对无人哭逝川。

由于一种千载难逢的偶然机会，从一九五八年一月开始，直到一九五九年九月，我们得以时常在工作也是开会时见面了。大家知道，这个期间是当代中国发生第一个大折腾的年代。我们比一般同志更直接生活在历史的漩涡之中。作为个人来说，我大呛了几口水，被淹得半死不活。

家英还好，得以幸免。这个期间的交往，就不限于摆摆龙门阵，或者跑跑琉璃厂了；而是经常议论时政，忧心国事，臧否人物，乃至推敲文件了。这是真正的交心，当然也是危险的交心。前些日子，去看家英夫人董边同志，才知道，我们当年交心的内容，有许多家英并没有跟自己的妻子说过。我在工业部门，他则常下农村。在了解情况方面，我们正好互相补充，使头脑比较冷静，有共同语言，能够不留情面地针砭时弊。我们都经过延安的整风学习，有作调查研究的习惯（在延安时都写过这方面的文章），不喜欢说也讨厌听那些空话、大话，很看不惯某些吹牛逢迎的人。我们年纪轻些，在某些人眼中，也许属于“嘴上没毛”之类，但我们保有“赤子之心”。

家英从小失去父母，在哥哥姐姐家中长大，当过中药铺的小学徒，这使他熟悉民间疾苦。他在抗战前，接受成都地下党同志的引导，积极参加救亡活动。一九三七年到延安。一九四七年他参加过晋绥解放区的土地改革运动，深知农村情况。解放后，他住在中南海，很看不起周围那些追名逐利之徒。他早就厌恶江青的一些行为（当然，那时议论的还多属于生活方面）。据董边同志告诉我，他同陈伯达作过长期斗争，针锋相对，寸步不让；因此，陈对他恨之入骨。我们当年臧否人物，就包括此人。他告诉过我：这位“陈夫子”制了一颗“闲章”，曰“野鹤闲云”，特别喜爱，以此自诩。其实，这正从反面露出此人当年的极大牢骚：无权无势。此人在中南海的房子住得很不错了，但还想方

设法翻修，中央办公厅的负责同志硬不买账，于是怀恨在心。家英最看不起的是，此人经常向他打听"主席最近又读了什么书？""注意什么问题？"之类。这种察颜观色、探听气候以"投其所好"的作风，我们非常反感，也觉得是一种危险之事。果然，一九五八年十一月的郑州会议，这位"经济学家"赶时髦，抢浪头，发表不要商品生产、取消货币的谬论，遭到毛主席严厉的批评指责。摔了这个筋斗，陈伯达痛苦之至，我们毫不同情。

一九五九年四月上海会议之前，家英在四川农村蹲点，是穿着"便服"赶到上海的，几乎引起进出住处的不便。那次会议，东道主极尽招待之能事。此时此地，他向我描述了在农村挨饿的情景，以及基层干部如实反映的浮夸。那时他领导的一个工作组正在四川有名的全国劳模罗世发的家乡作调查，罗世发谈了他如何被逼讲假话、虚报产量的情况。六月底，庐山会议之前，许多严重的"左"的错误，如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特别是共产风，已经发现，在逐步纠正之中。开会前夕，毛主席提出十九个要讨论的问题，准备纠"左"。会议的初期，是"神仙会"，毛主席找我们少数几个人谈了三次，谈得很融洽，有时满堂欢笑。家英将工作组写的有关罗世发的材料交了上去。我们尽自己所知，作了汇报，也提出了一些建议，比如最重要的一条是：应当让陈云同志重新主管财经工作。

在延安时，我们是革命的晚辈，通过整风学习，更加认识到毛主席的伟大，深刻理解没有毛泽东思想就不可能

取得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我们对毛主席的敬仰、尊重，自信不比许多老同志差。《毛泽东选集》四卷中所反映的毛泽东思想形成的过程，我们也不比陈伯达之流了解得差。尤其家英是《毛泽东选集》四卷九百八十七条注释的主编，更是如此。由于各自有机会接触过主席的一些手迹，以及早年不为人所知的史事，或者直接多年在身边工作，我们对主席的不同凡响、棋高一着，比一般同志可能感触更深一些。可是，我们也确实没有将主席当作一尊神，而是把他看作一个人。因而对主席的某些缺点和作法，私下常有些议论。如在“大跃进”时我们就谈过，主席对经济工作不熟悉，缺乏这方面必须具备的知识，在经济理论方面尤其没有钻研过，因此，处理有关经济的问题，就远不如处理军事、政治问题那样得心应手。家英当时有一个集中的想法，即主席应当摆脱日常事务，总结一些重大经验，专心于理论的著作，这样，对后代更有意义。在庐山时，他跟我谈过一副对联：“隐身免留千载笑，成书还待十年闲。”即指这个意思。他很惋惜主席志不在此。他早就同我谈过，编《毛泽东选集》时，主席常有厌于回顾旧作的情绪，而兴趣全在新的事物。

一九五九年庐山的大风波，原因很复杂，这同当时有兴风作浪、唯恐天下不乱之人，也有关系。七月二十三日，正式宣布批判彭德怀同志之后，我和家英等四个人，沿山漫步，半天也没有一个人讲一句话。走到半山腰的一个石亭中，远望长江天际流去，近听山中松涛阵阵，大家仍无

言相对。亭中有一块大石，上刻王阳明一首七绝，亭柱却无联刻。有人提议：写一首对联吧。我拣起地下烧焦的松枝，欲书未能时，家英抢着写了这一首名联：

四面江山来眼底

万家忧乐到心头

写完了，四个人依旧默默无声，沿着来时的道路，各自归去。

家英当年跟我谈过，如果允许他离开中南海时，想提三条意见，最后一条是：不要百年之后，有人议论。应当说，这是一个党员对党的领袖最高的关怀。在山上开“神仙会”阶段，由于我的不谨慎，将这三条意见同一位有老交情的同志谈了，开大会时被捅了出来。此事当时虽被“掩盖”过去，仍然影响到家英后来的处境，使我长期耿耿于怀。在山上时，我曾有过一种很悲观的情绪，向家英流露过。开完会，回到北京之后，他特地跟我通过一次电话，其中讲了这样一句话：“我们是道义之交。”不幸被人听见，几天之后，我家中的电话就被拆除了。

一九六〇年到一九六一年，我在北大荒劳动。前期在一个村子里，同老乡三同；后期调到虎林西岗农场场部，场部的生活条件稍好一些。由于身体关系，一九六一年底调回北京。其后两年，我独自一人在京闲居。两年间，同家英见过三次面，都是电话约到市内某一新华书店碰面，然后带着大口罩，漫步街头，找到有单间的饭馆，继续过去那种长谈。第一次碰面，我才知道在北大荒调到场部，

是他和别的几个关心我的同志作的安排。七十年代初作的杂诗中，曾记述此事："打起精神学打场，忽然意外转西岗，长安故旧多关切，不忍其人葬大荒。"这次在饭馆谈了一个下午，谈到北大荒当时少见炊烟的暮色和农民的挨饿景况时，我很动了感情。家英也谈起庐山会议之后，他所受到的种种冷遇。我们都有这样一个共同的愿望：国家和人民再也经不起折腾了，今后无论如何不要再搞大运动了。分手前，一起哼成了下面这首诗：

闹市遮颜过，胡同尚可行。
人间多雨露，老友系诗情。
冷眼观尘世，丹心向众生。
炎凉何必叹，把酒贱浮名。

一九六三年十二月，我被派到大别山中一个水电站去当文化教员。离京之前，与家英话别，到后海岸边散步，深夜又到一个小酒店喝酒。当然，谈的主要还是当前大事。他正参加起草农村工作的后十条，说不久后，我会听到传达的。他谈此事，也是让我对形势放心之意。临分手时，走过景山很远了。对我的遭遇，这夜他特别感慨系之，又讲起吴季子来。夜半回到住处时，不能成寐，直到吟得下面一律，才勉强睡去：

客身不意复南迁，随遇而安别亦难。
后海林荫同月步，鼓楼酒座候灯阑。
关怀莫过朝中事，袖手难为壁上观。
夜半宫西墙在望，不知相见又何年。

真没料到，这夜竟是我同家英的永诀！“文化大革命”前的几年，虽然相约，如有事就直接通信，但接受山上的教训，莫再连累他，一直没有给他写过信，上面这首诗他也不知道。

一九六七年四月，我曾回到北京一次，才知道家英已不在人间了。前些日子见到董边同志时，她比较详细谈了一九六六年五月二十三日，家英被迫害致死的情况。二十一日“中央文革”来人通知，两条罪名：同当时被批斗的办公厅负责同志关系不正常；一贯右倾。撤职交代，搬出中南海，并收走了全部文件。随即又听到办公厅大会上宣布了另一条罪状：篡改毛主席著作。这是指整理有关《海瑞罢官》的谈话时，他不赞成将彭德怀写进去。他这时面对着两个大敌，陈伯达与江青；还有一个小人叫戚本禹。他很愤慨，对妻子说道：“我的问题是陈伯达和江青的陷害。真想不到兢兢业业十八年，落得如此下场！”“那些坏人、恶人，终会得到恶报。”记得鲁迅谈到自杀时，说过这样的话：自杀是对环境的一种抗议。家英之死，是对当时环境的抗议。

七十年代初，住在秦城监狱怀念家英时，还作过这样一首七律：

古柳安详围海边，园中深院院中园。
多时不见忽相忆，无事而来乱扯谈。
世界纵横三万里，古今上下五千年。
戏言犹记料身后，又是黄昏絮满天！

家英专搜集清人字，我则兼搜字画；曾戏约后入土者，有继承权。董边同志告诉我，家英的藏书只收回很少一部分，有些难得的字条已散失，我送给他的一幅郑板桥字还幸存。收回的书籍中找到一本有我签名的日本版《东洋读史地图》，就带回留着纪念了。

这篇琐碎的"怀念"该结束了。但是对家英的怀念是永远不会结束的。

一九七九年十二月

总理在我心中

一九七九年一月，回到离开了二十年的工作岗位。好些同志跟我谈到，一九七二年十一月间，葛洲坝工程发生问题时，总理为此召开了三天会，在会上讲了这样的话：李锐在哪里？他当年对三峡的意见是正确的，他就不赞成先在干流修坝，主张先开发支流。当总理听到有人说我还被关着时，就接着说：李锐还关着？可以给他做些事嘛，别白吃饭，提些意见，也是劳动嘛！这是一九七二年初冬。总理在国务院的会议上说了这样的话，我仍然只能继续被关在秦城狱中。有关我的这一段话，当时下面都听到了传达，使得关心我的人知道此人还活着。可是，北京反而听不到传达，无人过问此事。由此就不由得不想起一九四四年类似的事情，情况却完全两样。一九四三年初，康生在延安大搞"抢救运动"，一大批新老干部被当作"特务"关押起来。我被关在保安处监狱。一九四四年六月，重庆有一个中外记者团要到延安来访问，其中有一个国民党报纸的记者是我小学同班同学，我向党反映了这一情况。总理立即吩咐有关方面，将我提前释放（释放之后才做正式结论），以便那个记者到来时，我可以做点统战工作。同时

对我当时生活上发生的一个不幸也作了照顾。后来总理在重庆，还对认识我的人谈起这件事。因为我是一九三九年底在重庆结婚后去延安的，在重庆有许多熟人。多少人写文章，怀念总理对干部、对普通人的关心，我这也算一个例子。

“文化大革命”时，在漫长的单监生活中，为了不让自己的脑袋变成木头，精神有所寄托，我于是学做旧诗，其中有不少咏人物诗。怀念总理时，做了这样一首七律：

半多世纪活青史，万里征途挑担人。
十载来回之字路，五朝更迭老臣心。
内忧外患千重变，樽俎沙场百战身。
管乐武侯皆往矣，神州代代沐甘霖。

在狱中前五、六年只有一张报纸可看，每见到总理接见外宾时的照片，总是久久凝视。一方面感到宽慰：有他忍辱负重，维系国命；另一方面有种说不出的难过：何时才能再见到他呢！

我没有在总理直接领导下工作过。由于参加黄河和长江的规划，特别是一九五八年南宁会议到一九五九年庐山会议的一年半中，同总理接触才比较多了，有时还能跟他随便闲谈，有一次他还特别问到我的家庭情况。人们谈到总理日理万机，都有无论巨细、事必躬亲的印象。我也谈两件往事。

关于三峡的上马之风，大概是一九五六年刮起来的。总理受命管了这件大事。他找我个别谈过，听取我的意见，

还要我把有关的材料、图纸给他看。一九五六年或一九五七年，国务院一次议论三峡的会议上，众口一词认为应尽快动工。我提出了不同看法。总理严肃地看了我一眼，大声说道：有一个人说困难，这很好。毛主席多年来听了主管长江工作的同志的宣传，很赞成修建三峡这个工程(因此写了"高峡出平湖"的词句)。后来一九五八年一月南宁会议上，听取了两方面意见之后，采纳了我的建议，否定了快修大三峡的方案。三月间，由总理主持，国务院各有关部门、地方负责同志和中外专家，乘轮查勘过一次三峡。这时"大跃进"的高潮正在开始，于是三峡上马的呼声复起。我的狱中回忆水电八年的纪事长诗中，有八句写此情景："当年大跃进潮头，诸公衮衮峡中游。美人沱觉花岗好，南津关为乳洞愁；评头品足观坝址，阔论高谈坐舸楼。话不投机惊满座，区区总算逆潮流。"七、八两句是说，在船上开会时，总理让我第一个发言，我仍然"舌战群儒"，大唱反调。到了重庆，总理主持了这次查勘的汇报会。随后我跟总理到成都，参加中央的成都会议。这次会议为"大跃进"通过了许多决议，唯独有关三峡的决议，没有什么"大跃进"的味道。决议中说："从国家长远的经济发展和技术条件两个方面考虑，三峡水利枢纽是需要修建而且可能修建的；但是最后下决心确定修建及何时修建，要待各个重要方面的准备工作基本完成之后，才能作出决定。估计三峡工程的整个勘测、设计和施工时间约需十五年到二十年。"决议还特别指出："在防洪问题上，要防止等待三峡

工程和有了三峡就万事大吉的思想。”并且正确规定了长江规划的基本原则:“需要正确解决以下七种关系：远景与近景，干流与支流，上中下游，大中小型，防洪、发电、灌溉与航运，水电与火电，发电与用电（最后两种关系是毛主席加的——作者）。这七种关系必须互相结合，根据实际情况，分别轻重缓急和先后次序，进行具体安排。三峡工程是长江规划的主体，但是要防止在规划中集中一点，不及其他，和以主体代替一切的思想。”回头来看，一九五八年初正是吹响“大跃进”进军号角之时，能够产生这样一个切实的决议，二十多年之后依然可以作为长江规划的指导方针，这自然是由于总理亲自抓了这件大事。

葛洲坝工程举世闻名，技术上有很大成功。但一九七〇年是在没有作出初步设计的情况下，被逼迫仓促上马的。由于泥沙淤积、坝址地质、枢纽布置等一系列重大问题没有查清落实，后来只好停工二年。在停工前的一九七一年十一月八日、九日和二十一日，召集各有关部门的负责人，总理主持开了三天会，从规划方针、设计到施工，逐个问题进行讨论。在讨论过程中，他极其严厉地批评了急躁蛮干、不实事求是、不总结经验教训和不敢坚持真理的思想作风。他讲了很多语重心长的话，批评了海阔天空、好说大话、好“办大事”的人。他说，长江出了乱子，不是哪个人的事，是整个国家、整个党的问题。当问到丹江口工程为什么还没有总结经验时（丹江口因施工质量等问题，曾经停工两年整顿过），总理说：要不断总结经验，我们

不愿总结经验，吃亏很大。水利部门二十年不愿总结经验，是吃大亏的事，走了许多弯路。总理谈到，他二十年关心两件事：一个上天，一个水利。水利是关系人民生命的大事，“我虽是外行，也要抓。”他说，中国水利至少有三千年的经验，“这是科学的事。都江堰总算个科学，有水平，有创造嘛。两千年前有水平，两千年后我们应更高嘛。现在有这么多科学试验，还总是出乱子。长江总是顾此失彼，总是不完全。”总理确实抓了二十年水利。三门峡工程教训很深，其改建也是由总理主持定案的。对葛洲坝的上马，在会议上他作了自我批评，说热心家逼着上马时，“我当时没有顶住，被你们一哄，我就顶不住。每次都是这样。”会议上也反映了一些具体技术问题，对那些好似专家的说法，他都作了独立的判断，不为左右。如关于模型试验，对话是如此精辟：水利是同自然界打交道，与工业机械的模型试验不同，水的变化很大，模拟很复杂。各地水文、气象等等条件不同，要多作模型试验、水工试验，也不能只在一个地方做。“水那么柔，但又那么猛，势不可挡，模型还不能全面反映。”他还说，“原则大方向对了，具体问题错了，也可能犯大错误。”当长办的负责人谈泥沙问题，“静水通航，动水拉沙”时，总理说，“我对这个问题保留意见”；当这个负责人主张先修三峡高坝时，总理说：“你对高坝说得那么容易，我对这个问题是战战兢兢，如临深渊，如履薄冰。可不要太自信。”当谈到修建葛洲坝原先曾有过不同意见时（赞成先修三峡的人曾正确地反对过先修葛洲坝，认

为颠倒了次序，建成以后对三峡施工不利；葛洲坝是三峡水电站下游便于航运水流稳定的反调节水库），总理说：不坚持真理行吗？自己如有经验，但不坚持真理，这是党性问题，比路线错误还严重。总理在提到我的时候，还这样说："总得有对立面，没有对立面危险得很。要有对立面。"他说，一个共产党员要敢提意见，决不能放弃原则。原则问题，一点也不能含糊。要对人民负责。急躁情绪，二十年都在犯！屡犯屡改，屡改屡犯。同志们呵，这是我们的总理的遗言！

三峡，葛洲坝，这是大事。还记得这样一件小事。一九五六年，西哈努克亲王来访，宾馆在东交民巷。那年电力部在北海公园内办了一个小型水力发电展览会，有新安江等许多颇为生动的模型。总理来看过，觉得很好，于是叫我选择几个模型，放到宾馆中，让客人看看。模型在宾馆安置好后，总理特地来仔细看了一遍。来时天色已经很晚，我有点抱怨，说等了好久。总理轻声地对我说：有时我还不是跟你一样，我的时间也并不能全由自己支配。尽管已经很晚了，总理还楼上、楼下，逐间房子查看有无什么不妥之处。

一九五九年四月上海会议时，已开始讨论压缩五九年钢铁的高指标等问题。会前我曾给毛主席写过一封信，谈"大跃进"、高指标的问题，此信给计委负责同志抄寄了一份。毛主席在开会之初找我谈话时，批评我胆子小，不敢惹事生非，"怕鬼"。谈话后，我壮着胆子又写了一封信。这就

是毛主席在会议结束时的长篇讲话中，有一个题目是“李锐怕鬼”的由来。总理知道我写了这样两封信，是非常高兴的，在工交系统的小会上特作表扬。这时，新安江水电站正在施工高潮，因为水泥供应不足，我曾带总工程师找过总理，得到解决。经不住我的极力动员，上海会议结束后，四月九日，我陪总理到新安江参观了半天，爬上大坝察看了混凝土浇捣的情况。参观之后，他很满意，作了这个在中国水电建设上有历史意义的题词：“为我国第一座自己设计和自制设备的大型水力发电站的胜利建设而欢呼！”是的，新安江水电站的建成是值得欢呼的，这座在当年可算得世界上的大型水电站，其施工质量，造价少于预算，工期不到四年即发电，确实是值得欢呼的。

同总理最后接触的日子，是一九五九年庐山会议。这两个月的经历，记忆犹新；总理的音容风貌，历历在目。彭总的信印发出来之后，议论多集中于此。七月二十日左右的一个晚上，在那个小礼拜堂的舞会上，同总理坐在一起。我问他，对彭总的信，有什么看法。他说：那没有什么吧。意思即这是一种很正常的情况，因为每次中央会议总是要印发许多传阅文件的。从七月十二日到二十二日，总理三次找国务院各部开会，谈形势，摆问题，算细帐。特别讲到陈云同志历来强调财政、物资、现金三个平衡，要略有节余。一九五八年全冲乱了，综合平衡工作没有做好，单生铁即贴补了十五亿。认为继续跃进，过分紧张，不能这样过日子。当时总理日以继夜，集中精力调整当年

计划，安排好基建摊子。可见七月二十三日以后，会议的“反右倾”，批判彭总，总理也是缺乏精神准备的。会议后期，我也大挨批判之后，总理还找我谈过一次话（彭真和尚昆同志在座），严肃而又亲切，鼓励我以后好好学习。

总理逝世时，我在安徽大别山中参加劳动，早晨突然听到哀乐，无限悲痛，无人可诉，暗自流泪。后来看到总理逝世纪录片，做了下面这首七律，以寄哀思：

世间多少悲酸事，未有伤心似此晨；
九万万人齐泪下，三千千界共旌升。
音容宛在春风暖，教诲犹蒙冬日亲。
望断灵车不复返，长号顿作巨雷奔。

一九八〇年二月

想念你啊，文立徵

寇逼徐州入鲁先，
得知消息换人间。
忠魂定不回衡岳，
日出当观泰岳巅。

——《龙胆紫集·哭文立徵》

七十年代初，在京郊秦城狱中怀念老友立徵时，作了上面这首绝句。我们是平津失陷后一起到济南并留在山东的。一九三八年三月，我到武汉开会，碰到立徵从鲁北前线辗转回后方找组织关系。于是我介绍他入了党，一起来到徐州；他和同行的十几个青年同志，立刻被苏鲁豫特委派到鲁南开辟工作。我们就此分手，一直不通音讯。一九四九年南下途中，遇到山东的老同志，才知立徵于一九四五年初在鲁南游击区牺牲了。

去年一月我重新回到工作岗位后，立徵的一位表弟不断来信，为的是立徵老家湖南衡山县，由于"找不到入党证明人"，多年来不承认立徵的烈士身份，甚至还有说他是伪军的。表弟寄来一厚本复印的二十二个人写的证明材料，他们都是立徵的战友和同事，有省军区政委、军分区司令

员、特级战斗英雄、游击区区长、影片《大浪淘沙》作者，等等。这时我才发现，我的这位老同学、好朋友文立徵，原来还担任过赫赫有名的铁道游击队的政委。

现在的年青人呵，你可曾知道，你们从电影和小说上认识的那位铁道游击队政委，牺牲时还不过三十四岁；他家中富有，是国民党一个高级军官的儿子；他在北平辅仁大学学化学，英文很好，又爱好文艺，会吹口琴，还喜欢照相，写得一手好字；抗战期间，他在鲁南艰苦的环境中打了八年游击战；他只有短暂的初恋，没有结婚……。

为了敦促我写一篇纪念立徵的文章，他的表弟又寄来珍藏的立徵于一九三四、三五两年写给弟弟的十五封信，其中有一九三五年十二月十一日、十八日两信，详细描述了“一二·九”和“一二·一六”两次参加游行示威的悲壮情景。“一二·九”的当夜，立徵就给我写了信，告知游行队伍怎样在王府井南口同警察的水龙、皮带奋战。我收到这封信后，即用报纸抄好，张贴在文学院大门口，燃起了武汉大学同学们的愤怒之火。

在中学时，立徵是一个非常用功、沉默寡言的人；午饭后必临魏碑，当作午休。我们直到高三才成为好朋友。这是由于两人都爱读邹韬奋编的《生活》，都好写白话文，一起办班上的墙报，常常旷课同去看联华公司的进步电影，我们的政治思想倾向完全相同。一九三四年上大学后，我们每周通信，从不间断；谈论的范围很广，“一二·九”前后，华北形势、国家命运成为主要话题。当年的辅仁是有

党组织的，大概由于立徵沉静内向的性格，以及学校生活环境，没有可能同组织中人接触。一九三七年五月，我离开学校来到北平接党的关系。六月间，他就正式办了退学手续，跟我住在一起。遗憾的是，当时没来得及介绍他入党；但他从我处看到了许多党的刊物。他也自认为自己已象我一样，是一个共产党员了。一九三七年八月到达济南后，我们就决定不回后方，留在山东打游击，接受组织的安排，进了韩复榘第三路军的抗日军政工作人员训练班。大概从这时起，他的性格和作风，有了某种根本的变化。

从一九三八年三月后，我和立徵虽然没有再生活、战斗在一起，但这一厚本证明材料告诉我：这个沉默寡言，曾经热心于化学试验的人，由于斗争的需要，从参加“一二·九”运动的普通一员，成长为一名深受鲁南当地人民爱戴的游击战士和指挥员。鲁南人民义勇总队和鲁南民众抗日自卫军，都是一九三八年春夏间建立的党领导的群众武装。立徵参加这个部队后，就改名文立正。据当时在这个部队任政训处长的朱道南同志说：“我只兼名义，实际工作由文立正做。一九三八年三、四月间，我们带义勇队一个大队到台儿庄一带活动，随即回到峄县四区，和国民党几个比较进步的司令共同协议成立了山外抗日联合委员会，办了一个青年训练班，由文立正负责主持。一九三八年七月，同党有统战关系的国民党特种工作团第五大队的邵剑秋，抗日坚决，政治进步，一再要求立正到该部工作。特委即派立正以公开共产党员的身份到第五大队，在那里发

展了党员，建立了党组织。立正的威信甚高，为所有的干部和士兵所爱戴。”一九三八年秋，朱道南到国民党第三专署保安第五旅工作，这是一支带土匪成分的队伍，工作很困难。朱道南就向山东分局统战部要求，立徵又被调来当政治部主任。这支部队整顿好了后，一九三九年秋，立徵又被调回第五大队。朱道南说，“当年冬，邵剑秋部正式改编为八路军一一五师运河支队。这可说是文立正同志初期工作的一大成果。”

立徵在第五大队和运河支队工作两年多，邵剑秋至今非常怀念他。他写的材料说：第五大队成员都是自愿集合起来抗日的老百姓，只有朴素的民族意识，对抗战的持久性、艰巨性认识不清，更不懂得革命的道理。立徵在部队教政治课，讲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教唱抗日救亡歌曲，用油印印成带画的书，极受战士欢迎，终于使这支部队成为有纪律、有觉悟的抗日部队。在运河支队成立前，干部和战士都叫他文老师。这支部队在立徵的教育指导下，在军事上也懂得了游击战术，除了一般战斗外，打过好几次比较有名的胜仗。如在津浦路上唐湖车站附近袭击日寇军用火车，在津浦路侧伏击汽车，曹家埠歼灭战，夜袭利口铁矿，奇袭唐湖车站据点，等等。这都同立徵的正确指挥有直接关系。在抗战年代里，部队物资供应极端困难，吃饭、穿衣全靠当地群众。在日寇扫荡、围剿、封锁和日、伪、顽合流向我们进攻的情况下，常常吃不饱、穿不暖。立徵爱吃高粱煎饼卷辣椒，常穿一件破棉袍。

一九四一年三月，立徽被鲁南军区派到第三军分区任副政治委员兼政治部主任。这个地区即现在的临沂、郯城、邳县、枣庄平原地区，是当年非常艰苦的游击区。一九四三年到峄、滕、沛地区检查独立支队工作时，因政治委员牺牲了，即留立徽任独立支队政委，并兼任过八个月铁道游击队政委。后来由于小说和电影的关系，铁道游击队真是十分出名了，当年配合铁道游击队工作，在临城六区当区长的范有功，追忆起政委文立徽的时候，叙述了当年他在游击队的一些生动场面：为了应付敌人，他穿着褴褛的衣服，戴一顶破毡帽头，穿一双铲鞋（一种很结实的布鞋）。真象小说上写的李正，穿一件破烂棉袍，束一根用布旒子编成的腰带。他个儿矮，袍子太长，就把前大襟翻起，掖在腰带里。破裤子也补满了白、黑、蓝各色补丁。他常带两支短枪，掖在胸前袍子里。战士们在铁路上斗争，都穿一色服装，很“阔气”，都有手表、好枪。文立徽等领导同志跟随队伍在周围村子里隐蔽指挥。当时护送干部过路，他总亲自参加。记得有一次大清早，见他毡帽上沾有稻草，准是夜里在哪个草堆里“歪块”（随便躺）了半夜。当时生活很苦，几个小枣也算一天口粮。有一天，他拿着一小块果子饼认真地对范有功说：“伙计，咱们今晚有饭了。”他非常爱学习，军装上衣和大襟衣的口袋里，全是自己用布面钉的小记录本，写满了密密麻麻的铅笔字。他很沉着，遇事总要弄个清楚，不轻易下决断。他非常乐观，对人总是和蔼可亲，从不高声说话。他是领导干部，在群众中却很

活跃，会吹口琴，总随身带着，一边吹，一边还教小孩们跳舞。

一九四五年二月，立徵到当时的临城县六区（今滕县西岗公社）检查扩军情况，这一带群众都亲热地叫他文科长。这里是游击区，他住在丁家堂村。区武装队的一个副班长是内奸，勾结伪专员大汉奸申宪五的匪军，于二月二十二日深夜突然袭击，立徵不幸遇难。滕县以西、微山县以北广大群众，知道文科长在丁家堂牺牲了，称这次事件为丁家堂惨案。一九四五年和一九四八年，这个内奸和申宪五先后被我军捕获，在当地开了公审大会后枪决。

立徵牺牲之后，广大干部和群众十分悲痛，从当地一个大地主家找来一口柏木棺材，将他的背包、衣物一起入殓，埋葬在丁家堂村；在追悼会上唱了临时编的挽歌。解放以后，西岗公社、丁家堂村等地群众每年清明和国庆节，总有几千人到文科长墓前开纪念大会，献上花圈，安上高音喇叭，宣传他的英雄事迹。

相信立徵家乡湖南省衡山县的人民，也一定会以故乡出了这样一个人民的好儿子而引为光荣。忠魂呵，你现在可以回衡岳省亲，看望看望家园了。

一九八〇年十一月

附记：

这篇文章在《中国青年报》发表以后，我仍然继续在收集有关立徵生平的资料，重要的有立徵表弟陈铁如为他撰写的小传，有立徵

的辅仁大学同学许衍梁写的回忆材料，有邵剑秋写的《运河支队回忆录》稿本的有关部分，还有梁再写给我的谈立徵在游击队情况的信，等等。其中不少材料正好补我这篇短文的不足，现在节录一些在下面：

据陈铁如撰小传，立徵字国遒，一九三七年在韩复榘的抗日军政工作人员训练班时的化名是赵宓。衡山东湖天柱寺（今东湖公社高峰大队第二生产队）人。一九一一年四月十四日生。祖父文山玉的职业是翻盖草屋的泥瓦匠，当地称为盖匠。父亲文九德，毕业于保定军官学校，北伐战争中曾在唐生智为军长的国民革命军第八军任团长，后任黄埔军校长沙分校少将总队长。一九二七年立徵考入长沙岳云中学。他在高中还没有毕业的时候，就在寿康里自己家里为贫苦儿童办了一所半日制学校，自己讲课，免费发给课本和学习用品。

一九三七年八月中旬，我同立徵到济南后，曾一起到他的辅仁同窗好友许衍梁家去过。许衍梁现任山东科协副主席，他的回忆材料说："一九三四年文立徵同志考入北平辅仁大学化学系。那时，我是历史系三年级的学生。我与他，还有两位化学系的新生，四个人共住一间宿舍，直到一九三五年暑假我毕业为止。化学系主任是美国人司徒豹，对教学和实验都抓得紧，学生（尤其是新生）感到压力很大。立徵学习很刻苦，很少参加娱乐活动，几乎每天下午都呆在实验室，晚上就呆在图书馆。他不大讲话，不爱说笑，很憎恶某些同学的名士派头和公子哥儿气。他身材较矮小，但结实，生活衣着都很俭朴，很突出的是爱整洁。每天午饭后必临大仿一两张，从不间断。他喜欢古拙有力的字体，这一点我们有同好。他也确是人如其字，颇有刚劲厚重的气概。我们同住一室的一年，正是日本侵略加剧，华北岌岌可危之时，记得立徵在言谈中，常表示痛感国家民族的危亡，痛恨国民党当局的误国和自己的报国无门。"抗日战争开始，韩复榘的第三路军政训处办起抗日军政人员训练班，吸收了大批平津流亡学生，立徵也参加了。毕业后分配到鲁北，他就把几

个口琴和他手抄的几本琴谱存放我家，动身前往城武去打游击。临行，他送了我一只常用的桃源石笔架，我将自己的一只军用皮挎包和一支短剑送给他，作为纪念。这以后他从前线到济南来过一次，风尘仆仆，更显得黑瘦。我邀他到铭新池洗澡，他满身虱子，一边捉，一边谈，谈发动群众的情况，组织抗日力量的经过，生活的艰苦，很激昂。也是这一次，他和我谈及了他的父亲，姊妹，家住在长沙小吴门外……。这是我和他的最后一面。解放后征集党史资料和烈士传记材料，我就写了一份他在辅仁求学时的情况，并把他手抄的琴谱和他送我的桃源石笔架作为烈士遗物，送交了济南市委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

邵剑秋《运河支队回忆录》的稿本中谈到，当时国民党军委会战区特种工作团第三总团的团长陈中柱、第二分团的分团长陆仰山欺骗他们，想把他的队伍拖到苏北去，说什么苏北未沦陷，还有中央军，部队去苏北补充枪支弹药，换发军衣，装备好了之后再回鲁南抗日。邵剑秋信以为真，一九三八年九月就率部跟随陈、陆越过陇海铁路南下。为了掌握部队，经特委同意，立徵随军行动。到淮阴后，他们将邵部编为一个营，一个月间，只是不断地整编、检阅、点验和请客宴会。至此，邵剑秋才知道陈、陆等人不过是借抗日之名扩大部队以图升官发财。十一月日寇进犯苏北，坦克、骑兵、炮兵一齐出动，而陈、陆却命令游击队去和机械化部队打阵地战，使部队遭受到惨重的损失。立徵和邵商量，决定脱离陈、陆的控制，连夜带部队回鲁南根据地去打游击。于是邵剑秋带着第三营，立徵和王墨卿、翁剑秋（此时这两人已由立徵介绍入党）带着第一营分头行动。立徵他们在过了陇海路以后，遇到国民党石友三的部队，文、王、翁三人认为是友军，前去联系，当即被扣。部队也被孙茂墀部堵截缴械，损失殆尽。文、王、翁三人被扣后，押送到石友三总部，当时张友渔在石部做统战工作，立徵认识张友渔，他们才得释放脱险，与邵部汇合。到一九三九年初，游击队和峄西游击区又得到了一些恢复和发展，陈中柱和陆仰山又来信拉邵剑秋，给了一

个“特种工作团第二分团”的番号，国民党的鲁南第一行署主任蔡少衡也想把邵部编成他属下的一个大队，并送来了关防和现金，同时写信来:“当今天下大势，不归于杨，则归于墨，何去何从，请君自择。”这年秋天，八路军一一五师罗荣桓政委率东进支队到达鲁南抱犊崮地区，与鲁南人民抗日义勇队会师，取得了一系列的战斗胜利。邵剑秋认识到：我们要抗日，只有跟着共产党，参加八路军。为了作出决定，召开了全团的干部会。邵剑秋在他的回忆录中写道:“会上绝大多数意见一致，这与平时文立正的帮助教育是有直接关系的，真是水到渠成。”一九四〇年元旦，正式宣布了八路军一一五师运河支队的成立。

梁再同志给我的信中说：

我和文立正同志初次共事是一九三八年夏天。我们在一起办过一个“抗日训练班”。

为了说清老文的工作和作用，先得写点当时当地的形势。他是随同党领导的游击队出山的；但那个队伍并未用八路军的番号，先叫“抗日义勇队”，后来在国民党的专员公署接受一个番号。他们南下到运河北岸的阴平、周营一带，距活动中心的抱犊崮山区一百多里。那里是几个土地主的天下，有的地主有“保家”的武装，有些还任国民党政府的区、乡长之类。少数中小地主家的子弟在外面上过学，有抗日救国的思想，抗日战争爆发后，他们中有的人就组织抗日游击队，其中影响较大的是邵剑秋和孙伯龙两部，战士大多数是贫苦农民。那时国民党的各派也到处拉拢武装，他们也就领得“国民革命军”什么什么游击队的名义，但同他们所属的上级既无政治关系，也无较好的人事关系，其实是独立自主，并也孤立无援的（这孙、邵两部的关系倒始终不错，后来合编为运河支队）。

义勇队南下，就是以朱道南同志为代表来做统战工作的。来后道南提议三部合办训练班，培养干部，一下子号召来了几十个青年。这个训练班其实是老文一个人办的。我那时住在孙

伯龙部，也去参加了。我原是小学教员，主观上追求进步，但处境偏僻，耳目闭塞，对于怎样抗日、革命，所知甚少。训练班讲课大半是老文的事。他的大困难是语言障碍，鲁南话的语音和一些特别的词汇，他听起来很费力，他的湖南话别人也难懂，有时只好由我来当翻译。《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歌》也是他先教我，我再教大家。他告诉我，这歌是红军时就唱起的，但歌词改了，这修改也不知出自何人之手。我记得的是"第一抗战坚决抗到底，拼命（?）争取最后的胜利。第二服从上级的命令，抗战胜利才能得保证。第三不拿群众一针线，群众对我拥护又喜欢。"还教《救亡进行曲》，"牺牲已到最后关头"，这是我原来就会唱的。这个训练班只办了十五天，便被一次较大的扫荡冲散了，但它起了应有的作用，四五十个青年（连我在内）在这里听到了一些全新的道理，大部分参加了运河支队或进了抗大，成为革命战士，有的同志还为革命而牺牲了。

第二次共事始于一九三九年十一月酝酿成立运河支队的时候。一天，他告诉我邵部二中队长有些犹豫，要我以亲戚关系对他进行工作，可见他已能懂得大部分鲁南话了。运河支队编成后，他做政治处主任，我任宣教股长。在频繁的战斗中，我们的工作是十分紧张的：起草、印刷宣传品、编写唱词，拟写标语，每次更换宿营地，除了战后转移，他都布置并参加群众纪律的检查（送走铺草、扫净院子、赔偿损坏的东西，有时还要挑满水缸等），而我们的驻地几乎是一两天最多不过四五天就要换的。尽管移动勤，只要有可能他就做群众工作。记得有一个星期天，住到阴平附近了，阴平有个礼拜堂，他带了我们三四个人，径直走进去，牧师正在讲道，我们也做出个听讲的样子，等牧师讲完了，他过去和牧师招呼了几句，也就上了讲台，开口道："圣经第××页上说，上帝帮助能够帮助自己的人。"接着就讲起保家卫国、抗日救亡的道理，牧师也站在旁边听。我们几个得意地悄悄互视，返回驻地的路上，兴奋得大声说笑，

佩服他的见空子就钻。他说："这不是不用召集吗？我们的事业是正义的，任何场合都有可以运用的机会，只要先和人家有点共同语言。"

运河支队成立后，短期间里便洋溢着八路军的风气了，群众纪律严明。后经"三起三落"，与强大到无法比的敌人周旋了四五年，必要时人自为战，始终打不垮也拖不散。这与开端时老文的倡导有关，是他把宣传、鼓动、教育、检查那一整套方法与作风带到部队来的。如今想起，他分明是我的直接上级，可是当时我们这些下级大概谁也无此感觉。他的主意多一点，我们都高兴照着去做，于是成了大家的心意。这是一种优良的传统还是游击作风呢？经过了四十余年的岁月，老文的音容笑貌还历历如在目前。算起来，我们那时年龄相仿的一伙人中，一大半用鲜血浇灌了祖国的土地。这一番回忆对我自己是有益的，它鼓励我为恢复党的传统，依照他们当年的样子过好残年。

后来梁再同志又来了一封信，说：

我还向山东省军区托人查找老文的历史材料，寄来的抄件说：他的名字记在"鲁南"部分，简历为"曾任运河支队政委（主任），被害时任地委宣传部长"，牺牲日期和地点为"一九四四年秋冬在滕县城楼村被顽俘去杀害"。籍贯为"江苏铜山县"！（《山东军区抗日战争时期战史》附件：《抗日战争时期山东我军革命烈士英名录》）您看，与我亲见亲闻的无一相符！据说山东临沂烈士陵园抗日烈士英名录也有他的名字，可不知道是怎么写的了。若也与《战史》附件相同，则若干年后，人们可能以为在鲁南牺牲的烈士，有两位叫做文立正的！时隔不久，就这样人言言殊，真实情况太不易弄清了。

实事求是，何惜乌纱

——怀念周小舟同志

小舟于一九六六年十二月二十六日在广州含冤辞世，至今整整十五年了。

为查勘五强溪工程，一九七九年初秋到长沙，我去过小舟旧居。当时一阵莫名的寂寞之感袭来：蓉园已是花千树，不见周郎谈笑声。一九四九年南下湖南时，我与小舟在开封初会。大概由于是同乡，年岁、经历相差不远（他比我大五岁，“一二·九”以前入党），共同熟人不少，好尚又多相似，因而一见如故。湖南有句俗话：“长沙里手湘潭票。”“票”字含义不易说清，硬要翻译，假、大、空近似，即善耍嘴皮的漂浮人物。小舟是湘潭人，跟“票”恰相对立，是一个讲究实际的人。之后约一年半时间，正副职的工作关系，我们朝夕相处，意气相投，凡事直来直去，建立了友谊和某种交心关系。二十年后的寂寞之感，勾引起“大跃进”年代的往事：独自徘徊谁共语？到乡翻似烂柯人。“大跃进”尤其庐山会议这一段史实，最能说明小舟的为人。

一九五九年柘溪开工，五、六月间，我从四川、贵州、广西转到湖南。小舟约我到家中长谈。他正下乡一个月归

来，丰富了第一手资料，在省委常委会上提出农民积极性、公社供给制、大队核算、公共食堂、粮食与钢铁指标以及劳动生产率等十多个问题。关于“大跃进”一年来的看法，我们毫无忌讳，交换见闻，观点一致。虽是忧心忡忡，仍然谈笑风生。小舟是一个平易而谦虚的人，并不固执己见，尤不愿谈自己。从追悼会的悼文中，才知道一九五六年毛主席到湖南，见到大好形势，曾夸奖过他：“你已经不是‘小舟’了，你成了承载几千万人的大船了。”这夜的长谈，他却禁不住谈到他的“先见之明”。他说，湖南去年老挨批评，被插过白旗；可是结果插红旗的省粮食少些，插白旗的省多些。一九五八年十一月郑州会议之后，对粮食估产，他跟左邻右舍有过争论：要么你是官僚主义，要么我是官僚主义。因为湖南估得低，邻省估得高。还有密植问题，有的省过密，湖南较稀。从农民的一句老实话，“作了一天活，身上没出汗”，提出农民积极性问题。他不赞成办常年食堂，办食堂浪费物力人力。说公社供给制，穷的时候不能搞，富的时候也不能搞。还谈到一九五八年韶山大吃偏饭，粮食也只增产百分之十四。他的总的看法是，人心思定，需要冷静下来，总结经验教训。

因此，七月初开始的庐山会议前期，我与小舟来往较多。毛主席在会前视察过河北、河南、湖北、湖南四省，对湖南的工作颇加称赞。小舟带上山的三句话：“成绩很大，问题不少，前途光明。”被接受为会议的方针。当时少奇同志也反复讲：成绩讲够，缺点讲透。到七月二十二日为止，

会议还称为“神仙会”：交流情况，各抒己见。周总理三次找国务院各部开会，谈形势，算细帐，强调陈云同志的三个平衡。大家座谈之余，游山赋诗，心情愉快。毛主席的两首诗——《到韶山》、《登庐山》，正由小舟传播开来。这两首诗是主席写给小舟、乔木二人，附信征求意见的。小舟在抗战前后，当过主席的秘书，也爱好诗词（“小舟”之名，即由主席叫他“小周”而来）。我们同在中南组，开会后不几天，他就兴致勃勃地将两首诗写在我的笔记本上，并将原信给我看。诗中词句，同后来发表的微有出入。《登庐山》还有小序：“一九五九年六月二十九日登庐山，望鄱阳湖、扬子江。千峦竞秀，万壑争流，红日方升，成诗八句。”由此可见当时毛主席的松快心情。我的本子上还有董老亲笔写的一首七律，颈联为：“盘桓最好寻花径，伫立俄延读御碑。”这都可说明会议前期大家的情绪。

按六个大区分的小组会，讨论主席提出的读书（读政治经济学）、形势、任务、体制、食堂、学会过日子、综合平衡、产品质量等十九个问题。小组会上，可说议论纷纷，但一些比较尖锐的意见，如不赞成“以钢为纲”，公社化过早，等等，还不能完全畅所欲言。有不少同志护短，转不过弯，直至反对批评过分密植。小舟是率直而言的。我的笔记本上，记有他七月四日的发言：一千零七十万吨不如八百万吨；公社一股风，越包越多；总产值至多每年增长百分之十到百分之二十（按：其实这也很难做到）；基本建设搞得太多了，湖南省县以上一千个项目，只有三

百个经过批准。他还谈到食堂反对派的六条意见：不利于节粮、养猪、造林、积肥，而且浪费劳力，吃得不愉快。会议原准备半个月左右结束，主席指定乔木、小舟、家英和我等七人起草一个《会议纪要》，论述形势、任务、综合平衡、经营管理、食堂等几个主要问题，总结一九五八年的经验，指出今后方向。

此时发生的影响当代历史的不幸，即小舟同彭德怀同志的往来以及导致彭总写那封信。一九五八年十二月武昌会议之后，彭总来到湖南，由小舟陪同三天，到过湘潭乌石（彭总家乡）、韶山和株洲。沿途看到为搞居民点，有的房子迁拆一空；有上千人挤在一丘二十亩的田里搞深翻；听县委书记汇报粮食的困难情况；还看了一些土高炉。后来彭总又去平江。小舟介绍，这是个"刮共产风"较严重的地方，干部的强迫命令也厉害。他们之间谈得比较深。上山之后，小舟又找彭总谈过两次话。彭总表示，有些意见，希望同主席敞开谈谈，但由于自己个性，怕谈不好。小舟就根据眼前经验："我们同主席谈话很随便呀。"怂恿彭总去谈。原来七月十一日夜，主席找小舟、周惠和我去漫谈过一次（以后还谈过几次），谈得很是融洽。主席认为一九五八年的问题主要出在综合平衡上，说他自己有时也胡思乱想，有些事不能全怪下面和各个部门。还风趣地说，否则，人们会象蒋干一样抱怨：曹营之事，难办得很。小舟乘机而言：高指标是"上有好者，下必甚焉"。这夜谈话情况，小舟给彭总讲了。彭总于是决定给主席写一封信，反

映自己的主要看法。小舟还建议彭总根据在西北小组的几次发言，予以整理，系统写出，这就是后来批判彭总时，追究小舟为"宣传员"、"提供材料"和"当了参谋"的由来。

彭总的信是七月十六日印发给大家的。小组会议从此起了一些变化，多围绕这封信和《会议纪要》继续讨论形势。有些对情况了解不深、不全，特别是护短的同志，不很赞成彭总的意见，且多从一些措词上加以指责。康生和华东那个头头等人，更是兴风作浪。七月十九日，小舟在小组会上完全同意彭总的信，认为总的精神是好的，至于某些提法、分寸、词句，可以斟酌。他特别谈到得失问题：从具体问题来讲，得多于失，得失相等，失多于得，都是有的，要加区别。比如湖南搞了五万个土炉，有两万个根本没有点过火；有些地方晚稻并秧，大大减产，这就只有失而无所得。缺点少讲，或讲而不透，是难以正确总结经验教训的。正确地检查缺点，不仅不会泄劲，反而能够更鼓舞正确的干劲。他以为各人由于工作方面不同，接触事物不同，因而看法不同。大家一起讨论，从各方面把问题提出来，经过分析，就可以达到一致。

大家知道，七月二十三日主席作了反"右"的讲话之后，会议急转直下。小舟是第四个受到千钧压力的人，他虽然不得不作些过头的戴帽检讨，但没有生造或夸张一星半点事实；相反，他还为彭总辩护。八月三日小组发言中，小舟举出彭总跟他谈的两件事，以说明彭总自己承认"对主席的正确、伟大是逐步认识的"。一是井冈山会师，毛主席不

准井冈山的人议论湘南失败，以利团结。彭总说，可见毛主席的伟大深远精神。二是抗战初期运动战与游击战之争，彭总说，很久以后才认识自己的错误和毛主席的正确。这就证明彭总从心底敬佩主席。

这个时刻，我与小舟还碰过面，他非常感慨，说准备撤职，摘下乌纱帽，但希望有机会去办好一个农场。小舟是一个对革命对自己极端负责的人，也是一个重感情的人。由于主客观之势太不相容，许多事他想不通，非常伤心，非常痛苦。八月十三日写给主席的信中有这样的话："解剖我们自己，披肝沥胆，又感觉与实际情况确有出入。我想假若戴上（右倾机会主义）这样一顶帽子，我对主席、中央、全党、湖南党员和人民，甚至对自己的老婆和孩子，都必须说我犯了反党、反中央、反主席……的错误，然而再说下去，势必泪潸潸下，不尽欲言。"

去年到广州，见到小舟的夫人王宁同志，探问小舟辞世前的情况。我们党几十年历次政治运动，大风大浪之中，有许多同志能够立如砥柱，始终坚持实事求是，尊重客观事实。小舟正是这样坚持并以身殉的人。也许他一时有绝望之感，人谁不有一时的迷误呢？这只是说明他的极度认真，执着于自己的信念，而决不是脆弱。要知道，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精髓就是实事求是。

党已给庐山会议作了正确的结论。与此有关的受过委屈还活着的同志，如今都在各自的岗位上努力工作，可是小舟（和彭总、洛甫同志等一样）却以五十四岁的盛年抱

恨以终。小舟当年企盼的党的集体领导、高度民主生活，正在到来。每逢佳节倍思亲；欣逢盛世，怎能不加倍思念故人呢？神州遍地皆春色，只是词场少一人。小舟是爱旧诗词的。上庐山第四天，我的登含鄱口句："高处为云低处雾，笑谈不觉失群山。"颇为小舟称赏。故人谈笑仍如在，使我伤怀奏短歌。小舟同志，愿将下面这首七律遥祭你在天之灵：

周郎意气永兴叹，抛却潇湘第一官。
举世沉冤皆大白，当年遗愿可长安。
桃符旧岁翻新岁，流水前澜让后澜。
知己平生能得几？心香燃尽泪阑干。

一九八一年十一月

读《彭德怀自述》

一口气读完《彭德怀自述》，思绪万千，感慨无穷。历史何等公正，人民何等幸运，十年动乱之后，终于能读到这样一本惊心动魄、震古烁今的《自述》。

一九六六年十二月，彭老总从成都被揪到北京批斗游街，毒打致残，此后又被囚于暗室，专案审查，直到一九七四年十一月二十九日去世。去世前已瘫痪，他对最后被允许看望他的侄女说："这怎么办？这怎么办？我瘫了，可我的案子还没有搞清楚呀！"

《自述》是"犯人"的交代材料，作为对"专案审查"者的提问的回答："不准表功，只准老老实实交代。"这些多年反复交代的材料是为了弄清所谓"案子"而问而写的。可是我们现在读到的却是一部中国红军建军史、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三十年革命战争史；又是一个旧军队的士兵，如何毕生征战，终于成长为几百万革命部队统帅的历史；一个农民的儿子，怎样立志救贫，秘密结社，勤奋自学，终于变为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历史；总之，这是一个真正的共产党员、一个真正的人的历史。

彭老总一生的经历和成就，主要是领导打仗，《自述》

写的也主要是军事斗争。他的对手最早是北洋军阀和国民党的军阀，后来是日本的将军，最后是美国的上将。枪林弹雨，出生入死，何止身经百战。他起义参加红军前，从士兵到当班、排、连、营、团长，打了十二年仗。他是红军当年最有实战经验的军事家之一（还是红军中第一个会打大炮的炮手）。他一生打败仗不多，战场上犯的重大错误也寥寥无几；读完“解放战争”、“抗美援朝”两章，使人更加感到这是中外古今战争史上少有的统帅。朝鲜停战协定签字后，联军总司令克拉克曾对他的僚属说：“美国上将在一个没有打胜的停战书上签字，这在美国历史上是第一次。”（引自《自述》。以下引号中文均引自《自述》）

一九五八年四月从武昌到广州开会时，我同彭总住在一起。他知道我是平江人后，曾同我详细谈了平江起义的经过，还特别谈到他的一个心愿：今后想编写战史。战争是他的职业，他最心爱之物，一生心血倾注于此；往事，故人，战场，无不铭记于心。因此，尽管手边毫无可供参考的材料，身心又遭受如此严酷的摧残（独处暗室，想看见窗外一丝阳光而不可得），他却能将三四十年的战争经历、戎马生涯写得这样清楚，乃至许许多多地名、日期都准确无误。作为一部历史文献，尤其是那些无其他人能提供的历史事件细节的第一手材料，自然最会为人们所珍视，治史的人更会孜孜研究。读完全书之后，我首先想到的则是所谓“野心家”、“伪君子”以及“一贯反毛主席”的问题。这是一九五九年庐山会议时，林彪、康生等人对彭老总的

诬蔑、批斗的主题，直到去世之日，一直戴在他身上的如磐枷锁。在庐山时，虽然彭总的一生我知道得不多，同他本人的接触也很有限，但同许多同志一样，绝对不能接受这种对他的诬蔑。我也被迫作检讨时，坦然承认说过这样的话：彭总伟大，只有他敢于写这样的信。其实，当时这种认识只是晚辈的一种感觉；现在读完《自述》，更清楚了解一些历史关节之后，才使我真正知道彭总伟大在何处。

从《自述》中，可以举出红军初创时期的三件事，以说明彭总是一个何等赤胆忠心、照顾大局的人。

第一件事，率部守井冈山。一九二八年十一月间，平江起义开辟了湘鄂赣根据地，成立边区特委之后，彭总和滕代远等率领红五军中的五个大队（约七、八百人），前往井冈山与红四军会合。当时湘赣两省反动军队准备再次"围剿"井冈山。红四军约五千人，草鞋单衣，没盐吃，粮食很困难，只有离开井冈山到白区打土豪，才能生存、发展。可是上千的伤病残人员和妇幼无法安置，又不可能带走，势必派队留守。四军前委多次开会讨论，最后决定由五军这五个大队留守井冈山，让彭总兼任四军副军长。这是一个极其严重而冒险的任务。除彭、滕二人外，五军其他干部都不赞成留下，认为"我们是来取联络的，任务已完成，应立即回湘鄂赣边区，传达'六大'决议"。彭、滕"说服了不同意见的同志，准备牺牲局部，使主力安全向外发展"。当时敌人约两三万人，敌我力量悬殊达三四十倍。激

战三昼夜之后，五路阵地有三路被敌突破，彭总集合三个大队约五百人，带领伤病残员突围。“时值严寒，天下大雪，高山积雪尺许，我的干粮袋炒米丢失了，我不愿别人知道，两天未吃一粒米，饥饿疲乏，真有寸步难行之势。可是枪声一响，劲又不知从哪儿来的。”突围后又遇伏击，在赣南边界几县转战两个多月，巩固扩大了部队，打下瑞金，才跟四军重又会合。“我向四军前委汇报了撤出井冈山的经过。毛党代表说，这次很危险，不应该决定你们留守井冈山。”当时，毛主席是有自我批评的。

第二件事，反对一、三军团分家。彭总领导的三军团原是独立发展起来的，一九三〇年八月第二次打长沙，才同一军团联合成立一方面军。《自述》欣慰地写道：“从此以后，我即在毛泽东同志为首的总前委领导之下进行工作了。”这之前，中央二月来信，对形势估计错误，要朱、毛离开红军，当时，彭总就给中央写信，表示不同意：“时局紧张，主要负责人不能离开部队。”“信是由四军前委转的，原稿留毛主席处。”一九三〇年十一月，第一次反“围剿”开始时，因三军团所部多平江、浏阳与阳新、大冶人，有地方观念的干部反对过赣江，主张一、三军团分家，夹江东西而阵，各发展各的地区。而当时只有两个军团合起来，才有可能吃掉敌一个整师。《自述》说：“为了消灭敌人，必须反对地方主义，在政治上以朱、毛为旗帜，集中统一红军，一、三军团不再分开。我这一票在当时是起相当作用的一票，站在哪一方面，哪一方面就占优势。”彭总分析形

势，说明留在湘鄂赣的地方部队，可以坚持并扩大。“有意见到河东讨论，但不能妨碍行动，更不能说一、三军团分家。”毫无疑问，这是关系到第一次（及以后几次）反“围剿”能否胜利的大关节。

第三件事，揭露伪造信件。反第一次“围剿”是空前大战；毛主席制定的方针是“放开两手，诱敌深入”，即把敌人引到根据地内来打。当时，地方正打A B团，三军团转向中心地带，以至带路的向导也找不到。原来江西省委中有人怀疑这一军事方针，说是右倾机会主义、退却路线，他们要“打到南昌去”。于是发生封锁红军，散发传单，写大标语：“拥护朱彭黄，打倒毛泽东”等情况。这是分裂党、分裂红军的行动。这时彭总突然接到一封仿毛字体的署名毛泽东的伪造信件，用以挑拨毛、彭之间关系。他根据自己的认识，立即断定：“毛泽东同志决不是一个阴谋家，而是一个无产阶级政治家。这封信是伪造的，这是分裂红军、分裂党的险恶阴谋。”（这时发生的反A B团和富田事变，情况极为复杂，有待重新作历史总结。）他当天就召开三军团紧急前委会议，亲笔写了一个简短的三军团宣言，坚决拥护毛政委、拥护总前委的领导，即刻将宣言和假信送到总前委。第二天，三军团开到离总前委十五里的地方，“我亲自去请毛政委来三军团干部会上讲话，使三军团干部第一次看到毛政委。”

红军初创之时，党中央远在上海，各地红军揭竿而起，八仙过海，各显神通。如果说有“野心家”，这正是历代农

民战争最容易发生“火并”之时。然而从以上三件事，我们能从彭总身上看到一丝一毫“野心家”的影子吗?恰恰相反，他完全不顾一己安危、局部利益，而完全、彻底服从全局。他自从认识到毛泽东同志的革命品质和正确领导之后，就敬佩之、服从之。当然，他不是一个喜欢盲从的人，对某种主张还没有认识清楚时，也许要保留一时；某些具体问题，也许一直有争论。但纵观全部《自述》，彭总在整个革命战争时期是执行了党的正确路线的。在决定出不出兵援朝的那次中央紧急会议上，在大家着重谈了出兵不利的情况之后，彭总（从兰州飞来）进入会场晚了一点，听到别的同志转述了毛主席讲的这一段话:“你们说的都有理由，但是别人处于国家危急时刻，我们站在旁边看，不论怎样说，心里也难过。”接着读下面这段《自述》，能不感动吗?“我刚到，未发言，内心想是应该出兵，救援朝鲜。散会后，中央管理科的同志把我送到北京饭店。当晚怎么也睡不着，我以为是沙发床，此福受不了，搬在地毯上，也睡不着。”(失眠者仔细分析了国内外形势之后)“把主席的四句话，反复念了几十遍，体会到这是一个国际主义和爱国主义相结合的指示。……我想到这里，认为出兵援朝是正确的，是必要的，是英明的决策，而且是迫不及待的。我想通了，拥护主席这一英明决策。”这就使人想到，整整二十年之后，“这一票”又是相当重要的。

彭总的老战友、老部下所写的怀念文章，不约而同多用这一类的标题:“丹心昭日月，刚正垂千秋”；“神威不灭，

浩气长存”；“忠心耿耿，铁骨铮铮”；“英雄气魄垂千古，国际精神召万民”……。这自然是几十年的亲身感受，发自内心的由衷赞美。

可是，庐山会议却说彭总同毛主席的关系三、七开（三分合作，七分对抗），说他执行了立三路线和王明路线。《自述》对后者有如实的说明。一九三〇年传达立三路线，命令打武昌。彭总精通军事："前有坚城，后无退路，侧长江，背南湖。"真要打，"有全军覆灭的危险"，因此拒不执行。后来"妥协"一下：割据鄂南六县，打开岳州。七月，何键派三个旅进攻平江，三军团以八千人对三万之敌，三天打四仗，追歼溃敌，迅雷不及掩耳攻占长沙。"这在军事史上是不多的"。然而彭总却作了检讨："由于红三军团攻占长沙的胜利，对于立三路线，也起了支援作用。"八月，成立一方面军的会议上，经过讨论，总前委决定第二次打长沙。当时三军团半年内扩大了六倍，连续作战，没有休整。彭总说："我未发言。从三军团本身来说，迫切需要短期整训。"结果围攻长沙月余未下，后来经过毛泽东、朱德同志的说服，才撤出战斗，佯攻南昌，巧夺吉安。对此，彭总是坚决拥护和执行的。他是一个谦逊的人，从不掩饰自己的过失。在反四次"围剿"前后，由于执行了当时中央领导的打赣州等错误命令，《自述》中有深刻的检讨。他是一个刚直不阿的人，从不隐瞒自己的观点，尤其遇到重大关键问题，决不计较个人得失而率直陈言。反五次"围剿"前后，他已逐渐认识到王明路线的错误，从军事到政治，

有过一系列抵制，而且每次都是直接给当时的中央领导人打电报，其间还写过长信，只是从未得到过答复。彭总被人看作是张飞，他也以此自许，有时不免脾气暴躁一些。打仗的人，谁没有个脾气？由于不断唱反调，他被撤掉军委副主席职务。形势越来越严重，对比以前毛主席的正确领导，彭总对当时中央的错误看得更加清楚了。一九三四年春广昌战役时，中央领导人亲自到前线督战，强迫三军团打阵地战，固守广昌，遭到惨重损失。在指挥所里，面对面争执，彭总"大胆地准备个人的不幸"，历数指挥的错误，指着鼻子痛斥他们"是图上作业的战术家"，"崽卖爷田心不痛"。请看《自述》中正气凛然的记述："那次，我把那套旧军衣背在包里，准备随他（李德）到瑞金去，受公审，开除党籍，杀头，都准备了，无所顾虑了。"

抗日战争初期，彭总是否执行了王明路线呢？请看《自述》："至于'一切经过统一战线'这一条，原来思想上就没有准备实行。在当时，我们想，在日军占领区，蒋介石是去不了的，也管不着我们，一切还是照毛主席的独立自主方针办。到一九三八年秋六中全会时，八路军已发展到二十五万人，成立了许多暂编、新编、教导旅。这些从未通过国民党，如要通过它，一个也不会准。"

从长征到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抗美援朝，许多重大历史关节，彭总起过什么作用，众所周知，无庸赘述。所有这些，《自述》都有记载。但也有一些不为人知的细节。例如一九三九年冬彭总过西安，在程潜（时任国民党军委

会委员长西安行营主任）处当面大骂何绍南："再去绥德当专员，老百姓抓了你公审！"何未敢再去，绥德从此成为陕甘宁边区一部分。他还对程说："今天谁要反共，他先放第一枪，我们立即放第二枪，这就叫做礼尚往来，还要放第三枪。"一九四〇年第一次反磨擦战役，全歼朱怀冰两个师。当时处境严重，彭总来不及事先请示。"事后报告了中央，得到了认可。"又如，一九四七年三月，胡宗南进攻延安时，敌我兵力十比一，这时是彭总自动请缨的。

彭老总自幼没有读过多少书，在旧军队中靠自学提高了文化。在江西时，他曾觉得自己理论知识不够，颇有点"自卑感"。从童年起，他认识社会，体会人事，都是从自己的生活实践中来的。他的志向、思想、感情也大都不是从书本中来的。也许由于这些原故，他似乎很不习惯，更不善于为自己辩护。这可举长征时的会理会议为证。由于林彪想要改变军事领导的一封信，会议对彭总发生了误会。彭总并不知道写信之事。虽然"当时听了也有些难过"，"我就没有申明……，采取了事久自然明的态度"。庐山会议又重提此事。因此，《自述》总结了这种不爱申辩的教训："在这二十四年中，主席大概讲过四次，我没有去向主席申明此事，也没有同其他任何同志谈过此事。从现在的经验教训来看，还是应当谈清楚的好，以免积累算总帐；同时也可避免挑拨者利用。……象会理会议，我没有主动向主席说清楚，是我不对。"这是一个多么纯朴、多么过分自洁的人呵！

直到庐山会议，尽管种种诬蔑、斥责、非难铺天盖地而来，彭总仍然是照顾大局，不愿多作申辩。其实，“大跃进”时的种种问题，他早有察觉，部队中反映的有关材料，都及时给主席送去。一九五八年十二月，武昌会议公布粮产七千五百亿斤，他有所怀疑。随后到湖南视察，到了自己的家乡，情况更加清楚。他担心群众饿肚子，立即给中央打电报，认为不能征购一千二百亿斤，只能九百亿斤。会议初期，在小组七次发言，想找主席面谈未果，才一个通夜亲笔写了那封有名的信。通观彭总一生言行、性格和为人，不难了解，这完全是一件自然而正常之事，何况信中还肯定了“大跃进”的“伟大成绩”。《自述》最后这一段话，真是令人不忍卒读:“在会议发展的过程中，我采取了要什么就给什么的态度，只要不损害党和人民的利益就行，而对自己的错误作了一些不合事实的夸大检讨。唯有所谓‘军事俱乐部’的问题，我坚持了实事求是的原则。对于这个问题，在庐山会议期间，就有追逼现象，特别以后在北京召开的军委扩大会议时期（八月下旬至九月上旬），这种现象尤为严重。”有一次，“逼得我当时气极了，我说:‘开除我的党籍，拿我去枪毙了罢！你们哪一个是“军事俱乐部”的成员，就自己来报名罢！’”“在庐山会议结束后，我就想把我在军队三十年来的影响肃清、搞臭。”“我只能毁灭自己，决不能损害党所领导的人民军队。”

同所谓“野心家”是诬蔑之词一样，所谓“伪君子”，主要是对彭老总出名的生活俭朴、厌恶奢侈的一种故意颠

倒黑白的诬蔑。彭总的童年和少年，是在讨米、饿饭、砍柴、挖煤、当堤工这样苦难的生活中过来的。他的一个弟弟是活活饿死的。大年初二，祖母要带着三个小孙子出去讨米，“我立在门限上，我不愿去，讨米受人欺侮。祖母说，不去怎么办！昨天我要去，你又不同意，今天你又不去，一家人就活活饿死吗!？ 寒风凛冽，雪花横飘，她，年过七十的老太婆，白发苍苍，一双小脚，带着两个孙孙（我三弟还不到四岁），拄着棒子，一步一扭的走出去。我看了，真如利刀刺心那样难过。”写这些“交代材料”时，写到伤心的时候，我们威震寰宇的统帅，常常写哭了，眼泪打湿了纸张。“他们走远了，我拿着柴刀上山去砍柴，卖了十文钱，兑了一小包盐。砍柴时发现枯树兜上一大堆寒菌，拣回来煮了一锅，我和父亲、伯祖父先吃了一些。祖母他们黄昏才回来，讨了一袋饭，还有三升米。祖母把饭倒在菌汤内，叫伯祖、父亲和我吃。我不肯吃，祖母哭了，说：‘讨回来的饭，你又不吃，有吃大家活，没有吃的就死在一起吧！’”“每一回忆至此，我就流泪，就伤心，今天还是这样。不写了！”“在我的生活中，这样的伤心遭遇，何止几百次！”

彭总一生不忘本，一生关心、热爱劳动人民，始终保持最朴素的阶级感情，尤其严格要求自己，这同他童年的苦难生活分不开。“在以后的日子里，我常常回忆到幼年的遭遇，鞭策自己不要腐化，不要忘记贫苦人民的生活。”

在庐山时，彭总说过，他一生不保留笔记与文字材料。

可是他却为后代保留了这样一本《自述》。彭总很喜欢《离骚》中的两句:“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离骚》与《自述》相距两千多年，内容与价值自然不同；但两位作者的正道直行，竭忠尽智，志洁行廉，为后人之楷模，可与日月争光，则是相同的。这本《自述》应当向每一个青年、每一个共产党员推荐；这是一部做一个真正的共产党员、一个真正的人的教科书。

一九八二年二月

一个在晚年大放光芒的人

——怀念刘澜波同志

去年十一月，我从云南回来，听说澜波同志病势转危，捱了近一个月，才被允许进医院探望。他紧紧拉住我的手，声音虽然很弱，还是不停地谈着，而且有点兴奋。他的秘书告诉我，他梦中还念叨着水电，叫唤着我的名字。这以后到临终前，我还去探望过两次，他已经不能说话了，但还有眼神，似乎认得出是谁来了。看到这个只是靠现代医学维持着的战斗的生命，在一分一秒地接近死亡，明明知道这是无可避免的规律，可是站在病床前，总还是免不了无边的怅惘和沉重的悲哀。

澜波于我，是兄长，是忘年之交。从五十年代到八十年代，在一个工作岗位上，上下级，正副职，共事最久，相知也深。早在五十年代，就敢于相互谈点私房话，最后这三年多就更是经常交心，无话不谈了。

我是一九五二年调到燃料工业部主管水电工作的。澜波分工管电。那时水电还提不到日程上来。水电局不仅不是一个独立的事业单位，而且几乎被合并到火电总局去（总是有人轻视新生事物的）。老的水电技术骨干，全国不过

几十人，最感困难的是只有一个地质工程师。一九五三年分配地质专业的大学毕业生时，在澜波主持的会议上，他主要考虑煤炭理所当然的需要，还不了解地质是水电建设的要害，水电只分配到两个人，我愤而中途退席，表示强烈不满。他从来没有介意我这一无礼举动。

一九五四年，黄河规划告一段落之后，我就动员澜波率领一个代表团去苏联参观电力工业。水电方面去的人最多，我任副团长。我们在苏联漫长的冬季中一共呆了四个月，在各地以参观水电为主。从此以后，关于我国水电的发展，我们两人的意见就完全一致了。在莫斯科的基辅旅馆，我们共居一室一个多月，白天已经很疲劳，晚上还常常谈到下半夜。谈的范围很广泛。一九四九年毛主席赴苏之行的内情，我知道得多一些，他是当作新闻来听的。这时正逢苏联政局有变动，马林科夫改任电力部长，关于中苏关系等等问题就议论得比较深。在苏联这四个月的观光生活，我曾逐日记载一点什么在一个小本子上，其中大约记了一些在基辅旅馆中的夜谈。一九六四年后，我在大别山中一个水电站当文化教员。“文化大革命”初期，这个小本子在北京旧居被水电部的“红卫兵”抄去了。一九六七年三、四月间，他们两次到这个水电站来找我，要我“交代同刘澜波的关系”。关于我同澜波的关系，大概那时北京的知情者揭发了不少，我不得不写出详细的交代。一九七九年重新工作以后，有关方面把我当年写的这些材料的存底全部退还给我，其中就有关于澜波的材料，这些材料——许

多往事，现在是想不起来的。我就照当时原貌（只是有的词、句加了引号）节录如下，借此也可从一个侧面了解澜波的为人。

交代开始就写道，从一九五二年到一九五九年庐山会议为止，七年之中，我与澜波的关系是比较密切的。其原因，除开工作关系之外，我认为主要由于在思想感情上有某些相通之处，即“右倾情绪”的东西。我认为，他为人比较厚道，作风较民主，尤其不喜欢整人。因之，逐渐与他建立起一种讲一定的“知心话”、“私房话”的关系。以下举了些例子：

访苏回国时，在飞机上，我深有感慨地同他谈到，希望以后不再搞大运动了，并谈到儒家的恕道问题。这实际上是怀疑群众运动，害怕阶级斗争的思想。刘虽没有多答言，也未反驳我的观点。

一九五六年或一九五七年，一次同他从国务院开会后一起出来，因为会议谈到三峡问题，我狂妄地说：“主席又不是圣人。”他当时虽责备我的自由主义、无组织观念，实质上只是怕我乱讲话的毛病捅出乱子，而并不是从思想认识上来作批评。他是一个很谨慎的人，从不乱讲话的，尤其在重要场合，更是如此。

一九五七年反右派时，他对一些划为右派的人是表同情的。如对编译室的一个老俄文翻译，就特别表示过惋惜之意。前辽宁“反党集团”中成员，刘同他们都是老熟人，谈起来就叹息，很不以这种“斗争”为然：“怎么观点不同，

有点议论，就成了反党?”（他在东北老一辈同志中是一个中心人物，有人说他象一块磁铁样吸引人。）

一九五八、一九五九两年“大跃进”时期，我认为刘对“三面红旗”的看法同我差不多。如一九五八年夏，上海华东区计划会议，对一九五九年指标大加码时，我在上海与刘通电话，很不赞成，说只有电力顶住了，他完全同意我的看法。我当时给毛主席写的一封信，寄给他看过。由于电力部未能跟上“大跃进”指标，毛主席一次见到刘时，曾半打趣地指着他说：就你没有出息。一九五八年十二月武昌会议后，大家去麻城参观（湖北“大跃进”的典型），看了一块棉花地和新盖的一个生产队的集体宿舍。他却跟我谈他的农家生活回忆，似是一个富裕农民的持家之道，思想感情上同当时公社化运动是格格不入的。一次司局长会，有人对公社化怀疑，刘一言不发。关于当年计划不能落实，他向我说过这样的话：“这好象吊着脖子走路，脚后跟不着地。”

庐山会议时，我们住在一栋宿舍，但不是一个小组。会议前期，刘少奇提出“成绩讲够，缺点也讲透”。大家对缺点还是津津乐道，“泄气思想与泼冷水现象”还是严重存在的。工交系统埋怨情绪最大，记得刘也发泄过这种埋怨情绪（原话已记不起）。对我当时来往的人和活动，刘是很清楚的。延安时期，刘在“柯老”领导的统战部工作，跟柯很熟。七月二十三日之前，柯等率领的“左派”很是活跃，刘很担心我卷入被攻击的靶子中。当时对于彭德怀的信有

各种议论，“左派”认为彭的矛头是对着毛主席的。他和我一起估计形势的发展，问我的看法。我说，主席讲话，可能是“左、右”两边各打五十板子。我当时心情很沉重，还有点愤激的情绪。刘也表现得跟我一样心情沉重。会议初期，一次同工业各部长游山，大概是在植物园，大家谈到农村的一些困难情况时，我冒了一句，“中国的农民好”，意指要是在东欧，早闹事了。小组会上斗争我比较紧张时，刘特地告诉我，张霖之将这话告诉他，张并没有在小组会上揭发。这当然是明显的包庇。我写的交代材料也交刘看过，他为我出过主意，找薄一波帮忙，过关过得好一些，因为薄在主席前曾讲过我的好话。

以上，是我一九六七年写的交代材料的部分节录。从中可以看到，甚至所用的语言都带有浓厚的当年色彩，至少在写的时候是作“交代”，决不是那种常不免有点谀词的纪念文章。可是，就从这些交代材料中，岂不是可以清楚地看到澜波同志的风貌、品德、是非观念和原则精神吗？

这是无可非议的：在过去的年代，人们不得不学了许多“乖”，难免为自己涂上一点保护色，“逢人只说三分话”，甚至在至亲好友面前，也不能不存点戒心。一九七九年初回原电力部工作之后，同过去相比，我感到澜波似乎判若两人：那种遇事谨慎为先，说话平和为上，乃至沉默以待的明哲保身味道，已一去不返，而换成了一个言谈容易愤激，喜怒形之于色，甚至“爱放放炮”，有点偏激的人了。

当然，最根本的是，他比过去更关心党和国家的命运。他的外形已是一个面带病容的老人，然而精神却是一个心藏烈火的青年。他是中纪委的常委，在有关会议上，一些人们心照不宣，不便捅开之事，他往往无所顾忌，一针见血说出来，把会议讨论引向本质。他从复任电力部部长直到去世之前，三年间基本住在医院，病房是会客、看信、谈话、批阅文件、召集会议之所。他常常在深夜手捧文件，在沙发上入睡。一九七九年来信多，部党组曾规定少送，终归无效，最后同秘书达成协议：每天最多看十封。这一年，他亲自批复的来信有一百几十封。每遇重要会议，总要拖着病躯同大家见面，讲短话或讲长话。一九七九年后连着三年的三次全国电力会议，他都出席作报告，常常离开讲稿作即兴发挥，而这些讲话，反而是最为生动与深入人心的。由于严重的心脏病，他每次参加这样的大会必定缓缓走上二楼，在会议室稍事休息，同大家聊聊，然后再到会场去。他不愿意在会场上一千多人目光中是一个病夫，总是衣冠整齐，注意仪表，似乎还想显出精力不减当年。他非常关心群众生活，建议召开全国电力系统职工生活会。会议期间，一周内他参加了四次会，会场设在四楼，上楼当然极其吃力。

澜波历来重视知识分子。燃料部时期，他负责筹建了北京矿业学院和石油学院，他分工管电，最后才筹建电力学院。当时教学人才极端缺乏，他甚至找到北京市公安局长，从在押人员中寻求教书之人。“文化大革命”中，

水电部所属许多学校、科研、设计机构，特别是水电系统的一些骨干单位，被拆散、捣毁，资料烧光，人员下放，每一谈及，他真如切股挖心之痛，愤恨不已，乃至垂泪（他的女儿在十年浩劫中死去，他也没有这样动过感情，念念不忘）。听说承德电厂有一位五十年代清华毕业的“摘帽右派”，由于“没出过差错”，还在卖饭票，便特地请到北京面谈，亲自干预，调到电力学院任教。类似的事有过好几件。每次电力工作会议，他都要谈知识分子问题，认为普遍存在的情况仍是知识分子使用既不当也不够，重用更差，更谈不上让他们担任一、二、三把手。他不胜感叹地说:“不少工科大学毕业生是窝在那儿了，把他们‘风干了’”。有的单位虽然提拔技术干部当领导了，但他们的名次往往排得很后，实际上没有什么权，特别是没有“人”权，不过作作陪衬而已。甚至讨论重大技术问题，也不倾听他们的意见。很多领导只是使用他们，不同他们谈心，不做思想工作，不关心他们的生活疾苦，更不关心他们的入党要求。他认为把知识分子当“臭老九”的流毒仍在许多人的头脑中作怪，实际上还是唯成分论，什么“历史问题”，“社会关系”，“家庭出身”，“没有组织能力”，等等。他认为这些框框可以说是一种排斥知识分子的派性。他常常向地方来的同志说，不把具有各行各业专长的知识分子提拔到各级领导岗位上来，四化就无法实现。他常敦促领导干部努力学习业务，认为一个领导干部必须具备与自己职责相称的科技知识。当他知道电力系统有些领导干

部连"周波"是什么也答不上来时，在一九八〇年二月的全国电力工作会议上来了一次"突然袭击"：全体人员参加有关业务知识的考试，引起很大震动。所有的主要试题（大小问答五十一道），都是他亲自拟定的，为此熬夜到了两点。他还抽阅了部分答卷。在这次会议上，他语重心长地说："这对重视学习会起点促进作用。应该承认，我们的领导干部是非常缺乏管理现代化生产和建设的知识和经验的，我就是其中的一个。毛主席一再教导我们要变外行为内行，我到现在还称不上内行，对一些业务只是一知半解，我希望大家不要象我这样，少壮不努力，老大徒伤悲。"

在工作的最后三年中，澜波同志紧紧抓住了干部问题，特别是调整好领导班子。他常在各种场合说："三种人"和风派人物，不能留在领导岗位上。他在一九八〇年二月会议上所作的报告，事先送给耀邦同志看过，得到称赞，并批示："这个讲话请送宋任穷同志一份，以便使中组部了解干部的一些动向。"澜波同志两年半以前所作报告中的下面这一段话，确实还值得我们深思：

> 特别值得警惕的是，在我们各级领导班子中，从思想到行动，还有没有极少数人一直到现在为止，跟党的路线、方针是对立的？这种人同对三中全会精神不理解的人是不一样的，是有原则区别的，不能把他们看成只是认识问题。
>
> 还有没有极少数人对我们党中央制定的一系列重

大政策，如干部政策、知识分子政策、平反冤假错案政策等，顽固地进行抵制，一直抵制到现在？

还有没有极少数人对我们的党纪国法，根本不放在眼里，他们胆大妄为，无法无天，甚至还在搞派性活动？

我看可能都会有的。当然，要认真深入调查研究后才能确定。这种人是不安定的因素，或者是潜在的不安定因素。对这种人我们决不要掉以轻心。你不敢碰他，他就要碰你。当然，我们允许犯错误，允许改正错误，但决不能允许不改正错误。要给犯错误的人以改正错误的机会，但决不能允许继续重用那些坚持错误的人。我们必须分清是非，赏罚分明。这件事，我有生之年，一定要一抓到底。因此我希望还能多活几年。

后来在一次会议上，听到有的同志谈到，对过去犯过错误的人不要过分计较，可采取“俱往矣”的方针时，澜波是很激愤的。他同我议论过这个极关重要的问题，提出某些名字：“对他们也俱往矣？”上述报告中，他还讲了这么一段话：

从一些人民来信和我所接触到的一些同志的谈话中，反映一些单位的领导成员中，还有打砸抢起家的，有闹派性的，有风派人物等，这些人还没有认识错误，更没有改正错误，甚至也没有作过公开的检查，这些人继续留在重要岗位上，同志们是不放心的，我也不

放心。

在离开讲稿发挥时，他情绪很是激动，声音也颤动："整顿领导班子这件事办不好，我死不瞑目！"

关于澜波主动要求退居二线，推荐李鹏同志为前电力部部长的事，是大家都熟悉的，曾得到中央领导同志的多次表扬，誉为"党内开明人士"，《人民日报》、《红旗》等都为此发表了评论文章，宣传这一范例。一九五四年到苏联参观访问时，新中国最早一批留苏学水电的学生，正好毕业，他们参加了我们的观光队伍，李鹏就是其中的一个。澜波当时就是一个有心人，对他们的培养、爱护，几十年如一日，尤其对李鹏有更多的关注，使他熟悉水、火电生产的全部业务，从总工程师、厂长、党委书记到局长，一个一个台阶上来，最后作为接班人，完全符合中央提出的干部四化的标准。

这种同过去判若两人的敢作敢为，勇于提出和坚持自己的正确意见，还可举出不少事例。如必须加强电力工业的集中统一管理，澜波是坚持到底的。早在一九七九年五月十九日，他在《人民日报》上发表了题为《电力工业必须变落后为先行》的文章，其中七点方针之一就是这个问题。陈云同志认为这是一篇非常好的文章，接连读了两遍，让秘书给澜波写信说："坚持按文章的方针办，完全支持你。"在十年内乱中，全国电网的集中统一管理体制曾受到严重破坏。一九七九年水利、电力两部分家之后，使这个问题的解决更增加了困难。为此，他不顾病情，向国务院领导和

有关部委陈述意见，说明利害。

他向国务院领导写信说："丹江口水电站装机九十万千瓦，占鄂豫两省电力容量的五分之一，是华中电网的枢纽电站和唯一联结点，担负全网调峰、调频和事故紧急备用等重要任务，尤其事故处理是分秒必争的，因此电站的生产和调度必须由网局统一管理。""水电是电力工业的一个越来越重要的、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我已年老体衰，似不妨'清闲'，但此事有关国家电力事业的合理发展，不得不提出这个问题。对以上几个问题，我既不是争权，也不是争利，争的是一个'理'——为迅速实现四化的大道理。"随即国务院召开了有关这个问题的会议，澜波同志亲自出席，在会上慷慨陈词，据理力争，简直象一个少年气盛之人。

在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召开之前一段很长的时间，我们之间的谈话，常涉及到各级领导如何进一步解放思想的问题，都深深感到二十多年来左倾思想为害之深之广。每谈及这些大局，他常愤慨不已。这种议论的结果是，他本着对党和国家，对子孙后代，也对国际共运负责的态度，给中央领导同志写了一封信，坦率地说明了自己的忧虑，以及不能不感到忧虑的原因。这个问题，在十一届六中全会上终于得到妥善的解决，使他得以心安。

他知道自己的时间不多了，常对身边的人表示，要把该做的事做完，该说的话说完。病势已经非常沉重，最后一次谈到工作时，声音已经微弱：

“水电要争，速度要争，核电也要争……”

澜波是今年三月五日十五时最后停止呼吸的，我相信在最后时刻，他的逐渐衰微、逝去的思维和感情，必是极为安详的。近日我常想，我所见到的最后这三年的澜波，这光彩照人的澜波，才是他的本来面目吧。过去这光彩，是被过多的拘谨（也许还有一点韬晦）掩盖住了。有些不幸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前就去世的老同志，也许终其一生也没能够完全显露出自己的光彩来。这是真正的不幸——个人的，更是历史的不幸。澜波能够在一生的晚年——最后三年显出自己的本色，总还要算是一件幸事。可惜的是，这时间太短了，就象一支燃得明亮的蜡烛，一瞬就成了灰烬。

三年中住在医院里，澜波是病房最“不守纪律”的人。许多同志特别是医务人员都曾劝他少看文件，少接待客人，少说话，最好不要出去开会。如果认真这样做了，我们的澜波同志也许还能参加党的十二次代表大会。我们可以埋怨澜波不懂得“少做就是多做，多做就是少做”的辩证法，这确实是许多年迈的同志应当汲取的教训；但这也是没有法子的，多年来不可能伸展的抱负与奔放的本性，一朝如愿，怎么又能顾及到哪一天要去见马克思呢!

一九八二年九月

忆谢文耀

文耀离开人间三十四年了。刚得到他牺牲消息的时候，就想写一篇悼文，但由于世事的纷扰，一直没能够提起笔来。文耀在天有灵，当不会怨我忘记了故人吧。

一九三六年暑假开始的时候，我因为还有点事，留在学校里。一天下午，正从东湖游泳回来，一个陌生的同学突然敲门进来，操湖北口音，瘦小的个子，留着长发，不修边幅，带一副近视眼镜，态度很随和。他就是谢文耀，这是我们的第一次见面。他告诉我，他是外文系的，刚从上海回来，准备下学期复学。原来，他比我早两年，于一九三二年考进武汉大学，读了两年，就休学到上海去了。他哥哥谢文炳在上海暨南大学文学院执教，也发表作品。他住在哥哥家里，想专门从事写作，当"兄弟作家"。这个愿望未能实现，只是读了些书，学了法文。终于又离开上海的原因，也许是寄居生活很难长期延续下去，似乎还谈到不习惯哥哥家庭的生活方式。但最重要的还是"一二·九"运动的影响。在全国抗日救亡运动高涨的形势下，他闲不住，他不能做一个旁观者，于是就回到学校来了。

这天文耀还谈到，他为什么来找我。当年武大有一个

师生合办的校刊《珞珈月刊》。我在中学时一直爱好左翼文艺，高三时兴之所至，写过一个短篇，题目叫《走》。我刚入学不久，这个月刊要出“文艺专号”，向同学征稿，我就把这篇东西寄去了，出刊时居然压卷。写的是一个人力车夫和他的儿子，忍受不了剥削和贫困的生活而暗示投奔红军。从小学到中学，我是在长沙度过的。在大革命时当过童子团员，平江老家也常传来红军的故事，于是有过许多朦胧的遐想。这是我生平写过的唯一一篇“小说”，当然是很幼稚的。大约是它的倾向曾使文耀感到兴趣。这一次是从他的同班好友林守正（林已在新四军皖南事变中牺牲）等人处知道，我是“一二·九”运动的积极分子，工学院的一个头头，还主办过学生会的刊物《救中国》（这个刊物思想激进，旗帜鲜明）。“一二·九”运动在武汉也是闹得很厉害的，武昌几千学生曾在江边和街头露宿，武大则罢了课。这些，他在上海就从报纸上看到过有关报道。我们尽管是初会，可是越谈越投机，越谈越兴奋，真是相见恨晚。那时我年未及冠，文耀比我大四、五岁，我们的话题却没有触及年青人喜欢谈的爱情之类，完全是“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气概：厌恶蒋介石，向往共产党。竟日长谈继续了整整一个星期，我才怀着惜别之情回到长沙去了。这时，他给我看过他写的中篇小说《万民伞》的稿本，写的是国民党地方官盘剥农民而又沽名钓誉的故事。可能由于再也无意于当作家，这篇东西似乎从来没有向哪个刊物投寄过。这部稿子是否还存在于天地之间呢？文耀是很会写文章的。

一九三六年下期武大学生救国会出的校刊,是公开发行的,文耀在上面发表的时论，最受读者欢迎。

下学期一开学之后，我们联合所有的进步同学组成一个秘密团体“武大青年救国团”，参加的有四十来人，其中还有助教，文耀被推为负责人之一。我那时的活动主要不在校内，而在武汉三镇的“秘密学联”。这是公开学联被国民党当局强迫解散后成立起来的，骨干多是“一二·九”运动时最积极的分子。参加的共有二十多个学校，每校少则几人,多则十几、二十人，除武大以外，总共约二百多人。名义虽叫“学联”，实际类似北平的民族解放先锋队组织，完全采取秘密活动的方式,如传阅革命书刊，组织读书会，领导各校的公开活动，等等。我常要下山，几乎很少上课了。这时在校内同我关系最密切的就是文耀，他家住在武昌,也就逐渐参加了学联的活动。我设法单独住一间房子，文耀在外文系占用了一间公用房间(也在宿舍内)。这两间房子实际上成了我们的“工作机关”，敲门有暗号，以免闲人突然闯入。我们两人，加上一九三六年入校的原来就是秘密学联负责人之一的万国瑞(杨纯)，三人小组办了一个秘密的油印刊物:《武汉学联》。搜集材料，写文章，刻蜡板，印刷装订，为此常常熬夜。汉口的生活书店是学联的秘密发行机关。

我们时常谈论的话题是必须找到共产党，否则，我们这只小船，就没有舵，怎样在风浪中前进呢。上海全国救国会领导成员之一何伟，当时常来往于武汉与上海之间，

我们同他有密切的联系。何原是武昌华中大学毕业的，在汉口一个教会女中教书，我们在他的转寄信件的朋友处见到党的北方局刊物《长城》，断定他一定找到了党的关系。向他提出此要求时，他却没有肯定的表态，可能党还没有交给他在武汉发展组织的任务。我们只得另找别的途径。文耀认识一个大革命时期到莫斯科学习过的姓甘的武昌人，不久前从苏州反省院出来，我们在他家里见到俄文书刊，就觉得特别兴奋和亲切。于是找他谈党的问题。那时我们在政治上很幼稚，不知道反省院出来的人是需要经过党的详细审查的。甘的意见是，在没有找到党的正式关系以前，可以先自发成立一个临时支部，一边建党，一边找党。我们认为这是个好办法。于是在秘密学联中串联，找了几个最可靠的积极分子商谈，他们也赞成这样办。经过几个月的酝酿，一九三七年二月的一天，我们一共八个人，在武昌贡院街三十号文耀的家里集会。记得是在他家后院的一间大房子里开的会，由他的姐姐景屏为我们放哨。我们庄严地举手宣誓，每人都填写了入党表，正式成立了这个自发的党组织，称为武汉临时支部。后来才知道，自发支部中有位同志当时已经有了党的关系，可说是党组织打入我们自发支部来的吧。在延安时，钱（瑛）大姐、陶铸同志都跟我谈过，党后来承认了这个自发支部，认为这个组织对抗战前后武汉的救亡运动和党的发展，起了很好的作用。

这时，我对文耀和他的家庭了解才多一些。他的老家是湖北汉川，家境比较贫寒（贡院街的房子似没有正式的

大门，是那种店铺型上格板的门面)。祖父是农民，父亲教过私塾，会一点书画，也当过打秋风的游学先生。家里曾薄有田产，有半条耕牛，雇了半个长工。后来把田地卖掉供大哥文炳在清华读书。文炳考取公费留美，回国后，当了大学教授，由他来供给弟妹读书。文耀天分高，在学校功课很好，念高中时即为别人枪替，考取了大学。他是以第一名考入武大外文系的(同时他还考取北大)。学法文才半年，就可以用法文写信了。

一九三七年五月，我带着自发支部全体同志的入党表到北平，很快就与党接上头，随后文耀也到北平来了。北方局的同志正同我们研究如何在武汉正式建立党的组织时，七月七日芦沟桥事变爆发，形势大变。几天之后，文耀即匆匆忙忙奉命先单独返回武汉去了。

这年十一月，我从山东到武汉，又见到了文耀。他告诉我他回到武汉以后几个月的活动。陶铸到武大建立了正式的党支部，文耀是支部的负责人之一，管宣传。以学联的成员和平津流亡同学为基础，成立了当年有名的青年团体——武汉青年救国团，因此，他非常忙碌。一九三八年三月，全国学联开会时，我又来到武汉，那时，他正在长江局受训，我们见面的机会不多。

一九三八年六月间，我从徐州突围后路过武汉，又同文耀聚首了。那时，他正准备到鄂北去打游击。那天我们两人在武昌汉阳门码头江岸上漫步，这正是“一二·九”运动游行队伍露宿之处，当年在寒冷的阵阵江风中坚持的情

景，历历如在目前，此起彼伏的救亡歌声，还在耳边回响。我们缓缓地并肩走着，兴奋地畅怀交谈。眼前的形势使人激动，唤起一缕得意的情怀。那天我们谈了很久，甚至谈到胜利之日，必定要到武汉重聚。谁能料到这一次的分手竟是我同文耀的最后的诀别！

回到长沙以后，还和文耀通过几次信。他来信说，我们的这些通信，是他“生活中唯一的享受”。由于彼此的地址都常常变动，更由于彼此都处在紧张的战斗生活之中，武汉失陷之后，这“生活中唯一的享受”也无法继续下去了。

我在延安，文耀是在新四军第五师，那时从华中到延安的人少，很少听到他的信息。只知道他在担任《七七报》的总编辑；中原局成立，他任《七七报》的副社长。此外就什么也不知道了。整个抗战时期，学生时代的战友大都东西南北，天各一方，大家都在紧张的战斗生活中，各自为各种各样的事情而忙碌，大概也都很少有机会去回忆往事了。

直到一九四七年九月下旬，我才又意外地得到了文耀的消息。那时我在热河主持冀察热辽分局报社的工作（这时报纸改名《群众日报》）。一天，新华总社发来的电讯稿中，突然看到第一篇是“中原前线记者谢文耀”写的，评论刘邓反攻大军南征以来的敌我态势。真是大喜过望！哦，哦，文耀，原来你在这里！总编辑朱九思也是武大外文系的同学，当年“青救团”的成员。我们两人拿着这份电稿就谈起这位久别的故人来了。那天，我想起了许多往事，兴奋得

彻夜不能入睡。正象刘邓大军打仗纵横自如极有气势一样，文耀的这篇述评也是写得纵横自如极有气势的。他的笔还是同从前一样泼辣锋利，他的观察还是那样敏锐深刻和有条理；篇中的警句："解放军现在驰骋于江淮之间，如蛟龙入海，纵横自如"，多少年来我一直不曾忘记。这次为了写这篇文章，请穆青同志帮助把旧报纸上的这篇述评复制出来了，现在摘录一点在下面，让大家看看文耀的文采：

> 蒋贼及其统帅部始终以为刘邓大军是北渡或被迫南移，其蠢愚无知缺乏战略眼光可谓惊人！及至八月十四日以后，南下大军突然出现在沙河以南，蒋匪这才慌了手脚，为了掩盖他惊慌忙乱的丑态，又不愿意也不敢于承认南下解放军的行动乃是一个预定的巨大反攻行动。无可奈何之余，只好叫中央社出来叫嚣所谓"刘匪全部被歼于沙河"以自解嘲。蒋家匪帮们所苦恼的，是尾追部队对解放军既可望而又不可即，在沙河仅有的一次阻击亦告惨败，而长江以北的广大地区更无一兵一卒可以阻击解放军的前进。
>
> 南征大军把蒋匪一切尾追部队远远地扔在后面，从容渡过淮河，进入大别山区。蒋介石匪帮们的一切所谓"围歼"、"追击"、"堵击"都已变成纸上的名词。解放军现正驰骋于江淮之间，如蛟龙入海，纵横自如，它高兴进兵哪里便进兵哪里，……蒋匪军则东碰西撞顾此失彼，处处可防，而处处不胜防。四十八师向光山、经扶碰了两下，忽然觉得不妙，又夹起尾巴掉头

东奔皖西，图救合肥。五十八师则于固始、商城间徘徊不前。罗广文及八十五师等部则龟缩于平汉东侧，不敢动弹。五十二师之三十三旅才到郾城，又忽然返防武汉。六十五师也急忙沿平汉赶回汉口。蒋匪军郑州前方指挥所，则由菏泽而开封，而信阳，只能望着刘邓大军的背影移动。二〇六师及第三师等才"追"到许昌、正阳，忽然豫西告警，又中途折转，西奔洛阳。蒋贼及其统帅部手忙脚乱的窘态表露无遗。

当年刘邓大军强渡黄河，向大别山进军，揭开了人民解放军战略反攻的序幕，标志着人民解放战争"已经达到了一个转折点"。即从上面节录的两段来看，文耀对战争的这一转折作了何等有声有色的描述，真是长人民的志气，灭敌人的威风。

我很兴奋，庆幸着我们天南地北，战斗在同一个岗位上。虽然一时还不可能直接同文耀通信，但总算从新闻电讯中得知他的下落了，相信以后还会看到他的文章的。我怎么也没有想到，几个月之后，我所看到的竟是他的噩耗。一九四八年二月，我正调到东北局工作，一天早晨，突然在《东北日报》上看到一条新华社的电讯，说新华社华中总分社的负责人谢文耀在中原汝南区敌后工作中牺牲。这在我真如晴天霹雳，震惊，悲痛，多少天也排遣不了。现在没有查到那天的报纸，依稀记得消息说的是：文耀在村中遭到地主武装的伏击，他开枪抵抗，因寡不敌众而牺牲。新华总社档案室保存的材料说的则是：一九四八年二月十

五日，文耀在中原汝南区李楼村附近搞土改，被敌俘后牺牲。这份材料还说："谢文耀同志参加革命后表现很好，生病后仍坚持工作。在困难时期，如在中原突围时，有人想到大解放区，他未提过意见。到晋南与爱人会合后，不久(单身)被派赴中原，愉快受命，且提出很多积极意见。对同志很注意帮助、团结，注意老乡生活。牺牲时很年轻，大家都觉得可惜。"确是年轻，那时他还只三十岁出头。

十年浩劫中，我在八年单监枯坐无聊时，默念着故人和往事，做了些怀旧的诗，有一首是纪念文耀的，写得到噩耗时的心情：

故人又似笑来前，
喜读"蛟龙入海"篇。
正待中原席卷日，
何期万里哭南天。

一九四九年南下途中，曾在武汉停留短时。有一天，与朱九思等一群人作东湖之游，大家的兴致都很高。可是，我的心情却很沉重。轮渡过江，在汉阳门上岸，这是我和文耀最后流连之处。十一年物换星移，但汉阳门景物如旧，码头陈迹依稀可辨，可是，故人何在？当年的梦幻——胜利重逢的喜悦又何寻呢？沉默无声的痛楚，使我无法分享游伴的欢欣。那天风浪特大，游艇不能下湖。狱中怀旧的《一九四九年南下过武汉》题目中的一首，正是记述此时对文耀的怀念：

过江又见汉阳门，

车近东湖思故人。

八十里波不平静，

莫非为我洗风尘。

一九八〇年春的一个星期日，我邀请了文耀的姐姐景屏、弟弟文煊夫妇，还有文耀在武大外文系的同班好友叶君健，到家中作客。我们的话旧当然以文耀为中心。文耀别后的情况，在很长时间里我几乎是一无所知，这天才得知一个大概。一九三八年武汉沦陷后，文耀由党的湖北省工委派到洪湖地区天门、汉川一带工作。那里是他的家乡，在他的领导下，党的组织很快发展起来。办鄂中特委党训班时，他亲自刻印过一本油印小册子《党的建设》，作为教材。随后又被派到当地几支小的游杂部队去作统战工作，几经艰难险阻（有一次几乎被一个有土匪习气的队伍活埋了），到一九三九年七月，这几支小部队终于接受党的领导，编成"抗日游击队天汉第三中队"，走上了抗日前线。一九四〇年，文耀任天汉地委宣传部长。鄂豫边区党委机关报《七七报》创刊，他被派到该报参加领导工作。他的第一个孩子在战乱中夭折。第二个孩子出生在一九四四年二月，正值战争转徙之际，还没有满月就寄养在当地农民家里，直到文耀牺牲，他们父子也没见过面。解放后，孩子才由党组织派人认领回来，这时已是一个六、七岁的牧童了。那天还知道，文耀的牺牲本来是可以避免的：当时他未听劝阻，带了支短枪，只身到村子里探听虚实，因而遭难。遗体被丢在河里，后来就葬在汝南城郊。我们谈到，如果

文耀还活着，不是继续在新闻、宣传部门工作，很可能早就转到外交系统，因为他不仅精通英语，法语也好。

姐姐景屏保存了弟弟给她的一封信，这是中原突围后辗转寄到延安的，是文耀留给家人的最后的手泽。现在转录在下面：

> 我随部队由中原突围到了陕南。前后八个月，于二月底渡河到了太岳。北上之行总算达到了目的。此次部队过河主要为休整补充，准备时机一到，回戈中原。我们廿九日抵阳城，四日去晋城。五师部队干部及家属都将集中在那里作较长的整顿。我不惯于部队宣教工作，已向组织提出去延安学习，或去《解放日报》、《人民日报》工作……。我搞报纸近十年，从党的事业方面，从个人兴趣和经历方面，都是以新闻文化工作为自己终身事业，因此我有比较长期的打算。在新闻文化工作方面，我比较长于组织管理，特别对新闻事业有较深的兴趣和感情。至于写作，我对自己估计已不是那么高了，主要原因是，在中原八九年长期处于游击战争环境，技术荒废了，落在时代后边了。政治生活经历虽然有些，但写不出，写不好。我之想去延安，一方面希望在政治水平、思想锻炼上更提高一步；一方面把英文和世界语温习一下，再学俄文，将来兼做翻译工作。……我拟以全力争取这个前途。
>
> 小刘（刘健，文耀的爱人，已去世）于去年突围前半个月生场病，乘火车去邯郸，现带着孩子在《人民

日报》工作。她来电告我，母子均好。我要是能去延安，将与她一同去，那时，你便可以见到久别十年的三弟和小侄了。对我们来说，未必不是一件最大的乐事……我多么想和你见面，倾谈十年以来的心情啊！……我明日到晋城，行止确定后再写信给你。回信暂寄太岳区晋城新四军五师政治部。

很久以来，我就决心要写一篇回忆文耀的文章，这倒不是为了排遣自己的悲怀，也不是为了偿还对故人的宿债，而是为了今天的青年读者，帮助他们了解前人是如何为着党的事业奋斗牺牲的。

原来打算找一些熟悉文耀的同志，更多地搜集一些有关文耀在漫长的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的事迹，使这篇文章的内容稍稍充实一点，后来一想，湖北党的组织和有关部门，必定会为文耀立传的，我这篇东西就写成这个样子吧。

一九八二年十一月

附记：

《湖北省志·新闻志》编辑室的同志最近找到了李普一九四八年三月三日写给新华社社长廖承志的一封信，谈谢文耀殉难经过颇为详细，是现在能够得到的最初、最确切的记载，兹转录于下：

廖社长：

兹将谢文耀同志（按谢曾任中原《七七报》副社长、临时总社秘书）被土匪俘去之经过情形报告于下：

谢文耀、张铁夫和我三人随陈克寒同志到汝南县境的东南

部作土改，于十二月底出发，一月中旬开始工作。谢文耀同志在袁寨（亚光出版之袖珍地图上可以找到）西北十二里的李楼一个工作组担任副组长(克寒同志在北面，张铁夫同志在西面，我在东面，各组相距约七、八里)。

旧历元月初五日（二月十四日），敌十一旅由汝南埠向西北开向汝南城。我和谢等两组（还有另一个组）一起行动，于先一天深夜向正西转移约三十里，到汝河的河套里，第二天（初六日，二月十五日）探知敌已过去，乃决定回原地继续工作。谢组未吃早饭就先走了。他们那一组共八个干部，他和正组长各分一半，他那一半又各自分开，他独自去李楼，其他三人各去一村。他到李楼仅一小时许，即来土匪十余人把他俘去。匪徒又到另一村俘去另一人，其他附近两个村子的两个人乘隙逃脱。

李楼水沟很深，仅有一条独木桥通入寨门。谢带了一支二十响的驳壳。被匪徒发现时他曾发了两枪，然后向一个草堆躲去，为匪徒击中腰部，随即被俘。

李楼老百姓只看见匪徒们把他带往南去。又据别的老百姓说，匪徒们自相惊扰，说我军早已追击他们（我们转移时跟着我军一个连，由一个团长指挥）。他们仓促爬过一条深沟，水深及腰，土匪和谢文耀都是徒涉过去的。以后，有人说把他带到河南正阳县去了，有人说，谢走不动，途中就枪毙了。后一说的可能性很大，因为土匪以为我军在追他（其实并没有。那时部队仍在河套内，不知道发生了这件事）。他们自己狼狈逃窜，谢已负伤，又浸了水，当然跟不上他们。

土改工作队随即打听消息，设法营救，但至今没有下落。我们愿意出钱赎，或者交换，因为他们也有人扣押在我们这里。

文耀同志的牺牲，大家都很哀痛。我们将化悲痛为力量，努力工作。

李普　三月三日(一九四八年)

新华社编者在这一信件后面加了如下的按语：

李普同志的信，是本月中旬才收到的。中原前线分社于本月（可能是四月）二十三日来电称："谢文耀同志被俘后，我们曾派士绅前往交涉，但经查看，业已牺牲。"总社得此噩耗后，已去电致哀，并慰勉中原诸同志继承谢文耀同志遗志，为创造江淮河汉间新闻事业而奋斗。

学生时代的毛泽东

毛泽东诞生到今年整整九十周年了。一八九三年正好是甲午战争的前一年，在这以前的半个多世纪里，腐败的清王朝无力抗御“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的入侵，中国社会迅速地坠入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深渊。从旧中国到新中国，这一伟大的历史转变，是亿万中国人民在一百多年的漫长岁月中坚忍不拔前仆后继艰苦奋斗取得的。毛泽东是中国人民在这场斗争中最杰出的领袖之一，可以说，他的一生曾影响和主宰过中国之命运。他出生和生活在中国历史发生空前变革的时代，在这样一个时代，正如恩格斯所说，是一个需要巨人而且产生了巨人的时代。列宁也说：“伟大的革命斗争会造就伟大人物。”毛泽东，就是中国人民伟大的革命斗争所造就出来的伟大人物。

毛泽东本人是怎样响应历史的召唤，从而使自己成为历史所需要的伟大人物的呢？他从学生时代开始，曾为此作过一些怎样的努力？这些努力又给他后来的事业怎样的影响？这些都是极有意义的研究课题。这篇短文只准备介绍他学生时代若干有关的片断资料。

毛泽东出生于湖南湘潭韶山冲一个农民的家庭。当年

这里是一个交通不便、风气闭塞的山村。他的父亲识字不多，但精明能干，亦农亦商，终于成为一个在乡间有资格发行小额钱票的“小财东”。由于在一次讼诉中的失败，使他愿意让儿子念一点书，“可以帮助他打赢官司”。[1]毛泽东八岁被送进私塾，一直读到十三岁。《论语》、《孟子》、《左传》这些经书，读得背诵如流。后来他说起自己的幼年，“学的是‘子曰：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一套，这种学习的内容虽然陈旧了，但是对我也有好处，因为我识字便是从这里学来的。”[2]事实上，当时的学习远不是只起了识字的作用，这些对于儿童来说枯燥难懂的书本，读熟了，就有些近似于电脑的软件储存，以后用起来是现成的。毛泽东幼年时代的记忆，显然帮助了他后来的“古为今用”。我们看四卷《毛泽东选集》，其中众多的孔孟之言常用得恰到好处。

那时，毛泽东的生活是学生兼小长工或者小长工兼学生。十三岁就不再进私塾，整天在地里干一个全劳力的活，夜晚还要帮助父亲记帐。尽管这样，他还是如饥似渴地阅读能够找到的任何书籍，对《三国》、《水浒》等等小说尤其喜爱，熟记其中的一些故事。难能可贵的是，他在阅读中能进行独立思考，“有一天我忽然想到，这些小说有一件事情很特别，就是里面没有种田的农民，所有的人物都是武将、文官、书生，从来没有一个农民做主人公。对于这件事，我纳闷了两年之久，后来我就分析小说的内容。我发

---

① 见斯诺《西行漫记》。本文所用毛泽东传记材料，凡未注明出处者均引自该书。

② 《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776页。

现它们颂扬的全都是武将，人民的统治者，而这些人是不必种田的。”《三国》、《水浒》这些小说中充满了战争的描写，加上《左传》中那些战争的记载，这对于毛泽东后来数十年特别是游击战争初期的军事生涯，显然是有启发和帮助的。例如《水浒》中洪教头的故事，三打祝家庄的故事，他都在自己的军事著作和哲学著作中当作例证加以引用。十年内战时期的教条主义者曾经挖苦过他：靠《三国演义》、《孙子兵法》、《曾胡治兵格言》等等，来指挥战争。

也正是在这努力搜求书籍的时候，毛泽东读到了《盛世危言》一书，这是他接触到的第一本讨论社会政治问题的著作。作者郑观应是清末的一个改良主义者，从他自己取的一个别号“杞忧生”可以看出他的忧国之心。他思考中国贫弱的原因，主张在“主以中学，辅以西学”的原则下在中国发展资本主义的经济和政治，例如，实行保护关税，发展机器制造工业，以商战对商战，并设置议院等等。这是康有为、梁启超以前鼓吹维新改革最有影响的著作。毛泽东非常喜欢这本书，甚至三十年之后还能向斯诺讲述这书的大要。对书籍的广泛兴趣，经常思考祖国的现状和前途，是毛泽东从少年时代起就显露出来了的特色。

在家里，毛泽东不满于父亲的专制，他从不愿受约束，好自行其是，有过很多“忤逆不孝”的抗争。用他后来风趣的说法，“我家分成两‘党’。一党是我父亲，是执政党。反对党由我、母亲、弟弟组成，有时连雇工也包括在内。”他热爱母亲。母亲是一个善良、谦和、公正和乐于帮助别人

的农村妇女，她的品德给了毛泽东良好的影响。她对神佛的信仰很虔诚，经常向儿子灌输宗教信仰。因此，少年毛泽东也信过神佛。周恩来在《学习毛泽东》一文中就曾经提到“当他妈妈生病的时候，他去求神拜佛”的事。我们知道，那还不是一般的求神拜佛，而是十五岁时去南岳“朝拜香”，几步一拜地一直步行几百里到南岳。没有虔诚的信仰这是做不到的。第二年，一九〇九年，一个新派教师李漱清回到韶山，向人们宣传维新思想，反对宗教迷信。毛泽东同他很谈得来，在他的影响下，又读了上述《盛世危言》等新书，终于破除了对神佛的迷信。一九二五年，李漱清也到了广州，他们曾一起工作。

毛泽东在家里一面种田，一面自己找书来读，这样过了三年，他十六岁了。父亲决定送他到湘潭一家米店去做学徒。这时他听说邻县湘乡的东山书院改成了一所新式的高级小学，由于求知的渴望，他坚决要到东山小学去读书。父亲终于拗他不过，让步了。一九一〇年早秋的一天，毛泽东第一次离开家乡，到湘乡县立东山高小读书，从此也就离开了这个束缚身心的家庭和风气闭塞的山村。这种独立不羁的品质，帮助这个伟大人物作出了决定一生命运的第一个重大抉择。

在这所新式小学，毛泽东除了仍读经书之外，第一次受到了正规的学校教育，学习了现代自然科学知识和英语。在这里，教员都看重他，由于他领悟力、模仿力高，古文写得好，国文教员尤其喜欢他。他写的好些篇文章在校内

传诵一时，以至几十年之后，人们还记得其中的一些题目：《言志》、《救亡图存篇》、《宋襄公论》等等。校长和教师都很器重这个学生，说："学校取了一名建国材。"在东山小学的同学中，毛泽东也有几个家境相近的友伴，如后来以诗闻名的萧三（当时名萧植蕃）就是一个。他的回忆中有这样一件事：一次他借一本《世界英杰传》给毛泽东，书中有华盛顿、林肯、卢梭、孟德斯鸠等人的传记。书还来的时候，毛泽东抱歉地说："对不住，我把书弄脏了。"原来他在整本书上加上了许多圈点。他特别钦佩华盛顿，经过八年艰苦战争，赢得了美国独立。他说：中国也要有这样的人物。

在东山小学，毛泽东第一次知道康有为和梁启超，并且十分崇拜这两个人物。他借到了一套《新民丛报》。这是梁启超于戊戌政变后亡命日本时，一九〇二年在横滨创办的刊物，一九〇七年就停刊了。康、梁作为两颗明星出现在历史舞台上，是一八九八年，那时他们代表着维新改革的历史要求，在中国思想界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待到毛泽东从旧刊物上接触到梁启超的时候，明星的光芒早已暗淡下去了。但梁启超对封建主义的批判，对西方资产阶级社会政治学说的介绍，仍使他觉得无比的新鲜。由于年龄和知识的增长，他对这些新学的理解和接受显然要比几年前读到的《盛世危言》更多。特别是梁启超的那种"条理明晰，笔锋常带感情，对于读者别有一种魔力"的文章，更使他神往。他有意模仿这种笔调，也很能写一点这种文体的政论了。这时他还取别名"子任"，可见对梁仰慕的程度（梁启

超号任公)。

在现在保存下来的一本当年毛泽东读过的《新民丛报》上，我们可以看到他写的这样一段批语："正式而立者，立宪之国家也，宪法为人民所制定，君主为人民所推戴。不以正式而立者，专制之国家也，法令由君主所制定，君主非人民所心悦诚服者。前者如现今之英日诸国，后者如中国数千年来盗窃得国之列朝也。"这一批语表明，毛泽东一面阅读，一面在思考中国的历史、现状和前途。他的这些意见不论其错误部分或正确部分，同样都反映出他接受了《新民丛报》的影响。这影响一直延续了相当长的一段时期。一九一八年，他和蔡和森、何叔衡、萧三等志同道合的朋友组织新民学会；从学会命名中就可以明显看出梁启超影响的印记，因为梁写过一篇有名的文章《新民说》。

毛泽东在东山小学只读了半年。这个学校并不能满足他的求知欲。他想到长沙去，他听说，那里有很多更高级的新学校。正好这时候学校的国文教师贺凤岗应聘到湘乡驻省中学堂任教，他愿意带这个学生到长沙去读书。好不容易说服了父亲。一九一一年春天，毛泽东挑着行李步行到湘潭县城，再乘船到长沙，进了湘乡驻省中学堂。来到长沙，对于毛泽东后来的道路，是一个更大的转折点。长沙是湖南全省的政治文化中心，也是新旧斗争的激烈场所。近代史上的一些重要人物如梁启超、谭嗣同、黄遵宪、黄兴、陈天华等许多人，都先后在这里活动过。只是来到长沙之后，毛泽东才更直接地触摸到了时代的脉搏。这时，

清王朝已经临近了自己的末日，它的腐败统治弄得民不聊生，民怨沸腾。在毛泽东来到长沙的一年以前，长沙城里曾发生饥民抢米风潮，遭到地方当局的残酷镇压，旗杆上悬挂着示众的人头。事件发生的当时他还在韶山家中，那许多天里，他都和友伴讨论这事，为饥民深感不平。后来他对斯诺说，这事"影响了我的一生"。也正在这时，孙中山领导的同盟会在许多地方发动反清的武装起义，此伏彼起。就在毛泽东来到长沙前后，广州爆发了进攻督署的起义，七十二烈士殉难，这一可歌可泣的壮举给了湖南以至毛泽东本人很大的影响。八年之后，他在自己编的《湘江评论》上发表的一篇文章回顾说："宣统三年三月二十九日，黄兴在广州起事，全国震动。消息到湘，学生界中之抱革命主义者，已跃跃欲试。"① 毛泽东，就正是一个"跃跃欲试"的"学生界中之抱革命主义者"。他积极参加了湘乡驻省中学堂的学生运动，他和几个激进的同学不但剪掉自己头上的辫子，还"出其不意强剪"别人的辫子。有无辫子，是清王朝用来区别顺逆的标志。不久，四川保路运动爆发，敲响了清王朝的丧钟，"继起者则为湖南，学生界尤其愤激，倡言罢课，到处开会演说。"② 湖南地方当局"横加干涉，学生公然开会不成，则秘密开会，城里开会不成，则聚议于岳麓山头"。③ 他说，他自己"当时也是这许多人里的一个小卒。我们学校里每天关着大门演说，好些同学慷慨激昂

①②③ 见《湘江评论》第4号（1919年8月4日出版）所载《本会总记》一文。

地主张革命。还记得演说的时候，一位同学将他身上的长袍卸下一丢，说‘快习兵操，准备打仗’”。[1]

清王朝不但应该推翻而且将要被推翻，这一点在毛泽东已经是完全清楚的了。尽管带着一种年轻人对于政治的幼稚认识，他还是在很认真地思考着中国的未来。“这个时候，我也听说了孙中山这个人和同盟会的纲领。当时全国处于第一次革命（按指辛亥革命）的前夜。我激动之下写了一篇文章贴在学堂的墙上。这是我第一次发表政见。思想还有些糊涂。我还没有放弃我对康有为、梁启超的钦佩。我并不清楚他们之间的差别。所以我在文章里提出，把孙中山从日本请回来当新政府的总统，康有为当国务总理，梁启超当外交部长！”正如他自己说的，他这第一次发表的政见竟没有能弄清楚当时革命派同改良派政治上的分野。但他这“有些糊涂”之中仍有不糊涂之处，在他所属意的三驾马车中，辕马毕竟是孙中山而不是康、梁。

一九一一年十月十日（夏历八月十九日）的武昌起义改变了中国发展的道路，也改变了毛泽东发展的道路，使他在湘乡驻省中学只读了半年左右就中断了。当时，湖南是全国第一个响应独立的省份，十月二十二日，成立了以革命党人焦达峰、陈作新为正副都督的湖南军政府。只有十天，立宪党人谭延闿组织了一次兵变，伏兵杀害了焦、陈二督，自己接任都督。一个月里政治风云的变化真是太大了。

---

① 见《湘江评论》第4号（1919年8月4日出版）所载《本会总记》一文。

毛泽东在长沙，目击了这一切。焦、陈举义之前，他曾经准备响应湖北军政府的号召，到武昌去参加革命军。听说武汉街道潮湿，还特地找朋友借得了一双雨鞋。湖南宣布独立以后，不必去武昌了，可以就近在长沙参加革命。他不愿意参加当时正在组织起来的学生军，就在这年十月底，他到长沙新军第二十五混成协（旅）第五十标（团）第一营左队里当上了一名列兵。那时清朝皇帝还没有宣布退位，他参军，是要为完成革命尽一份力量。后来他这样叙述了当年的兵营生活：

> 我的军饷是每月七元……，伙食用去两元，我还得花钱买水。士兵用水必须到城外去挑，但是我是一个学生，不屑挑水，只好向挑夫买水。剩下的饷银，我都用在读报纸上，贪读不厌。当时鼓吹革命的报刊中有《湘江日报》，里面讨论到社会主义，我就是从那里第一次知道社会主义这个名词的。我也同其他学生和士兵讨论社会主义，其实那只是社会改良主义。

毛泽东在兵营里，同穿着军装的工农分子有了直接的接触，其中有矿工和铁匠。他跟这些人建立了很好的关系。一九五〇年夏天，当年的副班长给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主席来信，主席亲切地写了回信[1]。

一九一二年三月，南京临时政府和北京政权达成协议后，不久就宣告解散，南北“统一”了。毛泽东以为这一场

[1] 副班长名彭友胜。这封回信曾由笔者装裱珍藏，1960年连同其他手迹上交中央办公厅。

革命已经没有什么事情要他做了，决心退出军队，回到他的书本子上去，他一共当了半年兵。

他一连投考了几个学校：警察学堂、法政学堂、商业学堂、实业学堂等等，都不惬意，有的住了个把月又退出来。一九一二年春天，他以第一名的成绩考取省立第一中学。但他对这个学校也不满意，以为课程有限，校规也使人反感。他从一位很器重他的国文教师那里借了一部《御批通鉴辑览》，读得很有兴味，觉得与其上学，还不如自学更好，可以多读自己喜爱的书。这样，他在校六个月就退学了，订了自修计划，每天到湖南省立图书馆去看书。“我非常认真地执行，持之以恒。我这样度过的半年时间，我认为对我极有价值。每天早晨图书馆一开门我就进去。中午只停下来买两块米糕吃。这就是我每天的午饭。我天天在图书馆读到关门才出来。”

毛泽东在这里全身心投入书籍的海洋，也在这里起步“走向世界”。图书馆的墙上挂着一幅《世界坤舆大地图》，每天经过，总要停下来细看一阵，感到世界真大！中国古称“居四海之内”，把自己和整个世界等同起来；其实从地图上看，它只占地球总面积的很小一部分。湖南更小，湘潭简直找不到地名。他想，世界上的事、中国的事，真是太值得研究了。在图书馆，他贪婪地阅读了大量的书籍，“我读了亚当·斯密的《原富》，达尔文的《物种起源》和约翰·穆勒的一部关于伦理学的书。我读了卢梭的著作，斯宾塞的《逻辑》和孟德斯鸠写的一本关于法律的书。我在认

真研读俄、美、英、法等国历史地理的同时，也阅读诗歌、小说和古希腊的故事。”

严复翻译的《原富》、《法意》、《群己权界论》、《群学肄言》等书，都是十八、十九世纪欧洲社会学说方面的名著，待到严复把它们介绍到中国来的时候已经有些过时了。这时，在西欧先进国家，马克思主义早已出现并且已有很深的影响，亚当·斯密等人的学说已经显得很暗淡。但是，这些较之中国传统的封建主义经典来说依然还是进步的东西；这是不论《论语》、《孟子》直到《御批通鉴辑览》中，都完全没有的全新的道理。毛泽东从严复译述的这些书中受到了一次比较系统的启蒙教育。这里应该特别提到《天演论》。这是严复根据赫胥黎的《进化论与伦理学》一书编译而成的，其中夹有不少译者的评论。他认为“世道必进，后胜于今”，反对中国人“好古而忽今”的思想；中国要救亡图存，只有“早日变计”，“力今以胜古”。康有为鼓吹维新的重要著作《新学伪经考》，是以对儒家经典作出新的阐发来反对“恪守祖训”的封建顽固派的。跟康梁不同，严复原原本本地介绍西方的名著，着重介绍了近代自然科学的方法论，使中国人比较系统地了解西方学术，给维新派提供了新的有力武器。严复的这些译本给了青年毛泽东很大的影响。后来，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中，严复和洪秀全、康有为、孙中山被并列于“代表了在中国共产党出世以前向西方寻找真理的一派人物”。

这半年的自修是很惬意也很有收获的，但因遭到父亲

的反对而无法继续下去了，父亲希望儿子能进正规的学校念书。为了能继续从家庭取得有限的费用，以维持最低的生活，而又得到学习的机会，他最后不得不考入免收学膳费的师范学校。一九一三年春季，将近二十岁的毛泽东考入了湖南公立第四师范。他又是以第一名被录取的。校长看了他的作文试卷，深为叹服，说："这样的文章，我辈同事中有几个做得出来！"第二年春季，第四师范合并于第一师范，直到一九一八年夏季毕业，他在这所当年很有名气的学校学习了五年半。

毛泽东利用在第一师范五年半的时间，专攻社会科学，一心探索救国救民的真理和改造社会的道路，他的思想处在新旧交替的急剧变化之中，他自己对这段生活作了这样的评价："我的政治思想在这个时期开始形成。我也是在这里获得社会行动的初步经验的。"他回忆说："这所新学校有许多校规，我赞成的极少。例如，我反对自然科学列为必修课。我想专修社会科学。我对自然科学并不特别感兴趣，我没有好好地去学，所以大多数这些课程我得到的分数很差。幸亏我的社会科学各课得到的分数都很高，这样就扯平了其他课程的坏分数。"这是一件很能够显示性格特征的轶事。他是一个从来不愿受约束而要按自己主见行事的人。对于当时象他这样一个立志从事政治活动的人来说，学社会科学远比自然科学有兴趣是十分自然的事，无可非议。但对自然科学知识的忽视，毕竟是一种遗憾。

毛泽东幸运的是，在第一师范遇到了很好的老师和很

好的同学。当时给他影响最深的是伦理学教师杨昌济。杨先后在日本和英国留学共达十年之久，他自幼服膺程朱之学，青年时期即具有爱国思想（留学时改名怀中）。与当年一般竞学法政、实业、军事等科的留学生不同，他在外国潜心研究教育和哲学，探求做人的道理。归国时正逢辛亥革命，谭延闿想延揽他做教育司长。他不愿做官，只是选择了一个冷清清的位置，当一个师范教员。很显然，这是由于他不满现实，有所抱负，想从教育着手，为国家培植人才。毛泽东认为杨昌济是"一个道德高尚的人。他对自己的伦理学有强烈信仰，努力鼓励学生立志做有益于社会的正大光明的人"。难得的是，在众多学生中，杨昌济对毛泽东也最为欣赏。他在一九一五年四月五日的日记中写道："毛生泽东言其所居之地为湘潭与湘乡连界之地，仅隔一山，人多务农。渠之父先亦务农，现业转贩；其弟亦务农，其外家为湘乡人，亦农家也，而资质俊秀若此，殊为难得。余因以农家多出异材，引曾涤生、梁任公之例以勉之。毛生曾务农二年，民国反正时又曾当兵半年，亦有趣味之履历也。"①

在第一师范的教师中，给予学生以良好影响的，还有徐特立和方维夏等，他们后来都成了著名的共产党人。同学中的蔡和森、何叔衡、陈昌、罗学瓒、张昆弟等，也都是关心国家人民的前途命运的热血青年，围绕在杨昌济

---

① 杨昌济《达化斋日记》，湖南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

老师的周围。后来他们和毛泽东一起组织了新民学会。建党以后，他们成为湖南最早一批党员骨干，并且都为共产主义事业献出了生命。这些师友都和毛泽东有着很深的关系，彼此之间都有着良好的影响。

毛泽东还希望结识本校同学之外的有志青年。一九一五年十一月九日他在致黎锦熙的信中说："两年以来，求友之心甚炽。夏假后，乃作一启事张之各校，应者亦五六人。近日心事稍快唯此耳。"这里指的就是著名的《二十八画生征友启事》（毛泽东三字的繁体共二十八画）。这启事的内容，据他后来对斯诺说的，是"邀请有志于爱国工作的青年和我联系。我指明要结交能刻苦耐劳、意志坚定、随时准备为国捐躯的青年"。这应征的五六个人中，现在我们只知道李立三和罗章龙两人。罗章龙在复信中写道："空谷足音，跫然色喜。"他们结识以后一时来往颇为密切，经常交谈读书心得，交换读书笔记。后来新民学会成立，罗章龙是最早的会员之一。

毛泽东在第一师范求学时好学深思的情况，从现在保存下来的他所写的一本笔记和一本书的批语中可以窥见一斑。他当年的读书笔记、读报摘记等是很多的（如杨昌济翻译的《西洋伦理学史》讲稿，就工工整整抄了七大本），曾积有一大网篮，存放在韶山家中。马日事变后，有族人畏祸，将这些搬到后山烧毁。他幼年的塾师将这一笔记保存下来。

笔记本共四十七页，一万余字。前面十一页是手抄《离

骚》和《九歌》全文，可见他对楚辞爱好之深。后面三十六页冠以《讲堂录》之名，主要是"修身"和"国文"等科的笔记，当是一九一三年至一九一四年听杨昌济讲课时所记。所记内容颇为驳杂，有文字训诂，警句摘录，古人的里籍年代，间或稍加评骘，有几处也记及圆周率、经纬度等自然科学常识。笔记中偶有发议论处，现在很难分辨这些究竟是学生本人的意见还是教师的意见。但至少可以认为，这些经过选择而记下的意见大抵是学生所赞同的。从这里，不仅可以看出这个青年学生读书之博，用力之勤，由此还可以窥见当年他所受的影响。

《讲堂录》中，孔孟儒家学说占有突出的地位。在中国的文化遗产中，跟老庄的主要是出世的思想不同，孔孟主要是入世的思想。显然，毛泽东正是怀有改造国家社会的抱负，才对孔孟学说发生兴趣的。例如，他摘录了孟子说的"夫天未欲平治天下也，如欲平治天下，当今之世，舍我其谁也"这样的话；提到了主张"先天下之忧而忧"的范仲淹；提到了自许"六经责我开生面"的王船山，等等。可贵的是，青年毛泽东并没有全盘接受孔孟的思想，而进行了一些独立的思考。例如，他写道："'君子谋道不谋食'（按：见《论语·卫灵公》），系对孳孳为利者而言，非谓凡士人均不贵谋夫食也。'志不在温饱'（按：宋代王曾的名言："曾平生之志不在温饱"），对立志而言，若言作用则王道之极亦只衣帛食粟，不饥不寒而已，安见温饱之不可以谋也。"列宁在《哲学笔记·费尔巴哈〈宗教本质讲演录〉一书摘要》

中认为，费尔巴哈提出的道德不是别的，只是一切人的利己主义的论点，可以算是“历史唯物主义的胚芽”。毛泽东的这些议论显然也是包含着历史唯物主义的胚芽的。

《讲堂录》中还记了曾国藩的语录:“不说大话，不骛虚名，不行架空之事，不谈过高之理”；记下了曾撰《圣哲画像记》中所标举的三十二个人；以及曾所倡导的“八本”：即读书、作文、养生、事亲、居家、立身、做官、行军等项的基本准则。他对曾国藩的赞赏显然是受了杨昌济的影响。这里应当附带说明一下，旧时尤其是湖南的读书人，包括一些有为之士，一般容易受所谓“中兴名臣”、“一代儒宗”曾国藩治学、办事、处世、为人的影响。曾国藩一生究心宋明理学，以儒家道统的继承者自居。他在镇压太平天国时，就声称不仅是为了维护清王朝的统治，而且是为了维护纲常名教的道统，因而笼络了一批汉族封建知识分子。对于曾国藩鼓吹程朱之学，重视伦理道德修养，杨昌济很是推崇，他在《论语类钞》中，认为曾国藩抓住了“大本大源”。毛泽东在一九一七年八月二十三日致黎锦熙的信中说:“今之论人者，称袁世凯、孙文、康有为而三，孙、袁吾不论，独康似略有本源，然细观之，其本源究不能指其实在何处，徒为华言炫听，并无一干树立枝叶扶疏之妙。愚意所谓本源者，倡学而已矣，惟学如基础，今日无学，故基础不厚，时虞倾圮。愚于近人，独服曾文正，观其收拾洪杨一役，而完满无缺，使以今人易其位，其能如彼之完满乎?”

一个认真的思想家、哲学家，无不从探究世界的本源入手，来建立自己的世界观、人生观。本源是来自精神，还是来自物质？借学校自学的毛泽东，也是从这里开始的，他为此付出了艰巨的精神劳动。这从现在幸存的另一件实物得到证实。这件实物就是一九一七至一九一八年杨昌济教伦理学所用的课本《伦理学原理》（德国泡尔生著、蔡元培译）。在这约十万字的课本上，毛泽东用工整的蝇头小楷写了一万二千一百余字的批语，全书逐字逐句都加上圈点、单杠、双杠、三角、叉等等符号，可见他在学习中是何等的专注而深思。泡尔生是十九世纪康德派唯心论哲学家，于伦理学调和动机论与功利论。毛泽东的批语，除了少部分是对原书一些章节的提要以及“此语甚精”、“此不然”之类表示是否赞同的短句之外，绝大部分是他发抒自己对伦理观、人生观、历史观和宇宙观的见解，以及对原书的批判或引伸，其中许多地方联系到古今中外诸家的哲学思想，以及“五四”前夜的国事与思潮。总之，处处显示着追求真理和改革国家社会的精神。

从这些批语中清楚地看到：青年毛泽东在哲学思想上的杂学庞收，从孔孟程朱陆王，到颜习斋、顾炎武、王船山、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现在又加上了康德、叔本华，以及陈独秀、李大钊，甚至还有佛学的东西，[1]这使他当时的思想成了一堆十分庞杂的混合物。在这里，我们

---

① 毛泽东1920年6月7日致黎锦熙的信中说到，他“很想研究”的几门学问中就有佛学。

既看见了主观唯心主义的东西，例如说什么"世界固有人有物，然皆因我而有也，我眼一闭固不见物也"；"使无个人（或个体）则无宇宙"，认为客观物质世界不能离开主观而存在；也看见了认识论上的唯物主义倾向，例如说，"其知也，亦系经而知之"，"此种言语在其起源确已合于客观界之事实，乃由种种之经验而来者也。由一人而论，从幼小之时即兼而习之，似为构成于先天，而从历史观之，则纯成乎经验，而非所谓先天识觉也，"这就接近于唯物主义的经验论了。在这里，我们还看见了朴素的辩证法，例如说，"治乱迭乘，平和与战伐相寻者，自然之例也。伊古以来，一治即有一乱。"分明显现着对于事物向对立面转化的认识，但有时又流露出了对于发展观的主观随意性："宇宙之毁决不终毁也，其毁于此者必成于彼，无疑也。吾人甚盼其毁，盖毁旧宇宙而得新宇宙，岂不愈于旧宇宙耶？"这种说法看来是从佛教哲学中"劫"这一范畴而来的。还有这样一大段："观念即实在，实在即观念，有限即无限，……生即死，死即生，……小即大，阳即阴，上即下，秽即清，男即女，厚即薄，质而言之，万即一，变即常。"否认了任何差别，这就从辩证的思维走向了相对主义，有点类乎庄周的"齐物论"了。在这里，我们也看到了圣贤豪杰创世的唯心主义的历史观："豪杰之士发展其得于天之本性，伸张其本性中至伟至大之力，因以成其为豪杰焉。本性以外之一切外铄之事，如制裁束缚之类，彼此以其本性中至大之动力排除之。"这里又是以是否探得"大本大源"来区分上智

下愚："圣人者既得大本者也，贤人略得大本者也，愚人不得大本者也。"杨昌济虽奉孔孟程朱之学为正宗，却又攀援附会，把古今中西哲学思想冶之于一炉。学生自然也受这种影响。例如在泡尔生论及大人君子义务感情之处，《批语》以为"与孟子所论浩然之气及大丈夫两章之意大略相同"。此外，"本精神不灭、物质不灭为基础的观点"，"精神、物质非绝对相离之二物，其实即一物也，二者乃共存者也。"这也反映了中国古代哲学和康德二元论的影响。我们不必惊讶青年毛泽东当时有着多么芜杂的思想，重要的是，透过这些芜杂思想所显现出来的真知灼见，例如，他在写了"凡有压抑个人、违背个性者罪莫大矣"一句之后，紧接着说："故吾国之三纲在所必去，而与宗教、资本家、君主国四者，同为天下之恶魔也。"又例如阐述带有佛家观点的"生灭成毁"之后，这样写道："吾尝虑中国之将亡，今乃知不然。改建政体，变化民质，改良社会，是亦日耳曼而变为德意志也，无忧也。惟改变之事，如何进行，乃是问题。吾意必须再造之，使其如物质之由毁而成，如孩儿之从母腹生也。国家如此，民族亦然。各世纪中，各民族起各种之大革命，时时涤旧，染而新之，皆生死成毁之大变化也。"这就说明，这个学生的艰苦的哲学思维，是为他的现实的政治观点服务的。必须打碎现存的国家机器这种革命思想和革命精神，是毛泽东在求学时期就已形成了的。

值得特别注意的是，为要"改造国家与社会"，《批语》中许多地方说到必须从改造自我或"实现自我"做起，不

但要实行“今日之我与昨日之我挑战”，而且要实行“来日之我与今日之我挑战”。“实现自我”是杨昌济讲授伦理学的一个专题。毛泽东称之为“精神的个人主义”：“人类之目的在实现自我而已。实现自我者，即充分发达自己身体及精神之能力至于最高之谓。”救国必先救民。有赖于人人求得真理，实现自我。这个学生当年是这样想的，也是这样做的。他服膺于王船山、颜习斋等的“经世致用”的“实学”，力求实践自己的理想。他的“野蛮其体魄”的锻炼身体的方法，在学校中几年如一日，从不间断，正好说明他的“知而不行，只是未知”的身体力行的精神。

《讲堂录》和《伦理学原理》上的批语，都是听课和阅读的当时随手记下来的片断东西。我们研究毛泽东在学生时代的思想见解，应该更加重视他在一九一七年四月用“二十八画生”这个署名在《新青年》月刊（第三卷第二号）上发表的《体育之研究》一文。一九一五年九月陈独秀主编的《青年杂志》（第二卷起改名《新青年》）一出版，杨昌济就把它介绍给了毛泽东和其他学生。这在当时是一个在全国知识界和广大青年中风靡一时的刊物。特别是当一九一六年袁世凯死了之后，刊物变得更加激进，大力鼓吹民主与科学，为后来“五四”运动的爆发作了舆论的准备。杨昌济在《新青年》上发表文章，也带动他心爱的学生毛泽东向这个刊物投稿。

毛泽东极力主张“身心并完”，强调个人主观意志的能动作用，他曾经写过一篇《心之力》的文章，被杨昌济推奖

备至，打了一百分。可惜这篇文章世人已无法看到。《体育之研究》这篇极可珍贵的文章，可说是《心之力》的姊妹篇。全文八千余字，共分八节，详细论述了有关体育的各个方面。文章本着严复的《原强》、梁启超的《新民说》等，提出了德智体"三育并重"的主张，力求变化民质，出现身心并完的一代新民。这篇文章中的唯物主义倾向，比以前《伦理学原理》的批语中表现的更为明显。文章说："夫知识之事，认识世间之事物而判断其理也，于此有须于体者焉。直观则赖乎耳目，思索则赖乎脑筋，耳目脑筋之谓体，体全而知识之事以全"。感觉活动有赖于感觉器官，思维活动有赖于大脑，这显然是唯物主义的认识。文章对于一切事物无不处于运动变化之中、对立事物经常在互相转化这一辩证法思想，也作了精辟的阐述。"人之身盖日日变易者：新陈代谢之作用不绝行于各部组织之间，目不明可以明，耳不聪可以聪，虽六、七十之人犹有改易官骸之效，事盖有必至者。"

毛泽东从来不是一个坐而论道的学者，体育之研究与实践不过是一个例证。正如他自己说的，他是在第一师范时期开始形成自己的政治思想，也是在这里获得社会行动的初步经验。他主持学友会，为全体同学服务。主办夜校，为失学的工人服务。他的抱负与理想，总是力求付诸实践，而且常有凡俗之不敢为的举动。他在《讲堂录》中说："闭门求学，其学无用。欲从天下国家万事万物而学之，则汗漫九垓，遍游四宇尚已。"他从旧的《民报》中看到两个学生旅

行全国一直走到打箭炉（按即今四川康定）的记载，很想效法他们的榜样。于是在一九一七年的暑假，邀了当时在教小学的朋友萧子升徒步旅行，他们象旧时的“游学先生”一样，穿着草鞋，背着包袱雨伞，漫游了长沙、宁乡、安化、益阳、沅江五个县。在这次漫游中接触了各阶层的人物，特别是贫苦的劳动者，获得了许多书本上所没有的知识。毛泽东的实践家的品质高于他的理论家的品质，这一点在他学生时代就有非凡的显露。

还应该提到一件可以看出他的胆识的事情。一九一七年十一月，段祺瑞政府所委派的湖南督军傅良佐在桂军谭浩明部压迫下弃城逃走，长沙一时成了真空，一夕数惊。毛泽东以学友会总务的身分领导了护校活动，“学生自愿军”手持军训课用的木枪“分夜逡巡，警卫非常”。北洋第八师王汝贤部奉令增援傅良佐，一天晚上该部的一支队伍到达长沙近郊，因不知桂军入城没有，不敢贸然前进，在距离学校两里地的猴子石徘徊。毛泽东分析了形势，于是联络附近的警察分所，利用他们的几支真枪带头，扼守妙高峰制高点，在夜色中毛泽东指挥这一支只有木枪的队伍切断通道，形成了包围圈，警察在山头鸣枪，一面大放炮竹虚张声势，迫使这支北洋军缴了械。当然，这事也跟倾向直系的王汝贤不愿为皖系的傅良佐出力有很大关系，但毛泽东的过人的胆识毕竟起了决定性的作用。

从正式发表的论文以及笔记之类来看毛泽东在第一师范求学时的思想，正如他自己后来说的：“在这个时候，我

的思想是自由主义、民主改良主义、空想社会主义等思想的大杂烩。我憧憬'十九世纪的民主'、乌托邦主义和旧式的自由主义，但是我反对军阀和反对帝国主义是明确无疑的。"这是一个十分确切的概括的说明。一方面，以民主的思想、唯物主义和辩证法的明显倾向为主的杂学庞收的混合物；一方面，反帝、反军阀、反封建，这是学生时代的毛泽东思想的主流。正是因为有了这个主流，一当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他就能够迅速地接受马克思主义的学说，并且成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

对于马克思主义者的毛泽东来说，早年所受的芜杂的思想影响终究是一个沉重的负担。不论作为封建时代思想体系的孔孟学说，或是康德的先验论哲学，同作为无产阶级世界观的马克思主义，从根本上说是对立的，格格不入的。必须彻底清理早期所受的思想影响，清理这一堆思想的混合物，这是一个何等艰巨的任务。列宁在二十岁时就已经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了，二十三岁就写了《什么是"人民之友"》一书。这是许多不同的条件造成的。俄国与西方联系多，中国与西方长期隔绝。在中国内部，湖南又是一个极为闭塞的省份。列宁出生在一个民主的知识分子的家庭，从小受到了良好的教育，而毛泽东只有在克服了父亲的反对之后才能念一点书。更重要的，当时俄国资本主义已经有了一定的发展，《资本论》已经有了俄译本，特别是俄国出现了普列汉诺夫这样卓越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而且列宁能直接阅读马恩的原著。这些条件毛泽东都不具备。

严格说来，马克思主义的传入中国是十月革命以后的事，马列主义的许多重要著作，更是三十年代后才陆续翻译过来。历史注定了毛泽东（以及中国第一代共产党人）在接触马克思主义之前，先要接触那些欧洲已经过时的哲学思想和社会学说。不破不立，不破除这些非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就不能牢固掌握马克思主义思想。毛泽东当年在较短的时间内，克服了十分驳杂的思想而成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真是异乎寻常的艰难。他终于做到了这一点，这正是他的伟大处。可是由于思想也往往是“先入为主”的，彻底清理极为不易。青少年时代的思想初恋，似乎在晚年又燃起了某种“怀旧”之情，这就不能不使人们发生“沉重的负担”这类感叹。

毛泽东在第一师范的最后两年，主要是按照自己的读书计划在那里自修，对不感兴趣的课程则应付了事，甚至根本不去上课。教师们都能谅解他，把他当作一个特殊的学生。对于一个有自学能力的好学的人来说，自修，也许是一种最好、最有效地利用时间的学习方法。不少成大事业大学问的人，都有过这种独立自学的经历。马克思在柏林大学，九个学期中只选修了十二门功课，甚至这十二门课他也很少去听。他选修法学的课程不过是作为研究历史和哲学的一种附属修业。正如梅林说的，“作为一个思想家，马克思在大学时代就已经独立地工作了。他在两个学期中所获得的大量知识，如果按照学院式的喂养方法，在讲堂上点点滴滴的灌输的话，就是二十个学期也是学不完

的”。[1]

一九一八年六月，毛泽东在第一师范毕业。他在一九二〇年六月七日写给黎锦熙的信中说：“我一生恨极了学校，所以我决定不再入学校，自由研究，只要有规律，有方法，未必全不可能。”从此，毛泽东结束了他的学生生活。不久他进行了组织新民学会、组织勤工俭学等等活动，开始了他投身革命洪流的新阶段。

从毛泽东在学生时代的这些事迹中，我们可以看到，他很早就是一个有抱负、有理想、有胆识的人，他不仅是一个特别用功、好学深思的学生，更重要的是，他如此关心着国家和人民的前途命运，不断探求救国救民的真理和道路。所有这些，都是值得今日青年一代学习的。我们纪念他诞生九十周年，就要学习他的这些精神。今天我们要开创社会主义事业的新局面，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同样十分需要这种精神。

一九八三年十一月

---

① 见梅林《马克思传》。

一个献身教育事业的人

——记傅任敢教授

傅任敢先生的译著要出版了，这是一件很好的事情。虽然我不懂教育，也没有读过他的文稿，但深知傅先生为人的真诚，治学的严谨，象这样一位言传身教、毕生不懈、鞠躬尽瘁的老教育家的译著，很有必要留传。

由于家庭的关系，我很早就认识傅先生。一九三四年上北平升学时，曾在清华园傅先生的家中度过一次周末。抗战时在延安，就听说他在重庆主持清华中学，成绩斐然，学生可以订阅《新华日报》，地下党在该校有基础。一九四九年南下到长沙时，我们终于又会面了，他的家就在我母亲住所的隔壁。我回家探望母亲时，他的夫人杨仁（我大姐的同学）特为放了一挂鞭炮。傅先生当时欢庆中国的教育事业也得到解放，对党是无条件的信任。在中等教育方面，他是一个很有抱负的人。一九五〇年初教育界的友人约他到北京，发挥他的才能。

一九五二年我也转业调到北京，由于隔行，大家都忙，五十年代似很少来往。六十年代初，我们同处于逆境，于是有过一两次往来，他也没有更多诉说他遇到的不幸与

不公平，只是非常同情我的遭遇。他还送了《〈学记〉译述》给我，本子很薄，但很严谨，知道他仍在从事学问，这就很好。

一九七九年一月回到北京后，听说他身体不好，特去看望，当时谈到许多想做的事情，后来又寄来文章与我。《毛泽东的早期革命活动》一书的增订本出版，他一定要去一本。在他去世前不久，我曾到医院去看望，他还将读了《龙胆紫集》后写的一首诗送给我，这时他躺在床上，已无力多说话了。他的夫人告诉我，他还在挂念着为《中国大百科全书》写稿的事。追悼会上，看到他的老朋友与弟子们的许多挽联、悼词，使人深受感动。

最近由于湖南教育出版社要我为傅先生的译著写篇小序，他的女儿平生送来了许多有关材料，包括他在解放初期写的自传，以及他去世后一些同学和学生写的回忆文章，使我更清晰地看见了一个勤勤恳恳的教育家在半个多世纪中走过的艰难道路。傅任敢教授只不过是“五四”以后的万千中国现代知识分子中的普普通通的一人，并无赫赫之功与籍籍之名。但正因为如此，他就有了代表性，我们就可以把他作为认识他们那一代知识分子（广而言之，也可以作为整个现代中国知识分子）的一个标本。下面，我就从有关材料中摘抄一些，稍作文字整理，按时间先后排列如次。

傅先生求学时代的情况，在他本人于一九五〇年五月一日写的一篇自传中讲得比较详细。

中学时代：

我是一九一九年进的长沙明德中学，一九二三年冬读完四年毕业，那时正当五四运动以后，毛主席在长沙一师附小教书，组织文化书社，传播新思想。同班有位庞人侃①君，每周周末要从北门跑到南门去与毛主席相聚。我受了他的影响，也爱看看新书新报，后来夏曦当长沙学生联合会会长，我是明德的出席代表，与夏曦、刘梦苇等常有见面机会。

一九二三年冬考完毕业考试，我因平时有感于学校风气之坏，作了一篇短文投给长沙《大公报》，批评校政。不料付排的那天晚上，学校负责人在报馆看到了原稿，回校召开会议，决议扣留我的毕业文凭。这个打击使我后来决心学习教育。

这回因写批评稿而扣发文凭的事，后来他在一九五五年九月十五日写的另一篇材料中，说得更具体些：

毕业考试后，我写信给长沙《大公报》，批评校务，被主事谢祖尧发觉，报告了在京的校长胡子靖，扣留我的文凭。（按：其中提到的谢祖尧，是后来国民党湖南省党部的负责人）

一九二五年傅先生考取了清华大学及北京交通大学。他进了清华大学的教育心理系，至一九二九年毕业。这几年里的情况，他在自传里说：

---

① 庞是被湖南军阀赵恒惕杀害的黄、庞二烈士之一的庞人佺的弟弟，后来也参加了革命。

我参加了二次清华的校政改革运动。第一次是北伐军快到徐州的时候。清华本来是个留美预备学校，从一九二五年起才改为大学，我们便是大学部的第一级，当时留美预备部还剩下一九二八和一九二九两级没有毕业。北伐军到了徐州，留美预备部的同学着了慌，恐怕北伐军到了北京以后，他们出不了洋，于是暗中要求校长曹云祥，准他们立即提前出国。曹与外交部部员组成的校董会也乐得借此多领一笔经费，大家分润，估计可达数十万元。不料在开校董会的前一日被校内教授们知道了，又传到了学生中间，我们便起而反对。我们的主张是：不能提前出洋，不能动用基金；我与另外二位同学作为代表，去见当时的外交部长王荫泰。王一见面便说："我已与曹校长说过了，你们大学部也应当选派一部分出洋才公道。"想收买我们，我们感到受了曲解与侮辱，一气便回校公开了王的谈话，并加以驳斥。后来这件阴谋便没有实现。第二次是北伐军到京以后，我们主张清华改为国立（以前是外交部部立），基金独立（以前被外交部少数部员把持），和欢迎罗家伦做校长。我不是国民党党员，也与罗无一面之缘，只因在中学时爱看《新潮》之类的杂志，对他有番仰慕之心，加以清华校友中有人以大清华主义为号召来反对他，激起了我们的反感，因此更要欢迎他。不料我与另外二位同学作代表到南京去接罗的时候，他一见面便把他的校务计划中的某一条

给我们看，那一条的内容也是要把大学部的学生选派一部分送出洋。我们当时又感到了被曲解与被侮辱，回校又公开见面的内容，以后我与罗便再没有来往了。

我在清华最后的二年的生活是靠自力支持的。① 支持的办法是写点文章投到杂志上去，主要是《教育杂志》与《中华教育界》，其中有几篇比较艰涩的译文被改登在《民铎》杂志与《学衡》上，这些杂志的编辑人除吴宓教过我翻译术以外，至今与我都不相识。此外与同学办过一个《弘毅月刊》，登的都是国学家王国维、梁启超等人的讲稿，一个《认识周刊》，登一些零碎论文。

看来，傅先生的这篇自传乃是为了交代历史人事关系而写的，所以着重写了那些带有政治活动性质的内容，而一点也没有涉及日常学习的情况。特别是由于他的谦逊，羞于为自己评功摆好，好些事情都没有写上，因此从他的自传中并不可能看出他的全貌。当年的清华同学、现任财经学院教授曾炳钧，在《对任敢学行的片段回忆》一文中说：

任敢原名举丰，一九二五年考入清华大学，一年后专攻教育心理，学习成绩优良，甚得教师赏识。任敢沉毅有识，明敏笃实，遇事独抒己见，侃侃而谈，不畏强力，不喜阿附，故改名任敢。好读书，尤其读

① 那时傅先生的父亲叫他停学回乡，他不肯，父亲就断绝了同他的经济关系。

罗素著作，有文才，每有写作，构思成熟，即奋笔疾书，短时立就，不多改易，而明畅曲达，文彩斐然。

任敢既善于学习，又干练多才，待友诚信，以此为同校学友所推重。与同年级同学牟乃祚、汤象龙、刘心铨、曾炳钧、袁翰青等尤友善。任敢在学生时期无党派，只加入当时校中一、二学术友谊团体，如“青年励志学会”，“弘毅学会”，参加编辑《弘毅》会刊。一九二八年，与曾炳钧、徐士瑚、牟乃祚等创办一知识性刊物《认识周报》，并与曾先后担任总编辑。该刊虽刊行不久，但在读者中反应良好，当时清华大学著名教授翁文灏、吴宓及北京大学教授陶孟和等，对该刊均交口称誉。

任敢在清华学习时，正值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革命的学生运动风起云涌。任敢此时注意力虽集中在学习，但经常参加进步的学生运动。一九二六年三月北京学生发起了反抗军阀，向段祺瑞政府请愿的运动，遭到武装镇压，发生了“三·一八”惨案，死伤学生数十人。同年级学友韦杰三烈士中弹死，汪燕杰（振儒）受伤，任敢当时是在请愿队伍中亲历险境的幸免者。任敢在校内还积极参加了驱除腐恶势力改革学制的学生运动。

当年清华同学、现在四川财经学院的汤象龙，在《关于傅任敢教授的历史资料》一文中有类似的介绍：

一九二五年考入清华大学第一级本科教育心理系，在校学习成绩优异，深受校系领导器重。三年级时担任第一级学生会主席兼学术委员，经常为《清华周刊》撰写论文，并翻译过有关欧美教育心理学论文多篇，刊在《教育杂志》和《大公报》等刊物。四年级时担任清华大学学生会主席，主编过《认识周刊》半年，写过一些论文。当时学校师生称他为一个"著作等身"的青年学者。在三四年级学习期间，适值国内政治动荡不安，而他仍专心学习，未参加任何党派组织活动。但一九二八年学校掀起反对乔德福校长的风潮，他曾代表全校学生赴南京国民政府教育部请愿，坚拒乔德福来校，深受全校师生赞扬。

在清华大学毕业后，傅先生回到湖南，在他的母校长沙明德中学担任教员和教务主任。一九三三年他又回到清华大学，任校长办公室秘书并兼任成府小学校长，直至抗战爆发、北平沦陷时为止。关于这一段情况，当时的同事汪健君写给傅平生的一封信中说：

我和令尊论交，始于他留校任校长秘书职务时，他办事明敏有条理，待人谦虚和蔼，所编《清华同学录》，创立规模，详而不繁，简而不漏，一时称善，嗣后即遵为楷式。那时我在清华教务方面任职，得常接晤，对他非常钦佩。从他那里，我受到了许多教益。芦沟桥事变突发，学校南迁，我和他均被留在原校址内任清华大学保管委员会委员，护理校产并处理善后事

宜。

在入侵者的铁蹄之下护校，可不是一件轻松的事情，何况他当时还远不只是护校，还实际进行了支援抗日军队的活动。他在自传中说：

抗战第一年，学校把我们留下保管校产，那时我为清华教职员公会兼办成府小学，剩有一万六千元基金，经由叶企荪先生接济了冀中吕正操将军。我们在校内受过日本军人多次的压迫与侮辱，其中最危险的一次是敌酋寺内要来驻扎。我关照了同事美国人温德，转告美领馆提出口头抗议，驻校的牟田口一定要我们限期交出报信的人，幸多方调解拖延，才算不了了之。

一九三八年日寇侵占清华园，傅先生间关万里，从沦陷区到了大后方，在重庆创办了清华中学并担任校长。关于这个学校创办的背景，现重庆第九中学（原清华中学）致校友的信中，作了如下的说明：

一九三八年七月份，董必武同志指示当时中共重庆市委委员罗清同志："应该在重庆这个地方创办一所我们党领导的中学，培养大批思想进步、具有党的优良作风的青年。"罗清遵照董老的指示，与地下党其他同志及清华大学校友经过两个月的紧张筹备，又得到了社会知名人士的襄助，九月，终于在重庆江北胡家湾成立了清华中学（后迁到重庆士桥现校址）。清华中学开学不久，即成立了中共清华中学党支部。

傅先生是怎样担任这个学校校长的？在他去世之后，

该校在京校友写了如下一份材料：

傅任敢先生是一位爱国主义者，是进步的热爱民主的教育家。他热心于教育事业，抱着教育救国的思想，兢兢业业，把清华中学办成一个进步的、具有优良校风的、教学质量高的、在西南地区比较有名的学校，为国家和民族培养了一大批人才。

傅任敢先生“较开明，不大干涉学生思想活动，学校里的教师中多进步分子，学生甚活跃”。这是一九五〇年十二月重庆市委政策研究室编的《解放前重庆概况》一书对他的评价。傅任敢先生在清华中学办学十年的情况，的确是这样的。他对国民党教育当局规定的一些反动措施，采取抵制的态度，坚持不设童子军课、军训课和公民课。国民党企图在学校建立党部和三青团部，他予以拒绝，从而掩护了进步势力，使学校地下党组织得以发展，学生运动中师生未遭到逮捕。解放前夕，为了保护学校，傅先生利用当时在国民党军界中有名望的一位人士、也是学校的董事长吕超写了一块“学校重地，禁止驻军”的木牌，竖立在校园内，使学校免遭国民党军队的破坏。

傅任敢先生号召学生“关心时事，不问政治”。这个口号看来似乎是矛盾的，在当时却起了很好的作用。“关心时事”要求学生不要闭门读书，要时刻关心着国家大事；“不问政治”是一个策略的提法。实际上，他对学生参加反饥饿、反内战的罢课、示威游行等运动，

并未加以干涉。学校既订《中央日报》，又订《新华日报》，图书室也有不少进步书籍，不少同学当时就读到了一些马列主义的书。

应该怎样理解这个看来有点自相矛盾的口号呢？一九八〇年国庆期间，在北京工作的八十多位旧日清华中学师生举行过一次聚会，会上有人作了确切的解释："'关心时事'，活跃了我们同学的生活；'不过问实际政治'，起到了保护同学的作用，这也是为什么解放时清华中学地下党团员那么多，而始终没有遭到迫害，国民党三青团也始终打不进清华中学的一个最有力的注脚。"

清华中学教学等方面的情况，该校在京校友写的那一份材料介绍说：

傅先生非常注意教学质量。聘请的教员中，大多是清华大学的优秀毕业生，教学上对学生要求很严格，因此，清华中学读书风气甚浓，涌现了一大批勤奋好学、成绩优良的学生。历年升入北大、清华、南开、交大等全国有名大学的毕业生人数，在西南地区的中学中名列前茅。这些毕业生，许多已成了今天祖国四化建设中的骨干力量。

傅先生注意培养学生的民主作风，支持学生创办各种刊物、墙报，因而，学校中学术空气和讨论时事的空气非常活跃。他提倡学生自治，全校设有学生自治会，各班有班会，民主选举领导人，学生的事情由学生自己办。

傅先生还非常重视文娱体育活动，支持学生办歌咏队、话剧团，每学期都要搞几次歌咏比赛，演几次话剧，如《雷雨》、《家》、《棠棣之花》等。为了加强学生的体育锻炼，学校规定每天下午第四节课是体育活动时间，学生一律到操场里去，不准在教室里看书。为了促进体育运动的开展，每学期都要举办一次校内运动会或游泳比赛。

傅先生倡导艰苦朴素的作风。他勤俭办校，把募捐来的钱买建筑材料，动员师生自己盖校舍。规定学生要穿学生服，不得穿奇装异服。提倡学生洗冷水脸，自己洗衣服。还组织同学们利用课余时间劳动，历时数年，修成了一个大养鱼池，取名"愚公池"。

总之，傅任敢先生在清华中学任校长期间，治校是严谨的；采取的措施，在当时是进步的；他重视学生德智体全面发展的思想，在今天看来也是正确的。我们这些从这个学校出来的学生，三十几年来对母校一直怀有深厚的感情，对傅校长十分敬重和深切怀念，因为我们不少同学革命人生观的初步树立是在这个学校，基础知识的获得是在这个学校，优良作风的形成是在这个学校。

重庆清华中学第一届学生严伟年在写给平生的信中回忆说：

重庆清华中学是一九三八年八月下半月开始招生的，招了两次，我是第二次考进的。当年九月开学。地址

在江北鸳鸯桥胡家湾，校舍是租用王姓地主的院子。我们第一届入学时有七十二人，称为“七十二贤人”。学习环境的确艰苦：住茅屋，点油灯，伙食也差。

傅任敢校长是一九三九年初来学校的。

高中学制是三年，两年内将全部课程学完，第三年加课学习及复习。第一届学生除几个同学成家立业外，全部升入大学。其中有现在的原子能专家朱光亚，最后一个学期转南开中学毕业。

聘的教师以清华大学毕业生为主，教材多采用国外有名的教本，如《范氏大代数》、《英文典大全》，用的都是英文原本。布置作业较多，也经常考试，以促进学生的学习和复习，巩固知识。

学生的英文水平都高，特别是文科班，傅校长亲自授课，并购置不少英文故事小册，供课外阅读。我入大学后，就能看英文本的医学书籍，用英文写信。

当时抗战，购书困难，他劝说王姓房东向学校捐赠了一部商务印书馆出版的《万有文库》，同时发动同学捐书，这样办起了图书室。

在校舍院子前，买得王姓一大块水田，作大操场。我记得在教导主任魏泽馨的带动下，全校师生手挽手，高唱义勇军进行曲，踏着步伐，压平操场。操场落成后，他规定下午四至六时锁教室门，大家一律出来运动。当时组织有篮、排球队，体操队，我也是队员，参加单、双杠。您母亲杨老师指导我们打排球，她的

声音仍在我耳中回响。

傅校长也重视音乐教育，动员房东捐赠了一台立式钢琴，由蒋宪端老师任教。由于缺少音乐和图画课的教师，他还创造了一种“教生”制度。什么叫“教生”？老师教，叫教师；学生教，叫教生。当时我被聘为“音乐教生”，还有一个同学做“图画教生”。他还请重庆管弦乐团来校演奏过。

他提倡学生关心时事，独立思考。他还创造了一种督促学生学习报纸的办法，每天晚饭前集合时，拿出一个饼干桶，里面是每个学生的小名牌，抽签，抽到谁，谁就上台讲时事。

后来学校在重庆士桥盖起了新校舍（即现在的重庆九中）。刚刚盖好教室，还没有学生宿舍、没有桌椅黑板时，开学时间到了，怎么办？于是，学生睡教室，白天卷起行李当凳子，膝盖做桌子，白纸贴在墙上代黑板，老师蘸墨汁板书。

我同傅先生的多年接触中，他从没有谈过他当年靠拢党的政治态度，更没有标榜过他有何进步功劳，他的自传中对此也只字未提。可是，当年重庆的清华中学就象是党办的一所中学，不，也许由党员直接来办，说不定会被查封的。请看有关这方面的一些回忆。先是清华中学学生，后来又在那里任教，并且担任地下党的支部书记的汪国桢，写给傅平生的信中说：

我最不能忘记的是，你父亲在当时国民党统治区

白色恐怖局面下办学，顶住了反动当局的压力，不允许国民党、三青团进入学校。如有个别特务混进学校，一经察觉，即予解雇。还有一件令人感动的事，那是一九四九年四月八日，我们清中全体学生、地下党员和进步教师，集体步行到沙坪坝去和重庆大学、南开中学等大、中学校师生，合开几万人的大会，声讨国民党政府血腥镇压请愿学生的南京"四一惨案"。你父亲第二天也来了，到我们的住处南开中学、树人中学来看望，他非常关心师生的安全，可见他是支持学生的正义行动的。他办校十年，清中没有一个地下共产党员、一个进步师生遭到国民党特务的残害，这是我们在清中学习过、工作过的共产党员永远要感谢他的。

另一个地下共产党员黄继武说：

一九四七年至一九四九年，这是从黑暗的中国到光明的中国的关键时刻。在这历史性的时刻，我是在清华中学度过的。傅校长不仅没有让反动党团进校，而且在校内培养了一种既讲科学又讲民主的作风。傅校长规定每个班必须办一墙报，它的内容学校不加干涉，随你去写多进步的东西都可以。当时同志们的思想总的说是在党的领导之下，但是这样一个民主自由的学校环境，也是起了不小作用的。

当时清华中学第六级学生张其锟、辛代高合写的一篇回忆材料说：

抗日战争期间的重庆，处于国民党的反动统治之

下，傅任敢校长在这种形势下主持清华中学，教育学生用了两句话，叫做“要关心时事，不要参与政治”。他的用心是良苦的：既要学生关心国家大事，又不要被国民党抓住把柄。当时在重庆能公开订阅《新华日报》的中学是很少的，在我们校内就可以公开订阅、零售。当时一般中学都有国民党或三青团的组织和活动，在清华则没有。这在当时的重庆，可能是仅有的。

抗战末期，国民党发动知识青年从军，但当时清华中学学生参加国民党青年军的极少。这与校内的政治空气是有关的。当时除了重庆市教育局派人到学校作过一次动员外，学校当局没有再做其他工作。

抗战胜利后，国民党利用当时国际国内的复杂形势，蒙蔽青年学生，在重庆煽动了反苏游行，清华中学也有学生参加了。游行前，傅校长曾加以劝阻，告诫学生说，情况复杂，不要被人利用。游行后，他又请人来校作有关蒙古情况的讲演，使学生明白蒙古在一九二一年就已革命成功而独立，并不是苏联侵占了蒙古。

教育的重要职责是传授知识，更重要的是要使受业者明确学习的目的，学会如何做人。作为一个进步的教育家，傅任敢先生在这两方面都是做得很出色的，前面已有不少介绍。经过十年内乱之后，请看当年他的学生的有关感想。当年清华中学的学生胡甫庥（现改名胡平，在国家科委政策研究室工作）写的一份回忆材料中说：

学校常用“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道理来激发青年人的爱国心，每天清晨，天还没有大亮，校园上下到处响起了琅琅读书声。这种刻苦好学的精神，并不都出自“学而优则仕”的动机，而往往出自一种自觉性和责任心：复兴中华，需要一代有知识的新人。清华中学教给学生的，与其说是丰富完备的知识，不如说是热爱知识、追求真理的进取心。而恰恰是这一点，成了学生们日后最大的财富。

原来重庆清华中学教务主任、现在四川大学历史系教授王介平写的《一位平凡而伟大的教育家》一文，这样介绍了傅先生这方面的成就：“重庆清华中学以独特的优良学风著称。一般肯定它升学率高，对学生要求严格，慎选师资，三育并重等等，却很少谈到傅任敢同志所提倡的家庭式教育这个核心环节所起的潜移默化作用。傅任敢同志提倡家庭式教育，匠心独运，创设出一套具体措施。如在每个教室旁特筑导师室，规定导师专教该班语文，全面负责，为密切师生联系、师生打成一片、言传身教提供了条件。浸润既久，学生好学而不极端，活泼而有礼貌，全面发展而不没其爱好，师生同学间亲如家人，互敬互助，蔚然成风，历久不败。傅任敢同志重视自我教育，充分相信学生经过亲身实践，足以获得知识启迪智能。在课堂内重启发，多测验考试，课外让学生参加各种活动和体育运动，提高觉悟，改正缺点，在时代潮流的洗礼下探索自己应走的道路，对此学校不加干预。同时又尽量防阻恶势力侵入学校，以

免妨碍学生的正常成长。这便使校园里弥漫着一派生机勃勃、活跃向上的气氛。”最为难能可贵的是，傅先生的民主办学精神，他让学生干预校政。王介平的文稿接着说：“最集中体现学校民主作风而富有教育意义的是‘期终意见表’，每值学期终了前，为了收集学生对学校的意见，每人发白纸一大张，上面印四句话：‘善意批评，积极建议，知无不言，言无不尽。’不记名，只填班级。从学校行政、教学到膳食，从校长、教师到校工，学生都可以毫无顾忌地畅所欲言，提出意见和批评，学校根据这些意见总结改进工作。这个办法不但保证了学校工作的不断改进，又对学生进行了一次意义深刻的民主教育。”傅先生这种放手让群众监督领导的做法，同多年来“左”的失误，实成一种鲜明的对照：许多人由于对领导提了点什么意见，就会挨整，就会在运动中戴上一顶什么帽子。某些“宁左勿右”的共产党员，面对这位民主人士，实在应该感觉惭愧！

从上面所引的当年师生的回忆材料中，人们对于傅任敢教授在重庆清华中学办学的情况，可以获得一个颇为清晰颇为完整的印象了。可是，在当时国民党统治中心的重庆，为了取得这些成果，必须抵抗多么强大的政治压力，这就不是当年一般师生所能具体知道的了。为了了解这一点，我们不妨看看他本人写的自传：

> 首先我们与国民党的关系始终是绝缘的。我自己自始至终没有加入过国民党，中间有一次全川中学校长集体入党，我没有到会得免，有两次中央训练团指

名调训，我称病没有去。在当时的陪都，象我这种情形，恐怕是唯一的例外。学校里面自始至终没有成立过国民党党部与三青团团部，中间有一次社会局叫我们组织三青团，我们也一拖了事。这在当时的陪都，也怕是唯一的例外。我们的训导主任多数不是国民党党员，最后一个且系中共党员。我们最初只是觉得大环境太腐恶了，想保持一片小天地中的清洁，后来才进展到有意掩护在学青年的自求进步，所以师生订阅《新华日报》的达二三百份，伪政府几次密令禁止，我们始终没有执行。进步书刊学生几乎人手一册，学校图书馆也购藏不少。

抗日战争胜利结束后，傅先生除了继续办重庆清华中学之外，并于一九四六年秋天又创办了长沙清华中学，作为重庆清华中学的分校，并由他本人兼任校长。当年长沙清华中学一级学生、学生会主席、现任东北电业管理局技术改进局工程师谭昌铭写的一篇回忆录说：

长沙清华高级中学是在一九四六年秋季由校长傅任敢教授创办的。实际上它是重庆清华中学的一个分校，因为学生的学籍都在重庆清华中学。学校的教育方针和规章制度都和重庆清华中学相同。傅任敢教授兼任这两个中学的校长。创办长沙清华中学的动因是这样的：抗日战争初期清华大学在长沙岳麓山南麓左家垅盖了两栋校舍，打算在华北沦陷后迁至此地，后来这计划未能实现。这两栋校舍的产权属于清华大学。

抗战胜利，清华大学迁回北平，校长梅贻琦建议傅任敢利用这个校舍创办长沙清华中学。

长沙清华中学始终没有国民党和三青团的组织(至少没有公开的组织和活动)。由于学校远在郊区，又没有在当地政府备案，国民党地方政府基本上对它采取不闻不问的态度。可能由于它有某些上层人士(清华校友)如梅贻琦、新一军军长孙立人等人的赞助，当地国民党政府也就一直没有来碰它。在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它是国民党鞭长莫及的一个管不着的单位，进步力量发展很快，到一九四九年长沙解放，这个学校的多数学生立即参加了革命。

身教重于言教，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古今中外教育家都这样主张，可是要真正做到是很不容易的。前面已经谈到傅先生创导的“家庭式教育”特别注重德育，谭昌铭的回忆对此也有记载：

清华中学特别重视德育。傅校长德育教育的主要方法是以身作则，并要求所有的教师作学生的表率。他提出学校家庭化的口号，视学生如同自己的子弟一样，但他又不搞家长制，提出了另一个口号，那就是管理民主化。他把德育和智育密切结合起来，在整个教学过程中无不注重德育。别的学校有公民课，也即国民党的政治课，清华中学没有。别的学校每星期举行一次纪念周，名为纪念孙中山先生，实际上是进行政治教育，清华中学也没有这项活动。校规很简单，

只有遵守作息制度、课堂纪律，不吸烟，不喝酒，不蓄发等几条。学生全部住校，多数专职老师也住校，同学生打成一片。这样的教育影响很深远，多数学生保持刻苦好学、勤恳工作的作风，几十年如一日，生活俭朴，有的至今不抽烟，不喝酒。

智育方面，傅校长把重点放在培养学生的自学能力上，课程的安排特别注重三门基础课：语文、数学和英语，分量特别重，每周各八节课，占了全部课时的三分之二。语文教学以语言为主、文学为辅，古汉语和现代汉语并重，每周命题作文一篇，在两堂课的时间内完成，当场交卷。英语采用直接法教学，课堂上一般不用汉语讲解，以养成学生理解和使用英语的能力。我至今记得傅校长常常强调的一句话：**A foreign language learning is a habit transformation**（外国语学习是一种习惯的转变）。课堂上除讲课外，还进行英语问答练习和听写练习。为了培养学生阅读英语书刊的能力，高中二年级用的《范氏大代数》、《霍尔乃特解析几何》等教科书都是英文原版，三年级理科用英文的物理学课本，这是针对清华大学一般新生入学头一年看不懂英文科技课本的现象而采取的措施。在清华中学的图书馆阅览室里，还订了几种英文报刊，除了上海出版的《密勒氏评论报》，还有《Times》、《Reader's Digest》等。清华中学与教会无缘，傅校长是主张无神论的，但却常常请外国传教士在星期六

下午或星期日来校演讲，目的是让学生有听外国人说英语的机会。

傅先生是很重视美育的，将它与德智体并重。他力求提高学生对真正的美的感受力，尤其是在抗战艰苦环境中，在日常生活和艺术作品方面，如何理解和欣赏美好事物。这种潜移默化的熏陶可以影响人的一生。谭昌铭的回忆说：

> 清华中学十分重视美育，学生穿着规定的简单朴素的制服，学生都剃光头，要求整齐清洁。学校里办公室、教室、礼堂，陈设都很简单，一切都讲求实用。傅校长提倡的是一种朴实的美。他本人的风格也是朴实无华的。高中三年一直有音乐课，歌咏活动很活跃，学生都能识谱。到一九四八年以后，革命歌曲在校内大流行，并且公开演出《兄妹开荒》等节目，课余常举行音乐欣赏会，播放西方古典名曲，其中有反映劳动人民疾苦的《伏尔加船夫曲》等。

清华中学在教学中，力图把中国优秀的传统文化和欧美的科学技术和文化结合起来，既有强烈的民族自尊心而又不排外，对古今中外一切优秀的文化和科学知识，采取兼收并蓄的方针。

总之，傅校长的教育思想是德智体美四育并重，引导学生追求真理追求知识，为社会造福。重要的不只是传授知识而是培养学生的能力，自学的能力和自治的能力。他的理想是造就体魄健全、具有高尚的道

德情操和高度的文化素养献身社会的人才。他也是这样塑造他自己的。他本人不追求名利，不做官，以教育为毕生事业，否则他也不会放弃清华大学的职位来办中学了。

一九四九年，傅任敢先生欢欣鼓舞地迎接了全国解放。这一个在教育事业上做了许多有益的工作、并且在政治上追求进步的人，并没有以功臣自居，以进步自居，相反，他十分严肃地考虑自己是否适应新的时代的要求。他在自传中说的这一段话，现在读来还是非常感人的：

> 我在解放后即对师生说："我们以前多少有点自由主义的、与政治绝缘的作风，这在解放以前是我们的一个大优点，因为它掩护了大家求进步；解放以后却变成了一个大包袱，必须赶快丢掉。"

从他的这篇自传中可以看到，当时他思考着的，是原来做的有哪些不足。回顾自己走过的道路，自己作了十分严格的解剖：

> 我曾冷静地分析过我自己，对革命，最初我是不了解它的必要性的，我是个小资产阶级出身的旧知识分子，一方面极端憎恶伪政府时代的一切作风与表现，因此绝不与当日的官府有往来。一般的社会交际官场，我也深恶痛绝，但是我总希望国事能够不流血而得到改良，甚至我还提出过一句矛盾的口号"关心时事，不问政治"，因为我知道纯技术观点是不对的，学生应有正确的政治认识，但是自己既无参加革命的勇气与

决心，又怕学生行动起来，遭受牺牲。无庸讳言，最初我是一个改良主义者，想走中间路线，后来经过一次又一次的失望，我才知道革命是不可避免的了。解放以后亲身目击，一切从前办不到、望不到的事，现在逐渐一一实现了，我才懂得革命的必要，加以多看了一些理论书籍，我算是明白了革命的必然性了。

过去二十一年来，我一直专心在做教育工作，从不外骛，可惜出身与环境限制了我的工作内容与方式，现在我决心从头学起，并从头做起。自信可以诚诚恳恳老老实实地为人民做点事情。

一九五〇年北京市人民政府决定在劳动人民聚居的龙须沟地区建立一所私立中学（即第十一中学）时，根据副市长吴晗的推荐，傅先生被调来北京任该校第一任校长，负责筹建工作。雷通衢在一份回忆材料中记述建校时的情况说：

在建校初期，没有得力师资，他就从南方聘请了教语文、数学、生物等科的多位教师；没有操场，他就带领全体师生，自己动手平整坟山，并在上面洒了厚厚的一层生石灰消毒，使三百多学生有了上体育课的场地；没有礼堂，他又和全体师生一道，将神殿改建为礼堂，仅仅这一项工程就为国家节约了一万二千斤小米，受到了市人民政府的嘉奖。

他也注意请社会上知名人士和英雄模范人物来校作报告，老体育专家马约翰的报告推动了学校的体育

活动；历史学家吴晗勉励学生好好学习，成为建设新中国的有用人才；吴运铎也来作了报告，学生们从他的事迹中激发了更加刻苦学习的热情，决心把自己的一切献给党的革命事业。

一九五四年，北京师范学院开始筹建，傅任敢被调来参加筹建工作。这是一个新的工作岗位，在他，也是一个新的起点。以前，他办中学，是为大学准备合格的、优良的学生，现在，他要来直接培养师资了，他原先的许多抱负得到了施展的大好机会，他关于教育科学的理论探讨和实践经验，有了用武之地。我们也应该为这个新的学府深庆得人。请看他是怀着怎样的激情投入这个工作的。师院的屈惠英、吴山梅、邓兰如、谢惠玲、雷文娴、张特民、高滨、林兰芝等人合写的一篇纪念文章回忆说：

> 傅先生是我院元老之一。早在一九五四年我院筹建时期，傅先生奉命筹建教育教研室。创业难，一切都是从零开始。为了集中精力，他从城里搬到学校宿舍住，日以继夜地投入工作。不论是饭后的休息时间，还是紧张备课后的夜晚，傅先生经常把我们这些人叫去，商量如何收集整理有关资料，如何开好教育课程，提出他对教研室今后的设想和打算，并仔细听取我们的意见。
>
> 一九五五年秋天，我院从东郊迁到现在校址。有一次傅先生站在新建的教学楼前，满怀深情地说："党为了培养师资建了这样好的校舍，我们一定要好好

干哪！教育教研室要做出成绩和贡献，就要协助院领导办好学院，办好附中，将来有了条件，还要办好附小和幼儿园，要办成一条龙，我们一定要把各级附校办好，办成教育科学研究的阵地，办出北京师院的特点来。”我们当时在场的人，无不感到傅先生是位有远见的老教育家。他对祖国师范教育事业的责任感和事业心使我们深为感动。在傅先生言传身教的熏陶下，我们这些“新兵”更加热爱自己的本职工作，决心象傅先生那样为祖国的师范教育事业奋斗一生。

建院初期，傅先生身为教育研究室主任，负责编写教育学讲义，还担任着两个班的教学任务，但他仍拿出很多时间和精力放在对我们的培养和提携上。他认真审阅我们的讲稿，听我们试讲。从教材处理、教法选择、课的组织结构以及教态等方面进行具体指点和示范。我们这些青年人是在傅先生具体指导下走上讲台的。

留给我们最深刻的印象是傅先生严谨的治学态度和理论联系实际的好学风，不论是在理论研究、著书立说方面，还是在教学实践上都是这样。他经常讲：“理论研究是为了指导实践，学习古代外国的论著，也是借以为鉴，指导我们现实的工作，如果离开了这一点，那么从事理论研究，学习前人经验又有什么意义呢！”

不久以前，胡耀邦同志在他的那篇纪念马克思的报告中，对解放前我国知识分子的状况作了这样的估计：

新中国成立以前，我国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虽然知识分子按其社会地位，大都是从属于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但是他们中间的绝大多数同时也受着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派的压迫，因而一部分知识分子直接参加了革命，一部分同情革命，还有许许多多知识分子怀有反帝爱国的志向。

这个估计是完全符合实际情况的，傅先生岂不正是千千万万怀有反帝爱国志向、同情革命的知识分子中的一个吗？可惜的是，情况又正象耀邦同志在这篇报告中所说的一样：

从五十年代后期开始，我们在对待知识和知识分子的问题上，逐渐离开了正确方向，犯了严重的左倾错误。它的主要表现，就是轻视知识，轻视专业，给广大的热爱社会主义祖国并对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作出了重要贡献的知识分子戴上“资产阶级”的帽子，排斥和打击他们，使许多知识分子遭受压抑，以至蒙受冤屈。

事情就是这样。在一九五七年的反右派斗争中，傅先生成了扩大化的受害者。他是因为什么原因而被划为“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分子”的呢？他的大女儿傅平生是个有心人，她把她父亲划右派的“罪证”保存下来了。那是两份油印的《北京师院整风专刊》，北京师范学院院刊编辑室编，一份是一九五七年六月七日出版的第十四期，另一份是第二十七期（具体的出版日期不详，当较前者稍后）。上面登载了傅先生在师院教师座谈会上发言的详细摘要。这是

一份有代表性的材料，很值得一读。人们就此可以知道，当年一个人只要发表了一些什么样的言论，就会被硬推到异己的、敌对的方面去。现在我把第十四期所载的他六月五日的发言摘抄在下面：

> 我今天谈四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对运动本身的意见。……要使这次运动搞得好，一定要坚持和风细雨的原则，只有和风细雨才能细致分析问题。我不相信两人互相大叫大骂后团结会更好一些，我认为指着鼻子大叫大骂后反而会产生新的问题。心平气和地来谈容易使对方接受。报上登载某教授发言说：过去你们粗暴对我们，我们是向你们学的，而且学的还没到家。这种态度我不同意。

每一个不怀成见的、公正的人都可以作出判断：傅先生的这个态度究竟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呢，还是拥护党拥护社会主义。他旗帜鲜明地表示不能同意一些有偏激情绪的人的态度，不赞成以粗暴的态度对党提意见。

傅先生讲的第二个问题是师范学院究竟应该归教育部领导，还是归高等教育部领导的问题。他是主张由高教部领导的。由于高等教育部早已和教育部合并，此刻已经完全没有必要来介绍他所申述的那些理由了。国务院所属的这两个部都是共产党领导的，不论主张由哪个部来领导，即使这个主张不恰当，也决不能说是反党反社会主义。

> 第三个问题是高师体制问题。现存党委制有一定缺点，如：一、别校党委工作一把抓，一方面是忙不过

来；另一方面高等学校工作面广，几个党委委员不可能胜任所有工作。据说个别学院几个党委同志没有受过高等教育，自然不懂业务，不能领导业务。二、以党代政，势必使学校民主成为形式，党委的决定交给会议讨论，实际只是布置工作而已，大家不可能提出不同的意见。同时非党领导同志会感觉有职无权，只参加演出,不参加排练。这涉及到党能不能领导科学、文化教育和高等学校的问题。我认为在方针上党完全可以领导，这些方面也不能脱离党的领导。至于具体业务能不能领导？这要具体分析，如某方面党有能领导的人就领导，否则就得倚靠党外专家。

我不赞成教授治校理由有四：一、解放前教授治校的主要是北大、清华，我只谈谈清华的情况，当时提出教授治校的方案意味着反对当时政府和当时的校长；当时也有宗派主义情绪，清华教师多是清华毕业美国留学的，有大清华主义。目前这个提法是不恰当的。二、除历史原因外，教授治校也为本身条件所限。教授在业务上是懂得多一些，可是领导学校还有其他方面的工作，教授不见得能完全胜任。三、过去教授治校有宗派主义，你争我夺。教师经过思想改造后觉悟大大提高，但是学校全由教授来管理，还可能缺乏全面观点，会削弱领导。四、教授不只是不能完全胜任领导，实际上教授也不一定愿意管理许多行政事务。

我赞成民主办学，这不意味着过去不民主。民主办学的内容如何？我认为应该是“党委领导、校长负责、依靠教师、发扬民主”。

党委如何领导？领导方针、政策的实施，是起监督作用，不是执行；领导思想教育工作。如何实现领导？可参考中央办法，党委决定以建议形式提交校务委员会，通过出席会议的党员贯彻党的意图。

校长负责一方面是对上级负责，负责贯彻上级的方针、政策、决定；一方面是对校务委员会负责，负责执行校务委员会的决定。如作出与上级政策相反的决定，原则上接受上级决定；如作出的相反决定是结合实际的具体办法，原则上按决定执行。如校务委员会决定与校长意见不一致，由校长建议再讨论一次，如仍不一致，校长应服从会议决定。在行政会议上校长有最后决定权。

如何依靠教师？校务委员会应有各级教师代表参加，教授名额可多一些，讲师次之，助教又次之，但我院讲师是中坚，应多一些。有些权力要下放，如聘请教授可否由系务会议提出初步意见，再由院务委员会决定。

如何发扬民主？一、教研组长、系主任等至教务长由民主选举产生，苏联莫斯科大学已这样作，这应当作为我们的方向，逐步实现。二、院务委员会应采取多数表决办法，过去会议布置多，今后应多进行讨论。

三、党委决定通过党员贯彻，但当党员的看法与决定不一致时，应鼓励党员表示个人意见。四、民主党派可联合选举一、二名代表参加院务委员会，工会也要有代表，有人提出由共产党与民主党派联合决定学校大计，也不妥。

上面所引的意见虽不能说全都是适当的，但是其中许多意见就其精神来说显然是很好的。例如，关于党的领导问题，耀邦同志在前面引过的纪念马克思的报告中就指出：

党的领导是政治、思想和组织的领导，是方针政策的领导，是对于各方面工作的检查督促，不可能也不应当包办代替各项具体业务、技术和行政工作。

在今天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中，正确的政治领导，就是要在各个领域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把党的方针政策同本地区、本部门的具体实际和具体业务结合起来，调动和组织各方面的积极因素，卓有成效地实现党所提出的战斗任务。而要做到这一点，党的各级领导干部不但要具备一定的科学文化基础知识，而且要熟悉各自领导范围内的必要的专业知识，了解有关业务领域的具体情况，掌握它们的特殊规律。不然的话，只能是空头政治，只能不着边际，无所作为，或者瞎指挥。依靠这样的领导，四化建设是没有希望的。因此，要领导，就必须努力成为内行。

傅先生谈的第四个问题是加强学术空气问题。第二十

七期专刊上登出的他的那篇发言摘要，总的精神和上一篇相同，他对整风运动中出现的不够实事求是的意见提出了批评，指出“有的人过去受过委屈，现在揭露‘三害’可能情绪激动”的态度“是没有好处的”。当然，他也对自己所见的一些不好的现象提出了批评，例如：

在学习苏联时不听老教师意见，院系调整乱合并，造成现在很大问题。又如教材是讲的寒带问题，却拿到我们温带来讲。据说有的领导干部说过，苏联是错的也要学。

下边由于上级这样作风，养成善于领会领导意图，不能独立思考或不敢独立思考，结果产生报喜不报忧，盲目服从，纸上处处超过指标，实际上完不成，这种风气“自古皆然，于今为烈”。

还有一些诸如此类的意见，不引了。前面我们已经了解到傅任敢是一位何等真诚的民主教育家，我们自应理解他的这些意见是何等的自然与善意。可是，当年就是这样一些意见，也就足够使他成为一个“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分子”了。这不是他一人的不幸，这对于我们党和我们民族，都是一场灾难。值得庆幸的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清算了以往极左的错误，极端地重视了社会主义民主和社会主义法制的建设，下决心不再重蹈过去的覆辙。一九七九年，傅先生错划右派一案得到了改正。前面引过的屈惠英等八人的纪念文章中说：

一九七九年他恢复工作走进教研室的第一天，便

关心询问每个同志开课的情况，并建议要让青壮年教师多挑重担，促使他们迅速成长。他还兴致勃勃地为教研室多出人才多出成果献策献计，为提高教研室一些教师的外语水平，他不顾自己年老体弱多病，辅导专业英语，甚至有病也不耽误一节课。有一次因为看错了表提前来到学校，教师们正在午休，他就悄悄地在办公室里等了一个多小时。对傅先生的这种精神，同志们无不为之感动。在最后两三年里，他还抢时间重新修订了过去有关教育的译稿(英译中、古译今)，撰写评介孔子教育活动的论著，为《中国大百科全书》撰写有关教育的条目……直到他病重再也不能握笔为止。

傅先生的家属保存了一件珍贵的遗物，那是一九八一年八月二十四日他在病中写给孙辈的一首诗：

七七衰翁未自弃，
初升旭日更可喜。
祖孙并肩齐迈进，
争为四化尽绵力。

这是一种多么感人的精神状态呵！

一九八二年一月二十四日清晨，傅先生在北京部队总医院与世长辞。

追悼会上，我听到了北京师范学院党委致的悼词，公正地对他一生的业绩作了很高的评价：

傅任敢同志是一位有影响的、爱国、民主、进步的教育家。半个多世纪以来，他把自己的全部精力献

给祖国的教育事业。无论是在从事教育工作、培养人才方面，还是在研究、介绍我国古代教育理论方面，他都成绩卓著，多所建树，为发展我们的教育事业，作出了宝贵的贡献。他的逝世是我们教育事业的损失。

悼词扼要地介绍了傅任敢的生平事迹，并且特地指出：

他在逆境中仍然怀着对党和人民的赤子之心，忍辱负重，认真工作，撰写了《教育心理学》和《夸美纽斯传及〈大教学论〉注释》，并参加翻译了《西方的没落》等著作。

一九八一年夏季，在酷暑中他还挥汗赶写《中国大百科全书》的教育条目。他说，我的时间有限了，必须尽最大的可能利用它。坚持写完了才去住院治疗。在医院的病床上他还口述着要写的几个题目。他就是这样，为人民，为教育事业献出了毕生的精力。

我听了这悼词，在悲哀和怅惘中间也有了一些平安的感觉。党和人民毕竟是公平的，我想，这应该也可以告慰傅先生的在天之灵了。

他一生著译甚勤，从青年时代起就开始翻译西方有关教育的论著。附在《傅任敢教育译著选集》卷末的魏泽馨写的文章中，比较详细地介绍了他这一方面的活动：

在清华大学最后二年，……傅教授就靠写文章及借债以维持生活。除参与创办《弘毅》会刊及《认识周报》外，还经常用“举丰”“苕年”笔名向《教育杂志》、《中华教育界》、《民铎杂志》及《学衡》上投稿，现在从

北京图书馆查出的一部分他当时的译著中，就有《克伯屈文化与教育》，介绍了克伯屈一九二七年的一篇论文；《后得性遗传问题之实验的研究》，介绍了麦独孤的实验报告；《情感与理智》，介绍了行为主义者华生的一篇心理学论文，等等。

在清华大学工作期间（一九三三年至一九三八年），傅教授对于教育学术的翻译工作更加勤奋。先后在商务印书馆《汉译世界名著》中出版的有：裴斯泰洛齐的《贤伉俪》、娄德安的《生活的科学》、卢骚等的《莉娜及其它》、约翰·洛克的《教育漫话》和夸美纽斯的《大教学论》。此外还编了一部《近代中国教育人物象传》，五年之内利用业余时间出版六本书，真是很不容易的。

他在编辑《近代中国教育人物象传》时，曾写信给在北大读书的他的学生，嘱他寻找李大钊同志的照片。那时北平正处在国民党反动派白色恐怖之下，可见傅教授当时对大钊同志是有一定认识与尊敬的。

从当年的杂志上可以看到：他在《教育杂志》上发表了不少介绍外国教育情况的文章，如《苏俄职业教育之近况》、《法国中等教育之演变》、《英国中等教育之鸟瞰》、《美国教师专业概况》。在《认识周报》上发表了《优生与教育》、《中国优生问题》、《后得性遗传问题之实验的研究》等好些文章。在《独立评论》上发表过《湖南教育一瞥》。此外，他还在《国闻周报》、《华年周刊》、《旅行杂志》等刊物上发表过文章。在清华大学和清华中学发表的文章就不待说了。

他在解放后写的文章，陆续发表在《光明日报》、《文汇报》、《人民教育》、《教育研究》等报刊上，出版的单行本有《〈学记〉译述》（上海教育出版社）。花了许多心血的著作《教育心理学》及《夸美纽斯传及〈大教学论〉注释》两书，商务印书馆已决定出版，恰值十年内乱发生，“商务”遭到冲击，两本书稿付之一炬，至为可惜。

由于他英语好，长于翻译，他还参加翻译了《西方的没落》、《世界通史资料选辑·现代史部分（第一分册）》等书；此外，他翻译的《历史学的理论与实际》不久即将出版。他的书，我仅仅读过他送我的《〈学记〉译述》一本，以为他治学态度严谨，文笔也是好的。其他的书没有读过，不能说什么，想必也是同样的水平。就凭上述不完全的目录，著译方面这些成绩，也就是值得称道的了，何况他还有更重要的方面，有他的本业，有他倾注了毕生心力的教育事业呢。

类似傅先生的人，或者说旧中国大多数的知识分子，大都有一种出污泥而不染的洁癖，清高，正直，鄙弃国民党的官场，希望中国富强、进步，希望通过自己的专业能对祖国有所贡献。这样的人最终必然把希望寄托在我们党的身上，这是爱国的、正直的中国知识分子的必然归宿。

我不懂教育。作为一个教育家，我以为傅先生最大的一个特点是重视教人而不只是教书。对于青年一代传授知识是重要的，但是仅仅传授知识是不够的。傅先生办学，是德、智、体、美四育并重。就拿智育来说，他把培养和

提高学生自学的能力看得比传授知识更重要。在他主持的学校里，注意采取种种具体措施来培养学生的良好习惯和作风。我以为这是他的教育实践和教育思想中最可宝贵的部分，也是我们今天教育界应当注重发扬的精神。傅先生是一位有着强烈的民主思想的人，这也正是一位教育家应当具备的天然品质，同时，也是我们大家应当向他学习的地方。

鲁迅在一篇文章里，把古往今来那些"埋头苦干的人"、"拼命硬干的人"称做"中国的脊梁"。象傅先生，难道不正是这样一个埋头苦干、拼命硬干的人吗？尽管他又是如此的平凡，并不为许多人所知道，但是他的学生、同事，以及每一个和他熟识的人，却永远不会忘记他。我们的党也从痛苦的教训中开始学会珍惜这样的知识分子了。我不惮烦地把这许多材料摘抄出来，用意也就在这里。

一九八三年十二月

纪念齐白石

一九八三年十二月二十五日为国画大师齐白石一百二十周年诞辰。他的家乡湖南湘潭各界于今年元旦至四日举行纪念活动，出版纪念专集，并筹建湘潭齐白石纪念馆。去年九月间，我就收到筹委会《募征书画金石诗文专函》。犹豫到十一月初，终于冒充风雅，写了一幅字条寄去，略说因缘:“拄杖闲庭喜小休，新雏掌上正啁啾。后生略得先生意，眼底风光笔底收。右题画家刘宇一绘赠白石大师弄雏图绝句。余自幼酷好美术，五十年代为琉璃厂常客。得画渐多，大师精品不下十帧。尝有句云：白石选精品，鸡雏可谓神；门人牛补柳，此画挂小厅。惜李可染写牧童骑牛、白石补柳条幅，随所藏书画，皆毁于十年动乱，今幸存者才二帧及餐菊楼题画册而已。乡人纪念，征稿于余，不辞谫陋，录以报命，略抒追慕之情云耳。”

我是一九三四年才知道齐白石的名字的，那时我在武汉读书，收到在北平读书的好友文立徵（一九四五年初在鲁南游击区牺牲）来信，说他请齐白石刻了一方图章，高兴得不得了。一九四九年南下途中路过北平，购得黎锦熙、胡适、邓广铭三人合编的《齐白石年谱》，才对画师的生平

和为人有了一些了解。对于这一位从细工木匠自学成才的艺术大师，对于他潜心绘事敝屣尊荣的风骨，敬慕之情不觉油然而生。一九五二年调北京工作之后，才有机会逛琉璃厂。依我的偏见，就书画而论，齐白石的画逊于他所崇拜的徐文长、石涛、朱耷以及近人吴昌硕诸家，这些人的存画已稀而值昂，齐画价较廉且量多，大有挑选余地。自然，我的多选购齐白石作品，更是出于对其人的崇敬。

到一九五九年春，我购藏的白石精品共约十幅。就象茨威格小说《看不见的珍藏》中所写的那一位名画收藏家一样，这些已经不复存在的名作依然历历在我目前。如我尝在诗中提到的那一幅《鸡雏》，绘小鸡可一二十只，或觅食，或追逐，只只毛茸茸，有质感，神态飞动，栩栩如生，且有题诗，是我及今所见鸡雏图中之最佳作。李可染绘牛、白石补柳一幅，当年荣宝斋欲收回制版，我想以孤本传世而不许。谁料这一念之差，竟使此作毁于文化浩劫。我爱艺术，但并无据为私有之心，所有藏品，最终总是要交给适当的单位，使其得以保存和流传。几十年来，我失去的东西甚多，书画自是身外之物，失去就失去了吧。只是想到这些艺术珍品虽不是毁于我之手，却是在我的手中被毁掉的，总不能不对白石老人有一种负咎的感觉，对于艺术有一种负咎的感觉。

差可庆幸的是，我还保存着他的两幅精品和一册《餐菊楼画册》。餐菊楼是桐城方子易的画室名。五十年代，我问过荣宝斋的老杨（现已去世），他知道方子易其人，是二十

年代的画家，似曾学过西画。此册收画十帧，白石各附以题跋，或诗或文，饶有情趣。如题山水云："墨点作为归鸟迟，江村晚树远无枝。故乡有此湖山好，可惜翁衰离乱时。"画渔人担网过小桥，白石题诗："江边最好晚凉幽，获外闲盟水上鸥。莫使江桥空寂寞，肩担鱼网且勾留。"都是清新可喜的小诗。也有题跋忆及童稚时事，如题垂钓图云："阿芝少时喜钓鱼。祖母防其水死，作意曰：'汝只管食鱼，今日将无火为炊，汝知之否！'令其砍柴，不使近水，余以为苦。岂知衰老干戈，故山无置樵柯渔钓之地耶。"也有题跋论画，如题山水云："四百年来画山水者，余独喜玄宰、阿长（按即董其昌、徐文长），其余虽有千岩万壑，余尝以匠家目之。时流不誉余画，余亦不许时人。固山水难画过前人何必为。时人以为余不能画山水，余喜之。子易弟誉余画，因及此。"《餐菊楼画册》作于庚申（一九二〇）年，白石五十八岁，已经知名于故都了。他为画册作的跋语说："老萍最喜餐菊楼写真，能得神似。居于京师，同趣者皆莫及。来京无闻，乃先人非显宦，自家未年尊故耳。余怜其与余少有同病，出此索跋，书而归之。"可见其提携后进之心。大约也是因为忆及自己青少年时代的艰辛，才更对青年艺术家的困顿有同感吧。使我尤为欣赏的是，题跋用了多种书体，有习见行书，有冬心体，有类瘦金体。我同湖南的同志说，俟湘潭齐白石纪念馆建成，当将此册送去，让大家欣赏，也可当作研究齐白石的一种资料。

前面提到《齐白石年谱》，是研究白石其人其事的一部

重要文献，其中不少极可珍贵的材料，曾使我生仰慕之情。如记他学画的经历："他在家一直的养草虫——纺绩娘、蚱蜢、蝗虫之类，还有其他生物，他时常注视其特点，做直接写生的练习，历时既久，自然传神，所以他的画并不是专得力于摹古。到壬寅，他四十岁，作远游，渐变作风，才走上大写意的花卉翎毛一派（吴昌硕开创的风气)。民初，学八大山人（书法则仿金冬心)。直到民六民八两次避乱（按指一九一七至一九一九年间，南、北军在湖南的混战)，定居北平以后，才独创红花墨叶的两色花卉，与浓淡几笔的蟹和虾。"又如记他学篆刻："……一日问铁安：'我总刻不好，奈何？'铁安答曰：'南泉冲的础石，挑一担归，随刻随磨去，尽三四点心盒，都成石浆，就刻好了。'白石默识其言。自是至庚戌十年间果成名。"《年谱》并引了他自述练习刻印情景的诗句："磨石书堂水亦灾。"自注："余学刊印，刊后复磨；磨后又刊。客室成泥，欲就干，移于东复移于西，□于八方，通室必成池底。"白石是花了如许工夫，才成为艺术家的。

至于其为人襟抱，《年谱》引《自记》中谈到光绪二十九年（一九〇三）年的一件事："春三月，午诒（即夏寿田）请尽画师职，同上京师。樊山（即樊樊山）曰：'吾五月相继至。太后爱画，吾当荐君。'……璜平生以见贵人为苦事，强辞午诒，欲南还。午诒曰：'既有归志，不可强留。寿田欲为公捐一县丞。……'璜笑谢之。"给慈禧太后去当一名宫廷画师，在一些人大约是求之不得的，而齐白石却鄙弃它，

以为苦事。他就是秉着这样的气质和情操才成为一代艺术宗师的。

在那以衣饰取人的年代，这一位卓有成就的艺术家却一直不失农家本色，致为流俗所轻："时有某巨公称觞演剧，坐中皆冠裳显贵，翁被延入坐，布衣褴褛，无与接谈者，梅畹华后至，高呼齐先生，执礼甚恭，满座为之惊讶。翁题画诗云：'曾见先朝享太平，布衣蔬食动公卿；而今沦落长安市，幸有梅郎识姓名。'有感而发，一时传为佳话。"梅兰芳曾向大师学画，两位艺术家声应气求，有相似之处。齐白石与陈师曾、徐悲鸿之间的深厚友谊，互相尊敬与师法，最为人们称道。陈师曾将他的画带到日本，广为宣传，才名动海外。

抗日战争期间，齐白石久居沦陷的北平，写了一纸有名的《画不卖与官家窃恐不祥告白》，表示了对占领者的敌意："中外官长要买白石之画者，用代表人可矣，不必亲驾到门。从来官不入民家。官入民家，主人不利。谨此告知，恕不接见。"在沦陷区，他往往用诗画寄托心绪意境。如《西江月·重到陶然亭望西山》之下半阕云："城郭未非鹤语，菰蒲无际烟浮，西山犹在不须愁，自有太平时候。"表明他对战争的胜利满怀信心。又如一九四四年作《题画蟹》云："处处草泥乡，行到何方好！去岁见君多，今年见君少。"表明他看出敌寇已到日暮途穷的境界了。

这一本《年谱》编至一九四八年为止。新中国成立之后，白石老人更为世人所重，获得崇高的荣誉，这是大家所熟

知的。一九五〇年，毛主席曾接老人到中南海住所，作几小时长谈，畅叙乡情，共进晚餐。老人也将他新的力作献给主席。老人深感晚年的幸福，激发了新的创作热情，常日日作画不已，逝世之年尚未歇笔。

《齐白石年谱》是一九四九年三月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的，已经很不容易找到。我以为很值得重印。不知编者中的邓先生是否有意于此：将白石老人晚年事迹补写进去，使成全璧呢？

一九八四年一月

怀念范寿康先生

著名的爱国人士、老一辈教育家和哲学家范寿康先生，离开他刚回归的祖国不觉一周年了。

去年十一月武汉大学校庆七十周年时，曾向我征稿，特将范先生书赠的字幅原件转送母校，以为纪念。范先生写道:“祖国中兴，富强在望。今后只要安定团结，社会主义新中国的建设必可完成。余年老体衰，以言报国，心余力绌。但在有生之年，躬逢其盛，生平快事，莫过于此。”字幅后面附有我的跋语:“此范师手泽也。犹记‘一二·九’运动时，尝代表学生救国会往侯，深感长者之同情爱护，足征先生忧国之心，不独师生之私谊也。嗣后云天远阻，趋侯为难。壬戌春，先生归来，曾往机场迎接，并躬与校友欢迎盛会。又接德邻，得以请益。一日，公子岱年同志持赠此幅，拳拳以祖国中兴富强相期；老骥伏枥之心，跃然纸上。越二月，先生辞世。呜乎，壮心未已，留付后人。谨以此帧，转赠母校。庶几后辈知前辈付托之重，共励振兴中华之志。”

范先生于一九三三年受聘武汉大学，任哲学教育系主任。我于翌年入学，从新结识的哲学系同学中传来空谷足

音：范先生讲授马克思的唯物论。我是工学院的学生，无缘去听讲，但从校刊上读到他写的文章。当年国民党政府的国立大学讲台上，有这样一位讲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教授，这对思想左倾的学生，正如黑夜摸山路的行人看到前面有人打着灯笼一样高兴。最近武大寄来一九三三年至一九三七年几种校刊上发表的范先生的十四篇文章，使我回味当年受到的教益。先生不仅讲授马克思学说，而且宣传救亡图存的爱国思想。《哲学的两个基本方向——观念论与唯物论》（载《文哲季刊》三卷一号）是一篇近两万字的长文，考察了唯心论与唯物论的基本观点和主要学派的发展史，最后谈到富有辩证思想的唯物论。主张"人类的实践乃系检定真理的规准"；"唯物论者承认客观真理的存在"，可以"逐渐加以认知——逐渐向之接近"；这种"新兴的哲学""总有一天会有光华灿烂的发展的"。范先生在日本留学时受河上肇的影响很深，认为经济学的圣典书籍只有亚当·斯密的《原富》与马克思的《资本论》。他在《近代经济学界的两大伟人》（载《珞珈月刊》一九三三年创刊号）一文中，介绍了两位伟人艰苦奋斗的一生。最后这样谈到当前世界与中国的问题：世界上贫富悬隔，阶级对立，生产过剩，成为国际纷争的根源；中国生产落后，经济上不平等不自由，受帝国主义侵略，必须唤起民众，联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来与帝国主义作斗争。

"一二·九"运动时，我作为学生救国会的代表到范先生家中，向他求教，他完全支持我们的爱国行动。这是我

与先生在校中唯一的一次接触。我于一九三七年五月离校后，即再未见到先生。抗战初期过武汉时，欣闻先生在政治部第三厅负责对日宣传工作。一九四九年南下过开封时，在旧书铺买到一九三六年开明版《中国哲学史通论》，这是我当年读过的范先生的讲义，以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阐述我国历代各家思想，解释社会发展的规律，敢于这样结论："真欲为人类全般谋幸福的增进，社会组织的根本改造是很迫切、很必需的。""生产关系随着生产力的发展而演变，也是一件虽欲避免而无可避免的事实。"（见《绪论》）作为一种纪念，这本书我一直保存着。

一九七九年我重回电力部工作。一九八〇年，范先生的幼子乐年夫妇自美国回国定居，恰在水电科研院工作。乐年同志是台湾留美学生，得加州理工学院的博士学位，自幼受父亲的熏陶，热爱祖国，要求进步。从他那里得知范先生多年来的情况。这年秋天，乐年的姐姐令云从美国回国探亲，要去台湾看望父亲。我请他们兄弟姐妹聚餐，托令云将珍藏的《中国哲学史通论》一书带交范先生，请她转告：我们这些珞珈山的学生惦记着当年的启蒙老师，希望他回来看看新中国的建设，这是他半个世纪前的理想。

我深信范先生一定会回到祖国来的。他有深厚的马克思主义修养，一九二〇年在日本读书时，即向《东方杂志》投稿，介绍《马克思的唯物史观》。他还继承了中国传统的优良士风，当年在珞珈山，我们就有此感觉。岱年同志告我，范家的祖先是范仲淹，留有家训"先忧后乐"（先生赠

我的字幅盖有闲章“后乐堂”)。范先生的父亲清末留学日本，与陶成章、经亨颐等交谊很深。一九二六年经亨颐长中山大学时，曾聘范先生为秘书长。一九二七年大革命失败后，先生又随经回上虞故乡，担任经创办的春晖中学校长，一批知名学者和进步人士曾在此任教。一九三〇年，可能有国民党反动派打击春晖进步势力的背景，曾发生土匪绑架校长与另一教师一学生的事件。范先生的父亲毅然以巨款将三人一起赎出，自此，先生才离开故乡。虽然遭此巨变，在弥天黑暗之中，先生显然没有丝毫动摇以马克思主义传教终身的志向。

果然，一九八一年九月，范先生终于离开台北到了美国，在华盛顿女儿家住了下来。他极其兴奋地阅读报道祖国大陆建设成就的出版物，向回来过的华裔学者任之恭教授等询问故土情况。一次友人宴会，他即席赋诗言志:“报国应忘老，人间爱晚晴。欣逢中兴日，愿作鼓吹声。”一九八二年四月十八日，先生以八十八岁的高龄，由乐年夫妇陪同侍奉回来了。我很高兴，那天深夜，约了叶君健同学一起到机场迎接这位阔别近半个世纪的老师。范先生虽然坐在轮椅上，依然精神矍铄，毫无长途飞行后的倦容。五月六日，我们三十年代的武大学生男女二十多人，聚会欢迎范老师。大家一一作了自我介绍，十分欢快。昔日学子现也垂垂老矣，此情此景，大家都有一种幸福之感。

范先生回来后的新居，正好与我的住处相邻。去年春节前夕，我去问候。他朝南坐在客厅中间，红光满面，谈

锋很健。他告诉我，那本《中国哲学史通论》，他又带了回来，已交三联书店重版，并为《通论》重版本写了序言。序言不长，而热情洋溢，最足以表现他回国以后的兴奋心情：“目下祖国中兴，生气蓬勃，富强远景已在目前，国人扬眉吐气之日已经到来。际此盛世，凡我同胞更应淬厉奋发，对提高今后精神文明及物质文明作出更大贡献，而且在于未来，国人不应妄自菲薄，要使祖国之精神文明及物质文明居于整个世界人类先进之行列，发扬示范之作用。”

最近岱年同志将他父亲的一些有关资料交给我看，其中有一封逝世前四天收到的国外学生来信，足见范先生作为教育家感人之深。信中回忆了一九五四年在台湾大学听范师上哲学课的情景：“先生讲授辩证唯物论虽然只有短短一百分钟，也没有用唯物辩证等词儿，在一九四九年以后的台湾却是绝无仅有的。学生的印象因之也特别深刻。”他为什么要给范老师写这封信呢：“学生出生于日据时代的台湾，据家谱是漳州渡台第八代，在祖国大陆并无亲人。老师虽只教过学生两年，也无深交，但是基于思想上长期以来对老师的敬仰，可能是目前在国内的学生心许的最近的长辈了。”

抗战胜利后，范先生应台湾行政长官陈仪之邀，前往台湾参加接收工作，任教育处长。他在美国停留时，可能由于年事已高，曾为自己一生写了一篇简短的自述，其中记述了初到台湾时的情况：“台湾自割让以来，为时已五十年，日人实施皇民化教育，雷厉风行，无微不至。称日语

为国语，讲日本语，看日文报，读日文书。台湾同胞不准任小学教师。台北帝大（即今之台湾大学）只准台湾学生攻读农、医、理、工，不准习文、法，且名额仅占学生八百人中四分之一。此外，又有所谓‘国语家庭’，虽在家中，亦只准使用日语对话，‘改名姓’，则须将原来之姓改成日本之姓，如小林、井上等等。余针对时弊，乃以一切‘中国化’为号召，组国语推行委员会，普及国语教育，创立师范学院，积极培养合格教师；提倡讲中国话，看中文报，发扬祖国文化，宣扬血统一致。举凡能促进‘中国化’之一切，无不尽力推行，期望台湾同胞皆能不忘祖先，真能投入祖国之怀抱。”这是范先生对我国家民族的一大贡献，显现了他的远见卓识。一九四六年夏，他负责的教育处还考选了一百名公费生，到大陆的大学学习，使他们进一步熟悉祖国文化。其中约一半左右回到台湾，有半数留在大陆。留在大陆的这批台湾知识分子，解放后多成为宣传、外交等工作的骨干。一九四七年“二·二八”事变，台湾知识分子被株连的很多，范先生各方奔走，多所保全（如原台北建国中学校长陈文彬，即由他保释后，经日本回大陆工作的）。这年五月，他从政界引退，到台湾大学哲学系任教。许寿裳被害时，他立即赶到现场，悲愤异常，回家整日默默不语。

据岱年同志说，他父亲回国后，虽然只过了短暂的十个半月，却实现了他在台湾三十多年梦寐以求的许多愿望。这些他都在日记中一一予以记载，并同儿女们常谈到的。

他第一次来到古都北京，游览了紫禁城和颐和园；观赏了景山的牡丹和北海的秋菊。“五一”前夕，为《北京晚报》写诗：“华府樱花谢，东飞燕市来；神州无限好，喜见牡丹开。”

他又回到了阔别三十五年的故乡浙江上虞，祭扫了祖父母、父母亲的坟墓。白马湖畔春晖中学的活泼的少年，对这位五十年前老校长的热情欢迎，使他十分激动。他在台湾时曾写诗怀念老家和白马湖：“衰年更切故乡情，汉有曹碑晋谢茔，最是傍湖花似锦，柳荫三月啭流莺。”而今这一切以新的面貌重现在他眼前。他兴奋地写下新的诗句：“半生飘泊东归客，喜见故乡万象新。”他重游了杭州西湖，楼外楼的醋鱼和莼菜更胜似当年。

他见到了分别三十五年的长子、次子，见到了从未见过面的两个儿媳、四个孙儿与长婿。他与在京的儿孙们欢度了他的八十八寿辰，又一起欢度了去年的春节，这是他漫长的一生中第一次与如此众多的儿孙共度佳节。这天晚上他同晚辈谈了范氏家训与家风。

他终于见到了分别半个世纪左右的老友叶圣陶、胡愈之、吴觉农、徐逸樵、沈兹九、董聿茂、汤佩松、陈礼节、胡子婴等等。到京后第二天早晨，经普椿来看望，他还认得这就是“普妹妹”。经普椿是经亨颐的女儿，他的学生。廖承志夫妇在他的生日，还特地来为他祝寿。成仿吾第二天就急着要来看他，因为几十年来他们彼此都不知道老友还在人间。他曾到年逾九旬的顾寿白的卧室促膝话旧，会面

不久，顾老就去世了。他把仍在台湾的许多亲友的口信、近况，一一告诉了他们在大陆的亲友。许多相识或不相识的人来信向他打听在台亲人的地址和近况，凡是他知道的，都一一回信作答。骨肉分离、长相思恋之情，他有最深切的感受。

他参加了郭沫若故居的开幕典礼，回来后写了《怀沫若学兄》的诗篇："福冈惠书一朵云，申江远别见深情，半生飘泊今归去，遗恨无缘再见君。"他亲笔写了《经亨颐先生传》，这是他敬仰的长辈；写了《忆达夫学兄》短文，表达对故友的深切怀念。他十分敬仰一九四九年慷慨就义的陈公恰先生（陈仪），本想为他写传，后来得知福建的故旧钱履周已经写好长篇传记，感到十分欣慰（遗憾的是不及见面，钱先生就已去世）。

他最为感奋的是，被增补为全国政协委员、常务委员，被邀请列席党的十二大开幕，还受到党和国家的领导人邓小平、邓颖超、廖承志、胡愈之、杨静仁等，以及民革、民盟中央的宴请。他写信给国外的子女说："国家待我至为优渥，当以有生之年报效国家，为祖国统一而努力。"

范先生回国后，心情愉快，耳聪目明，外出不再用轮椅，自信还能再活十年，希望能看到祖国的统一。儿女们劝他写回忆录，他却准备与原武大学生方攻石合写一本新中国建设的成就，已拟定提纲，自己动手剪报，收集资料。他说，我在台湾和海外是公认说老实话的，我写出来的东西，别人是会相信的。

范先生坚持记日记到逝世前夕。去世前五天，他手抄于右任的两句诗句："葬我于高山之上兮，望我大陆。大陆不可见兮，只有痛哭！"这可能是表达他自己晚年终于回到祖国的庆幸，是对于右老晚年思乡之切的哀思，也是对还留在海峡那边的亲友故旧的怀念吧。

一九八三年元宵节（二月二十七日）第二天早晨，我突然接到岱年同志的电话，说他的父亲昨夜因心力衰竭而溘然长逝！他弥留时没有什么痛苦，遗容十分安详，犹如熟睡。子女们已把父亲的一份骨灰安放在八宝山纪念堂；一份已安葬在故乡，与早在三十年代初去世的胡氏夫人合葬，廖公亲笔写了碑文；还有一份骨灰准备将来送到他生活过三十六年的第二故乡台湾台北，与一九七九年在那里逝世的唐氏夫人合葬。

一代师表范寿康先生留给后人的东西是很多的，除开一个终身信仰马克思主义、热爱祖国的知识分子的真诚心灵以外，据不完全统计，他的教育和哲学等方面著作近三十部，文章约二三百篇。与《中国哲学史通论》同时重版的有《朱子及其哲学》。闻有关方面正在搜集范先生的著作，准备陆续出版。范先生逝世时唯一的遗憾就是没有看到祖国的统一；但他生前曾一再表示，经过海峡两岸同胞和全世界炎黄子孙的共同努力，祖国是一定会统一的。

一九八四年二月

忆 吴 觉

一九八一年夏，我到南京出差，特去看望一别二十多年的老友吴觉。这时他任南京工学院党委书记和江苏省政协的副主席，因哮喘痼疾发作住在家中。一进客厅，就看到墙上挂着李一氓遒劲书法的一帧条幅：

主人颇有江湖气，坐客能谈山海经。

抗日战争时同吴觉同志共事淮海区，曾撰书此联以赠之。三十五六年后重遇南京，虽历劫无重数而雅兴不减当年。回京后曾直同志告以联语，因重录寄之，当共哄笑。然这一段历史不可没也。李一氓于北京。一九八零年元旦。

这两句话真是把吴觉写活了。我最初认识他是一九三八年一月在徐州，那时我正负责组织公开合法的第五战区青年救国团。战区司令长官是李宗仁，政治上比较开明，成立有第五战区民众抗日总动员委员会，吸收了一批地方开明士绅和进步人士。当时党的苏鲁特委负责人是郭子化，他有较多的上层关系，也被聘请为委员；特委成员郭影秋就在动员委员会内工作。吴觉是淮阴人，他同谢冰岩代表苏北的抗日青年，从淮阴来徐州找党的关系，同时带了地

方上层人士介绍信来找总动委会，取得成立地方群众组织的合法权力，以便回到淮（阴）淮（安）涟（水）泗(县)一带开展抗日活动。他们由郭影秋安排，来找过我，说起他们的活动情况，知道苏北有一批人刚从监狱和反省院中出来，还有从外地流亡回来的进步青年，急于找到党的关系。这次他们只带回总动委会的认可，而没有能接上组织关系。吴觉被任命为淮阴动委会的指导员，受权组织县动委会，他们已成立的抗日群众团体也得到承认。

一九三八年五月，徐州突围前夕，我奉特委命，率领青救团组织的三、四十人转到东北军于学忠部队，新组建一个战地工作团。于部突然改变挺进山东敌后的计划，我们也只好随部队突围。在突围中被冲散，与总部失去联系，我们一支小分队辗转向东突出敌人包围。后来我只身来到淮阴，在吴觉处住了三、四个星期；其间并到涟水东北军五十七军常恩多师同党组织联系过。由于我的介绍，吴同他们早有来往。

吴觉是“七·七”事变前两天，通过国民党上层关系从苏州反省院保释的。他回到淮阴时，日寇已逼近南京。这时国民党的江苏省政府、省党部正搬到淮阴。省主席顾祝同未到任，由二十四集团军总司令韩德勤代理。省党部书记周化鹏是他父亲的学生，为世交。吴利用这些上层关系，争取组织进步团体的合法地位，开展独立自主的抗日活动。他同夏如爱、宋振鼎、谢冰岩等一批失掉关系的党、团员同志，将淮阴、涟水、淮安、泗县、灌云一带进步青年都

团结在他们的周围，尽量扩大抗日进步力量，准备在苏北敌后打游击。为此，吴觉还与同族人的帮会领袖、土匪头目、国民党上海暗杀团的枪手等三教九流联系，以防止这些地头蛇跑到敌人那边去。他自己弄到七支枪，埋藏在农村的家中。周化鹏等人也知道，以吴为首的这一批从监狱、反省院出来的共产党员或"嫌疑分子"，有活动能力，在青年中有威信，在即将来临的敌后游击战争中是一支不可忽视的力量。当吴觉等准备成立苏北抗日同盟会时，周化鹏便主动找吴等开座谈会，想把他们拉过去，说是要起"化学变化"，国共两党统一战线要"联合为一体"。当即遭到吴觉等人的拒绝。于是周化鹏也不同意他们成立苏北抗日同盟会。吴随即找到他父亲的朋友、江苏省有名的士绅、进步人士朱德轩，同国民党顽固派作合法斗争。朱是上海的名律师，顾祝同、韩德勤是他的同乡后辈。吴觉到徐州，就是带了朱的介绍信去找李宗仁的。他们从徐州回来，带回第五战区的"令箭"，正式成立淮阴县动员委员会，由朱德轩任主任委员，朱的亲信淮阴县长胡海泉为组织部长，吴觉兼副部长，掌握组织大权。于是合法地成立了苏北抗日同盟会，由大革命时的老同志宋振鼎任理事长，谢冰岩任秘书长，骨干有李干成、陈书同、万金培等。同时还创办刊物，翻印延安的出版物。由于获得了合法地位，活动就便利多了。这个群众组织很快向乡下发展，各区乡陆续建立起抗日自卫武装，吴觉还与朱德轩一起到各乡检阅。后来吴觉筹集经费，秘密购置枪支。

我是五月上旬到达淮阴的，当时因敌机骚扰，常有警报，吴觉以城郊农村他岳母家为活动场所，我就同他们住在一起。三月间全国学联在武汉开成立大会时，我曾去参加，弄到了大批书刊，包括许多介绍红军游击战争经验的小册子，带回徐州传播了，自己也因此学得一点皮毛。在我们党的《抗日救国十大纲领》的影响下，这时国民党公布了《抗战建国纲领》和关于召集“国民参政会”的决定。国民党这个具有两面性的《纲领》，在内外政策上较过去有了一些变化，有其一定的积极意义。我到淮阴时，正遇上国民党的淮阴县长要请吴觉等人吃饭，韩德勤八十九军的政治部主任李岐鸣等人参加，商谈对统一战线的看法问题，“以求得意见一致”。在这之前，江苏省的保安司令（二十四集团军的副司令李守维兼）和韩德勤本人，都分别找吴觉、谢冰岩他们谈过话，也请吃过饭，表示愿意听取进步青年的意见。这些国民党分子对统一战线有他们的理论，就是所谓“化学性质”的，所有党派都要融为一体，由国民党领导，奉蒋介石为“民族领袖”。这一次吴觉一定要拉我一同去赴宴，借重我这个“不速之客”，以张他们的声势，表示他们并非纯地方性质的力量，而是与外面已取得一定联络的。参加这次宴会的，记得还有宋振鼎、谢冰岩。他们要我作主要发言。一九八四年四月三十日吴觉去世后，他的儿子将他一九五五年在安徽受审查期间所写的详细自述和其他有关重要资料寄来，其中记述了这次宴会：

同年夏，国民党江苏省当局要淮阴县长胡海泉出

面请我们吃饭，同时请他们省方要人，如李岐鸣等，想利用吃饭举行一次交换意见，主要想在对统一战线认识方面求得一致意见。我们参加作客吃饭者，是我及宋、谢三人，另外还有李锐同志，因他曾听了党内关于统一战线的重要报告，我们准备在座谈时以李锐同志为主发言，李今年尚在中央任水电总局局长。在宴后开始座谈的时候，国民党人开了话题后，即由李锐同志发表了长篇意见。李的一席话是说得很生动，说得国民党人哑口无声，而不敢继续发言了。

这次宴会后，吴觉等人很想留我在淮阴工作。由于苏北这一带还没有建立党的地方组织，我于是到涟水常恩多部的党组织联系，考虑是否先留在该部。吴觉等曾经介绍过一批当地的进步青年给该师办的学兵队，内中已建立党的支部。到常部后，同师长常恩多长谈过一次，在旅长唐君尧处住了几天（唐是西安事变时捉蒋介石的指挥官，跟我谈了当时的详情）。由于国民党的政训处对东北军监视甚严，以至常师长很谨慎，在晚上坐床垂帐读进步书籍。我也不便在该部留下。最后只好仍只身离开淮阴，经上海回到大后方。临别时，吴觉特为我换了服装，介绍了泰县的熟人关系和一路情况。这是一个真空地带，长江的港口同上海有轮船来往。从此与吴觉即不通音讯。

“文化大革命”时，我在秦城的单监生活中，枯坐无聊，追怀往事，作了些怀旧的诗。记述抗战爆发到徐州突围的长诗《转蓬曲》中，有几句讲的也正是这一段经历：

失伴只身走淮阴，敌后孤悬一死城。
当地新交欲揭竿，苦于蒋党阻重深。
借我外来不速客，席间舌战群丑惊。
走访涟水“杨开多”，亲耳临潼捉蒋情。
（“杨开多”为常恩多师代号。）
师座读书犹垂帐，众目睽睽难久停。
万里云罗一孤雁，江淮涟泗人留恋，
半月勾留别依依，不敢扁舟远搁浅。

这次和吴觉相聚半个多月，留下的印象是很深的。后来知道苏北沦陷后到我军主力东进前，这一年半当中，在党派来的淮盐工委的领导下，吴觉等组织了一支开始只有几百人的抗日义勇队，吴担任总指挥（谢冰岩为秘书长，宋振鼎为政治部主任，夏如爱为教导大队队长），成为淮阴地区最强大的抗日武装。后来这支武装逐步扩大为八路军南进支队第八团、第三梯队（对外名淮河大队），吴任团长、大队长等。淮阴是一九三九年二月沦陷的。当时淮海地区的情况极为复杂，他们的处境极为困难。除日、伪、顽（国民党）军外，还有为各方争取的地方游杂武装。吴觉率领这支部队周旋其间，同日、伪、顽军浴血奋战，给日伪军不断打击。在国民党军的“清剿”中，部队日渐扩大，吴觉本人则被张贴布告，悬五千元的赏格捉拿。他在《自述》中说：“与国民党特务进行了残酷无情的斗争，这是我亲自掌握的，被我镇压的特务是难以数计的。”随着部队的扩大和改编，吴觉最后担任了八路军一一五师教导第五旅第三团

团长。直到一九四〇年，虽然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武装斗争，吴觉还没有正式解决党的组织关系。他自己说："这一年半的斗争是尖锐、残酷、艰难、困苦的。我们没有根据地，我们是在国民党统治区及日伪统治区内活动，既要防顽，又要防日，实处于日伪顽夹击之中。同时我们没有经济来源，数百人的游击队完全依靠分散在老百姓家吃饭，这就需要有最高度的自觉的纪律。群众条件好有基础的地方，虽然可以隐蔽，但因吃饭问题，难以停留两天以上。我们经常日伏夜出，灵活跳动；常夜行七八十里，穿插于淮海、盐阜两个地区；常饿着肚子行军、打仗；没有卫生人员，病号、伤员最难处理。这一年半的坚持斗争中，牺牲了许多领导干部。……为了保存我们这支力量，当时刘少奇同志曾决定让我们撤到皖东北根据地去，但我们表示可以坚持，而且可以坚持到迎接主力东进。由于我们完成了坚持的任务，保障了苏北地方党组织的建立与发展。（黄克诚同志率领的）八路军的主力，终于顺利地于一九四〇年夏季进军苏北，建立了淮海与盐阜两根据地。这时我已二十八岁了。"这一段描述，不禁使我想起那半个多月同他相处的日子，他的豪迈气概、潇洒风度和英发才干，历历如在眼前。吴觉后来从部队调到地方，曾担任淮海行政区专员等职。

解放初期在湖南工作时，黄克诚和金明同志都同我谈起过吴觉在开辟和坚持苏北根据地时作出的贡献和他的特出才能。黄老还特别谈到，少奇同志说过，当年金明从山

东到苏北后，一大功绩就是放手使用了吴觉这一批从监狱和反省院出来的老同志，从而进一步打开了淮海地区的局面。

我第三次见到吴觉，是一十八年之后的一九五六年秋新安江水电站开工之前。我到上海找谭震林同志，请求支援技术干部，华东局派张灿明同志同我一起到蚌埠找吴觉，请淮委支援。这时正是吴觉被错误“肃反”，关押一年之后，刚恢复自由。他陪我参观佛子岭水库和正在施工的响洪甸水库，畅谈了分手后各自的经历。

第四次见面是一九五八年，我到三门峡出差，他刚调去任工程局副局长。他有哮喘老病，患肺气肿，仍力疾陪我到工地各处跑动，还艰难地同我一起爬上混凝土拌合高楼。这次他才比较详细谈了他在淮委挨整的一段经过。这种滥施专政手段，随意残酷整人，在吴觉身上的这一段往事，是早在一九五五年发生的，扼要记述如下，颇有史料价值。

一九五〇年秋天，浩大的治淮工程开始时，华东局调吴觉到安徽，担任治淮委员会秘书长和党委副书记，负责日常工作。由于党委书记比较主观武断，淮委的许多干部意见不少，淮河流域几省之间，也因此不甚协调。吴觉总是帮着劝说疏导，以求搞好团结，做好工作。开始倒也相安无事。可是好景不长，矛盾逐渐发生和发展了。一九五二年初秋的一次会议，这位党委书记组织了一些人对当时的淮委主任和工程部副部长大加责难，吴觉认为这些责难

缺乏实事求是的精神，就在另一次会议上作了公正说明。当会议材料整理上报时，这位负责人让人转告吴觉，要他修改发言记录，吴没有同意。果然，不久报复就来了。一九五三年新三反运动中，就有当事者投书《人民日报》，说吴觉官僚主义，毫无群众观点，压低民工工资，造成工地紊乱……。这份材料是如此“典型”，正合乎新三反报道的需要。报社十分重视，派了记者到现场调查。不调查倒也罢了，一调查就发现原来情况完全弄颠倒了，会议记录和有关文电表明：吴觉多次主张提高民工工资，而总是遭到了那位负责人的拒绝！

一九五三年夏天，在北京开治淮会议，涉及到淮委和水利部高层人事安排。会议期间，党委书记对吴忽然表示好感，似乎有封官许愿之意，且示意到上面谈谈（与他不合调的）某某的小话……。吴是一个刚直耿介的人，毅然拒绝了，说：“我一生没有做过这样的事情。”由此，矛盾越积越多。例如，按照“经费尽量用在工程上”的原则，没有在佛子岭水库上游建筑别墅式的招待所；关于洪泽湖拦洪蓄水的水位问题，中央批准了吴觉照顾苏皖两省的建议；华东局对淮委领导比较支持吴的意见等等，都招来对吴的怨恨之心。当时水利部领导有意将吴觉调出安徽，到黄河水利委员会工作，这位负责人先是认可，后来又坚不同意。到一九五五年八月，由于发生了对苏北抗日同盟会这个组织的一些诋毁和误传，终于一纸逮捕证突然放在吴觉的面前叫他签字了。逮捕的理由有两条：一是与淮委一位领导

干部的关系问题，一是本人的历史问题。淮委那位领导干部告过党委书记的状，由于历史问题在受到审查（后来被打成“反革命集团”）；至于吴觉本人的历史问题,华东局于五四年已作出结论。对于这两条理由，吴觉都不服，当即声明：他与淮委那位领导干部的关系尽人皆知,有目共睹，是正常的工作关系；至于本人历史，华东局已作过处理，此外再无可交代。可是事情并不这样简单，因为吴觉不仅从一九三〇年起先后四次被捕，两次进反省院，而且在抗战前后同那么多国民党的上层人士有往来，亲属关系也极复杂，有的已跑到香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呢！

吴觉一被捕，他的亲戚朋友凡是可以逮捕的都逮捕到安徽来，强迫他们写“检举材料”。他的家遭到了搜查,妻子被捕后曾一度神经失常。家里雇用的一个保姆，也被逼着“检举”,几乎上吊。在淮委召开的有党内外干部参加的大会上，宣布吴觉是那位被审查干部的幕后指挥人，而且还是“大特务”。为了弄清楚自己的问题，吴觉写了几万字的材料，详细交代了自己一生的政治历史。例如前面提到的他曾经要我陪他去同国民党方面谈判这样的事都没有遗漏。虽然他在材料中提到了我，但是当年始终没有人向我调查过他的情况。现在想来，这大概是由于目的只是要打击吴觉，并不是真要全面查清吴的政治历史，所以有可能证明其历史功绩的人就都不去找了。充满杀机的是，要吴交代抗日战争初期他们搞武装斗争阶段的两桩历史悬案：一位上级派来的参谋长的失踪；淮阴县委书记被人暗杀。利用

这样悬着多年的无头公案，文章是很好做的。吴觉不幸中的万幸是，正好这时候，这两宗悬案都在江苏破案了，找到了真凶。尤其荒唐的是，放在办公室用的收音机，被没收后诬为收发报机，造成一个“现行犯”的疑团，派出大批外调人员，跑遍大半个中国，以查证这个“现行特务”。后来由于实在找不出题目做文章，“大特务”无从证实，加以有中央同志过问，只好不了了之。到一九五六年九月一日，即关押了整整一年之后，吴觉才获得自由。他从此杜门谢客，不与任何人往来，有人劝他到外地休养，也怕引起疑虑。我那次向淮委要干部，看来是华东局领导有意让吴觉出面接待的。当时吴没有同我细说这一段灾难。吴觉这样韬光养晦，倒也过了两年清静日子，到一九五八年七月，终于让他离开安徽，到三门峡工程局了。后来到一九六二年，吴觉应召到安徽申诉，那位负责人才完全承认这是一桩错案。

从一九三〇年起，吴觉曾四次被捕，二次进反省院。第四次还几乎判了死刑。他在监狱受过酷刑，带过大镣，几乎瘐死。他在应付敌人时，也不是没有过错误，例如一九三三年第三次被捕，他承认了共青团员的身份。但应该看到更重要的事实是：大夏大学的一百多党团员和进步群众，没有一个因担任党支部书记的吴觉被捕而受到牵连。而且，这种错误吴觉从来没有隐瞒过。

他的儿子给我的信中说：“爸爸十分珍惜自己的政治生命。在‘文革’关押的最困难日子中，他每天偷偷地记叙自

己的历史，利用我们送饭探望的机会，一点一点地带出来，让我们子女了解他忠诚耿直的为人，了解他顽强战斗的一生。”“几十年来，爸爸常同我们谈及您及您和他的相交的往事。今从他遗下的上百万字材料中，按各历史时期摘出一部分寄上，以便您了解爸爸的为人和他辛酸的一生。他曾向谭震林老伯保证过，几十年专案审查也证明了，他对党交代的真实性。”

在干部的历史审查中，如果审查者带有偏见，或不够实事求是，或情况过于复杂，许多问题往往就难以如实解决。经过二十多年的内查外调，直到一九七八年，吴觉的历史，才恢复了本来面目。他的入党时间从一九三二年算起，是直到他逝世之后，才由组织重新审议解决的。

吴觉的自述材料中有一个细节，在党的干部审查工作中，我认为很值得注意。这是一九五四年十二月写的有关反省院中的一个看来很复杂的问题，摘录如下：

> 结论草稿最后引录“自新人评议语”中，有谓“吴觉非但积极反省，而且供出其他反省人情况，足证是彻底转变”。并谓我对此坚不承认。我第一次入反省院，是我第三次被捕以后的事，我以承认曾参加共青团不久即自动退出的托词，骗过特务的追讯，复经淞沪警备司令部军事法庭判处徒刑送反省院。在出反省院前，大夏支部曾有人来监狱看我。我在被捕之初，于敌人强暴胁迫利诱下，尚能坚不暴露组织供出同志，而反省院是执行感化机关，既无死亡威胁，又不审讯犯人，

我又从未为其审讯，何能供出其他反省人的情况呢？若谓可能在敌人面前暴露了其他反省人的学习情况，其实反省人的学习，敌人了解最清楚，也不需要问反省人的，因为各个反省人的日记、作文、读书笔录，都直接交给敌人审阅，反省人之间是互不传阅的。院方对反省人管理极严，反省人之间不准交谈，反省人之间也是互不暴露思想与案情的。当时我在反省院第一组学习，与我长期同住一室的人，表现极坏，出院后即当特务去了，这种情况，也不需要我去谈。我在反省院时曾被人控告为不肯反省学习的。因此敌人的评语是不可置信的。根据我当时情况，不可能蹲满六个月期即释放的，敌人之所以能将我期满释放，主要是由于我的父亲通过他的学生邱有珍、周化鹏二人帮的忙。邱、周是国民党江苏省党部的委员、部长，曾情托反省院的思想考核主任王进珊，要王到期将我释放。在我出院前，王进珊曾找我谈话，说院中很多人都反对放我，可是他仍设法决定放我，使我可以继续求学。我出院后曾与同出狱人薛味五（薛现仍参加革命）亲到王进珊家及周化鹏处表示谢意。十数年来，对这个情节，我已向党作了三次报告，苏北淮海区根据地初开辟时（一九四〇年），我也曾与刘瑞龙同志谈起。据刘说，他是认识王进珊的，并说王过去是左倾分子。在我第一次出反省院后不久，王就为反省院院长逐出反省院。因此，敌人对释放我的“评议语”，固

不能设想为敌人伪造档案，以准备二十年后的今天来陷害我，但是在旧社会内，反省院思想考核主任徇情伪造评语或欺瞒上峰的事，也是可能的。事实如此，绝非坚不承认，请组织上能详加查考，判其真伪。

吴觉一生的坎坷，也从一个侧面说明中国革命历史环境的复杂与党内斗争的复杂。在三十年代上海这样的地方同国民党的斗争中，在抗战初期国民党的腹地江苏建立根据地，一个共产党员如果没有一点所谓“江湖气”，即没有处理复杂的社会人事关系以及同狡猾凶残的敌人作斗争的一套本领，是办不成事情更成不了气候的；一个干部尤其是领导干部，如果没有座客来谈山海经，没有民主作风，不能容纳各种人才，听取各种意见，也是不可能成为一个好的领导的。这两种品质凝聚于吴觉一身。李一氓、曾直等同志，曾在艰苦斗争的环境同吴觉共过事，故体会极深，因而才有如此概括如此贴切的评价罢。

吴觉卒年七十二岁。我收到的讣告说：“遵照吴觉同志遗愿和家属意见，决定丧事从简，不开追悼会，不举行遗体告别仪式。”我没有同吴觉同志一起工作过。我这篇东西只是就与我有关的回忆，以及他的儿子寄来的材料中稍作摘要（读这些材料时，我是很受感动的），草草写成，不过是有关吴觉的二三事而已。在二十多年的不断受到审查的过程中，吴觉为了申述自己革命的、战斗的一生，留下了成百万字的材料，我认为这些材料的史料价值，不只是属于吴觉个人的，而是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中国革命斗争历史

的复杂与残酷。我希望江苏党史研究的单位，能够将这些材料整理出版，这对现在的青年也有教育意义。

一九八五年四月

附记：

这篇文章的草稿曾寄与惠浴宇、管文蔚、金明、夏如爱、谢冰岩等同志，请他们审阅。

惠老回信说："过去一般同志认为吴觉同志有'江湖气'，其实是他海阔天空，谈笑风生，引人入胜；但对原则问题和大是大非是从不含糊的。知道的人固然不少，但毕竟不多不详。"

管老回信说："吴觉是一位正派的好同志，他留下的史料，我们当与其家属商量后，加以整理，并争取出版。你的建议很好。"管老还在文中批注："吴觉同志很重视统战工作，并很善于做统战工作。"

金明同志来同我作了一次长谈，回忆他一九三九年五月从山东南下淮海的种种情况，以印证吴觉当年的作为。他特别谈到抗战初期淮海地区斗争的特殊复杂和异常艰难，因为这是国民党严密统治过的腹地，又是平原、河网地带，韩德勤部有几万人，韩是反共专家，我军处于日伪顽夹击之中。在八路军、新四军主力南下、东进之前，吴觉等创建的这支地方抗日队伍，主要由当地的青年学生组成，秀才造反，孤悬敌后，能够坚持下来，是很不容易的。他们为苏北根据地的创建立了大功。他还谈到，吴在晚年一直要求对他的一生有一个公正的评价。

谢冰岩、夏如爱两位虽然都在北京，但自从一九三八年在淮阴和一九五二年在湖南分别之后，就一直没再碰过面。这次他们约好一起来我家，同我详细谈了文章涉及的许多细节。他们正受命编写苏北抗日根据地创建的历史，带来了已经印出的总结资料。关于苏北抗日同盟会的问题，他们两人曾联名写过一个材料，因一九五五年和后来的十年动乱期间，对这个组织的历史和性质，有过严重的歪曲，对其中几个骨干成员有过不实之辞。他们向组织写的这个材

料都一一予以澄清。关于吴觉和当年在苏北的有关活动，他们作了如下评价：

吴觉是一个感情浓郁、对人诚挚、非常健谈的人，"有他在场，满屋生风。"他尤其善于同各种人相处，善于同旧社会形形色色的人打交道；他很好地利用了他的家庭关系和亲朋关系，当初主要活动是做上层统战工作。后来建军打仗，发展到淮河大队的这支队伍，三分之二以上成员是进步青年，实际是一支干部队伍。我军主力到达之后，这个大队的成员大都转到县区当地方干部，也有少数留在部队。江苏省的好些负责人是这个大队出身的，在部队的有的现在已是军长了。这支队伍坚持淮海地区，同日伪顽浴血苦斗，从而使地方党组织得以顺利发展，保护了地方干部，而且将国民党大批区乡政权人员都争取过来了，使汉奸根本站不住脚。因此对苏北地区来说，吴觉同志是一位值得大家怀念的有功之臣。

吴觉去世后，他的家属为我寄来南京工学院的悼念专刊。最近又寄来治淮委员会去年出版的《治淮》（第四期）与《淮河志通讯》（第二期），其中有编辑部写的《人民治淮的先驱与功臣——吴觉》，有转载《安徽日报》上张祚荫写的文章：《杰出的才干，高尚的情操（忆吴觉同志在治淮战线上）》。所有纪念文章都称赞吴觉的才华出众，精明强干，品质高尚，有远见卓识，以及实事求是、平易近人、豁达大度的作风，颂扬他善于团结知识分子，尊重他们，信任他们。那篇编辑部的文章说，吴觉当年"要求所有党员干部都要同知识分子交朋友，尤其要同旧中国过来的老知识分子交朋友，并作为一项政治任务。他在淮委机关规定，有好房子要首先让老知识分子和工程技术干部住，在生活上要尽可能地照顾他们，他经常找工程技术干部谈心，一起边吃饭边聊天。在工作上，他更是虚心地听取工程技术人员的意见和建议，碰到自己不懂的问题就真心诚意地向他们请教。他每次出差，都要带技术干部当自己的参谋。他提出要大力培养青年工程师、党员工程师。所以，当年参加治淮的成千上万名新老知识分子和工程技术人员，一致感到生活在党的怀抱的温暖，心

情十分舒畅”。

吴觉的一生，反映了中国当代革命知识分子所走过的曲折道路，最主要的是他们没有在任何困难、任何逆境中屈服过。是的，吴觉是一个能干的人，一个才华出众的人，然而他生前有多么漫长的时间未能尽展其才啊！也许，吴觉在离开他所眷恋的这个人世时，心中有某种遗憾。这种遗憾让我们活着的人来消除吧。今天的中国要腾飞，最大的最根本的问题就是要尊重知识、尊重人才（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现在还在呼喊这八个字，确实使人感到惭愧）；要唯才是用，人尽其才。我们一定要使每一个有才干的人离开这个人世时，不再有丝毫遗憾啊！

一九八五年四月

文立徵烈士二题

一个战士的书生时代

一九七九年初，离合肥来北京的前夕，安徽省地质局的党委书记曾星五同志来找我，让我写立徵入党前后的证明材料。到北京后，立徵的一位在山东工作的表弟陈铁如同志就不断跟我通信，为的是立徵的家乡湖南衡山县，由于“找不到入党介绍人”，多年来迟迟不正式承认立徵的烈士身份；并给我寄来一厚本复制的二十二个人写的证明材料，他们都是立徵的同事和战友，其中有山东军区政委、苏州军分区司令员（铁道游击队队长）、影片《大浪淘沙》作者、游击区区长、特级战斗英雄，等等，还有已经去世的原山东省委负责人郭子化同志。到一九七九年十一月，我这个入党介绍人早写过了证明，问题还是没有解决。这位已为此奔走多年的表弟，又将他珍藏的立徵写的十五封书信寄来，嘱我写一篇纪念文章，趁“一二·九”在报上发表，以促此事的实现，因为立徵的亲属已盼望整整三十年了。直到八〇年六月，我给民政部部长程子华同志写的信批转到湖南后，文立徵是革命烈士，在他的家乡才算得到正式认可。

立徽是一九四五年二月二十二日牺牲的，距今整整四十年了；我们是一九三八年三月在徐州分手的，整整四十七年了。这一厚本证明材料和十五封书信（我多么熟悉这些字迹呵），曾象捏在手中的两团火，非放下来不可，于是趁"一二·九"四十五周年约稿时，匆匆写了一篇短短的纪念文章，发表在八〇年十二月二十六日的《中国青年报》。其中有这样几句话："现在的年青人呵，你可曾知道，你们从电影和小说上认识的那位铁道游击队政委，牺牲时还不过三十四岁；他家中富有，是国民党一个高级军官的儿子，他在北京辅仁大学学化学，英文很好，又爱好文艺，会吹口琴，还喜欢照相，写得一手好字；抗战期间，他在鲁南艰苦的环境中打了八年游击战……。"中国青年出版社编辑烈士书信时，我曾将立徽这些家书交给他们。现在出版的《革命烈士书信》续编中，收录了立徽参加"一二·九"运动时写的两封信。

一九二八年到一九三四年，我与立徽在长沙私立岳云中学同班。那是何等黑暗的年代，何等黑暗的地方。学校生活是死水一潭。这个学校的教员是当年第一流的。可是初中国文读《孟子》，高中国文教员是一个举人，讲《古文辞类纂》，不准作白话文；历史教员是念自编的讲义；地理教员总是让学生抄黑板。这所中学以数学闻名，高中的数、理、化全用英文原版的外国教科书，每天做不完的习题。当时长沙的书店买不到鲁迅的著作；有一个泰东图书馆在一九三〇年左右卖过创造社的书刊，后来就买不到任何左

翼文学的东西了。“九·一八”后，日本灭亡中国的计划《田中奏折》曾在社会上流传，学生们读了之后都义愤填膺。国民党省政府的主席何键却提倡“武术救国”，找来七十二县“好汉”在长沙摆擂台。社会上的乌烟瘴气自不待说。

立徵沉默寡言，不好活动，每天午饭后临魏碑。我是班上唯一的走读生，喜欢打球，因此一直没有交往。直到高中三年级，由于以下三件事，我们才突然成为好朋友：其一，立徵订了邹韬奋编的《生活》和林语堂编的《论语》，每期都要向他借阅，逐渐谈得来了。其二，班上办墙报，半月一期，我们都用白话写文章，我还主编过美术专刊，他也有同好。其三，间或下午不上课，一同去看联华公司的进步电影，如《大路》、《城市之夜》、《都会的早晨》、《小玩意》、《渔光曲》等，都是悄悄去看的日场。记得有一次下大雨，影院就我们两个观众。看完电影后，有时还上面馆吃一角钱一碗的高价面，都是由他请客。他去过我家几次，知道我家贫寒，点油灯做功课。大概是由于这个缘故吧，他从没让我去过他的家。他的父亲出身于保定军官学校，北伐时是唐生智部下的团长，后来大概是何键部下的副旅长，家里当然富裕，住的是洋式房屋。临毕业之前，全班同学开会，决定编印一本毕业纪念册，上刊每人的相片和小传。当时由于全班同教务主任闹了一个大冲突，临近毕业考试时，寄宿生全部搬到旅馆中住，因而纪念册中未列教员名单。这件事由我们两人包办：从交涉照相，跑印刷所，直到编排看校样。这是我平生第一次同编辑与印

刷打交道。封面由我画了两张：一个工人推着一个大齿轮，一群骆驼在沙漠中前进，都是图案形的。立徵选定了前者，这也说明我们两人的意气相投。纪念册上的照片，别人都是一副正经面孔，用的长方形；唯独我们两个突出：开口笑容，用的圆形。别人的小传都是文言，也只有我们两人和另一位要好的朋友秦本立，用的白话文。他俩的小传都是我作的。

中学时代值得记述的事情不多。十年动乱在狱中作旧诗，有两首绝句回忆当年情况：

六载寒窗未遇师，厌抄黑板背书辞；
留连唯有泰东馆，曾是联华电影迷。
寂寞少年经武门，田中奏折警钟闻。
疮痍满目观《人道》，得一知音文立徵。

经武门是中学的校址。《人道》反映了一九三一年大水灾的情况，金焰主演，是联华公司早期出名的影片，学校特地租来，在风雨操场放映给全校学生看的。爱好左翼文学，关心时事，不愿意读死书，这是我与立徵成为莫逆之交的原因。

毕业之后，由于不满意湖南这个地方，也看不起当时省立的湖南大学，我同立徵、秦本立、赵焕南四个要好的朋友，一同去北平升学。我们穿着军训用的服装，弄来斜皮带和校、尉官符号，冒充军官买半票，一路威风乘车北去。经过汉口还照了张相，在照片上互相题字："凝视着光明"（可惜我的全部照片在十年动乱中在寄存的地方被烧

毁了)。到北平后，我们住在西城一所公寓，真象鸟儿出了笼样地自由。我与立徵爱好的是文学，但那几年考工科的人特别多，我们受社会风气影响，偏要考理工科。结果都没有考上清华，他考入辅仁大学化学系，我考入武汉大学机械系。(秦本立考入北京大学教育系，解放后长期在北京市教育部门工作，"文化大革命"时受迫害死去。赵焕南毕业时是班上第一名，考入北洋大学机械系，抗战时在国民党空军基地负责机修，死于飞机事故。)他们三人都留在平津，唯独我一个人怅怅南归。在珞珈山虽然结识了新的朋友，但我的感情大部分还留在如此眷念的故都，向往那种穷学生住公寓的生活。于是同立徵每周一信，从不间断，直到一九三七年五月离校。

现在手头的立徵的十五封信，除一九三三年除夕一封外，都是三四、三五两年，写给他的在读高中的弟弟——劲弟的。信中内容当然跟写给我的不同；我们之间的思想倾向和达到的水平，大体是一致的。这些，却是以长兄的身份写的。几次读着，读着，这些信又将我带回到半个世纪前的生活：矮矮的沉静而深思的立徵，似乎就站在面前，招呼着去散步，缓缓地交谈，有时争执几句。我用了两个晚上，将这些信摘录下来，相信读者不致于怪我摘录过多。从中可以看到，三十年代一位有思想的青年，在如何引导他的弟弟走上一条正确的人生道路，并激励其爱国思想；同时也反映出为什么这样一个好学的书生，后来会成为一个坚强的游击队战士。我也相信，这位三十年代的青年，

就在他求学之时，也有许多地方值得今天八十年代的青年来学习。现在就用这些摘录的（稍作文字处理的）信现身说法，来说明立徵本人吧。

一九三三年除夕：

今夜一过，明天又是新年。你应当仔细想想你所要做的事，如何准备你的将来，对着全国，全世界。我决不是叫你抱头闷想，把一晚游艺会得来的快乐完全忘掉，而是要你反问自己，在这样时光的追逐里，重逢新年的一刹那，我的家庭是……？我的学校是……？我的国家、民族是……？我的世界是……？（这里的"我"当然不是狭义的我），能有美好的回答。

你不要看到街上蠢动的人们个个脸上清洁，虽然有许多人还加上一层厚厚的粉膏。实在个个都是污垢满面的，白沙井（按长沙有名的泉水井）的水洗刷不去脂粉也盖不了污垢。不但脸上，心灵上更充满了这些，一团黑漆。这些污垢、黑漆是：贪狠、虚伪、闲散（包括懒……）。我们不仅要清洁他们的脸垢（外表），同时还要洗涤心头的黑漆。自然，最要紧的是首先从洗涤自己着手。

一九三四年九月：

（按由于投考清华失败，又错过燕京、南开的考期，这封信的开头，极端责备自己。）

我痛心极了，真是钢笔替我流眼泪。这次的失败，凡关心我的人，当然会加以轻视或怜悯。他们轻视我，

那是可以的；怜悯可就用不着了。我不能接受他们给我的“怜悯”，多给我“轻视”的好。

世界大发明家爱迪生说：“天才是一分神来，九十九分汗下。”他所谓“神来”即是玄学者的所谓“灵感”；用血汗苦功到了九十九分时，也许有一分的灵感的巧怪新花样出来，那就是创作了。我现在是须要百分之百分流汗了。

不得已我入辅仁了，我不是急于要做“大学生”，是为着要求较好的读书环境。

一九三四年中秋节：

今晚，我们预备到北海去吃月饼——我们的月饼在天上与湖里。现在已上课一周，除国文、军训外，其余都是德、美人任教授，全以英语授课，一整周都有点摸“洋风”；每堂课能懂得他们的general idea（一般概念），就算不枉坐这五十分钟了。两三周后或可习惯。

我住在第三层楼，房间窗子向正东，北海里的白塔、景山均在望中。太阳出来，照得满屋红光，这样，大自然给我不少快乐与力量。每早起床，我同太阳差不多；星期日也许它比我早半点钟。四人一房，大得宽松。我的床靠近热气管。舍内餐间、澡堂、洗脸间一切设置都极现代化。不过，对我这样的人也许是物质享受太丰厚，容易懒惰下去，你须得时时警惕我，鞭策我。

一九三四年九月二十七日：

关于你明年投考大学的事，本想将材料收齐后作系统叙述，现暂照你问的零碎回答：一所名大学，从教授、设备或历史各方面比较，也不可能全好全美。所以你选择学校应以何者最著称为主，如想学土木，最好能考上唐山交大；化工最好是浙江大学；地质考北大；机械或电机自应考上海交大，天津北洋与清华也不错（清华此二系历史不久，正努力中)。工学院当然以大代数、解析几何、三角、理化为重要。《范氏》代数方法较新，还巧妙；《霍尔·乃特》习题搜集广泛，可各取其特长（按这两种大代数教本为当年长沙一些学校采用)。考北大、清华，国文都须语体文（即所谓“小品”)，且注重描写或叙述方面。如今年清华作文题为《夏日的昆虫》，另题为《我的国文教师》；北大也是两题任作一个：《描写你一件最可纪念的事》，《描写你一个认识最深的人》。英文作文也是同样情形，并重改错、翻译、填字。

父亲这种突变，自然起于精神的大不满足（如个人的意志不展，家庭间的无乐趣，或我老使他失望等)。人的生活种种作用，本是一种波状曲线，有向上的时候，也有向下的时候。我们要使这种曲线的向下曲度减小，一方面要靠继母大大整理家庭，使生气、乐趣、喜快充溢于我们全家人之间，使父亲得着安慰。一方面是要我们兄弟努力做人——铸炼自己，做一个“最好的我”，使父亲增加新的希望。“侍父母讥谏”，

这是中国的古训。这就是说，父母言行有了错误，子女可以乘时隐隐约约地、不怨不怒地婉言劝谏。但这种“进言”功夫极不容易，稍不聪明，就坏了大事。(你如有这种信给父亲，宜先寄我一看，怕一时贸然触怒呵！)

原先想跟你谈谈“性”的问题，但现在可没有这种工夫了，只好先寄廿七页《青年期之性的卫生及道德》给你看看。现在还是简单补上几句：1.煌炎与炳叔(按当是两个亲属)的急性肺痨都起于“自戕”。2.你有什么精神上的不乐意没有？开诚地与我商量吧。3.如有和异性做朋友的 chance（机会），你也可不放过。现社会的情形，与年岁不远的女人谈话与往来，就流俗地想到男女间的某种特殊关系，乃至目为“非士君子”。这种俗下的眼光与态度，你摒除吧。只要我们是真诚的清白的友谊，无论思想、言行都是只在“灵”的方面，即精神方面。

一九三四年十一月十一日：

你临的张迁碑我已看到，在用笔方面，确实很有进步。初步当力求貌似，继而进取神合可也（碑坏不能辨者，不必勉强临写）。记得一次，李伯对我说：“写字动笔要有起势，字方得神味，不然纸白墨黑而已。”我想这种龙走虎奔的起势，是精神的由手腕至笔落到纸上，并且这精神电似的传递，当然又是流汗得来的结果。可愧我现在还是白纸黑字。你的小字还是临柳

公？笔法受魏体影响太深。

录冰心《春水》，题在故都照片正面，现重写一遍："先驱者，前途认定了，切莫回头。一回头，灵魂里潜藏的怯弱，要你停留。"求学的进程太重要，一失时，极难挽救的。我现在这样警告你。今日的中国人，有一天自己用功的机会，已是大大幸福；即明日降为人奴，也是该受，因为我们根本惰性太大。美学者 **Robert E. Lee**（按罗伯特·爱德华·李，1807—1870，美国将军）给他儿子的信中有："你大胆、坦白地去认识你所在的世界（意指研讨学问以理解宇宙真理，非谓多谙习社会黑暗以混饭吃）……青年在十八岁以前，是学问真正驰入他脑子的时候，以后就只有经验的充实，再无学问的进展了。你如想你应当享受学问的权威、伟大与自由，你该当此时立基。"（他儿子那时只十六岁）。你不也是未到十八岁吗？我希望在"你的面巾上有因打球流的汗，也有因读书流的汗渍"，那便可以做到象德人一连十二个钟头脑力工作，还不感头昏。一个人能解决吃饭问题，固然重要；但我以为终身毫无学问上的享受，何不长眠以休乎！每星期必浏览杂志一、二小时，至少须读《中学生》（即小品文也得注意看看）。

一九三五年一月廿七日：

关于"化学平衡"你懂得清楚不清楚？这种现象是很重要的。譬如这个可逆方程式：$3Fe + 4H_2O \rightleftarrows$

$Fe_3O_4+4H_2$，在什么情形下化学作用向右或向左呢？假如一定量之氢与磁铁同放入于一密闭器里，又怎样呢？又如：$3H_2+N_2 \rightleftarrows 2NH_3+heat$（热），须要何种条件才脑精（按今称为氨）制得最多呢？又如风化与潮解也是一种平衡作用。

一九三五年二月廿二日：

我的字，笔姿不开展，是第一大毛病；而笔调不十二分下俗，或是我的长处，尚不敢肯定。笔姿不展，记得父亲也曾向我示过此意，当时我还傲不自认呢。你的字也有不展的病态，是不是受了我的影响。字的风格是最要紧的。“风格”，是抽象名词，不易解说。就说少女吧，她的face（脸庞）虽不合西施的条件，而她的风格（这里不如说风度）很好，那她就很有挑战他人心灵的力量；若她风态下俗，虽具电影明星胡蝶的脸子，也就只有下俗人爱她了。同样，字的风格不高，不但全无美感，浅一点说，全无快感，而是东施效颦，岂不大糟。风格似乎又各种各样，我的标准是“刚劲而雅朴”，今我虽未之至，却心向往之。假如打字机通行得如门闩一样，那上面的话都是废话了，除非他是个艺术家。即今学生也大都不讲究写字，尤其学理工的，遑论什么风格不风格。我也常常这样想：“字，能认识就得了，何必要好！”然而人的爱美心情，你不可忽视。

你现在数、理、化全用英本，如我在“岳云”一

样。我从前有一恶习：老不爱查生字，读不懂就找中文本看。结果，一进大学，作理化实验报告，全得用英文，每次四、五页，写得慢。我第一次进实验室，问管理员俄国佬要个软木塞子（Wood stopper)，我不知英文名，解释了半天，拿个瓶子做手势，他才明白我的意思。有时实验做得不对，找教授问，也苦于英语不流利。所以你得学好英文本理化，否则，将来进大学，没时间查生字。至少现在要拿起原文本读个全懂。科学书又没有中文译本，读不来，即进了大学，也不能念好的。

一九三五年四月廿二日：

“工程师职业”曾引起你的注意，我还希望你再加上热心。人世间的事物，只要有热，没有造不出来的。你看，黄金与钢铁不都是由于高热的结果！拿破仑的字典无“难”字，也只是他用热力把“难”字赶跑了。只有热才是宇宙间的大力士。

所谓特殊的自然科学天才，多只偏重于数学与物理；而工程范围内所需要的数理，只要你现在于数理不厌恶，功课能应付裕如，那将来很可以对付工程的学科。说到所谓有解决繁复问题的兴趣，由繁变简，这是人所乐为，只看你脑子能不能凉一凉，途径对不对。所谓无生界生活，就是说机器世界，其实静的机械，的是动的根源，没有钢的飞轮，时代怎能被推着前进？机器实统治了运动的世界，而执机器之鞭的是

谁呢？不就是工程师和工人？

“天下事本无分难易”，只要有热力与毅力做你坚强的基础。你有热力，生长你的才干；你有毅力，维持你的才干。今日从事科学的人尤其是工程师，可说是积极的新中国的建设者，除了解决个人职业外，还有为大众的更可骄傲之处。

写日记是随笔的最好练习。至于用文言或白话，本来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文章，但我们处在这紊乱的漩涡，西装时髦轻便，马褂古香朴朴，非二者全兼不可。写日记可不管文言、白话，只看如何写得真切、明快，合乎文理就好。

一九三五年五月廿七日：

我常回想过去的生活，有许多事很好笑，许多事太过火，许多事太蠢，许多事很可耻……检讨一下，很满意的事几到了绝无仅有的地步。质地低劣固有关（按：直到这时，立徵还在苛责自己没能考入清华），缺乏指导不能不说是最大原因，然而这也是中国的普遍现象。现在你也在这圈里过活，我很希望你能培养自己的锐感，来观察一切事物，作自己的指导，时时打开你的眼睛，好象电影特写镜头，察见人家的好坏，做自己的镜子；常清洁自己。“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至于孰为恶，孰为善，你以现代立场，自己当有些把握吧。现在想起过去许多不满意事，而在当时未尝不自认为快意事。所以，今日的我与昨日的我

冲突,实在是由于自身观察与理解向前推进了的表现。“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这明明说宇宙万物都是动的，人的思想也随着时代而迈进。觉今是而昨非，不正是思想上应有的反应么。

到了大学,同学间的关系，友谊，常“点头”而止，因为各人的社会经验多到了个半足程度。中学同学多诚恳，坦白，不粉饰。往往小学、中学的老朋友倒成了你终身最坦白最相信的好朋友了。

一块毛铁须加锻炼，而后成纯钢，而后能致用。

一九三五年六月十六日：

我很高兴你已经是校队排球队里的一将了。在学术、体育、音乐三者中，各有一技之长（至少也得说有嗜好),我们的生活才不感觉有大缺陷，在集体活动中也不至于“遇事无以对”。

一九三五年十一月十六日：

从前美国有位学者说：二十五岁以下的青年，不信仰无政府主义，十足表现他无出息；三十岁以后，他还不放弃无政府主义，十足表现他无用。不过现在又有其他种主义代替无政府主义了。你能注意社会、政治各种动向自是很好的。不过你举出那两位与你常聚谈的人，他们的思想都出了时代圈之外，官、财气息特重，虽目空一切，终坐井观天，纵成势力人，亦不能成全“人之伟大”，我所不取。希望你未传染得这种流行空虚病。这种“空虚”病，只有用“无烟煤”可以

填补。（按：下面录下郭沫若《女神》中的《无烟煤》，第一节是法国小说家斯汤达尔的警句："轮船要煤烧，我的脑筋中每天至少要三四立方尺的新思潮。"此诗最后一句是："我要往图书馆里去挖煤去哟！"）我们想要路走的远，要多装无烟煤；想要走的快，也要多装无烟煤。煤经过一种变化，产生伟大的力量。你要快装煤，多装煤。

这些信，写于半个世纪之前。那时的中国，只有极少数有识之士将希望寄托在共产党身上。立徽比我大六岁，关于大革命时期的回忆，他比我更清晰一些。从给弟弟的信中知悉，一九三〇年红军攻入长沙时，他的家（在小吴门外城郊）曾受到损失，大概是附近贫苦居民所为。这些事他从来没有同我谈起过。那时我们无法知道共产党的任何具体情况，只是一种朦胧的寄托。然而，我们对于国民党、蒋介石是深恶痛绝的。林语堂办的《论语》，有一期揭开封面就有一幅整版漫画：一片漆黑中，用白线勾勒一个人形，在抽鸦片。题目似是：中国财政的一线希望。我和立徽议论过这幅画，认为这就是当时的黑暗中国，希望则在那一边——我们所不了解的"苏区"。"苏区"这个名词是从我的老家平江来人中知道的。我的忆旧诗中有句："人人平等事悬殊，来客频频话苏区。学唱饥寒交迫曲，心驰桃树武陵居。"这是一个年轻的远房亲戚，他在苏区呆过，来到长沙时，眉飞色舞地跟我讲过苏区的生活，教我唱过《国际歌》。如果新中国不曾发生这十年动乱，那么上面摘

录的这些信，对今天的青年是无大意义的。然而，不幸的是，十年是非黑白的颠倒，搞乱了一代青年的思想，他们现在生活在灿烂的阳光中，有些人仍如在五里雾中。我录下这些信，也还有另一个意思。即这些信件的收信人、当年深情地读过这些信而且将它们完好地保存在衡山家中的立徽，立徽的亲爱的胞弟，我也认识的，比我们低两班，曾是岳云高十三班的学生，现在当也跟我一样，鬓发如霜了吧。他住在大海的另一岸，我希望他能有机会读到我这篇文章，引起他的怀旧和乡思。立徽高中毕业时，由于爱国激情的冲动投考了国民党军校，在抗日战争中，两兄弟在中国大地的两个战场上同时抗击着日寇。差堪告慰的是，立徽的弟妹们不久前告诉我：他们已收到远隔重洋的哥哥的来信。立徽在信中说："读微弟、御妹来信，得悉母亲身体健旺，弟妹们均已成家，有孩子，更有合适的工作，年节家人均能团聚，闻之亟慰。我们在海外，一切平安，惟时以家人为念！侄儿三侄女一均已婚嫁就业，老大老二各有一女，年节及假日都回来团聚，得享天伦。"血比水浓，海内外兄弟聚首一堂的日子总会要到来的吧。

一九三五年暑假，我提前一年进行暑假期间的工厂实习，选定长辛店铁路工厂，为的是靠近北平，以便同立徽共度暑假。这时华北的形势已经紧张。六月十六日，他给弟弟的信中写道：

半月来，报上"华北"的字眼真够醒目了。自五月廿九日至六月十日，问题才告一段落。然邻邦移外交

于军部，手段堪惊，故目前形势仍不可尽测，未敢乐观。至原提条件为何，不能全悉。原则不外扫除我在华北之军政势力，造成黄河以北非武装区，然后言中日亲善(？)与提携(？)，此固维持东亚和平（？）“有不得已也”。而旬日来：于主席（按河北省主席于学忠）之免职；天津市长之易人；军分会政训处之撤销；宪兵第三团之离平；关、黄两师之移防；河北省、市党部之取消……等事实之变化，当系受其影响。近两日消息稍沉寂，此对方为了要监察我方承办条件履行与否也，然后进一步工作（日日有飞机侦察）。还说一件事：六月七日，河北高中军训集中训练处，接日方某武官电话，谓欲领两连兵在两小时内前来观光，主持人关麟徵师长（古北口一役勇将）即应允，并备阵以待，不意客至过门不入。移时，关即奉遣散命。临别，作最后精神训话时，关上台四、五分钟久，泣不能言。在场数千学兵，无不落泪。因为他们都读过都德的《最后一课》。

我到长辛店后，第一个月的周末，都是到北平同立徵一起度过的。由于实习生活过于呆板，同伴也谈不来，第二个月就索性离开工厂，同立徵住到一起了。这是多么美好的一个月。我们常逛书摊，东安市场可以买到翻印的鲁迅杂文集。有次去游颐和园，门票五角钱，进排云殿还要花五角钱，于是两人沿着外墙往上走，在最高处翻墙而入。那时游人很少。当我们走上最高处亭子时，一大群日

本男女挤在里面，又吃又闹，好象这儿是他们的天下。这个刺激的场面，使我们大败其兴。立徵带了一个Box（盒式）照像机，也不想拍照了。

“一二·九”运动前夕，立徵来信，常谈华北形势的危急。下面是十一月廿四日他写给弟弟的信，可见他当时的忧国之情：

> 这星期你们一定天天挤着看报纸。现在我不能不很悲痛地告诉你。但是我能写些什么呢？你只有从新闻语调里忖度（天津《大公报》），现在我只能告诉你一句话：“要问华北的消息么，那正在破灭与创造之线间。”事已确到最后关头，屈辱流离在所不免。这点当我去年北上时就认清了的。我并不因此惶恐，只更自奋力，知学生生活一日宝贵一日，活动力、沉毅力更增大了。只是我们的言行远远不如你们在长沙的自由。我们也时常看到铁鸟的飞影，但上面却不是“青天白日”的徽标，而是别种颜色。常想到一句悲壮的话：“我学航空，就是要求死的伟大！”这是一位航空学校同学的意志。“最好是来北平读书”，这样的话，你不要再说了，也不要想了，免得人家笑你神经错乱。我知道我有一天会在火车站与从不相识的人握手的，那是平汉车还是平沪车，现在不可预测。

“一二·九”运动爆发后第三天，我就接到立徵的长信，他参加了那天的游行，当夜给我写信，详细描述了在王府井南口挨水龙冲射和皮鞭抽打的情形。这封信立即在我的

朋友中传看，我连夜用大张白报纸抄好，张贴在学校中心文学院的门口，于是点燃了武汉大学全校同学的愤怒之火。之后，又收到他详述“一二·一六”游行的长信。这时，武汉的学生运动已经同北平同全国的学生运动汇合在一起了。十二月十一日立徵给他弟弟的信中写道：

关于“一二·九”，你们是否得到了这类的快邮代电？这次示威运动北方报纸都不能登载，南方总不如此吧。我在当天晚上就写了封信给你，只是那时情形混乱，事后查明的结果是这样：参加人数约五千余人，受伤者二百余人，被捕者三十余人。对方的武器是东洋刺刀，水龙，与中国皮腰带、皮靴。有师大女同学一人受刺刀重伤，有性命危险。事后当局戒备益严，凡被注意的学校门口皆布警兵数十或百人，水龙数具，严禁团体行动，便衣侦探四伏。北大、平大、师大十日起已罢课；我校虽受伤有人，尚未罢课。空气表面似乎转入镇静、沉默，内心之火更可化金石了。北平今冬特冷，报载几天冻死了百多人。我们有热血，并未因此寒惧，两拳压在口袋里，依然热烘烘的。

果然，立徵又英勇地参加了“一二·一六”的示威游行。十八日给弟弟写的信是铅笔字，发现其中有五页用了复写纸，一定是同样的几页也寄我了。这是“一二·九”运动的战士也是后来牺牲于抗日战场的战士第一次参加战斗的亲笔记录。虽然“一二·一六”这天的战斗经过已有专书记载，立徵所记只是他亲历的一段，我仍觉得有责任一字一句抄

下烈士的手迹，何况其中有些细节还有史料价值。今年是“一二·九”运动五十周年，发表这些信件也很有纪念意义。

事先当局已闻悉十六日有第二次示威运动，故各校门与各街通衢戒备益严。学联会分全市各校为四区路，定上午在天坛前天桥集中。大集会后再进城示威游行。

我校晨八时由西城出动，经过两三度水龙、警棒、大刀奋战后，中途与清华一部分（也是被冲散了的）汇合，直达天桥。十点过，先后奋斗得以到场的大中学生将近一万（听说各路在中途被冲散的不少，也有些中学生被学校当局禁闭不能出来）。悲壮激昂的气氛坚压长空。草草开过市民大会后，一万群众列队，臂挽臂四人一排，回头欲从前门入城示威。这时队伍已扩大到一里多路长，气势愈觉雄壮了。久久沉闷地压在心头快要炸裂的悲愤与积怒，现在变成呐喊了；平日不能谈论的，现在血似地写在宣言纸上了。我们雄视一切，我们痛快，我们感觉华北仍是中国人的。

到了前门，即受到“绝不准入城”的阻止，数度和平开导与交涉都无效，只有冲锋与肉搏了。我们的武器自然是肉和血；对方的，初是水龙，水龙不足用，继之以大棒、皮鞭、刺刀、大刀背，于是流血开始了；终于第一排枪声（向天）响了。群众暂时退让了一下，又即刻齐集前进，第二第三排枪继续响了，同时大刀、

警队一车车压来，机关枪排列更多了，但群众不再惊动。他们见弹压无效，只好与我们讲和，允大队从宣武门进城。我们也只得改路了。途中在西河沿又小冲突一次，下午四点抵宣武门。到达时才知道被骗了：城门同样关闭了。后传开城，以解散大队为条件。燕京受骗，先离了大队，后来清华也离开了宣武门。

“各人走不各人走?”“不走!”“等不等?”“等!”这是我们留下来的队伍大家的回答。东北大学、师大、辅仁、北大、汇文等校四百多人，在大风严寒中，在城门外直等到夜里十点多。最后大队欲集中师大，走不到半里，在骡马市大街又与水龙、大刀、刺刀大激战几个回合，此时因人马太疲，又肚子饿，只好疏散开，各向师大奔来。到了师大点兵，轻重伤的占五分之三、四。我们坐本校慰劳队的汽车回营了。

在汽车中大家都沉默无语。我在回想这些悲欢壮烈的镜头：在宣武门外时，有一位清华女同学偷从城门下匍匐穿过，刚起铁闩时，警察发觉了，被捕毒打回来。有十多个小商贩走来慰劳我们大队，显示一种强烈的爱国热情，慰劳品是窝窝头、烧饼、芝麻糖、哈德门香烟……都是由几大枚、几十枚凑起来买的。我们饿了一整天，冻了半夜，这时觉得从来没吃过如此味道好的烧饼。当慰劳团来的时候，市民围近来看的更多，我们借此向他们作真切的宣传，还与他们同叫了口号。还有件事值得说的，当我们出发时，有位

国际新闻记者Mr George Kaiunkov(乔治·凯诺可夫先生)从辅仁经过,得他许可与我校两同学携camera(照相机)乘汽车在各路与前门一带摄取影片,并允即运欧美。

"一二·九"这年寒假,立徵和我都曾回到长沙过年。我们的交谈,当然比过去大不相同了:这是两个无愧为救亡战士的老友从南北同一战场上归来后的交谈,我们兴奋,对民族前途充满希望。这时,八年未见过面的我的小学同班好友黄乃(原名黄一寰),正从南京回来度假,他是黄兴的幼子,名门之后。一见面,三言两语,我们的思想认识是多么一致啊!过了元宵之后,我们三人一起离开长沙,经过武汉才分手的。我们还在武昌蛇山黄乃父亲的铜像下照过像。现在我的幸存照片中,有一张立徵和我的半身像,是特意在汉口照相馆中照的。立徵家中还找到一张他在船上的背影全身照,则是在轮渡上由我拍的。"一二·九"以后到一九三七年五月我离校前,我们的通信更加频繁。一九三六年暑假他没有回家。那时,我在校内外活动甚多,三六年下半年开始寻找党的关系,三七年年初正式成立党的武汉临时支部。一九三六年下半年全国救亡运动中,各地大体都开展过援助绥远抗战的活动。立徵写信告我,他参加北平学生组织的一个口琴队,到绥远前线劳军,就便游了云岗石窟,寄来许多照片。为找到党的正式关系,一九三七年五、六月间,武汉临时支部武大小组的三个人,杨纯(万国瑞)、谢文耀和我先后来到北平。五月中

旬，立徽即离开学校，同我们住到一起。我们先后同北平市委和北方局的同志接头，商议在武汉建立党的正式组织问题。由于时间急促和繁忙，我竟来不及介绍立徽入党。芦沟桥事变之后，谢文耀先回武汉。八月中旬,我与杨纯、立徽三人经天津到济南，不准备南下了，随即参加韩复榘的三路军受训，以便留在山东打游击。我因故中途退出，于十一月间到泰安。立徽于结业后，被分配到鲁北城武县当民训督导员，在泰安还收到过他从前线寄来的信，说那里举目无亲。一九三八年三月间，我从徐州到武汉参加全国学联代表大会时，一天，突然在武昌的民先队部见到立徽，才知道他在城武很难立足，找不到任何可靠的进步关系,在敌人临近时，撤退下来，辗转回到武汉找组织关系。于是我与谢文耀正式介绍他入党。三月中旬，我们一起来到徐州。离开武汉时，长江局组织部让我带领十多个青年同志到徐州前线，相机转入山东敌后。到徐州后，同苏鲁豫特委负责人郭子化商议,这一批同志全部到鲁南敌后去。从此，我就同立徽分手了，再没有通过信，也一直打听不到他的消息。直到一九四九年六月南下途中，才从金明同志处知道，抗战胜利前不久，立徽已在鲁南牺牲。

前面谈到，一九七九年收到立徽表弟寄来两大包材料时，我就想为立徽写一篇较详细的传记，而终没能写成，这是由于工作忙，更由于他在抗战时期的情况我完全不清楚，手中只有这些简要的“证明材料”。经过几番周折，这些传记材料又在一个地方被耽搁了。我断断续续写出以上

这些回忆，为了存真，大段大段摘录下来他写给弟弟的家书。这些，大体上反映了从“一二·九”前后到参加抗日游击战争这一时期，立徵的为人、治学和思想的片断情况；至于最重要的八年艰苦抗战的情况，就只有让他的表弟千辛万苦搜集“证明材料”及其经过，如实地勾勒出一个轮廓。这个轮廓也可说是为了恢复烈士本来面目的一曲“寻兄记”。这也附带说明二三十年来，我们各项工作中“左”的为害特别是在湖南这个地方曾何等严重。

据表弟告我，丁家堂当地群众埋葬立徵——他们的文科长时，找到当地大地主一口名贵的棺材，将立徵的随身物件包括他的装满笔记本的旧挎包，一起放入棺中。我真幻想有朝一日，能为立徵迁葬时，如挖掘古墓一样，这些笔记本仍完好地自棺中找出。那么，抗战八年残酷斗争的鲁南游击区中，一个活生生的，为当地群众无限爱戴的战士和领导者的形象，他的音容风貌，就会更加明晰地出现在世人面前。

铁如寻兄记

“你知道一个名叫文立徵，化名赵宓的人吗？”

多少年中间，陈铁如几乎是逢人就问。至少，每当他遇到抗日战争时期在鲁南一带战斗过来的同志，总要提出这个问题来。他也千百次地得到了同样的回答：

“不知道。”

当然，有的人的回答并不这样简单，他要求陈铁如把

问题提得更具体一些，多提供一些有关的细节，以便思考。但是结果仍然是抱歉地表示："不知道。"

陈铁如在山东临沂拖拉机制造厂工作，是从部队转业下来的。他为什么这么执着地一定要打听这文立徽的下落呢？

文立徽是他的表哥。陈铁如舅舅家的表兄弟姊妹很多，立徽最大。小时候他常常同妈妈到舅舅家去，可是从来没有见到过这一位年纪比他大许多的大表哥。原先，他听说大表哥在北平上大学，后来抗日战争开始，又听说他在山东打仗，年纪更大一点，更听说他当的是八路军……。尽管没有见过面，但他常常听到爸爸妈妈夸奖大表哥，说他在学校里功课好，说他肯帮穷苦人的忙。有钱人家往往是看不起穷亲戚的，文家可不是这样。陈铁如听妈妈说，她每次回娘家，立徽待姑母总是又恭敬又亲热，问长问短。到要走的时候，他也总是买好车票送上车去。那时陈家没有钱供孩子上学，陈铁如的两个姐姐也就是由这一位大表哥带到长沙念书的。由于常常听到妈妈爸爸说起他，陈铁如对这一位从未见过的大表哥似乎是很熟识了。

一九四九年全国解放，可是这一位听说当了八路军的大表哥并没有回来。舅父文九德在军界工作多年，有一些故旧在人民解放军任职，他向这些人打听大儿子的下落。有的人没有听说过，有的人说是听说过但是不知其详，还有绘影绘声的传闻，说他现在是人民解放军某一个支队的司令员……。一切熟识的人都问遍了之后，没有办法，文

九德就在《人民日报》上登出了“寻人启事”。他们家里还写信向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国务院人事局、《解放军报》、《中国青年报》等各处寻找，回信都是“查无此人”！一个不祥的阴影逐渐出现在家人的心头。如果他还在人世，也该主动找家人联系了，莫非已经殉国了吗？万一真是如此，他又牺牲在何时、何地呢？

抗美援朝战争爆发，当时还在念初中的陈铁如，怀着满腔的热血，响应号召，报名参加了军干校。开始他被分配在一个机要学校学习，后来因为“社会关系复杂，不宜于做机要工作”，被调到海军的一个工厂。过了几年，又根据一个什么“几清几查”的命令，一夜之间，他又不宜于在军事工厂工作了。陈铁如想，说他社会关系复杂，大约是因为舅父文九德在旧军队工作多年吧。后来他才知道，不仅是舅父，解放后一直下落不明的大表哥也不知怎样被定为“伪军官”了。这种谣言他早就有所风闻，到了一九六七年，陈铁如竟收到北京医学院一个什么“专案组”寄来的这样一份“函调提纲”，其中指供的项目之一是：“文立徵何时参加伪军？任何职？现逃往何处？”天哪，血口喷人，这么多活着的人遭到污蔑还不够，已经为国捐躯的先烈也要被骂得狗血淋头吗？悲愤的心，使陈铁如越来越下定决心，非找到大表哥的下落不可！

湖南衡山县的民政部门也不知道他们这地方出了一位死不还乡的英烈。立徵的继母、弟妹在家乡，根本不被当作烈士家属看待。相反，立徵的“伪军官”身份，虽然不可

能有任何材料证明，却是被毫无疑义地承认了。凡是“伪军官家属”所应当“享受”的种种“待遇”，他的继母和弟妹是一项不缺地全部“享受”到了：不能升学，不能招工，不能参军，不能入党，不能……

一九五三年，陈铁如在海军军械部上海训练队学习，就近写信给华东军区政治部干部部查询，不久回信来了：“因你信上未写明他原部队的详细番号与职别，故无从查询，你若知其部队番号与工作等情，可告知我们，以便代查。”这一些陈铁如全不知道。他只知道大表哥当了八路军，在鲁南打过仗。陈铁如还请军委总政刊登了《军属寻人名单》，也没有结果。

为了多了解到大表哥的一些情况，陈铁如写信给在家乡的父亲，请他到舅父家去找找看，看能不能够找到一点大表哥的证件、信件或其他什么的。结果只找到了他在北平求学期间写给弟弟立徽的十几封信。一九三九年冬天，他在山东峄县周家营以友人口气寄回的信，一九四三年从临沂寄回的信，比较详细地谈到当时战争生活的，可惜都找不到了。找到了的这些给弟弟的信件，处处显现着一个向往革命的青年的热烈的心，其中记述他参加“一二·九”运动情况的那两封信，几十年之后读了都令人激动。陈铁如读着这些信笺已经发黄、变脆的信件，更增加了对这一位兄长的敬爱了。

也真是无巧不成书。陈铁如因为受到文立徽这个“复杂”的社会关系的连累，不宜留在军队工作，转业到地方，

全国三十个省市自治区，两千多个县市，别的地方都不叫他去，辗转让他到了临沂。这里属沂蒙山区，正是当年文立徵战斗的地带，也许在无意之间，他也曾踏着当年大表哥的足迹。这种巧合更便于他打听大表哥的下落了。那是在六十年代的头一年，他参加了新建拖拉机厂的工作，接触的人不少。每逢遇到参加革命较早的老同志，他都问：你知道文立徵或者赵宓这人吗？不管在理发店里，在公共浴池里，还是出差住在招待所里，他几乎象一个精神病患者一样，象希腊神话中的斯芬克司一样，执着地向人们提出同一个问题来，在失望了一千次之后，依然一千零一次地提出问题。他下决心要在浩瀚的大海里捞出这一枚确实存在过的针来。

陈铁如永远不会忘记一九六八年十二月二十九日这个日子。这一天他遇到了山东省招远县的岳风成。谈话中，他知道了岳风成抗战时期在这一带打过游击，于是也并不存特别希望地提出他的老问题来了：

“你知道一个名叫文立徵，化名赵宓的人吗？——他是我的表哥，也在这一带打过游击的，现在下落不明了。”

“赵宓——，我见过。”岳风成沉思了一下，回答说：“那是一九三九年，我刚参军不久，在台儿庄听过他作的报告。”

“当时他干什么工作？”陈铁如急切的问。

“他是我们鲁南沂河支队支队长。个子不高，胖胖的，说话带南方口音，那时大约三十岁吧。”

至于后来的情况呢？岳风成就不知道了。

问题并没有解决，但是朝问题的正确解决迈出了真正的一步。从此，问题的提法可以更具体一些，范围也更广阔一些了：

"你知道抗日战争中鲁南沂河支队的情况吗？你知道现在何处有沂河支队的同志吗？"

首先，陈铁如向临沂地区直属机关的老同志打听，寻找还健在的原沂河支队领导人的姓名、地址，逐渐地也得到了一些线索。

一九七三年，立徵的妹妹立御通过另外的途径听说：抗日战争中，我冀鲁豫军区第二军分区有个赵谭支队，支队长为赵宓。她没有能够打听到更多的细节，就把这告诉了陈铁如，请他循着这线索追寻下去。同时她把自己珍藏的大哥的唯一一张相片，一九三四年在长沙拍摄的，复印了许多张寄来，好让陈铁如拿给立徵当年的战友去看，帮助他们回忆。

陈铁如辗转打听到王献廷、韩去非、杨士法三人了解情况，就写了信要去问，但他只知道他们原在上海工作，不知道具体地址，就将信寄往上海市革委会组织组，请他们转交。不久，原信退回：应通过组织按规定手续办理！托转几封打听表哥下落的信有什么规定手续呢？幸好世上总有热心人，苍山县物资局的于广明帮助他找到韩去非的地址了。一九七四年五月十六日得到了第一个真正的突破。这一天，陈铁如收到了当年鲁南三军分区政治委员韩去非

的复信。信中说：

关于查询文立正同志下落的信，刚已收阅。所说文立徵（赵宓），这可能是文立正同志的原名。

文立正同志是在一九四一年三月由山东八路军鲁南军区派到鲁南军区第三军分区（即今临沂、郯城、邳县、峄县之平原地区）为副政治委员兼政治部主任，到一九四二年春，文立正同志又被鲁南军区调到铁道游击队任政治委员。据说文立正同志到铁道游击队只十八天，在对日寇作战中英勇牺牲。津浦铁路西，具体地址不详。

对文立正同志在一九四一年三月来到第三军分区工作之前的历史情况不详。当时的鲁南军区政治部组织部长为唐健如同志，现为山东军区政治委员。一般说来，组织部长对干部的革命历史情况，是比较熟悉的。但也年长日久，人也年老，记忆衰退，希设法向唐健如同志进行了解。

一九五〇年我被调到中共济南市委工作时，曾听到许衍梁同志（现在济南市革委工作）谈过他和文立正同志原在北平辅仁大学同学。文立正同志可能是一九三七年曾到济南。一九三七年十月济南沦陷前离开的。为此，希向许衍梁同志进行了解。

我对文立正同志的情况不大了解。因我正是一九四一年被调离三军分区之后，他才被调到三军分区工作的。我在一九四二年又被调回三军分区工作时，他

已被调到铁道游击队工作，所以只是认识，但不熟悉他的历史情况。据我所知，他还未结婚。

韩去非不但复信提供了自己知道的全部情况，介绍了唐健如、许衍梁两个重要的调查线索，而且在复信之后他也帮着打听文立徵的情况了。他找了上海原在鲁南工作过的同志交谈，找了原八路军一一五师运河支队政委、上海房产局党委书记朱道南。提起文立徵，朱道南记得十分清楚，马上写了一份详细材料，请韩去非转陈铁如。这份一九七四年九月十五日写的材料说：

文立正同志湖南人，其父曾在保定军官学校毕业，一九二六年国民革命军北伐期内曾担任第八军唐生智的团长，一九二七年初调任黄埔军校长沙第三分校步兵大队长，当时倾向共产党，拥护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一九二七年马日事变以后的情况就不清楚了。

据我所知，文立正同志的生母去世后，其父又结了婚，生有弟妹数人。文立正同志在长沙某中学结业后，考取了北平一教会大学（曾同我谈过大学的名称，我忘记了）。他的思想比较进步，依靠共产党，痛恨国民党反动当局未放一枪放弃了东北四省，据说当时曾同平津同学会有联系。约在一九三七年下半年，和北平郑琳（女）等同志到了徐州，和我们的苏鲁边区特委书记郭子化同志接上关系（郭在徐州第五战区动委会兼做统战工作，文化大革命前任中央卫生部副部长）。一九三八年春文立正、郑琳等同志由于徐州形势紧张，

随郭子化、张光中同志到了山东鲁南地区抱犊崮以西南唐等地，参加第五战区鲁南人民抗日义勇总队（我党领导的部队）工作。到了一九三八年四、五月间，特委决定我兼任鲁南民众抗日自卫军（我党领导的武装）政训处长，文立正同志担任副处长（我只兼任名义，实际工作由文去做）。当即我和文立正等同志带义勇队一个大队出山到台儿庄一带活动，过了二三天又回到峄县四区周家营一带，和国民党几个比较进步的司令共同协议成立了山外抗日军联合委员会。由于工作需要，报请特委同意，在周家营以北的白楼办了一个青年训练班，由文立正同志负责主持。接着我去山里参加反顽战斗。到了一九三八年的七月份，国民党特种工作团（CC领导的，和我们有统战关系）第五大队的邵剑秋抗日比较坚决，政治上亦较进步，一再要求文立正同志到他那里帮助政治工作。经特委同意，文到邵部工作。到了那里以后，发展了党，不久成立了党的支部。文立正同志的威信颇高，为所有的下级干部和士兵所爱戴。为邵剑秋的部队一九四〇年改编为八路军一一五师运河支队打下了良好的基础，可说这是文立正同志工作的一大成果。

一九三八年秋组织上调我到友军国民党第三专署保安第五旅工作，这个部队土匪成分，工作非常难搞，政治工作必须积极展开。一九三九年初我去山东分局找到统战部长郭子化同志，经过郭的同意调文

立正同志到保安第五旅担任政治主任。到了一九三九年秋，组织上调我和文立正同志带保安第五旅回到了鲁南。由于工作需要，组织上决定调文立正同志重回特种工作团第五大队，到邵剑秋等部改编的八路军一一五师运河支队去工作，文担任了运河支队的政治主任。一九四一年我不再兼任运支政委，从此与文立正同志分手。以后他也离开运支，到八路军沂河支队工作。此一情况可向韩去非、王献廷同志了解。

约在一九四三年文立正同志被派到二地委担任工委书记。这个地区是最艰苦，斗争最复杂、最残酷的地方。文立正同志坚持战斗，毫不动摇。所惜由于武装力量单薄，加上人地生疏，于一九四四年秋，他带一警卫员在铁路以西（临城沙沟夏镇附近）某某村里夜间隐蔽，为国特侦知，勾结日特武装偷袭，不幸遇害，壮烈牺牲。（具体情况问山东泰安建设兵团副参谋长王墨山同志。）

文立正同志自从一九三八年初来到鲁南地区，为党做了大量工作，在极其艰难困苦复杂尖锐的斗争中，英勇战斗，勤勤恳恳，老老实实地埋头苦干，做出了良好的成绩，最后为党的事业牺牲了自己的生命，他不愧为优秀的共产党员，党的好儿子，是一位值得我们学习的好同志。

根据朱道南的建议，陈铁如又写信给王墨山，向他了解文立徵遇难时的具体情况。九月二十五日，王墨山写来

了回信：

> 文立徵同志是一九四三——一九四四年由中共鲁南区党委派到滕沛峄办事处(后改为薛城县)工作的，当时我任办事处主任。由于抗日战争的胜利发展，敌占区逐渐缩小，我占区逐渐扩大，滕沛峄办事处正在扩建为二地委。文立徵同志就是派到二地委工作的(参加二地委的领导)。他是在一次到敌我活动区去开展工作，在夜间宿营时，为敌特袭击而牺牲的。当时陪同他的有区长范有功同志。

王墨山不但提供了材料，还在信中无限深情地对陈铁如说："我们虽未见面，你既是文立徵同志的亲属，我们就有了阶级的感情，我希望你有机会来泰安。文立徵同志的善后问题，凡要我协助办的，我一定尽力而为。"

陈铁如也深深为这种感情所激动。他从这许多人写来的材料中知道大表哥确实已经不在人世，当然很觉悲哀，但他同时知道了大表哥是死于抗战的烈士，又为自己有这样的兄长而自豪。他想尽量详细地弄明白大表哥的生平事迹，他要循着已经找到的线索继续追寻，不断将调查询问的信件寄出去。

在很长时间里，陈铁如只是私下做着这一切。他的业余时间，那怕是一星半点的闲暇，都用在这件事情上了。多少年如一日，他写了字以万计的信件。没有静电复印设备，就利用氨熏晒制图纸的设备来复制材料，一笔一划地先照描在描图纸上，尽量不失原貌。他爱人也支持他，尽

管身体不好，还是强把全部家务揽过去，让陈铁如腾出手来，多一些时间写查询信，描证明材料……当临沂拖拉机制造厂的领导知道他在做这一件事情以后，马上表示了支持。按说，查明一位烈士的事迹与拖拉机厂的业务并无直接关系，但是这个厂的党组织不是只看到拖拉机与革命史无关的这一面，而是把制造拖拉机和弄清革命史都看成党的事业。他们积极支持了陈铁如的这一工作，例如打印、晒制材料都给予方便。周围同事也热情帮助他，对这事都很关心，争相传阅一些答复询问的信件。都为调查的每一步进展感到高兴。有的人主动分担陈铁如的工作任务，使他有可能外出作一些调查和访问。

通过广泛的通信调查，陈铁如已经掌握了大量材料和线索，也从这些材料中发现了一些有待进一步弄清楚的地方。他向厂领导提出：希望能到济南、泰安、济宁等地去访问一些老同志，进一步调查清楚烈士的事迹，并且看看烈士的遇难地和坟茔。厂领导支持了他的计划，并且派了一位同志陪同前往，协助他工作。一九七五年四月三日出发，陈铁如他们进行了近一月的调查和访问。

清明节是扫墓的节日。四月四日和五日，连续两天，陈铁如来到了大表哥的坟前。坟墓在滕县西岗公社丁堂大队，南靠昭阳湖，西接城廓河，东依甘桥村打谷场，北面一望无垠的肥田沃野一直延伸到远处的防风林带。这里是一片开阔地的制高点。文立徵就静卧在这里，听着澎湃的湖水和呼啸的林涛，看着他如此熟识亲近的乡亲们的辛劳

和愉悦，陈铁如被村里男女老幼友好地环拥和维护着。当年的妇救会长、儿童团长和民兵连长紧握着他的双手，久久不肯放开，说：见到你，就象又见到文科长了。陈铁如在大表哥的坟前深深默哀，他默念着：大表哥，我来了。日夜在想念着你的亲人们叫我来看望你了。……扫墓过后，陈铁如还去凭吊了大表哥遇难的房间：原临城县六区区委旧址。北墙与门框上，一个个弹着点还清晰可辨，它记录了革命先烈的浩然正气，也记录了敌寇汉奸的血腥罪行。

在泰安，王墨山亲热地接待了陈铁如一行。并给写了致唐健如的介绍信。到济南，正碰上军区开会。唐健如抽不出身来，但是他即另约了会见的时间，细读了留下的材料。原先约定是星期日相见的，当他星期六听说陈铁如他们已经来到，马上就接见了。唐健如不但谈了材料，写了材料，材料中既实事求是地说明他没听说过赵谭支队这个番号，也提供了一些重要情况，他还请省军区政治部把材料寄给了湖南省衡山县民政局，附以公函："我部唐健如同志为文立正同志所出的证明材料属实。根据文立正同志的情况，应定为烈士。"

在济南军区干部休养所，陈铁如访问了文立徵当年的战友董明春。他说，一年来，唐健如两次找他共同回忆文立徵的材料。他告诉陈铁如："文立正同志虽然是大学生，但生活艰苦朴素，整年穿件破旧衣裳，时常光着脚丫子，背个文件包。他去运河支队时，在我那里（鲁南湖边支队）住了十多天，太冷，我还送了他一双袜子。他一九三八年

就担任团职，以后整编部队，有时担任师职，有时又任团职，他从不计较，任师职或到基层都一样认真。”

在济宁，陈铁如找到了范有功。范说：“接到你的信，我一夜没有合眼。我常常回想起文立正同志，我多次跟他一同作战，他常来我的连队帮助工作，还手把手地教我写字学文化，我病了，他煎药端给我喝，真比亲兄弟还亲。”

范有功详细地介绍了文立徵牺牲的情况：“一九四四年六月鲁南二地委二军分区成立，文立正同志被派到二地委担任宣教科长，我调临城县六区区长。一九四五年正月初，文立正同志从二地委住地来到六区（这时区部驻丁家堂村，现在是滕县西岗公社丁堂大队）检查扩军情况，帮助巩固地区，并且为我们区办党训班讲党课。刚到三、四天，于正月初十深夜十二点左右，文立正同志在宿营时，由于内奸（区中队三班副班长）徐宜南勾结国民党伪专员大汉奸申宪五的匪兵，对区部机关突然袭击，文立正同志不幸头部中弹，当即牺牲了。我们区中队打跑了敌人，第二天到了丁家堂村北的两河岔村大地主家找来一口好柏木棺材，我们区机关干部战士和广大群众十分悲痛地将文立正同志连同他的背包衣物成殓。安葬之后举行了追悼会。所有这些善后工作都是我主持办理的。人们都很怀念他。每逢清明节、国庆节，都有许许多多的人到墓前凭吊，开会纪念，献花圈，向青年学生讲述他的事迹。”

当年在六区青救会工作的张秀桐，还记得追悼会上所唱的问答体的挽歌：

什么人造成丁堂惨案？什么人带路当的汉奸？什么人为国殉的难？什么人准备大报仇冤？

申宪五造成丁堂惨案，徐宜南带路当的汉奸，文科长为国殉的难，同志们准备大报仇冤！

后来，申宪五和徐宜南这两个凶手都被捕获处决了。

范有功还和陈铁如谈起，大约就在一九四九年大队伍南下期间吧，文立徵的妹妹曾经来过，她是在北京工作的，先找到了滕县县委，向当时的县委书记陶友亮详细询问了文立徵牺牲的经过，安葬在什么地方，凶手处决了没有……，县委特地为她组织了一些知道情况的老同志开座谈会，并领她到墓地凭吊……。骤听之下，陈铁如有点觉得诧异。他十分清楚，他本人是亲属中来扫墓的第一人。在他之前，哪一个表姊妹也没有来过，也从来没有哪一个表姊妹在北京工作。陈铁如猜不出这人是谁，但是他深深被她的行为感动了。他想：他们虽不是同胞兄妹，但必定是有着很深的革命友情的战友。她一定也是很尊敬大表哥，愿意自己是他的妹妹，并且以此为自己的光荣吧。所以，她才不远千里，来凭吊故人的坟茔，大有古人素车白马的遗风。对于这种高贵纯真的感情，陈铁如是能够理解的。这一个月的访问中，他接触了许多人，大表哥当年的许多战友，他们谈起他来，还是那样的亲切，深情，还能谈出他许多轶事。呵，谁说大表哥早已不在人世了呢，他还活着，活在当年战友的心上，虎虎有生气地活在人们的记忆中。

陈铁如知道了大表哥曾经是铁道游击队的政委，他联

想起那一本以铁道游击队的惊险情节获得众多读者的小说，就把这书找来细读了。小说作者在后记里说，他同铁道游击队的干部战士十分熟悉；还说，他最先认识的是政委李正的模特儿，那是一九四三年在山东英模大会上。陈铁如想：这一位作家一定很熟知铁道游击队的情况，于是就写信向他讨教，热切地希望从他那里获得大表哥的一些材料。可是回答却是令人失望的：他说，铁道游击队前后几个政委他基本都知道，其中并无文立正，他"认为文很可能在铁道游击队前期或在微山湖边和铁道游击队一道活动过的其他游击队工作过"。不过这位作家表示：当年铁道游击队的领导人杜季伟、刘金山等人是他小说中人物的原型。当年躬与其役的这些同志毕竟更加了解情况，杜季伟写的材料中说："文立正同志一九四三年秋确实在铁道游击队工作一段时间，当时任职政委。相处不久，我即调离铁道游击队。我对文立正同志印象较深，他学习认真刻苦，政治思想老练，工作积极负责，作风艰苦朴素，作战勇敢，对党忠诚。"刘金山写的材料中说："文立正同志是一九四二年十一月调到铁道游击队工作的，只有八个月左右，他就调到滕县武工队去了，任武工队政委。"一九七八年六月，陈铁如到上海，看望了朱道南，顺便谈到这事，朱道南说："作者不知道。他一九四四年以后才搜集素材写小说，以前只是随军记者。"在一次访问中，邵剑秋也同陈铁如谈起文立徽在铁道游击队的时间，他说："恰恰不是早期，而是一九四三年，那时我同他还在郯（城）马（站）地区相会过一次。"陈

铁如收到了上百份材料，尽管一些材料在年月地点之类细节上稍有出入，对于文立徽担任过铁道游击队政委这一基本事实总是众口一词予以肯定的。其实这也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文立徽在铁道游击队当政委，只不过是他十年革命生涯中短短的几个月。即使没有这一段，他还当过鲁南人民抗日自卫军政训处副处长，当过友军保安第五旅政治部主任，当过八路军一一五师运河支队政治部主任和副政委，当过鲁南军区第三军分区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代理过独立支队政委，而铁道游击队即属于独立支队建制。陈铁如不是要为烈士多争一个头衔，而是为了弄清楚一段史实。

陈铁如搜集到的材料越来越多。这些材料每篇孤立起来看，写的虽不过只是一枝一节，但集在一起，一个栩栩如生的形象就凸现出来了。一九七五年十月，他把所有重要材料的复制件都寄了一份给湖南省衡山县民政局，接着又遵照民政局的意见寄去了原件。这些材料对于证实文立徽的烈士身份，对于推倒横加在他头上的"伪军官"这诬蔑不实之词，应该说是足够了的。

可是，在极左路线的影响下，要办好这件事竟是如此的烦难！文立徽要走进烈士的祠堂，还得跨越多少障碍啊。为了这事，陈铁如和文立徽的弟妹们同衡山县民政局纠缠了六年之久。

因为陈铁如寄去的证明材料大都是给他个人的复信，需要补盖公章方为有效。这是正当手续所必须的，无可非

议。这样，就要耽搁若干时日。

因为许多材料写的是“文立正”，山东军区政治部来信说“应定为烈士”的也是“文立正”，而陈铁如的表兄名叫“文立徵”，这究竟是一个人还是两个人？其实，这是一个早已解决的问题：张新华写的证明说：“文立徵同志原名立徵，后自己简化，改为‘立正’。这名字是在统战部队改的。”邵剑秋也证明了这一点，他说：“老文改名立正，就在我那个部队，当时我劝他：‘你改它干什么？’他却说：‘徵字笔画太多，还是改了好。’”就因这一字之差，几乎弄得“查无此人”，这样又得拖延若干时日。汉字简化，“徵”已简化为“征”，又是问题。

因为许多证明材料都没有写明文立徵或文立正的籍贯。只有朱道南一人说文是长沙人。“我县也有个文立徵，多年没有信息，与朱道南所介绍的略有相近，为了避免弄错，请朱道南将文立徵的家庭情况写得更加清楚一些……”公函寄到朱所在的上海房产局。朱道南对于他们这种对烈士毫无感情，拖拖沓沓的态度很不满，但还是详详细细写了一份材料加盖公章寄了去。

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时间就在不断的节外生枝中无声无息地过去了。为什么老是这么拖着不办呢？后来才明白了这奥妙：一次，立徵的弟妹到县里去询问，接谈的同志无意之间提到：“以你们的家庭出身，能不能享受烈属待遇还是个问题。”这样说也真太伤人的心了。人家的哥哥，为了革命，自愿地把自己的生命都献了出来，难道说他们

忍心拿哥哥的这一条性命来给自己换取一些什么?不是的，他们什么也不需要，只希望洗净横加在哥哥英灵上的那些污蔑，使他享有本来应该属于他的荣誉，就心满意足了。至于说到出身，彭湃烈士又是什么家庭出身呢？朱道南在致陈铁如的一封信中说:“追认文立正同志为烈士，这不只是文的家属光荣，也是衡山县的光荣。”

在大体上肯定文立徵是革命烈士之后，衡山县民政局在一九七八年六月三日给立徵的弟妹立微、立御的复信中，又提出了一个新的问题:

现在的问题，这个烈士在一九三七年八月以前是什么地方人，在什么部队或学校工作。什么地方入党(时间)，除个别一点线索外，我们查了大量单位，终未弄清。

你大哥文立徵从长沙至北京辅仁大学化学系这段情况，我们已弄清，你大哥是一九三六年离开学校的(原因不明)。

从这两项得出的结语是颇带威胁性的:

一九三六年六月至一九三七年八月这段时间只要联系上了，有证据了，我们定会井（整）理上报。联系不起来，不会井理上报。

不知道是为了嘲弄还是为了抚慰，信里面还写了这样几句:“办理烈士手续，我们衡山人不能说内行，但必定知道一点，特别是上级规定、要求。希你俩不要担心，着急。”

这真有点叫人啼笑皆非。已经有那么多详尽确凿的材

料证明文立徽的基本情况，证明了他是在敌后的战斗中死于敌寇汉奸之手，即使一时找不到他的入党介绍人，不了解他入伍前一年间的情况，应该也完全可以认定他为革命烈士了。路友于，张挹兰，闻一多，李公朴，杜斌丞，杜重远，杨虎城……这许许多多的人都不曾入党，不也是公认的烈士吗？何况已经确知道文立徽是党员，不能确定的仅仅是他入党的时间。他的党龄长一点或者短一点，对于是否能定他为烈士难道会有决定性的作用吗？

陈铁如也不知道大表哥是何时何人介绍入党的。他马上为打听这事而奔忙起来，一一给一些老同志写信请教，一些热心的老同志自己虽不知道，还是苦苦思索可能知道的线索，他们又向一些人发出询问的信去……

文立徽的入党介绍人是李锐。有人告诉陈铁如，只要找到李锐，就可以弄清楚文立徽入伍以前一年的情况了。陈铁如不认识李锐，也不知道上哪里找他。几经打听，他知道了李锐原来是水电部的副部长，在一九五九年庐山的那一场风暴之后即从地平线上消失，不知何往了。有人写信告诉他，听说"文革"前李锐在北京郊区某县任县长。还有人说他还关在牢里。文立徽的战友、当年运河支队的司令员邵剑秋，在安徽就打听到了三个名叫李锐的老干部，一个是安徽省科委的党委书记，在新四军二师工作过，不认识文立徽。后来，终于辗转打听到了一点线索，于是他就在一九七八年十二月十一日给安徽省地质局长曾星五写了这样一封信：

星五同志：你好！

现有一事相托，抗日时期与我在一起工作的战友文立徵同志，文原籍湖南衡山县人，一九三六年在北平辅仁大学化学系读书，三六年六月后离开辅仁大学，三七年八月（“七·七”事变后）文立徵和其他人由北京经天津到山东，作抗日救亡活动（据了解此时文立徵同志已是中共党员，带有组织介绍信），三七年冬国民党山东主席韩复榘不战而退，三八年春文立徵到武汉，经八路军武汉办事处（即长江局）介绍到敌后沦陷区鲁南工作（中共苏鲁特委书记郭子化处），三九年冬任我八路军运河支队政治主任，从四一年到四五年先后在鲁南第三、第二军分区工作（文立徵同志在运河支队工作时，改名为文立正，当时曾以友人口气给家乡写过一次家信，因此他的衡山县亲属，知道文在鲁南）。一九四五年一月文立徵同志在鲁南滕县丁家堂牺牲（坟茔尚在）。

前年（七六年）文立徵同志的表弟陈铁如与我来信说：全国解放到现在，湖南衡山县地方政府尚未承认文立徵同志为革命烈士，甚至对其亲属歧视，原因是文立徵同志的父亲是国民党高级军官，并怀疑文立徵逃亡在外，也是坏人。近年以来，经陈铁如与原在山东同文立徵同志一起工作的老同志联系，收集许多证明材料，转给湖南省衡山县民政局。现在衡山县民政局认为，从一九三七年八月文立徵离开北京，到一

九四五年一月在鲁南滕县丁家堂牺牲的文立正，证明材料业已弄清。但他们仍不承认文立徵同志为革命烈士，理由是：文立徵三六年六月前在辅仁大学化学系读书，不是中共党员；三六年六月后请假离开辅仁大学，到三七年八月离开北平去山东，这一段时间文立徵在什么地方？在何部门或学校？什么地方、时间入党？尚无人证明，未能查清。因此，湖南衡山县至今仍不承认文立徵同志是革命烈士。

据同文立徵同志三七年八月一起由北京经天津到山东的同志说，知道文立徵同志这段历史情况的是李锐。李锐是湖南人，早年负责湖南“民先”工作，三六年三七年与文立徵同在北平。全国解放后在中央水电部工作，五九年犯了错误，下放到佛子岭磨子潭水电站。

星五同志，你在安徽水电厅（局）工作多年，你对佛子岭磨子潭水电站的情况比较了解。你在抗日战争时期和解放战争初期也在鲁南工作，你也会知道文立正同志。咱们未牺牲的人，为了对革命烈士负责，请你在省通过组织找到李锐，回忆一下，写个证明，证明文立徵三六年六月到三七年八月这一段时间的历史（如能知道三八年春文立徵由武汉八路军办事处介绍到苏鲁特委郭子化同志处情况亦好），以便转给文立徵同志家乡衡山县地方政府追认烈士。

请速找李锐，并请将找的结果来信告我。并将李锐住址告我。

曾星五不负所托，他接到邵剑秋的信，马上设法去找李锐。这时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刚刚开过，已经开始着手平反历史上积累的那些冤假错案，我也经中央组织部批准，一九七八年十月，从磨子潭来到了合肥就医。一九七九年一月五日，曾星五在合肥找到了我，第二天，一月六日，我就回北京了。多年来，一直不知道立徵的更多的消息，也怪自己没能向山东有关方面着意打听。在八年的单监生活中，追怀往事，立徵的音容笑貌时时浮现在我的眼前。

我按照曾星五的要求立即写了如下证明材料：

一、我与文是长沙岳云中学的同班同学，好朋友，志同道合。一九三四年同去北平考大学，他考入辅仁化学系，我考入武汉大学。他参加"一二·九"运动游行的当夜，即将当天的情况，写信告诉我了。这封信在武汉大学起了点火的作用。

二、一九三七年五月，我到北平接上党的关系。他当时与我同住在北平翊教寺，实际上即已离开学校。八月，我们一起到济南，加入韩复榘三路军的干训班。这个班结束时，日寇已临近山东，他被分配到鲁北城武县。大概在日军侵占时，他与地方没有建立关系，辗转回到武汉。一九三八年三月，我到武汉参加全国学联开会时，碰见了他。当时党组织让我带一批青年（内中大多是党员）到徐州去工作，并相机进入山东。这时我与武大同学谢文耀（党员，已牺牲，文同我们住在翊教寺时，谢也在北平，因而熟识），介绍文入党，

但未履行正式手续，即匆匆离武汉到徐州了。

三、三八年三月到徐州，我与郭子化同志（苏鲁特委）接头后，即将长江局组织部的介绍信及党员关系交与郭，并对郭说明，其中文是由我介绍入党的。这批党员随即由郭介绍到山东去了。当时特委留我在徐州工作（我本来也准备去山东的）。

四、之后，我与文即失去联系。

〔附：长江局组织部即在八路军办事处，是刘顺元同志写的介绍信。〕

我把这材料交给了曾星五，同时表示，很想更多了解一些文立徵家庭的情况和他到山东以后的情况。邵剑秋把这些转告陈铁如，一月底陈铁如就给我写信，叙说了几年来为了调查这事的曲折经过，并寄来前述一大本调查材料的复制件。看了这些材料，真是如见故人。从此我也就关心起这件事来。

几年的信件往还终于有了结果。一九八〇年八月二十日，湖南省民政厅的批复下来了："关于追认文立正同志为革命烈士的问题，根据调查材料，文立正同志是革命烈士，鲁南早已认定，临沂县烈士陵园有他的名单和史料，不需要再办批准手续。待一九八一年统一换证时再补发牺牲烈士证明书。"呵呵，"不需要再办批准手续"的，拖了五年才办妥，如果需要办批准手续的，该拖多少年呢？俟河之清，人寿几何！就在拖的这些年月中，写过材料的郭子化等几位老同志已经不在人世了！今年三月，收到上海寄来的朱

道南同志去世的讣告，遗憾的是我与道南同志生前无见面之缘。一九八三年冬，已经离休的邵剑秋同志，从安徽到北京来时特地找我恳谈，他说这是一了平生的夙愿——来会见战友的战友。

衡山县民政局已决定：整理文立徵的材料附在“毛泽东同志考察农民运动旧址”（衡山康王庙）里展出，一同展出的还有毛泽建、欧阳海等等烈士的事迹。

多年的奔走劳碌，总算有了结果。陈铁如有了如释重负的感觉。他可以告诉大表哥：在你的家乡，乡亲们都知道你，都在记念你。

在十年动乱中，我被关在秦城监狱，怀念立徵时，做了一首七绝，其中三、四句为：

忠魂定不回衡岳，日出当观泰岳巅。

这首诗的寓意是准确的。鲁南的人民是何等怀念文立正啊。最近收到山东滕县县政府来信，谓该县烈士陵园将进行扩建。“文立正同志是我县四位著名烈士之一，为我县的解放作出了卓越的贡献。”要我为立徵撰写碑文。在这之前，表弟陈铁如就受命撰过碑文，我以为是恰当的。碑文如下：

文立徵，又名立正，字国遒，湖南衡山人。一九三四年入北平辅仁大学化学系，为北平“一二·九”学生运动的积极参加者。一九三七年入伍，一九三八年三月入党。抗日战争时期，在鲁南历任八路军一一五师运河支队副政委兼政治处主任，鲁南第三军分区副政

委兼政治部主任，独立支队代理政委兼铁道游击队政委，鲁南区党委所属二地委委员，宣教科长等职。一九四五年二月廿二日，于原临城县六区丁家堂村开辟工作时，因叛徒告密，遭敌特武装袭击，壮烈牺牲。时年三十四岁。

一九八五年五月

附记：

一九八六年八月十八日，乘在山东出差并休假时，我来到滕县，在枣庄市委、滕县县委负责同志和陈铁如的陪同下，我和我的老伴到西岗镇丁家堂村（微山湖边沿）立徵的墓地，为我的老同学老战友扫墓，献上花圈后，我含泪念了头天晚上吟成的一首七律，最后又沉痛地加了一句：呜呼，吾兄生死太匆匆。

银幕荧屏惹梦思，微山湖畔立英姿。
列车飞上真身手，虎穴频探妙指挥。
莫道书生难造反，一为战士善坚持。
倭降未见君先殉，齐鲁招魂我太迟。

归途到滕县烈士陵园，瞻仰为立徵修建的纪念亭，亭为重檐六角，彩绘红柱，立有石碑，正面为“文立徵烈士纪念碑”，背面为烈士简历。

是夜续成七绝一首：

横戈杀贼秀才风，游击生涯百事通。
进退无形寒敌胆，吾兄生死太匆匆。

县委同志告我，立徵的墓将迁入陵园。

〔附录〕

《寻兄记》补遗

陈　铁　如

我舅家大表兄文立徵，在鲁南抗日前线殉国已四十周年。家人亲属寻找他的下落，用去整整三十年，其间的曲折坎坷，李锐同志《文立徵烈士二题》之述备矣。我作为文立徵的表弟，寻找他踪迹的当事人，还能向读者再说点什么呢！现不揣拉杂补白如下。

我寻找立徵表兄下落一事，始于一九五五年，一九七四年取得较大突破，一九八三年才告完成。此一行动得到许多老同志的谬奖，给了我极大的鼓励。其实，比起老同志们的关怀，我做的实在微不足道。当时处“文化革命”中，备受凌辱的郭子化、朱道南等革命前辈，夸奖此举是“对牺牲烈士的极大抚慰，对幸存者也是极大的教育”；在鲁南曾同烈士并肩战斗过的王墨山、张新华、范有功、姚兴华等老同志，将此看作正义的行动，表示坚决的支持。老同志们都说我寻找烈士的史迹，为其恢复政治荣誉，代表了他们的心愿。

一九八二年五月二十五日，我往访原鲁南三分区政治委员韩去非同志，面谢他一九七四年五月正确的判断，使查找工作得以顺利展开。因我请于光明同志转去的查询信

上，只有：文立徵，字国道，化名赵宓，毕业于北平辅仁大学化学系，以及他的外貌特征、早期照片等资料，并不知道已改名立正。这“徵”、“正”虽然谐音，但究系两个字。韩去非同志说：“我看过你的查询信和照片，经过分析，你找的就是文立正。当时战争环境，情况复杂，许多事情就要作分析。当然，我也可以写一封信给你说我不知道文立徵，我也就没事了。那样你就得再费许多周折，我也对不起牺牲的战友。”韩去非同志一九三七年起就任临郯中心县委书记，因而临沂、苍山地、县党史办都请他写党史和回忆录。他说一定会实事求是地把老同志们都写进去，包括文立正在内。他还叙述了让我寻找许衍梁同志的原委：“我怎么知道许衍梁认识文立正呢？说来话长，解放初期，我在济南市委工作，许任齐鲁大学教务长并济南市副市长，我们接触较多。有一次打扫卫生，他穿一身蓝工装，我想他家境富有，并无作工的，又未接触工厂，怎会有工装呢，深感奇怪，便玩笑说：‘你这身工装值得研究！’他说：‘的确值得研究。’接着他便把与文立正是同学，在辅仁同住一间宿舍，立正南下济南在他家住过，最后是把零散东西撂在他家而参加革命的事讲了，并说这套工作服就是文立正送他的。当时我没插话，只注意听着，他谈了许多具体事，可惜年深日久，都记不清了。听完，我告诉他立正已经牺牲了，并嘱把烈士遗物妥善保存，后来他果然将几件纪念性遗物，连同撰写的小传送交济南市府保存。”韩去非同志对我说：“你在临沂活动能力真不小，拐弯抹角找到了

我。"我告以费尽周折的经过，"自从打听到您在上海，就想通过市革委找您！"他说："那时我们都是黑帮，找不到。"我说："是的，材料寄到上海市革委会组织组，退了回去，批条上写着要通过组织联系云云。无奈，我又找临沂地革委，当时正是批林批孔闹派性的高潮，两个多月连封信也未发出去，更不可能有结果。经几番周折，终于在热心同志的帮助下，找到了苍山物资局的于光明同志，这才找到了您。"

这一次，我还到上海华东医院看望了病中的朱道南同志。他已年过八旬，早年投身革命，参加过广州起义，是革命老前辈。他见到我后，紧握我的双手激情满怀地说："我听到你来上海，很好，我们多年通信，今天终于能见上一面，十分高兴。我曾考虑过，立正同志许多事迹不为人知。"接着卧在病榻上的道南同志回忆了一九三八年春在郭子化同志处与立正同志相识，后来立正同他到五旅、鲁南人民义勇总队，办青年训练班等经历，还说到应邵剑秋同志的请求，派立正同志去帮助第五大队，并带领这支部队走上革命道路，成立运河支队，立正同志作了大量艰苦的工作。他告诉我："一九三八年秋冬，CC分子陈中柱等想以邵剑秋的第五大队作为向上爬的资本，把队伍骗到苏北淮阴，当时经我与义勇总队总队长张光中同志等商议，决定立正同去，以便掌握部队。到了那里，CC分子露出了本来面目，立正同志等带领一部分坚定的战士返回根据地，行至邳县被石友三部缴械，幸亏张友渔同志在该部作统战

工作（任政治部主任），在他的帮助下，立正同志等三人得以回到根据地，找到我，说明情况，问我怎么办？我们作了研究，决定让立正同志仍去帮助邵剑秋整理队伍。这一段历史不为人知，但你那里都有材料。我想，是否以你、我两人名义整理一下，枣庄、济南都很需要，我写了一个，很没有味道。”我返回单位以后，琐事繁多，疲于奔命，竟未及遂朱道南同志之愿，而他却于一九八五年三月以八十三岁的高龄谢世，酿成终身憾事。

那次谈话中，道南同志很感激李锐同志对立正同志补认为烈士一事给予的关心和支持。他说：“衡山这方面的人，受‘四人帮’的流毒太深，对革命烈士毫无一点感情，当时我真气愤得很。幸亏李锐同志热情帮助。”我说：“我在衡山民政局听说您为此颇为生气？”道南同志说：“他们总怀疑这也不对，那也错了。怎么会错呢，立正同志的父亲文九德曾是唐生智第八军的一个团长，一九二六年任黄埔军校长沙第三分校的步兵大队长！”我问：“您见过我的舅父？”他说：“他是我们的大队长。以后巧同立正同志一起工作，谈起来才知道文九德是他的父亲。那个人并不坏，当时倾向进步。”我也说明一九三九年我舅舅文九德因与上司意见不合，电辞回乡，开山植桐，办小学，开纸厂，倡导种小麦，在地方上也颇开明。

李锐同志是文立正烈士的挚友和入党介绍人，在十年动乱中，他在京郊狱中单监生活时，曾作绝句《哭文立徵》纪念烈士，寄托哀思之情。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过后不久，

一九七九年一月，他回京复职，从我的信中得知为文立徵同志办理补烈手续之难以后，给予了极大的关心。自一九七九年一月起，他在繁忙的工作中，先后为此给我写过廿多封信，足见他与烈士的深情厚谊。三十年代的长沙一潭死水，使他和烈士成为莫逆之交，走向革命之后，介绍立徵入党。

在当时的条件下，我深知李锐同志对补认立徵为烈士一事的关键作用，曾费尽心机，终未找到。历史不负有心人，邵剑秋同志于一九七八年十二月通过曾星五同志找到李锐同志，于一九七九年一月五日写出第一份证明材料。一月底我收到后，慑于衡山民政局的种种借口，感到略简单了一点，因而于一月末、三月五日及四月一日三次致信李锐同志，诉说查询事之不易，衡山民政局有关同志“左”的影响之深之固。同时寄上一本调查材料的复制件，请他考虑，详为证明。四月七日他回信说：

> 四月一日信收到。我是今年一月六日回到北京复职的。春节前后到长沙探亲住了半个月，回到北京即上班，两部分开，忙得不可开交，随即生病，到医院住了五周，住院时仍半天甚至整天办公。你寄给我的那包有关立徵的材料，是从长沙回来后见到的，但来不及详看，直到收到你的来信（刚从医院出来），才细看了你那封长信。这个情况希能见谅。
>
> 一月五日离合肥时，曾星五同志来访，我匆匆写了那份证明材料，按照惯例，以为曾已将此材料转到

湖南，问题就解决了。所以我春节回长沙时，就没有为此事再去找湖南有关部门去探问或关照。在长沙住了约半个月，每天人客川流不息，又是因私事返回家乡，各方面变化很大，这也是没打算为立徵事再作进一步落实的原因。

现在因为工作太忙，实无法按你所列提纲再详细写个材料寄你，由你转湖南。为使事情快点落实，建议你将我在合肥写的那个简单材料立即寄去湖南（说明晚寄的原因，或将我这信附上）。同时，我再为立徵写个简单材料交来京汇报工作的中南水电勘测设计院院长李善民同志（他是在湖南工作的老同志）带回长沙，交给省民政局，当面交代请他们尽快解决。

立徵是我岳云中学的老同学、老朋友，是我介绍入党的。三八年三月从武汉到徐州时，亲自介绍他进入山东敌后的。直到一九四九年六月南下湖南时，才以金明同志（郑琳的爱人，当时湖南省委副书记）处得知他已牺牲了，曾作过一首绝句悼念他：

寇逼徐州入鲁先，得知消息换人间；

忠魂定不回衡岳，日出当观泰岳巅。

立徵的弟弟立徽，比我们低两班，我还记得他的模样，人还在，且任金门副司令，当从北京有关方面了解，看能否作点什么统战工作。

我在岳云时名李厚生，现仍回到电力工业部管水电工作……

与上信相隔六天，便收到李锐同志前述的“另一简单材料”，即“致湖南省民政厅并衡山县民政局的信”的副本，包括六个方面二千余字，详细说明了衡山民政局长期“存疑”的问题，信中要求省、县两级民政部门“尽快办妥文的烈士追认手续，使他的家属亲人得到安慰”。但好事多磨，李锐同志的关心，一时并未引起有关方面的足够重视，一拖再拖。当得知这些情况后，于这年的十二月十七日，李锐同志来信嘱我另作他图，他说：

文立徵同志补烈士手续事，按理自然应当没有任何问题了。如果至今没有得到回信，请你为此事向程子华同志写报告，简述前后经过（过去有多少负责的老同志——职务姓名等——写过证明，现在我的证明——请附上我写的副本——发出后又半年多无回音等等），请程嘱湖南省民政局急办此事，寄给我，由我再附短信与程，我请他批办，这样就可以了。

文章（按：指我建议他写纪念立徵的）我是想写的，不过不知哪一天能写出，写好后当寄湖南的刊物发表。这样比较妥当一些。前信已提到过去曾作过一首怀念立徵的小诗，或者就从这首诗写起。

文立徵烈士的补认烈士手续，当我们（许多老同志、烈士弟妹等）同衡山民政局在办不办的马拉松式对抗赛中，李锐同志继续给予关心。为释李锐同志对老友之念，我于三月一日将珍藏多年的烈士遗墨——十五封家书寄奉，并汇报补认烈士手续仍不见分晓。一九八〇年三月十八日他

复信中说：

信与立徵遗墨已收到。睹物思人，不胜感慨。

我日常工作甚忙，又常出差，纪念文不知哪天能动笔。今年是“一二·九”卅五周年，或许将立徵遗墨交哪个刊物届时发表。总之，此事我责无旁贷。

你的报告已转程子华部长，他们已经批办。我设法再去查问一下湖南办了没有……

一九八〇年七月，我回湖南探望病中的老母，就便到衡山民政局和湖南省民政厅了解此事进度，民政局的同志此时态度已经转变，告诉我民政部已批催，现已经衡阳地区民政局转省民政局待批。他们还说衡山县委打算收集文立徵同志的史迹，将展于毛泽东同志考察农民运动旧址——衡山康王庙中。于是这年八月二十日省民政厅终于批复：“关于追认文立正同志为革命烈士的问题，根据调查材料，文立正同志是革命烈士，鲁南早已认定，临沂县烈士陵园有他的名单和史料，不需要再办批准手续。待一九八一年统一换证时，再补发牺牲烈士证明书。”（按：这个证明书迟至一九八三年底才发下来。）我将这些情况写信向李锐同志报告，他回信给我极大的鼓舞、信中说：

四月一日信并照片收到，三、四月份都出差，前几天才回来。你为立徵补烈事，多年奔波，付出巨大劳动，很使人敬佩。此种锲而不舍的精神，正是今天青年一代所要学习的。请你考虑，你可否将你十多年来办此事前前后后如实写出，如类似报告文学体裁则

更佳。其中可以贯穿两点：文立徵其人其事；作者与证明人之热心为立徵补烈事而积极活动与提供材料（包括你到烈士牺牲地的调查等等）。当然可以附带将有关单位的“左”的思想及种种阻力写出来。你的文笔很流畅，写起来不费力。

立徵给弟弟的旧信已交中国青年出版社看过，他们准备摘一点点，印在烈士书信集中（这种书已出版过一集，每位烈士的篇幅有限）。我日常事务极忙乱，再写长信，恐力不从心。

如果你可以离开工作一段时间外出为立徵搜集资料，或请其他人帮忙当然更好。

济南副市长许衍梁是立徵的辅仁同学，一九三七年八月至十月在济南时，我同立徵到他家去过（那时我曾改名王某）。你还可以向他征集立徵在辅仁时的情况。解放后我一直未同他联系过，他可能也不知道李锐就是当年的王某。

此后，我陆续收到李锐同志寄来的《龙胆紫集》、《中国青年报》上所撰纪念文、《一二·九运动在武汉》及《怀念十篇》等有纪念文立徵烈士文章的书报。一九八四年一月九日李锐同志于《人民日报》撰写《纪念齐白石》一文中，也提到好友文立徵：“我是一九三四年才知道齐白石的名字的，那时我在武汉读书，收到在北平读书的好友文立徵（一九四五年初在鲁南游击区牺牲）来信，说他请齐白石刻了一方图章，高兴得不得了。”上述文章对烈士的史迹，对老

一辈革命者为了民族的安危、国家的振兴和人民的幸福，而追求真理、不怕牺牲的高风亮节，都作了不同侧面的介绍。

一九七四年，正是我日夜盼望得到老同志们来信的时候，在梦中，我多次“寻”着了立徽表兄，其中两次至今记忆犹新。一次是他笑容可掬地对我说，他已经牺牲，住在一个湖中，随葬有笔记本、挂包之类。我见他在湖底一口宽大的棺材里慢慢坐起身，那笔记本是粗纸线装的，看到里面密密麻麻的、熟悉的铅笔字，激动地惊醒。另一次是我“找”到一个乡村小镇的石头街上，这里满目萧条，弥漫着战火消烟，一位陌生人在得知我是寻找表哥以后说：“你表哥已不在这里了，但书店有他的书，你去查查。”待我赶到书店，已是上门板收市的时刻。这梦中“牺牲在湖边”、“有他的书”等情节后来都为事实所印证。这也许是今天科学研究中所称的生物电流吧，是思虑高度集中的一种特异反映。英国剑桥大学的哈钦森教授，曾经征询过许多科学家，有百分之七十的人一致回答，在创造性活动中，梦境给予灵感。在睡梦中获得对疑难问题的解决不乏其例，真是“梦也助人”。

我，烈士的表弟，寻找烈士史迹的当事人之一，应该感谢有关单位的组织和诸多老同志的帮助，才使此事历经二十年终于有了结果，加在烈士身上的诬蔑之词，统统被推倒，烈士的继母得以享受烈属待遇，烈士弟妹们再不必为一个下落不明的哥哥而惶恐，我的心里犹如流过汩汩清

泉。一九八一年二月八日，我致李锐同志信中提到："我因立徽表兄家这一'复杂'社会关系，在'左'倾的日子里，尽管忠于职守，小心翼翼地工作，仍然诸事不顺，命途多舛，平生满意事，几达绝无境地。唯有查清立徽表兄史迹，与您们老同志们通信求教，才得到精神寄托。"事实就是这样。

现在，堪可告慰烈士在天之灵的是：在原籍，得以恢复他的真实面貌，再不是"在外干坏事而下落不明的人"；而在牺牲地，也不再是"无籍贯"烈士。山东滕县政府决定为文立徽同志迁坟树碑，安葬于烈士陵园；枣庄市和临沂地委党史办公室正在收集烈士史迹；烈士当年浴血奋斗的微山县，树立起运河支队纪念碑，其中文立徽是重要人物之一。

一九八六年一月十七日

重读张闻天同志的《庐山发言》

去年九月刘英同志来信说，“闻天同志含冤去世已经八年多了。明年是他的八十五周年诞辰，有关方面计划为他出版一本纪念文集。你和闻天同志同在庐山受难，很希望你能写一篇文章。”不久前，《张闻天选集》编辑工作小组将《选集》文章送了一套与我，其中就有闻天同志在庐山的那篇有名的长篇发言。重读之后，一方面引起往事的回忆，同时更加深了对闻天同志的敬重。

大家知道，一九五九年庐山会议的后期，批判彭、黄、张、周“右倾机会主义反党集团”时，闻天同志被目为“武文合璧，相得益彰”的“副帅”，受冲击也是极为严重的。攻击的靶子就是这篇讲了三个小时的《发言》。此时此刻，闻天同志为什么要作这样一个长篇的发言呢？

庐山会议的前期是所谓“神仙会”，原来只准备开十几天，产生一个会议的《纪要》就结束的。会议的基本精神是毛主席对当时形势估计的三句话：“成绩伟大，问题不少，前途光明。”大家遵循少奇同志的两句话：“成绩讲够，缺点讲透。”各抒己见，有的讲成绩多些或者大话还多些，有的

着重讲了缺点或面临的困难。总之，无甚拘束，开始确有点象"神仙会"的味道：白天开会游山，晚上散步跳舞。大概在七月十五日左右，《纪要》草稿和彭总的信印发之后，形势就向紧张方面变化了。这时，有些同志认为刮"共产风"等问题已作过检查，正在改正，就不大再愿意多谈、多听缺点，怕因此"泄气"，今后难以维持继续"大跃进"的局面。有些同志则感觉还有一种"压力"，即难以将缺点讲透，认为不把事实和后果摆清楚，找出其根源，认真总结好经验教训，就不利于今后的工作。多数人的观点比较持中，都急着下山抓工作。大概在一九五八年北戴河会议决定钢翻一番之后，闻天同志就密切注意"大跃进"发展的形势了。外交部机关炼钢，由于没有原料，他就下令停止。一九五九年三月在两广参观时，他作了很多调查研究，注意到劳动力和运输的紧张，许多小高炉并未点火，也还遇到浮夸以及粮食和副食短缺的情况。在庐山会议前的两次政治局会议上，他一再陈述自己的意见，认为在宣传中要承认缺点和错误。他同彭总在会前和会议期间（他们住处靠近）有过接触，许多观点相似，"意气相投"。他还找计委和财贸部门的负责同志了解情况，也找地方的负责同志如周小舟等交谈。他对"大跃进"有一套看法，确是忧心忡忡的。彭总的信印发之后，有一天在田家英的住处，我们一伙谈得来的人聚到一起（有胡乔木、周小舟、田家英、吴冷西等和我，还有陈伯达），正谈论信的内容时，闻天同志进来了，同我们一起议论起来。记得我还开过一句玩笑，说

我们这是“低调俱乐部”（所幸者，这个如追究其名称出典就不得了的玩笑，在批斗高潮时未揭发、坦白出来）。乔木同志马上接着说：不是，不是，我们这是马克思主义俱乐部。这个细节可以说明我们之间谈话的倾向。这是在庐山会议时，我同闻天同志主要的一次接触，因为我们没有编在一个小组。

我没有在闻天同志直接领导下工作过。一九四八年二月，我从热河调到哈尔滨，在东北局工作。五月间，闻天同志离开合江到东北局任常委兼组织部长。我曾列名于他所领导的巡视团为巡视员，但一直没有参加具体工作，只是在列席东北局的会议时常听他的发言。这个期间，闻天同志着意研究经济问题，曾对东北各种经济成分的历史和现状进行过多次细致的调查，常率领巡视组深入基层，用了很大精力研究全国解放后的经济建设方针。一九四八年八月，他受东北局委托，在东北城市工作会议上作了总结，接着又为东北局写了《关于东北经济构成及经济建设基本方针的提纲》，科学地分析了当时东北存在的五种经济成分（国营、合作化、国家资本主义、私人资本主义和小商品）及其相互关系，并据此提出了党对经济建设应该采取的方针路线。应当指出，在这个重大问题上能作出如此全面系统分析的文件，《提纲》在当时可说是绝无仅有的，因此受到了中央的重视。它的许多思想被吸收到一九四九年三月召开的七届二中全会的文件中。到一九四九年七月这个期间，他还先后就供销合作社的方针、土改后农村经济

的发展方向和对待私人资本主义政策等问题，向中央和东北局写了四个文件。其中允许少数新富农的存在和一定程度的发展等意见，曾受到过非难，但他并没有轻易放弃这些经过深思熟虑的意见。一九五四年电力代表团到苏联参观时，他在大使馆接见过刘澜波和我，那天见到李德伦来使馆，知道他当时在学点音乐，因此使我产生了一种他在苏联时颇有“闲情”的感觉。在庐山会议前期，毛主席同我们几个人的一次谈话中，谈到遵义会议召开前，先将洛甫、王稼祥争取过来的故事，还说到派洛甫到苏联当大使，来不及事先征求他的意见之事。这就使我证实了当年的这种感觉：闻天同志还是想在国内做事的，而且仍然对经济有执着的兴趣。一九五六年反急躁冒进后，他就在驻外使馆谈过，国内有冒进，供应紧张，原材料不足，盲目追求高速度，是主观主义，忘记了国家还很落后。他对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不准讲反冒进，是有抵触情绪的。因此，闻天同志在庐山作长篇发言，从政治经济学的角度，对“大跃进”提出全面的看法，是很自然的事情，是题中应有之义。他比较全面地掌握了实际情况，有经济理论修养，因而能抓住问题的本质，站得高，看得远。何况他是过来人，过去犯过严重的左倾错误，按照他后来检讨时说的，对“左”的东西特别敏感；他又是中央政治局的候补委员，在这样重要的历史关键时刻，有责任向党中央阐明自己的看法。

这个长篇《发言》是七月二十一日在华东小组会作的(组长是柯庆施)，距离毛主席七月二十三日作反“右”报告，

只有两天。这时对《纪要》特别是对彭总的信，非难已经很多，如说这封信的矛头是“针对主席”的，“小资产阶级狂热性就是左倾路线错误了”，“路线错误那就要更换领导了”，种种说法都在传开，形势已经比较紧张。正是在这样严重的时刻，闻天同志作为一个彻底的唯物主义者，以鲜明的态度，确凿的事实，科学的语言，冒险犯难，极言直谏，完全支持已经遭到非难的《纪要》和彭总的信，作了长达三个小时的发言。后来批斗他时，说他的发言对彭总的信作了“全面的系统的发挥”，是“进攻总路线、大跃进和人民公社的反党纲领”。小组会的发言，《简报》中一般只刊要点。七月二十三日之后，这个“副帅”的《发言》记录稿就全文印发下来。批判时有人统计：全文八千多字，而成绩只有二百七十余字；用了三十九个“但”字（“‘但’字以前虚晃一枪，以后便大做缺点的文章”），十三个“比例失调”，十二个“生产紧张”，一百零八个“很大损失（或损失）”，以及“太高”、“太急”、“太快”、“太多”等一大批“太”字。

《纪要》讲了“大跃进”三个方面的缺点，即比例失调，“共产风”，虚报浮夸和强迫命令，但没有对这些缺点展开论述。《发言》说是对《纪要》所谈缺点补充一些意见，实际是对“大跃进”作的一个比较全面的分析和总结：对暴露出来的严重缺点，引起的严重后果，以及产生缺点的原因，作了系统的论述；对政治与经济的关系，三种所有制的关系，民主与集中的关系等根本问题，作了理论的探讨；最后归结到党内民主作风的重要。

当时讨论中有一种较为普遍的意见,即前述多谈缺点,就会泄气，会打击群众的积极性。《发言》针锋相对地说,缺点定要讲透。缺点要经常讲，印象才会深刻。我们那时犯盲动主义，毛主席就经常讲，所以对缺点要采取郑重的态度，不要采取轻描淡写的态度。马列主义者鼓励积极性靠真理；现在我们觉得有些虚，就是真理不够，增产数字报了那么多，实际上没有那么多。马克思说过，革命时容易办蠢事。列宁也说，要正视这些蠢事。

《发言》指出，关于缺点的原因可以讲得具体一些：比例失调是指标过高，求成过急；“共产风”主要是所有制和按劳分配两个问题；虚报浮夸、强迫命令是不允许讲话、不允许怀疑所致，否则就扣“怀疑派”、“观潮派”等帽子。讲缺点，还应讲具体后果，这样才能取得经验，针对后果提出纠正办法。如钢铁指标太高,其他指标也被迫跟着上,造成全面紧张和比例失调；基建战线太长，“三边”（边勘测，边设计，边施工）做法，浪费太大，工程质量也差；新增工人太多，招二千多万，人浮于事;企业产品不成套,任务朝令夕改，不能实现价值；原材料缺乏，经常停工待料；产品质量下降，技术水平下降，不注意设备维修，等等。从而造成大量资金和物资浪费、积压,市场供应紧张,物资储备减少，财政结余用光，外贸出口不能完成等等恶果。“全民炼钢”不单赔了五十个亿，最大问题还在九千万人盲目上山，使农业生产受到损失，丰产也不能丰收。什么事都提倡全民，甚至要求“全民写诗”，搞得老百姓不胜

其烦。

关于公共食堂问题，当时议论甚多，河南认为食堂有八大好处，全省没一个垮的。大多数人还是要保食堂，以为这是一个社会主义乃至共产主义的标志。报纸上曾大批“资产阶级法权”，批按劳取酬。《发言》建议取消“吃饭不要钱”,改为实行社会保险，照顾少数丧失劳动力的人。明确提出：我们不能搞平均主义，还是要按劳分配。现在有些人把供给制、公共食堂等同于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其实这完全是两回事，社会主义并不一定要采取供给制、公共食堂这种办法。社会主义要贯彻按劳分配，就要强调保护消费品个人所有权，这到共产主义社会也是存在的。对于穷和富的观念要慢慢改变。劳动好，对国家贡献大，所得报酬就多，生活就富裕，富是由于劳动好。这样的富对个人好，对国家更好，它是应该的，光荣的。由于不爱劳动，好吃懒做而生活穷苦，是活该，是可耻的。《发言》还精辟地谈到当时流行的“共产主义风格”的宣传问题：共产主义风格、为集体牺牲个人的思想，这些可以宣传，可以用来要求少数人、先锋队、先进分子，但是不能当做制定现行政策的根据。如果社会主义不能满足个人物质、文化需要，就没有奋斗目标，社会主义也就建设不起来。

关于产生缺点的原因，《发言》同意《纪要》说的，主要是由于缺乏经验。但不能以此为满足，而应该从思想观点、方法和作风上去找原因，这样才有利于总结教训，避免今后重犯错误。这也是他这篇发言的主旨所在。关于主观主

义和片面性，《发言》专门作为一个问题提了出来。讲到主观和客观、精神和物质的关系，强调主观能动作用是对的，但强调过了头，以致不顾实际可能性，这就成了主观主义。好大喜功也是好的，但要合乎实际，否则就会弄巧成拙，欲速不达，好事变坏事。从主观主义进而谈到政治与经济的关系。领导经济光政治挂帅不行，还要根据客观经济规律办事。有的人根本看不起经济规律，认为只要政治挂帅就行；有的人公然违反客观经济规律，说是不用算经济帐，只要算政治帐。这是不行的。今天总结经验，尤应该从经济规律上进行探讨。

综合平衡的问题，当时也是很有争论的，有的人以“平衡是相对的，不平衡是绝对的”这一法则，为“大跃进”出现的严重失调辩护，甚至认为就是要冲破平衡，不平衡是好事。《纪要》中“综合平衡”一节是我参加起草的，内中有四句话：“统筹安排，供需协调，瞻前顾后，合理布局。”记得因字数所限，没有展开讲透。《发言》明确地说，经济建设就是要找出相对平衡，利用相对平衡，按照相对平衡办事。我们利用相对平衡制定经济计划，要使之大体是个平衡的计划。遇到某一方面被突破，便要做到及时平衡，这就是积极平衡。还建议在《纪要》草稿中加一条“经济核算”。任何产品，都要讲成本；要算帐，这跟“算帐派”是两回事。用毛主席的话，经济工作要越做越细，就是要精打细算。不算帐，社会主义是建设不起来的。有一个时期，我们的建设有不计成本、破釜沉舟的偏向，说是要算“政治帐”。

其实，“政治帐”同“经济帐”是统一的，不能把它们对立起来。我们的国家还是一穷二白，资金有限，必须根据节约原则，严格控制资金使用，最合理地使用每一块钱。毛主席提出要大家学政治经济学。领导经济建设，不懂或不熟悉经济规律是不行的。中国的经济建设有其特殊性，但是有关的普遍规律仍然起作用，问题在于两者相结合。政治经济学，不仅高级干部要学，广大干部也要学。

“大跃进”时期，不按科学精神办的事太多，报纸上放肆地报道，随便吹牛，放卫星，超外国，引起很大的混乱，国外影响也不好。庐山会议前夕，在外交部的务虚会上，闻天同志就讲过不要吹，说有些东西我们自己认为是正确的，但究竟正确与否，还有待实践证明。因此，《发言》强调，必须学习科学技术知识。许多东西我们缺乏常识。不能随便把原有的东西推翻，更不能随便吹牛。生产技术措施没有科学根据，光用土办法蛮干不行，蛮干是要死人的。对于已有的科学成果要重视。“一切经过试验”，试验确实成功了，再推广不迟。但实验室里成功了的，还不等于在生产中也已成功。赶超世界水平之类的话，要谨慎，的确比人家高明再讲也不迟，而且以自己不讲、让人家替我们讲为有利。他觉得当时我国的国际威信已经受到影响。

《发言》针对性极强，如此明快而尖锐，几乎毫无顾忌。最后谈到根本关键还在党内民主作风问题时，尤其如此。庐山会议之前两个月，四月上海会议时，毛主席曾提倡海瑞精神，鼓励大家讲话；说不敢提不同意见，无非是怕撤

职，怕开除党籍，怕离婚，怕坐牢，怕杀头，等等。在小组会上，闻天同志也曾谈过党内民主生活不正常的问题。《发言》中这一段话，今天读来也是有现实意义的："主席常说，要敢于提不同意见，要舍得一身剐，不怕杀头等等。这是对的。但是，光要求不怕杀头还不行。人总是怕杀头的，被国民党杀头不要紧，被共产党杀头还要遗臭万年。所以问题的另一面是要领导上造成一种空气、环境，使得下面敢于发表不同意见，形成生动活泼、能够自由交换意见的局面。"《发言》还特别欣赏《纪要》草稿中这一段话："必须在全党干部中间提倡说老实话，提倡实事求是的讨论。对于有些问题的认识一时可能有参差不齐，只要大家在实际行动中遵守纪律，那么这种现象是完全正常的，允许的。应该通过真正同志式的交换意见，逐步达到一致，不要采取粗暴武断办法，不要随便扣帽子。"《发言》说："这个问题对我们当权的政党特别重要。我们不要怕没有人歌功颂德，讲共产党光明、伟大，讲我们的成绩，因为这些是客观存在的事实。怕的是人家不敢向我们提不同意见。决不能因为人家讲几句不同意见，就给扣上种种帽子。是否提错了意见，就一定是观潮派、机会主义、右派呢?这也不一定。一个人是否真有问题，要经过一定时间观察。对一个人，经过长期观察其言论、行动，证明他确实是右派或观潮派，再扣帽子也来得及。这样做，对团结干部有利，对工作有利。总之，民主风气很重要；要造成一种生龙活虎、心情舒畅的局面，才会有战斗力。过去一个时期就不是这样，

几句话讲的不对，就被扣上帽子，当成怀疑派、观潮派，还被拔白旗，有些虚夸的反而受奖励，被树为红旗。为什么这样呢？为什么不能听听反面意见呢？刀把子、枪杆子，都在我们手里。怕什么呢？真正坚持实事求是、坚持群众路线的人，一定能够听，也一定会听的。听反面意见，是坚持群众路线、坚持实事求是的一个重要条件。毛主席关于群众路线、实事求是的讲话，我认为是讲起来容易做起来难，真正要培养这种风气不容易。”

这段话讲得多么好啊！往者不可谏，来者犹可追。我们每一个干部尤其是领导干部，要永远记住这段话的精神。当年闻天同志赤胆忠心、不顾个人安危的这种精神，实在值得我们学习。

《发言》的最后，才提到彭总的信，认为信的中心内容是希望总结经验，本意是很好的。针对有些人对信中某些措词的挑剔，《发言》为之辩解。特别是关于最敏感的“小资产阶级狂热性”提法，为最受攻击之处，就是赞成彭总的信的精神的人，也都不敢表示同意这个说法。唯有闻天同志一个人是这样说的：“这个问题不说可能更好一点，说了也可以，究竟怎样，可以考虑。但是，刮‘共产风’恐怕也是小资产阶级的狂热性。”

七月二十三日之后，硝烟滚滚，风云突变。在七月二十四日的小组会上，闻天同志还是坦然的，发言仍旧从容不迫，讲出心里的话：“我没有经验，是从旁看的。同时觉得你们不大愿意听，我们要讲缺点，你们要讲成绩，这主

要是看问题的角度不同。大家把不同的看法，不同的意见，经常讲出来，经过争论，认识一致了，问题就解决了。这样的会开得很有味道。现在顾虑的人还是不少的。彭总写了一封信，引起大家争论，能把问题看得更清楚。不怕扣帽子，不乱扣帽子，不怕争论，有话就讲，大家认识一致了，没有负担了，这就是心情舒畅。有什么讲什么，就没有什么紧张了。我有时也想，不关我的事，我讲不讲，我是搞外交工作的，讲了以后还有些后悔，我何必讲呢！紧张状态的确是存在的，养成民主作风很重要。这里都是负责同志，下面更严重些。”

就在他的《发言》被当作靶子印发的当天，我们还有过一次偶然的接触，他问我发言稿看了没有？我说看了，那些缺点都是存在的。在当时的情况下，也不便于再谈什么了。

七月二十三日之后的一两天，闻天同志同彭总碰面时，他们还相互谈到：讲缺点竟如此危险。我们总结经验，人家扣帽子。在后来的“检讨”中，闻天同志交代，他与彭总议论的要害，是关于领导作风问题，如何避免一言堂问题。如果只好听好消息，就必然助长下面报喜不报忧，因而容易受蒙蔽，容易头脑发热，也容易骄傲。他们还从南宁会议后个人威信的发展，谈到树立集体威信的重要，以及应防止损害集体领导原则的事情发生。

批斗升级之后，“不仅对事，还要对人”。八月二日，《给张闻天的信》印发了。闻天同志希望不扣帽子，不乱扣

帽子，然而，千钧重帽扣下了：陷入那个军事俱乐部去了。《发言》被指责为："安的什么主意？那样四面八方，勤劳辛苦，找出那样漆黑一团的材料。"闻天同志被认为"旧病复发"，遭到尖刻的讽刺与奚落。枚乘的《七发》随之印发，害的病与楚太子相似，这种病"可无药石针刺灸疗而已，可以要言妙道说而去也"。右倾或左倾机会主义这类毛病，是有历史和社会原因的，"所从来者至深远，淹滞永久而不废。"治疗之法，"批判从严"；"讲跃进之必要，说公社之原因，兼谈政治挂帅的极端重要性。"

八月上旬，原来六个小组并成三个大组，分头批判彭、黄、张、周等人。这些"批判从严"之处，就不必多说了。

在后来的"检讨"中，在社会主义经济建设问题上，闻天同志总结了以下六条，为"两条路线——总路线和反总路线的斗争"，他说自己从这六个方面反了"总路线"：

一、强调发展生产力，即把"以最少的劳动消耗，取得最大的经济效果"，把建立社会主义物质技术基础，作为建设社会主义的基本任务。这是把经济放在第一位，这是"三分政治，七分经济"，而政治也只是为了经济。

二、强调改善人民生活福利，强调社会主义国家要同资本主义国家在物质生活水平上，进行"和平竞赛"。

三、强调利用物质刺激，即利用工资等级、奖金制等，来刺激劳动人民和知识分子的生产积极性。

四、强调价值规律及其他经济规律的作用，强调一切

生产计划都应服从于经济规律，而不是使经济规律服从于生产计划；强调用经济方法去领导经济；以及强调经济核算、利润指标等等。

五、在生产管理上，强调厂长、工程师、专家等的集中管理，反对在生产中大搞群众运动；反对不断破坏"旧制度、旧规章"；从此也强调了要向资产阶级管理生产的经验学习，向资产阶级专家学习。

六、主张"平衡论"、"按比例论"，"生产渐进论"，反对"冒进"，反对大跃进。

总结以上所说，闻天同志"检讨"说："这条右倾机会主义路线是同党的总路线针锋相对的路线，其目的是要反对和修改总路线，是要把高速度、大跃进的总路线改为引导到稳步可靠的路线上来。结果是不要搞群众运动，取消大跃进。"

当年闻天同志写这些"检讨"时，相信他心中是坦然的，当然也是痛苦的，因为硬要在纸上把自信是正确的东西写成是错误的东西。历史是无情的，也是公正的，谬误终归谬误，真理终归真理。不是吗，我们的国家现在不是远比闻天同志二十六年前的设想更健康地在生活和发展吗！

从上面详细介绍的闻天同志的《发言》和"检讨"来看，当然《七发》等是无的放矢，恰恰相反，楚太子早已"霍然病已"。闻天同志如不是早在遵义会议开始，特别是延安整风期间就将"旧病"治愈，他怎么可能在庐山作这样一篇精辟的切中时弊的发言呢。我听见杨尚昆同志谈过，在江西的

后期，闻天同志同博古、李德就有争论的，就已经将他挤到政府部门，离开了中央的核心。现在从公布的文献上已得到证实。这也说明，他在遵义会议上的转变，不单是毛主席争取的结果，而是早有自己的觉悟做基础的。遵义会议之后，他对毛主席是信服的；在后来历次重大政治关节时，他同毛主席都是一致的。据说，曾因此遭受过讥讽。当时，闻天同志还处在中央负总责的位置，他这样义正词严地回答："真理在谁手上，就跟谁走。"据不少同志回忆，毛主席当时曾对闻天同志作过这样称誉的戏言："你是一个开明之君。"但他决不是只求形式地"紧跟"，更不是一味盲从的人。延安整风运动开始时，接受毛主席的教导，他深感有深入实际，深入群众，对中国社会作周密调查的必要，主动要求到基层去。一九四二年一月，他率领调查团到陕北的神木、府谷、米脂、绥德和晋西北的兴县等地，对农村、城镇的生产和社会关系进行全面调查，长达四百零二天。他亲自主持调查会，长时间地访问农民、基层干部和各阶层人物；查阅、收集大量有关经济和社会的文字材料，家谱、碑记都不放过；亲自或指导其他同志共写出十九篇调查报告。这说明闻天同志一旦大彻大悟过来，何等诚恳地向群众学习，并且在以后的政治生活中一直坚持求真知的科学态度。后来他在延安主持编辑的《参考资料》，对国民党统治区和国际形势作具体分析，文章质量是很高的，许多论文是他亲自撰写的（至今我还保存着这些马兰草纸印刷的珍本）。东北地区土改运动中，同其他解放区一样，

一度发生过“左”的偏向。一九四八年三月，东北局为此召开过一个月的总结会议，自始至终我都参加了。闻天同志主持的合江地区的土改，基本上没有受这股左倾思潮的影响；关于团结中农，区别地、富，正确对待知识分子等，他都为省委写了文件，作了一系列合乎实际的规定，防止了可能发生的偏向。所以，闻天同志在王明路线统治时期所犯过的“左”的错误，早以自己的言行证明彻底清除了。他不仅没有再“旧病复发”，而且在党犯新的左倾错误时，能够坚决顶住，明确地、全面地从实际到理论，指出这种错误，分析其原因，提出克服的办法。可是，历史多么不幸，这顶沉重的“旧病复发”的帽子，直到他去世之前，一直戴在头上。然而他并没有就此中断对真理的探索，在庐山蒙冤之后直到十年动乱期间，他还撰写了几十万字的笔记和文稿。从中可以看到，他不仅始终坚持真理，不畏横逆，挺身捍卫马克思主义的纯洁性，而且从理论上总结了“大跃进”到“文化大革命”的历史经验，在中国建设社会主义的一系列重大原则问题上，有过许多真知灼见，同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中央的路线、方针、政策，何其相似。这是多么难能可贵啊！这种精神，多么催人奋进，永放光辉。

戊戌政变的第二年，一八九九年，被“放归”的黄遵宪，写过一首发感慨的诗：“滔滔海水日趋东，万法从新要大同。后二十年言定验，手书心史井函中。”表明了一代先驱的自信心。黄遵宪深信，他所赞同的那些维新变法的主张，虽然一时在高压之下受到了摧残，但是时间终究会证明它是

正确的，二十年之后一定会证明它是正确的。黄遵宪的期望没有落空。二十年后是一九一九年，这一年发生了“五四”运动，提出民主和科学两个口号，已经大大超越了戊戌时代那些维新志士的要求了。

闻天同志在庐山的《发言》，当时我是从心底里赞同的，觉得他比彭总的信讲得更清楚，而且作了理论的阐述。在当时的气氛下作这样一篇发言，不仅要有至大至刚的正气，而且要有理论上的自信。他当然是深信自己意见的正确性的。闻天同志在一生的最后时刻，以衰病之身，管制之严，仍奋笔痛斥林彪、“四人帮”的极左谬论，写出那些研究政治和经济，以及党内民主生活的战斗檄文，当然也必定是坚定的自信心驱使他写的。现在，历史的曲折终结了。闻天同志的这个《发言》和《选集》中其他文章特别是晚年所写文章的观点，已经被普遍接受了。这也是在时间过去了二十多年之后，才被承认其正确性的。现在，两个三中全会的文件比闻天同志当年所想的更是大大前进了。我们的国家在党中央的正确领导下，正在经历第二次革命，正在欣欣向荣地向国家现代化的总目标胜利前进。闻天同志在天之灵当会感到欣慰。在我们社会主义的中国，正确意见要过二十年才被接受的事，相信当不致再出现了吧。努力做到这一点，是我们后死者、后来人的崇高职责。

一九八五年六月

忆六如老伯

一九三九年“平江惨案”以后，湖南的形势日趋紧张，一九四〇年开始大批撤退干部。我走得比较早，是一九三九年最后一天到达延安的。到延安后想到的第一件事，便是去看望六如老伯。

李六如是我父亲的好朋友，都是平江东乡人，我家长寿街离他家献钟只有三十里，他比我父亲大概要小五、六岁。我父亲是一九二二年在长沙赋闲时去世的，那时我还不满五岁。母亲拒绝老家长辈的安排，决不回家乡去，艰难地带着三个幼小的儿女在长沙读书。母子孤苦伶仃，相依为命。由于母亲的经常念叨，关于父亲的一生，他的为人、好尚和品德，包括他有哪些要好的朋友，都深深印在儿女的心中。这不仅是一种人伦的眷念，在那个世态炎凉的社会，更是一种傲于世俗、支持上进的无形力量。

父亲的朋友颇多，有些高官、名流我见到过，但母亲常谈到的六如和竹雅（方维夏，也是长寿街人），我却从来没有见到过。因为北伐战争前，他们早就到广东去了，大革命失败后，他们是被国民党通缉的著名的“共匪”、“暴徒”。母亲告诉我们，父亲去世时，他俩特别伤心；他们为

人同父亲一样正派、耿直，都反对赵恒惕（一九二〇年到一九二五年湖南的督军兼省长），都寄希望于广东出兵。父亲是一九〇五年去日本留学的，是同盟会员，民国初年的国会议员，到广东参加过孙中山的非常国会。竹雅和六如也是辛亥前、后去日本留学的，竹雅还是赵恒惕省议会的议员。平江这个地方，清末即得风气之先，“五四”运动时有过群众性的反日斗争，尤其十年内战时，是湘鄂赣根据地的中心区域，斗争极其尖锐而残酷。国民党高喊“血洗平江”，实施三光政策，烈士之多，居湖南首位，全县人口由七十多万减到开国初的四十多万。母亲告诉过我们，六如老伯家的房屋和器物都被烧光和抄没，两个胞弟和两个侄儿被国民党杀害，一个儿子下落不明。六如伯的元配夫人是母亲的同学，她们一直保持着友谊。

我去看望六如伯是有充分的精神准备的，而他突然见到这个外貌酷似乃父的故人之子，自然十分惊讶和意外高兴。至今我还记得那表情和满口乡音：“呵呀，呵呀，想不到，想不到，你的姆妈好吗？”第一次见面，谈得多的当然是我，关于我自己，以及他所关心的外面情况和故乡人事。在延安六年中，除开“抢救运动”那一年多外，每年总要去看望他一、二次。延安生活苦，每去必留餐，“打牙祭”。他种了苦瓜，有时还杀鸡；苦瓜，辣椒炒鸡，这是道地家乡菜。我在《解放日报》工作时，一九四二年要写纪念辛亥革命的文章，特地去找他谈过他参加辛亥革命的事迹，对他的一生才有较多的了解。六如伯是我们党有数的几个老前

辈之一，他怎样走上革命道路及其曲折的经历，在清末老一代的知识分子中是非常典型的。难怪他后来非写出一部《六十年的变迁》不可。

六如伯的父亲是富商，他幼年丧父，资财被有权势的伯父吞没。"骤贫难改旧家风"，母子靠借贷卖田维持家计。他虽然饱读经书，获得应县考的资格，但两个弟弟后来却只能当学徒了。一九〇七年二十岁的时候，他结识了同乡凌容众。凌是同我父亲一道去日本留学的，也是父亲的好友，因为反对"取缔规则"，被日本政府驱逐回国。凌回来后即传播反清思想，办平江启明女校（我母亲就是该校师范部第一班的学生）。六如伯从凌那里知悉陈天华蹈海事件，并看到《民报》、《游学译编》、《嘉定屠城纪略》等反清报刊和书籍。从此，"报家仇"的愤恨转到清朝皇帝身上去了。"匈奴未灭，何以家为！"他抱着这样的决心，投笔从戎，一九〇八年到武昌参加新军，结识了同盟会会员刘复基（武昌起义三烈士之一）、詹大悲等，组织文学社，为负责人之一，从事士兵运动。武昌首义时，他被黎元洪委为第四镇十六标标统（相当团长），参加了阳夏战争。由于不满意标统职位，又觉得自己年轻，想出洋深造，几经请求，黎元洪终于同意，赠他三千元出洋费，每月另拨官费八十元，还补了一个"陆军少将"头衔。六如伯用这笔钱买回了过去的几百石田产。到日本后，他放弃了"想当督军"的初愿，热心议会政治，做起"议员梦"来。于是不进士官学校，进

了明治大学的政治经济系。后来一心读社会科学书，如《社会问题十讲》、《马克思经济学说》等，还读了《资本论》第一卷，特别受河上肇著作的影响很深。他说，这是他一生读书最多的一个时期。为了反对二十一条，还曾罢学回到湖南，做过宣传救国的工作。一九一九年十月毕业回国时，他的爱国思想中带有空想社会主义的东西，认为只有把全国占大多数的农民、工人教育起来，振兴实业，国家才有希望。这时正值“五四”运动兴起，他拒绝长沙官方的高薪聘请，回到平江，集资办了一个织布厂，用的是宜昌出产的脚踏铁机。由于军阀勒索，洋布倾销，不久工厂就倒闭了，还欠了债，只好又卖田产。“实业救国”、“教育救国”的梦想终于破灭。值得庆幸的是，他同时办的救贫工厂、工农夜校，以及农会、工会等，不仅使平江有了第一代产业工人，同时培养了平江最早的一代革命干部。我在延安时，还找吴创国老人谈过这些事。吴是平江人，裁缝出身，当年就参加了办工农夜校和组织工会等活动，是六如伯得力的助手。

一九二〇年八月，经济破产了，六如伯到长沙法政专科等校教书，但不甘于当个教书匠，于是在报纸上发表文章，到处演讲，倡导平民教育运动。他通过省政府、省议会和省教育会中许多朋友、熟人的关系，自上而下向各县推动，成立了全省平民教育促进会，被举为副董事长（董事长为赵恒惕省府的秘书长）。方维夏时任省教育会会长，给的帮助最多。通过平民教育运动，还推动四五十个县办

了县报，全省县报联合会由他任会长。在长沙城区，由工厂、基督教青年会等办的工人夜校达一百多处。

他还编了四本通俗的《平民读本》，于一九二二年出版，其中宣传了马克思的社会主义思想。这四本小书曾风行一时，一连印了四版，达几万册。他同我谈起这些往事时，说自己当初并没有鲜明的无产阶级意识。

一九二〇年到一九二一年的平民教育运动，是有影响的进步活动，自然受到毛泽东的注意，便派人与六如伯联系，他们一见如故。结识了以毛泽东为首的原新民学会中的骨干何叔衡、李维汉、夏曦、郭亮等，以后，六如伯所有的社会活动也就同团与党的活动结合起来，如一九二一年春，平江就办起了文化书社的分社。李立三到安源开辟工人运动，就是利用平民教育会的合法身份。由毛泽东、何叔衡介绍，一九二一年六如伯先入团，随后入党，那时叫做由“中学”升入“大学”，党对团是很秘密的。入党之后，六如伯任湘区（省委）文委委员，同时负责平江的建党工作。在建党初期，六如伯同毛泽东的关系是很密切的。他的元配夫人跟我的母亲话旧时就谈起过：毛泽东常来我们家，我给他洗、补长褂子都记不清回数了。

对平江来说，李六如是“星星之火”的第一个火种。一九二二年他发展了两个党员，一个是工会会长陈苐章（一九二八年被国民党杀害），一个是农会会长余贲民。他们两人由六如伯介绍同毛泽东见面。余贲民参加过辛亥革命，是

湖南新军的连长，武昌起义战役中负伤后，即回乡务农，“五四”运动时在启明女校任教，后来是毛主席率部上井冈山时主要的军事领导人之一，也是湘鄂赣根据地的创始人之一，一九三二年任湘鄂赣省委的军事部长。一九三三年负伤治疗时，他受到错误的肃反政策干扰，在关押中去世。六如伯专门写过《余贲民传略》。据许多老同志回忆，毛主席在长征路上，在延安，在北京中南海，多次谈到余贲民，赞扬他的忠诚和苦干精神。

一九二三年平江成立了第一个共产党支部，党员中有裁缝、木匠、中医和小学教员。一九二四年，有团员二十三人。平江人前往黄埔军校学习的，一至四期有三十二人，五至七期有五十五人。这年由共产党员为主建立的平江国民党，有党员一百多人。献钟党支部书记罗纳川（一九二八年牺牲，时为县委负责人）领导二千造纸工人罢工，取得胜利。一九二五年，党员发展到三、四十人，正式成立县委。在北伐战争前夕，平江即展开了轰轰烈烈的爱国群众运动。

由于党的经费奇绌，一九二三年，省委（湘区区委）派六如伯作为国民党湖南省党部代表赴广州，向国民党中央求援。先由叶楚伧、邵力子等帮助了一笔款子，后来又由廖仲恺等批准，每月接济湖南一千元。六如伯又找到谭延闿和湘籍军官鲁涤平、陈嘉佑、张辉瓒等，为党办的湘江学校募了一大笔款子。由于谭延闿等以为六如伯是十足道地的国民党员，坚决挽留。经过党的同意，他受任湘军

国民党特别党部常务委员。谭延闿任第一次北伐总司令时，六如伯被任为总部党政处长，在韶关行营曾拜见孙中山。六如伯留下的笔记这样记载了这次会见："孙中山询问了湖南的情形，我报告了夏曦在湖南发展国民党党务的概况。他赞许说：还是共产党行，肯干，三大政策是对的嘛。不联他们联谁？又说：辛亥革命到现在十三年啦，政权操在反革命手里，越来越腐败黑暗。"第一次北伐失败后回到广州，六如伯任第二军军校政治部主任。他在湘军中发展的第一个党员便是方维夏。以后在各个团也发展了党员，成立了特别支部，他任书记，由周恩来直接领导。第二次北伐时，他任第二军（军长谭延闿）第四师（师长为张辉瓒）的中将党代表，方维夏为谭道源师的党代表，军党代表是李富春。在北伐战争中，六如伯随部队在前线，经历了湖南、江西、安徽、湖北各次战役。第二次攻南昌时，他在前线督战几天几夜。

平江是通湖北的要道。一九二六年七月，北伐军进逼时，党领导的民团成立了敢死队，余贲民任县团防局的总局长。一九二七年，党员达七千多人。"马日事变"后，湖南城乡一片白色恐怖。七月，县委集合团防局、工农武装共一千二百人编为平江工农义勇队，由余贲民任大队长。余部奉命前往南昌参加起义。后来这支部队辗转战斗，到浏阳文家市与毛泽东会合。

大革命失败后，一九二七年八月，党派六如伯和夏明翰到平江，领导秋收暴动。六如伯带回去两支枪，在献钟

找到罗纳川，一共“三支半枪”（有一支打不响），于九月二十一日袭击献钟警察所，获枪四支，镇压反动警官等八人。这以后，县委成立了平江暴动委员会，由罗纳川任主任，开始在四乡领导对付反革命屠杀的武装暴动，成立义勇队。各乡义勇队的人数几十、几百、上千不等，枪支多不过几支、几十支，从无到有，从小到大发展起来。九月，暴动委员会还组织几百农民扑城一次。这些初出茅庐的游击队，同国民党的清乡部队进行了极为艰苦而残酷的斗争。由于形势的恶化，全县党员由七千人减到三千七百人。一九二八年，国民党派三个团来平江清剿。三月，县游击总队组织十万农军第二次扑城，因人数太多，过早暴露目标而撤退。这次扑城高潮时，党员又发展到一万一千多人。

这时平江的豪绅纷纷向国民党政府呈文控告，说李六如是平江的祸根，必须翦除。于是这个“祸根”被悬赏通缉。由于目标太大，组织决定六如伯离开平江前往上海。这是一九二八年初的事。从此直到全国解放，他就再没有回过平江了。

由李六如点燃火种的平江革命斗争，确实是可歌可泣、惊天动地的，值得史家一书。十年内战时期，平江这个地方高潮低潮，汹涌来去；胜利失败，交织起伏；迅猛的发展，惨重的牺牲，常常更迭而至。一九二八年四月，东乡至南乡，火延八十里。陈光中部在东乡，分配士兵杀人任务，每天交左耳一只。七月彭德怀起义后，有的村子，群众集体入党，全县党员一时号称几万。八月陈光中清乡，

三天内在龙门杀一千三百余人，为有名的“龙门惨案”。几个月之内，东南北三乡，火光不熄，几万人无家可归。

但革命种子是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的。到一九三〇年五、六月间，平江的党、团员又发展到一万一千余人。一九三一年三月，红军攻克县城后，在这里选志愿兵一千五百人到江西补充红军。一九三八年，新四军第一支队成立时，傅秋涛率领的第一团，从平江出发，共一千一百人，有二百多支枪，七百马刀。平江同中国革命的关系，从这样一个数字也可见一斑：一九八五年平江县的负责人到北京来找平江的老干部座谈，军以上的还有四、五十人。

六如伯于一九二八年被迫离开平江到上海后，住在友人家中，险遭逮捕。这年冬天，党中央派他到南洋工作。一九二九年在新加坡办了一张小报，被英政府查封，人也被捕。他在法庭辩论，因无证据与口供，勒令出境。党又派他到橡胶园做工人工作，办工人夜校，同工人同餐、同宿、同割胶。由于患病，后来回到香港。在南方局工作一年多，于一九三〇年进入苏区。先在闽西省政府任秘书长，掌管内务、财政二部。后来调中央苏区，任税务局长，国家银行代行长等职。中央苏区经过几次反围剿战争，部队扩大，税收不足，加以制度紊乱，财政异常困难。六如伯以自己的专长，主张略微提高土地税，增发货币，整理税务，建立国家金库，度过难关。当时的财政人民委员邓子恢采纳了他的建议。苏区人民生活最大的困难是缺盐。他

发动一些老盐行挖土熬盐外，还贷款给商人，组织他们到白区千方百计运回食盐和药品、布匹等急需物资，他自己同营业部人员一起站柜台。可是在王明左倾路线统治时期，象六如伯这样从旧社会过来的老知识分子，当然容易得咎。在延安整风学习时，他曾同我谈到过，邓子恢被指责为“犯了右倾机会主义错误”，六如伯自己虽未明受处分，但也受到“商人路线”、“机会主义”、“阶级意识模糊”这类批评。当时传言银行系统“被右倾机会主义所统治”。他也收到过关心他的同志的劝告信。谈到这些往事他很感慨，在江西时，许多党的高级干部会议没有参加过，两次全苏代表大会都没能参加。他认为他之没能参加长征，也类似何叔衡等一样，是被认为“右倾”所致。何叔衡同他分手时，流着眼泪说下这句话：“唉，六如，不料我这副老骨头还要送到白区去啊！”

中央红军长征后，六如伯被留在中央政府后方办事处，仍主管财经工作。根据地一下子变成游击区了，经常随着部队在赣南山林间转移，栉风沐雨，夜行日宿。由于身体与年龄关系，经常掉队。一九三五年在一次非常危急的情况下，他被认为再拖下去，会白白送死当俘虏，于是项英命令他和他的夫人王美兰离开苏区，给了一笔路费。这笔钱在过赣江时，几乎全部被白军搜走。流落到吉安后被捕，后来经覃振援救，才得释放。一九三七年八月到达延安。

一九四四年夏天，我害了一场严重的伤寒病，在医院住了一个多月。病愈后去看望六如伯。他谈到对整风、“抢

救”中某些人的过左做法，他向组织提过书面意见。他还告诉我，“抢救”期间，保安处曾派人来向他调查我老家的情况，还问我的父亲是不是红军杀掉的。我是在长沙读的小学和中学，老家的男男女女、老老少少，六如伯比我熟悉得多；老家的亲属中，有人死于国民党的屠刀，也有些妇孺死于过左政策。有他的证明，这类谣传一下澄清。其实，我进延安时写的《自传》，老家的重要人事，是写得清清楚楚的。奇怪的是，一九五九年庐山会议上我受批斗时，康生仍在造谣，说我这个人“有杀父之仇”。后来知道，六如伯向调查者再一次辟这个谣，并对我父亲作了评介：是当年具有爱国民主思想的开明人士，如果活下来，也许会赞成共产主义的。这样的话，抗战前我也听母亲说过。

日本投降前不久，在延安时最后一次看望六如伯，他感慨较多，对自己一生的思想发展作了剖析。他说辛亥革命前，是狭隘的民族爱国主义思想，先受康、梁影响，后受同盟会影响。在日本留学时，先倾向资产阶级的德谟克拉西，读过各种社会主义书籍后，认为共产主义虽好，恐难实现，倾向改良的欧文主义。自己不尚空谈，较重实践，因此回国后在平江搞了那些活动。办工厂失败，到长沙教书后，感到国内军阀横行，农村经济破产，觉得非走苏俄劳农政府的革命道路不行。虽然那么早就入了党，但对共产主义和党只有抽象的认识，对党各个时期的任务和如何才能走向共产主义等许多问题，长时期中是很模糊的，认为只要把工农群众组织起来了，到处罢工暴动，就可以夺

取政权，实行社会主义，而不懂得中国革命的长期性和曲折性，更不懂得每一时期要有每一时期的革命政策和具体措施。他说，参加整风，学习党史，检查历史，参加新哲学会及其他各种学习，学习了毛主席的许多著作，尤其是有了在毛主席身边工作的亲身感受，思想认识上才真正有所提高，同过去相比，可说有质的不同。

一九四四年三月，在杨家岭学习会上，关于苏区的土地问题，六如伯作过一个很好的报告，提出了许多值得研究的问题。他说，十年土地政策可分为三个时期："八七"会议到一九三一年四中全会前三年多，是探索时期；四中全会到一九三五年底五年，是土地政策上变更最大，而在各苏区发生问题最多的时期；中央到陕北后，发布《关于富农策略决定》到抗战前夕，是开始转变土地政策的时期。他提出中国农村有否发展资本主义可能的问题。关于中国土地所有制，六大决议认为中国土地大半可以买卖，这便是资产阶级式占优势。他认为这是根本的错误。秦朝以后土地可以买卖，不能据此就说中国是非封建土地所有制占优势。此外，还提出土地国有还是农有？中国是大地主多还是小地主多？中国富农是小地主、半地主性，还是农村资产阶级？等等问题。当时我在《解放日报》管评论工作，接触过这些问题。六如伯是重视理论尤其经济理论的，一九四七年兼职主持东北财经干部学校时，还主编过《实用经济六讲》一书，第一讲《财政经济总论》就是他执笔的。

日本投降后，我们先后到达承德。我负责报社工作，

六如伯是热河省委常委和省府秘书长。见面时感到他有一种极为兴奋的情绪，即中国革命的胜利确确实实在望了。一九四六年纪念“七・七”抗战九周年时，我请他写过一篇文章：《蒋介石怎样出卖东北与热河》，内容是“九・一八”到“七・七”的六年大事记。这些历史事实真相，是新解放区人民迫切需要了解的。

一九五二年初，六如伯回到阔别二十五年的家乡。当时我在湖南省委工作。我的母亲自己做菜，举行家宴，请六如伯吃饭。陪客有两位平江人：长沙市委书记曹瑛和民政厅长陈再励，他们都是六如伯的老战友；还有一位同乡旧友陈长簇，是父亲的留日同学，旧时多年任湖南高等法院院长，支持程潜起义的。席间话旧，极尽欢愉，意境颇近于王荆公句“草草杯盘供笑语，昏昏灯火话平生”。（长沙当时电力虽不足，电灯还是很明亮的，“昏昏”易“昭昭”更切合当时情景。）这时我正为《毛泽东的早期革命活动》一书搜集资料，他知道我的这个计划后，谈到他在延安整风时，由于思想认识的提高，发现自己一生同中国革命历程，竟是如此紧密相连，因此写了《自传》之后，就将自己各个时期的经历和认识，写了许多札记，这个包包在离开延安后，一直随身带着。他说这次到湖南来，也附带收集有关资料。六如伯为我提供了极为珍贵的第一手材料。但是他很少谈自己，如关于平民教育运动中他所起的作用，避而不言，以至书中有关此事的年限我推后到一九二二年。他是湘区

的首任文委委员，也没有谈及。介绍陈茀章、余贲民二人来长沙这类事，才讲得比较具体。四本《平民读本》也是这次借给我的。这四本书的内容，在我写的书中作了较充分的介绍：写法由浅入深，由短而长，文字通俗，每课由几十字到三四百字不等；内容包括与日常生活有关的问题、社会文化、科学知识和国内国际大事，介绍了各派社会主义，尤其着重介绍了马克思主义的粗浅知识和俄国十月革命的方向。

五十年代在北京，整天忙于事务，看望六如伯反不如在延安的次数多了。《六十年的变迁》第一卷出版之后，他在扉页题签，送了一本与我，我至今保存着。当时虽没有细读，其中人事、乡情、风俗，却多么熟悉。凌雍雄（凌容众）在甲山办启明女学堂，最初招来的五名学生中，有“姓李的媳妇”，岂不就是指我母亲？“大跃进”那两年特别忙，似没有再去看望过六如伯，对《变迁》一书有什么想法自然也没有谈过。回忆中只有这样的感想：三卷书怕完不成。六如伯身体瘦弱，写完第一卷已是古稀之年了。这本书出版之前，曾将打印稿本送与一些老同志审阅。他告诉我，彭老总特来看望他，对此事倍加赞赏。一九五九年庐山会议之后，我就再也没有见到过六如伯。一九七九年初回到北京，去看望黄克诚同志，才知道这十年中，加上六如伯，我们三个人归“专案一办”同一个人管。一九八〇年七月二日举行六如伯的追悼会时，我正在南方出差。一直到前不久，才听说王美兰夫人仍住在北池子故居，自己也有了握

管的时间，于是去看望她。二十多年暌违，彼此还能认得出来。我们谈了大半个上午，才知道六如伯去世前的情况。她知道我要写这篇文章，将手头有关资料都交给了我，还送我《变迁》的第二卷和未完成的第三卷。同时我也收到平江寄来的有关六如伯的材料。

六如伯曲折、光辉的一生，前面只叙述了一个轮廓。他的经历如此丰富：武昌起义，北伐跨党，白区红区，国内国外，军事、政治、财经、文化、教育、司法各种工作，翩翩公子与共产党员，北伐将军与割胶工人，灯红酒绿与枪林弹雨，三次坐牢，经受酷刑……波澜起伏、艰难险阻集于一身。六十年的中国革命与个人经历，其追求、探索，理想、实践，后退、前进，挫折、胜利，失败、成功，两者溶为一体，如形影之相随，中国革命的惊涛骇浪中有他这一片耀眼的水花。五十年代中期，他由于年事与身体而离开工作岗位，虽然得的是脑病，但脑子却平静不下来，皓首病躯，日夜伏案，开始了一生最后的一场战斗——创作三卷《六十年的变迁》。夫人说："深夜，'铁马冰河'的回忆，会使他披衣下床，欣然命笔。为了核对某一史实，他要翻阅大量资料、书籍。有时为选择一个恰当的词，他会在院子里走上几十个来回，反复比较推敲。一九六一年，他更不顾自己年迈多病，竟长途跋涉，先后走了三个省，行程数千里，为第三卷收集资料。当同志们劝他注意身体时，他总说：'怕时间不够用！'他无时不意识到必须为自己有限的余生争分夺秒。'不完成《六十年的变迁》我死不瞑

目。’”

六如伯在衰弱的晚年如此执着于此书的完成，他必是有满肚子的话要说，他要把自己六十年间的立身行事、是非功过，都展现人前；要把六十年中国的变迁，从他个人经历这个侧面留与后人知晓。我想，他在回顾自己一生经历的时候，必定是有些宽慰，有些追悔，有些庆幸，有些惋惜，也有些遗憾甚或委屈。这虽是一部自传体的小说，但虚构的成份是很少很少的。主人公李六如在书中是变成季交恕了，可是众多的人名、地名都是真实的，许多情节几乎是按照历史事件的原貌描述的。在一定的意义上，小说就是历史，难道《红楼梦》不也是历史吗？记得恩格斯说过，巴尔扎克的《人间喜剧》所给予他的关于法国社会历史的知识，甚至比历史家和经济学家的著作还要多些。我的理解是：《人间喜剧》对当时法国的动荡形势、社会风尚、人事纠葛、人们心理状态的栩栩如生的描写，为我们具体了解那一段历史提供了丰富的感性材料，这是以诉诸理智的科学概括为主要叙述方法的历史著作无法提供的。当然，《变迁》就艺术性而论，不可以同《人间喜剧》比肩，但其中确实提供了大量中国革命史的感性资料，我甚至认为直接把它看作是一部历史著作也无不可。从反映时代来说，作家也应该是历史家，必须自身有丰富的生活经验、渊博的知识和生花妙笔，才能叙述确切，有血有肉，引人入胜。六如伯正是具备了这些条件，才决心最后当“作家”的（我这里加引号，是他曾对我说过：“我怎能算作家。”他认为《变

迁》结构上、艺术上都很差），才能使《变迁》出版后受到国内外的重视，第一卷印行七次，有英、日、俄译本。"文化大革命"的罪恶千千万万，《六十年的变迁》没有完成（只写到一九二八年上半年撤退到上海为止），作者"死不瞑目"，也是其中之一。

"文化大革命"开始后，每从报纸或广播中得知江青又发表讲话时，六如伯就向老伴叮嘱，要做好思想准备，随时应付最坏情况的发生。王美兰夫人的回忆说：在延安时，"六如任毛主席的秘书长期间，目睹江青专横跋扈、反复无常。服务人员十分为难，敢怒而不敢言。六如为了维护毛主席的威信，经过反复考虑，决定把大家长期积压在心头的对江青的意见向毛主席作一次汇报，提请江青注意，以便挽回影响。他认为，这是一个共产党员的责任，也是当秘书长的职责。但是正当六如同毛主席谈话之间，江青走了进来，有些话被她听见了，当即大哭大闹……事后，毛主席要江青向六如道歉，江青执意不肯。""五十年代初，六如任最高人民检察署副检察长兼党组书记时，一次在天安门城楼休息室见到毛主席，江青也在座。六如以为事过境迁，出于礼貌，问道：'江青同志身体好吗？'江青下巴一抬，扭头他顾。毛主席忙从旁插话，才把这尴尬局面圆过。"

果然，一九六七年康生一次接见湖南造反派时说："李六如是叛徒、反党分子。"还补了一句，"就是写《六十年的变迁》的那个李六如。""反党分子"的罪名是由于六如伯参加

编写《平江革命斗争史》，被推为主编。这当然就是“为彭德怀翻案”了。至于“叛徒”的问题，自是指一九三五年江西被捕之事。这件事，过去六如伯没有详细同我谈过，只说到是由覃振营救出狱的。原来一九三五年，几乎讨饭流落到吉安时，为了谋生，考入《吉安日报》当校对，后来被一个认识他的人告密，被国民党驻军逮捕。敌人出示刊有他的照片的通缉令，终于无法掩饰身份。经多次谈话逼供，强迫登报自首，以孔荷宠（曾为红军军长）投降受优待相诱，而均归无效之后，即开堂大审，动用酷刑。六如伯在他的《自传》中写道：“始而上用杠子踩着，继而下用铁链跪着，终而兼用皮鞭抽着，香火烧着，我晕死过去。到复苏时，已遍体血肉模糊，躺在囚室中。”六如伯以“要犯”被判处死刑，加上镣铐移押专署，候回文一到，即执行枪决。死刑判决乃根据国民党所谓《危害民国紧急治罪法》。六如伯熟谙法律，即动脑筋写“辩诉状”，说明自己并非“要犯”，根据条律，亦无死罪。他考虑若改判“无期徒刑”，则等待形势发展，有出狱可能。六如伯的老朋友湖南人覃振，时任国民党司法院副院长兼“中央公务员惩戒委员会委员长”，他即将这个“辩诉状”副本寄去，求其设法以免死刑，但并未请求保释。覃振极力疏通，并给国民党江西省主席熊式辉去信保释。信是一九三六年十一月十八日寄出的，直到西安事变后，一九三七年三月六如伯才被释放。他随即和夫人到南京，住在覃处，获得优养。覃探知尚未公开的八路军驻宁办事处地址后，即让六如伯与党组织取得联系，于一

九三七年八月到达延安。一到延安，他即将被捕经过，“辩诉状”原底，以及在吉安时与覃振的来往信件，交与党组织。这样酷刑不屈，经旧友援手得以出狱，与“叛徒”何干？按照康生们的逻辑是：瞿秋白被捕后牺牲了都要算叛徒，李六如被捕而又出狱就更是叛徒了。“文化大革命”期间，真还在江西国民党旧档中查到“伪司法院副院长为保释李六如给伪江西省主席熊式辉的信”。原信如下：

> 天翼吾兄主席勋鉴：敬启者，李君训生（这是六如伯当时用的假名）前以共党嫌疑被捕，羁押吉安将及一年。弟以李君曩曾效命本党，不无微劳。现已年逾五旬，室家多累。经此一度，必能反省。特此函恳，务乞念其衰老，转饬吉安该管机关，从宽开释。弟对于李君今后行动，当完全负责保证。耑函奉恳，无任感祷。敬颂勋绥。

覃振真是党的不忘旧情的好朋友，对这样一位被通缉的“老共匪”死囚，敢对他今后行动，“完全负责保证”，真是难能可贵，义重如山。我没有调查，不知当年的“专办”对信中“必能反省”四字是否仍做了文章，据此以定“叛徒”；也不知道现在是否还有人对此四字以为不然。当年两个国民党的大员之间为此“棘手”之事交往，一方要达到救友的目的，总不能不用他们之间的习惯用语吧。实际情况却是：覃振所“负责保证的行动”，是设法送他的老友回到共产党中去。据六如伯的《自传》说，到南京后，覃振曾让他就近做点事，他没有同意。人各有志，覃振遵守了中国士人的

古风。

一九七〇年，八十三岁的六如伯和他的老伴，被流放到桂林，过着软禁的生活。一次听说邓子恢就住在附近，他去探望时，相互抱肩，真是说不出的欢快。可是再次探视就被禁止了。王美兰夫人对我说，那时六如伯的体重只有八十斤，身体已很衰弱，心中的愤懑之气无处发泄时，常常仰天长啸，声音凄厉。此情正是“悲歌可以当泣，远望可以当归”。林彪摔死后，六如伯一九七二年返京时很是兴奋，“漫卷诗书喜欲狂”。哪知走出北京站，迎接他的竟仍然是“专办”人员几张卑视的冷面。当年法堂的酷刑忍受得住，可是以“叛徒”、“反党分子”的身份，长期面对周遭的冷遇与凌辱，八十多岁的衰病老人实在难以忍受了。夫人告诉我：他长期得不到正常的医疗，病情终于日渐恶化，人越来越瘦，脚越来越肿，大病房的嘈杂更难休息，只好回家待毙。最后病危时，要不到车，她只好到附近借一辆三轮车，将老人拉到医院。咽气时，六如伯拉着四十年共患难的老伴的手，用发硬的舌头，喃喃呼唤着：“毛主席、周总理、老同志……”神情极其凄苦，最后，流下两行泪水而停止呼吸。时在一九七三年四月十日。

六如老伯的这种临终情景，使我想起关汉卿《窦娥冤》中窦娥临刑前哭诉的句子：

地也，你不分好歹何为地？

天也，你错勘贤愚枉做天！

不！六如老伯的临终情思应是宇文虚中《在金日作》七

律的末两句：

人生一死浑闲事，裂眦穿胸不汝忘。

虽然怀着无处可诉的无限忧愤，六如伯最后的呼唤，最后的眼泪，仍是对党、对革命、对祖国的耿耿忠诚。

一九八五年八月中旬

《胡杨泪尽》序

在向钱宗仁的遗体告别时，我们聚在灵堂的几个人就商定，要为这个猝然去世的人出一个纪念集子，包括他自己写的诗文和别人为他写的诗文，让他继续活在人们的心中。我认为出这个集子有两方面的意义：一方面是让人们知所鉴戒，不要忘记过去，即本来是万物繁生的沃土，为何长期出现过戈壁；更重要的一方面是让人们知所效法，如钱宗仁因具顽强不屈、奋斗不已的精神，即令是戈壁，也能生长出胡杨。湖南出版社的同志深情地为这个集子命名为《胡杨泪尽》，但我相信，钱宗仁虽然离开了他如此眷恋的十亿神州，然而胡杨的泪水仍会常滴在人们的心头。

钱宗仁有点象一颗掠过天际的陨星，当人们刚刚看到它夺目的光焰，就戛然消失了。从这本书里，我们可以看到他的气质、风貌、雄心壮志和多方面的才能，可以看到他百折不挠、孜孜向上、拚搏不已的惊人毅力，可以看到他对国家和人民命运的关心与信心，可以看到他无时无刻不在想如何更多地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我看完他写的全部诗文、手稿和书信之后，最使我感动的，还是他那任何精神与肉体折磨都无法挫伤的顽强的学习精神。这种精神

正是当代青年、乃至中年、甚至老年，都应当向他学习的。因为我们大家都曾至少失去十年的宝贵年华，我们要象钱宗仁一样奋力追回来。钱宗仁说，他耽误了二十年，这几年挽回了五年，还差十五年！

钱宗仁在小学和中学读书时，是全县出名的高材生，可是他被“成份论”剥夺了读大学的权利，从此就因不愿屈服于命运，而历尽千磨万难。不论处于怎样的逆境，他所想的只是如何增长才识，多做点有益之事，而置个人安危于度外。干农活时，他的力气、技术与巧妙功夫得到乡人的赞赏。大办水利时，他不顾身卑，挺身而出，运用数理知识，带头选择最佳方案。连学手艺也不得批准时，他硬是用一个月时间，自成木匠，并兼雕刻与油漆，能以此谋生。在戈壁滩修路，冒风沙，铲石头，喝泥水，啃窝窝，虽与世隔绝，书影寥寥，但“天生我才必有用”，他在劳动之余，笨中取巧，终于创造了汉字笔顺号码排字法，以施展自己为社会服务的才智。十年浩劫时，日夜吊打，脚带重镣，“游团”示众，酷似农奴，几次奄奄一息，身上有伤疤，头上留裂缝，脸上余烙痕，他处之泰然，仍然珍惜时间。或假装晕迷，背古文诗词，念数学公式；或利用写检查，推敲音韵语法，证几何难题。如此刻苦学习，使他锻炼出惊人的记忆力和理解力，能一气背几百首诗词，记住中学时期的全部数学推理。待到大地春回，他已三十五岁了，身居僻壤，茕茕孑立，连书本也难找到。他慨叹“谋生尚且艰难，求学谈何容易”，因为他的业余时间，还要做木活维

持家计。但他认为“纵使青春已逝，且喜丹心无损”，于是竟实行五小时睡眠制，连吃饭、上厕、看孩子的时间也利用上，这样三年学完大学八门课程，通过毕业考试，并以最优成绩考上高等数学研究生。后来的归宿是在农垦大学教授复函数。人们呵，这是何等的毅力！这是不惜生命，去换取知识。

去年三月，钱宗仁第二次到北京进修时，我们得以见面，他找我几次商谈今后的去向。他的专业是一个纯理论的数学分支，没有应用前景，且缺继续攻关的环境和条件；又由于《胡杨泪》一文引来的社会关注，以及千百读者来信探讨社会问题的启发，他想离开可能“成名成家”、“安居乐业”之路，而转向接触社会斗争的风口浪头。他觉得自己的半生经历和思想文字能力，允许他作这种选择。他的这个转向的想法，也正是我在通信中向他提出过的问题。他获得学校的同意后，得以进入人民日报社工作。在生命的最后两个月时间，他学习新闻理论，熟悉报纸业务，实践记者采访，同时还涉猎社会学和人才学，同各方广泛联系，开始写这方面的心得和文章。钱宗仁在数学方面的根柢，我无从评价；从他的文章和书信，显现的不仅是文字水平，主要的还是他观察问题和独立思考的能力；诗词虽是余事，也露出风骨与才华。我问过他的身体状况，回答只是：平时难得感冒。谁料到他正以一个肝癌晚期扩散的病躯，在新的岗位上忍痛坚持工作，直到突然摔倒，住入医院后，半个月就离开人间。医生诊断，他的肝癌已有五年病史。

大家知道，精神与肉体的折磨是致癌因素。钱宗仁之死，又是一次教训；对受过磨难的知识分子，还得关心他们的健康，不要再事后惊叹他们的倔强而已。我是在他去世前两天才去看望他的。我的老伴曾代我先两天去医院，他企求地说道："我希望还能活半年，我有许多事要做，有许多东西想写出来。"说完这句话后，他用手捂住了眼睛，泣不成声。钱宗仁只活了四十一岁！他是多么留恋我们这个既古老又年青、满是伤痕却前景灿烂的中华大地。

令人痛心的是，钱宗仁同我最后接触的时候，虽然避免谈到他的身体情况（他跟别人是提过的），却谈到他的一种新的心灵痛苦。《胡杨泪》事在全国传播之后，在新疆就有人散布他的流言蜚语，当地负责方面为之澄清后，在他正要到人民日报社工作时，由于他曾为一个复杂案件的当事人鸣过不平，竟又遭到捕风捉影的恶意中伤。中伤者大概是不愿意让此人当记者的。诽谤虽未达到目的，钱宗仁的心情实难平复。他向我谈及此事时的悲愤神情，如在眼前。祖国大地虽然春光灿烂，万物向荣，但总还不免有朵朵乌云，甚至某处突降冰雹。借这篇序言，请允许我再次饶舌发出以下呼吁：我们经历了多么痛苦的年代，人们经受的创伤够多了，不知浪费、埋没和摧残了多少人才，今后再也不能做扼杀人才的蠢事了！爱贤惜才，求才若渴，选贤任能，唯才是用，是我国自古以来的好传统；当今之世，更应该大大发扬这种传统，使之成为全社会的风气。人才与改革是相辅相成的。只有人才源源涌现，如活水长

流，各方面的改革尤其是城市经济改革才有保证。我们要抓紧发掘人才，培养人才，爱惜并保护人才，真正做到人尽其才，才尽其用，这样，我们的国家才能富强，我们民族才能腾飞。

一九八六年二月

附记：

一九八五年十月一日，钱宗仁逝世后，十月三日曾作悼诗两首，刊十月十日《人民日报》：

九月下旬，忽闻钱宗仁同志（报告文学《胡杨泪》的主人公）住院，诊断为晚期肝癌扩散，二十七日，我的老伴先去看望时，他希望"还能活半年"。说，"有许多东西想写出来。"二十九日我到医院看望，已入急救室，见我时神志清楚，犹言："我病如用中药，或仍可治。"隔夜得电话：人已昏迷。十月一日凌晨得知，晨两点逝世，得年四十一岁。钱宗仁今春来京进修，几度相商，决心弃数学专业，改行到《人民日报》边学习边工作。十月三日，收到《群言》第六期，上刊钱文《愿伯乐常有，千里马常有》，文中《水调歌头》词早示我。读毕潸然，成诗二章，难表哀思。

劳骨伤筋尤苦志，飞沙走石立胡杨。
铮铮铁打自成器，疾疾风摧弓挽强。
热血男儿多智勇，痴心逆子尽忠良。
既然造化有深意，忍夺斯人咒上苍。

灯火家家望月圆，高楼此夜不成眠。
方兴国运山花烈，未展君才蜡泪干。
决意改行从笔政，何期开卷读遗篇。
伤心事问几时了？最怕衰年哭壮年！

怀 丁 玲

丁玲在我心中一直受到尊敬，是从中学时期开始的。一九二八年到一九三四年，我在长沙岳云中学读书。

大革命时期的长沙是轰轰烈烈的，我正读小学五年级，是班上童子团的小头头。蒋光赤的《少年漂泊者》、《鸭绿江上》，那时就读过。从此，就爱看左翼小说。大革命失败后，长沙很难买到左翼的书刊了，商务的《小说月报》倒是常看到的。记得是一九三一年，在《小说月报》上读到丁玲的《田家冲》，一下就吸引了我。这篇小说是从一个佃户家的女孩幺妹的眼睛，去看一个临时隐蔽在她家的革命者（东家的三小姐）的活动。在当年读过的进步小说中，这篇印象特深，大概也同自己的家庭出身有关。老家平江长寿街是老苏区，红白斗争极为尖锐，家乡不时传来这方面的信息。一九三一年我随母亲去过老家一次，到过乡下佃户家，父亲的坟墓在那家附近。因之对丁玲笔下的三小姐，有一种藏之内心的特殊感情，似乎她的血也在我身上流着。当然，这种革命意识是很朦胧的。我投身于革命，是"一二·九"运动开始的，但少年时就爱好左翼文艺，无疑有很大关系。一九三三年丁玲被捕之后，《良友》出版的《母亲》、《记丁

玲》等,以及记载她的事迹的出版物,我都是怀着关切的心情读过的。

一九四一年《解放日报》出刊后不久,我就调到报社。一九四二年改版之前,编辑部的分工是一、二、三、四版,一、二版是要闻与国际,三版是国内,四版上半截陕甘宁边区、下半截文艺副刊。我是国内版编辑,丁玲是文艺主编。我们同住在一排新打的土窑洞,大家都在几个新砌的烧地炕的大石窑洞中办公,每人一张小白木桌子。我最初值夜班,文艺版不值夜班,但大家天天见面,也有机会闲谈。我同丁玲谈起过读《田家冲》的印象,又都是湖南人,在湖南地下党活动时我去过常德,二十年代她也在岳云读过书。因此,共同的话题甚多。有一天晚上,我到她的窑洞中闲坐,谈得很晚。她详细谈了软禁在南京的情况,逃出来时得到当时在南京教书的方令孺的帮助。这次谈话,是我有意扯到这个题目。

丁玲在延安发表的作品,我都是及时读了的,有的内容很有同感。如《在医院中》这个短篇,写上海一个产科学校的毕业生陆萍,在离延安四十里地一个刚开办的医院里工作的经历,真实地反映了当时边区生活的一个侧面。对于要求把革命根据地写成黄金世界的观点来说,这篇小说当然不合胃口;但在延安生活过的人,不能不承认小说描写得相当真实,而且是充满着善意的。显然,作者是希望消除某些消极的和不健康的东西,才写这篇作品的。医院中存在的种种问题,主要的还不是战争环境和物资匮乏造

成的，更多的是主观上的因素。小说中一些不合理的现象，今天也不能说完全消除了。例如，医院的院长是一个“在军队里工作很久，对医务完全是外行”的人。一个什么处长的妻子，只认识几十个字，“对工作既没有兴趣，也没有认识”，却可以安排在这里做技术性很强的护士工作。陆萍提出了一个发人深省的问题：“革命既然是为广大的人类，为什么连最亲近的同志却这样缺少爱。”后来，比这篇作品遭到更为严重的一再批判的，是一九四二年的《三八节有感》那篇杂文。在这之前的一九四一年十月的文艺副刊上，还有过她的一篇《我们需要杂文》，其中有这样的话：“即使在进步的地方，有了初步的民主，然而这里更需要督促、监视。中国几千年来的根深蒂固的封建恶习，是不容易铲除的，而所谓进步的地方，又非从天而降，它与中国的旧社会是相连结着的。而我们却只说在这里是不宜于写杂文的，这里只应反映民主的生活，伟大的建设。”不是吗，这些话今天读来，也还有现实的意义。

我到《解放日报》之前，在中央青委工作。当时机关工作不甚紧张，知识分子干部聚在一起，年纪、经历差不太多，都有些少年气盛，曾在机关所在地的大砭沟口，立了一个大木牌，办过当年有名的杂文大墙报——《轻骑队》，直言不讳地批评一些认为是落后的或不顺眼的现象。我也是积极分子之一，最初几期写过文章。上述丁玲几篇文章留在记忆中，就是因为当时思想观点有相同之处。当然，整风运动开始之后，我们都检查了自己的“小资产阶级偏

激思想”。《解放日报》文艺副刊闯了大祸的，是登了王实味的《野百合花》。近年话旧，丁玲还谈起过，发王实味的文章时，她已离开报社到了“文抗”（延安文艺界抗敌协会），住在乡下。这以后在延安，我们就没有再碰过面。

一九四八年初，我从热河调到东北局工作。丁玲前往苏联访问，经过哈尔滨，我们又见了面。她到我的住处坐了一阵，谈《太阳照在桑干河上》的写作经过，原稿曾送与毛主席过目，还把当时东北刚出版的《太阳照在桑干河上》送了我一本。这本作者签名的初版本，一九四九年南下到湖南后，就被人借去了。这一别，就是整整三十年！解放初我在湖南工作时，康濯同志曾持她的介绍信来找过我。一九五二年我调到北京，改行到工业部门工作，五十年代在北京也没有见过面。一九五九年以后，我同她有着近似的命运。我们同时在北大荒呆过，同时在秦城呆过，不过彼此都无从知道罢了。

天回地转，到了一九七九年三月，有一个月时间，我与丁玲同住在医院，于是又能串门闲谈了。刚入医院，我是在脑神经科做检查时，突然遇见她的。白头相对，当然她的头发比我的白得多。令人安慰的是，她精神甚好，谈锋仍健。“屋破又逢连夜雨”，“文化大革命”初期她在北大荒吃的苦头，那些皮肉之刑，我还没有经历过，她居然活了过来，真是不易。我觉得这同陈明同志的长期照顾有关。他俩如“涸辙之鲋，相濡以沫”，被隔离时，也千方百计通点信息。没有这种精神与感情的支持，在这样漫长的“风

雪人间”,古稀高龄恐怕是难以熬过来的。

在医院时，她的问题还没有完全解决（关于两个“反党集团”的决定尚未撤销，这是“毛主席批的”），不免谈些不愉快的往事。她给我看了《新文学史料》上赵浩生写的一篇访问记，内中还涉及延安文艺界的所谓“宗派纠纷”。她认为这不利于安定团结,现在不应当再这样来回顾过去（在第四次文代会上，她总结文艺界几十年的经验教训，在讲话中曾着重提到宗派主义的危害）。出院后,在万寿路招待所，我遇见周扬同志，便谈到丁玲对这篇访问记的意见，建议他去看望她。后来丁玲告诉我，周扬到她家来了，可惜的是事先不知道，她不在家，没能相互畅怀一谈。在医院中以及后来多次闲谈，她跟我详细谈过她在左联时期的情形，包括同冯雪峰的交往，以及为什么文艺界因一九三六年的争论而形成如此长期的门户之见。谈起这些似乎是无法解开的历史疙瘩，虽然我是局外人，但我觉得丁玲的态度是诚恳的。她也常谈自己遇事过于天真等等缺点。

一九七九年的下半年，我们都搬到同一幢公寓大楼，走几步路，上下电梯，就可以到彼此的家。来往的次数是记不清的，闲谈的内容很广泛，总是在晚上，有时谈得很晚，来我家必与陈明一起。有时也相互送些土特产，或是出差带回的，或是别人馈赠的。有一回同海婴来，请海婴为我们拍了好多张照片。他俩同我的老伴也很熟了，我家老阿姨也最关心丁大姐的身体。

有一次谈到一九三六年到保安时的情况，她说，那时

同志间都很亲热，无甚拘束，谈话随便得很。她谈到对边区的观感：象个小朝廷，说林老就是财政大臣。毛主席对这个说法很感兴趣。过去不知道毛主席赠给她的那首《临江仙》词，这次谈话才知其详，她当时在红军中有个军职。词中说的："保安人物一时新，洞中开宴会，招待出牢人"；"昨天文小姐，今日武将军"。可见当时毛主席和中央同志对丁玲的到来，是何等高兴；毛主席的欢愉之情是溢于言表的。丁玲不无感慨地说，这首词的手迹是由胡风保存下来的。由此谈到过去同胡风并不认识，胡风在重庆办《七月》，才有了交往，她的稿费，胡风设法寄给她在湘西的母亲。

有一次话题从平生得罪的人谈起。她说，这只怨自己马虎大意，"也不会做人"。于是谈到江青结婚请吃饭之事。当时她听说女儿生了病，心里急得很，好不容易借到一匹马，就赶着到安塞保育院去了，而没有去赴宴。其实，脑子多转一下，安塞完全可以晚一天去。这样就可以免去引起的误会：被认为敬谢宴请，是对于婚事的态度。这大概是结怨江青之始。《三八节有感》中写的："而有着保姆的女同志，每一星期可以有一天最卫生的交际舞"，当年就传说是讽刺江青的。关于不会做人之事，谈过不止这一例，她的感慨甚多。

在我同丁玲的接触中，感触最深的是她对党的一往情深。二十年代，她曾经在上海平民女子学校、上海大学念过书，同李达、瞿秋白等有很深的关系，但那时她并没有入党。她入党是在白色恐怖最严重的一九三二年，是在胡

也频牺牲之后不久，就同战场上拿过阵亡同伴手中的枪继续战斗一样，这是怎样的悲壮和勇敢。不论是敌人的幽禁，还是自己同志的委屈（长达二十多年呵），都没有动摇她对党的信赖与深情。这从她一九七九年回到文坛后写的文章看得出来。一九八二年，她访美回来，来过我家两次，谈美国见闻，美的与丑的，赞扬与厌恶。第二次同江丰一起来，谈到美国某些人对她的"失望"。过去有人对她的出国是有戒心的，还设过障碍。这次令人担心的美国之行，她说，也算是不辱使命吧。她还同我谈过，当听到中央领导同志在报告中讲到，右派不能留在党内时，她哭了一上午。下午，见到一位同志，对她说："今后不能以同志相称，你有什么感想？"这真是向伤口上撒盐。她说，这些创伤多年来埋在心里，很少同人谈过。近年的接触中，我深深感到，毫无矫柔造作，对党一往情深，这才是丁玲同志一生最基本的方面。

在丁玲的家中，前后看到过几幅她的油画像。最早看到的一幅半身像，背景为北大荒的冬天：千树梨花，神态极其安详。我深知北大荒的冬天，曾为此像写过一首七绝相赠：

北大荒人十二冬，惯于雪夜白毛风。

三千白发何须问，掬出心肝依样红。

这首诗也可作为我上面这段话的一个补充。

一九八四年八月一日，中央组织部发出了为丁玲同志彻底恢复名誉的通知。这个通知经过一年多的调查落实，

几次慎重讨论，最后由中央批准。通知高度评价了她为党做的工作，赞扬她是一个忠诚的共产党员。是的，比起她半个多世纪对党的执着的爱，即使她有过什么过失，又何足计较呢。党给她彻底恢复名誉，推倒一切强加在她身上的不实之词，她是很感激的。她觉得从此她可以不再受到那些若明若暗的歧视了，那些嘁嘁喳喳的非议也可望消除。她同我谈过，有位美籍华人女作家想写她的评传，有人竟认为：作品可以介绍，评传可难写。收到这个通知后，她对陈明说：我可以死而瞑目了。她曾经想给中央写一封感激信，底稿给我看过，信中充满了激情，表示要在余生中为党作更多的工作。后来也许是认为实际行动比言词更加重要，这封信没有发出。

一九八四年十月，丁玲八十寿辰时，我书赠了一首七律：

多情湘女总多愁，风雨华年苦索求。
处子文章惊海内，平生抱负蕴心头。
纹身刺面寻常事，雪地冰原孺子牛。
笔底波澜随老壮，晚晴无限耀高丘。

这首诗，最初得七、八两句。这也是几年来我们的交谈中，我常常提到的一个题目：希望她在晚年集中余力，多写一些东西，尤其是回忆录。可是在生命的最后日子，她却以一种只有年轻人才有的狂热着手创刊《中国》文学杂志的工作。那时她住在医院里，就整天想这件事，找人到病房里来商量，邀哪些人来合作，刊物的名称、刊期、篇幅，等

等。自己出面写信、拜访，请求有关同志支持。我总觉得象办刊物这样繁重的工作，决不是一个八十老妪能够担当的了，她主编《北斗》，那是五十年前的事情。因此，我对这件事是持观望态度的，认为与其办刊物，还不如利用这最后有限的时间和精力，自己多写作一些。也真是有志者事竟成，只不过几个月的筹备，这个大型刊物就问世了。一九八四年十一月，她邀请我参加了在新侨饭店举行的《中国》文学杂志创刊招待会，还"强迫"我这个文学界以外的人讲了几句话。我只讲了一个意思，请作家们特别关心经济，发展生产力是我们的根本国策，写我们民族第三次腾飞经济生活中的新事物。

据我理解，丁玲最后以自己的全部热情和精力来办《中国》杂志，也是她一贯爱护青年人的最后一次表现吧。一九八五年第一期即创刊号，发表了她自己写的报告文学《一代天骄》，记北京市集体企业的先进人物：京海计算机机房装备公司经理王晓晖，这是团中央向她推荐的一个二十四岁的年轻人(她还介绍这位青年到我家来谈过)。这个刊物重视发表知名或不甚知名的青年作者的作品，包括一些"有争议的"青年作者的作品，也可说明我的这个理解。就我知道得不多的情况来说，她近年曾帮助过一些青年作家、艺术家，还有一些与文艺无缘的青年人。她给他们看稿，作序，送书，帮助解决工作问题和调动问题，直到予以资助，这些，都是很感动人的。对有些青年作家乃至有了名望的中青年作家的作品，她看到的缺点，也是直言不

讳的。她不止一次同我谈过现在某些年轻的作家和刊物编辑之间的不正之风，互相交换发表作品，她说，这种走后门会坑害一代青年。

在作协四次大会上，中央领导同志谈了创作自由问题之后，一九八五年春，丁玲在西安向记者讲到文艺界的一些敏感问题，中央领导同志认为她讲得好，不愧是一位革命的老作家，号召青年作家向她学习。她说，作家要正确理解创作自由，正确理解党的号召同行政干预是不同的。近年新人新作的涌现，说明党对文艺界没有太多的行政干预。违反文艺创作规律的行政干预，确实非摒弃不可。她说 党号召作家走向生活，反映时代，反映群众干四化、搞改革的崇高思想。但作家自己思想不解放，也不可能有真正的创作自由。只有真正了解社会，了解生活，真正掌握了时代脉搏、客观世界的本质，既懂政策，又善分析，那才能如鱼得水，无往不胜，在创作的天地里自由驰骋。她还说，创作一定要百家争鸣。创作要自由，评论也要自由，允许批评和反批评。

今年春节前不久，我老伴去医院看望丁玲后，回来对我说，精神很不好了，自己说懒得动，什么都不想动。二月十八日我赶到医院去时，她已住进急救室，人已入昏迷状态。陈明详谈了春节前后病情的变化，她自己知道将不久于人世，除夕告诉家人：我将成佛。广播中听到她逝世的消息时，我正在南方出差。对于一个年过八十、饱经摧折而又患有多种疾病的人来说，这并不使我感到突然。我

同丁玲相识四十五年，近年又过从甚密，对于她的离去，家中失去这样一位能随便闲谈的长者和朋友，我不能不感到深切的悲哀。三月十五日，我同我的老伴到八宝山向她告别，看到拥挤着的人群，一个个忧戚的面容，挂满灵堂内外的挽辞，特别是看到北大荒人送的覆盖在遗体上的"丁玲不死"的红幛，心中似乎代死者感到一种宽慰。

一个人的生命，无论怎样长寿，总是有尽的，而一个作家的生命却长存于他的作品之中。在这个意义上，丁玲并没有离开人间，她还将通过她的作品在今后的世代中发挥作用。说起她的作品，我有一个感觉，如同江河一泻千里，就不免泥沙俱下，而不能象山泉那么纯净。她的创作，常常是充满着昂扬的激情，文思泉涌，奔赴毫端，也就不暇字雕句琢了，因此偶有使人感到不够整饬之处。记得一九八一年我收到她的《生活、创作、时代灵魂》（她近年出版的所有作品包括六卷本《文集》都送我的），看到一两篇文章中有语法不妥之处，我竟到她家中当面指出过。其实这也不足为病。似乎在一本巴尔扎克的传记上看到过，巴尔扎克也有类似的情况，大概他的法文也有不甚考究之处，可是这决不妨碍巴尔扎克的作品成为文学世界的瑰宝。古诗所谓"天然去雕饰"，鲁迅诗说的"扫除腻粉呈风骨"，大约就是这种境界吧。那种缺乏思想与激情，而徒事雕琢、刻意求工的诗文，是不可能传世的。

丁玲是走进历史里去了。她留下的，不仅有几百万字的著作（有的遗作还待整理出版），六十年的文学活动，还

有她的思想演变的道路，从一个旧中国感到彷徨苦闷的知识青年变成一个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二十多年纹身刺面、受尽磨难而不变初衷、痴情如故，这都有典范的意义。我深信必将有更多的人研究她的作品和生平，必将有人为她写出传记的。因为，这是时代的需要。

这篇文章写完之后，我又习惯地来到丁玲的家中，又到了她住的房间，这间工作室兼卧室被陈明收拾得更加整洁，只是增加了一幅大型照片。丁玲同志，我的尊敬的朋友，你仍然同我们住在这一幢楼，我并没有感觉你已经离我们而去。

一九八六年四月下旬

后　记

一九三九年夏，在重庆南方局开青年工作会议，住在红岩嘴“八路军办事处”。南方局要开一个小型的平江惨案烈士追悼会，并出纪念册。涂正坤的音容笑貌还历历如在目前。纪念刊小册子印出之后，办事处的同志说，唯有我那篇东西有感情。

一九四二年春，何斌遇害的噩耗传来，在延安引起很大震动。那时我在解放日报社工作。一个晚上写出此文，大概第三天副刊部就发排了，登在四版头条，记得标题的字体很大，大约是二号字吧。当时报纸上很少直接批评国民党，文中对陈诚之流的斥责，引起了大家的快意和称许。追悼会是一个多月后才举行的，由凯丰同志主持。他的讲话慷慨激昂，至今还记得有这样一句：“蒋介石的手就是屠杀青年的手”。在当年统战环境中，这种稀有的追悼会是一种最好的阶级教育。（一九八五年四月，收到湖北寄来的《何功伟烈士诗文笺注》，嘱我作序。这篇序言即附于此文之后。）

一九四九年八月四日，长沙宣告和平解放。是夜入城时，省委负责同志向欢迎人群发表了简短讲话。当时长沙

报纸甚多，我负责审阅新闻记者发布的稿件，对程潜、陈明仁两位将军起义的欢迎措词，我同主持统战工作的同志小有争论。八月十五日《新湖南报》发刊社论《庆祝新湖南的诞生》，七月间在武汉停留时，我就写了初稿，其中谈到两位将军起义的重大意义和受到湖南人民的热烈欢迎。南下的北方同志不了解湖南的历史。郭亮在大革命时是湖南妇孺皆知的英雄人物，于是我有意写了这篇文章，让广大读者不要忘记历史——革命胜利来之不易；同时也是写给北方同志看的。但是，程潜将军曾是当事人。孙中山在广东召集非常国会时，先父是参加非常国会的湘籍议员，同程是熟人（程当年也在广州，他们都是孙中山一派的）。于是，此文发表后，黄克诚同志宴请程潜将军，我也叨陪末座，我也曾作过程家的客人，还参加了他七十岁的寿宴。这就避免了误会——表明这篇文章决不是写给他看的。

《怀念田家英》是一九七九年十一月写的。在这之前，我去看望了家英的夫人董边同志，她详谈了家英辞世前几天的情况，又目睹了许多遗物。悲从中来，虽然当时家英的结论还没有作出，我说，我先写一篇悼文吧。我同家英的交情是很深的，尤其是某些个人的爱好相同，性格也有相似之处。一九五八年到一九五九年九月，“大跃进”时期，我们经常在一起，思想观点一致，几乎无话不谈，文中的怀念当然写不完的。这时许多历史问题还没有作结论，许多事情和观点很不易着笔。这篇文章写出后，给一些老朋友看，都担心难以发表，当然也有不赞成的。一位老朋友

的女儿甚至说："李叔叔，你还挨整得不够！"无奈，我只好将文章直寄胡耀邦同志，第二天他就寄还，并在我的信上批曰："此文亦鲁迅笔法，无所谓不可发表。"于是才将文章和耀邦同志的批件一起寄出。然而还是没有能在《人民日报》刊出，只刊在《战地》增刊上。

接着就写了纪念总理的文章，一直放在抽屉内。一九八二年《人物》约稿，就寄去了，刊载在九月出版的《人物》第五期上。有熟人读了后，给我来信说，此文如早在报上发表，影响不是更大一些吗。后来《中华英烈》一九八六年第一期重刊此文时，又作了重要的补充。

一九八〇年初冬住在医院时，才得以动手写出《想念你呵，文立徵》。原来计划的篇幅较长，由于《中国青年报》版面限制，只有大加压缩。所有关于立徵的材料，只好暂时存压下来。

怀念周小舟的文章寄出前经过胡乔木同志过目。一九七九年到广州，见到小舟夫人王宁同志，探问小舟逝世前的情况。她说，批斗后几天，他烧掉了马、列、毛选之外的全部藏书。一个知识分子，烧书时的心情，可想而知，是同战士毁掉武器时一样的。那时，湖南一些人对小舟的评价还不公正，长时间揪住他当年的"右倾"不放，王宁同志对此很不满意。我认为我应该为小舟写篇悼文。

《彭德怀自述》还未正式出版前，我就收到征求意见本。读完后的心情，当然同许多读者一样。《读书》杂志约我写一篇读后。写好之后，我曾读给萧克同志听过，承他指点

过若干有关史实，他特别详谈了尚未作出历史结论的反AB团公案。黄克诚同志当时身体不好，住医院，就没有为此去打搅他。

澜波同志逝世后,余秋里同志特地嘱我写篇纪念文章，我自己也正有此打算，这也是澜波的夫人和儿辈的心愿。"十二大"前，工作非常紧张，文章是断断续续写成的。

一九四八年在哈尔滨得到文耀牺牲的噩耗时，就动笔写怀念文章,也许是因为当时刚调换工作，心绪不甚安定，此文只开了个头，一直没有能够续成，一拖就是几十年。后来因约，才逼出这样一篇东西。

以上十篇收在《怀念十篇》中,以下十篇则为近年所作。

《学生时代的毛泽东》是《时代的报告》（现改名《报告文学》）为纪念毛泽东九十诞辰的约稿，当时工作甚忙，拖了很久才写成。因为我必须重新"进入角色"，重翻旧的资料和消化新的有关论著。毛泽东的早期思想是一个值得研究的重大课题，现在已有不少同志写了专著。我对此不过接触较早，研究却是很不够的。可能是文中引用了一些新的资料，作了一些探索性的新的论断，发表后曾引起人们注意，特别是其中这一段话，使人发生兴趣:"青少年时代的思想初恋，似乎在晚年又燃起了某种'怀旧'之情，这就不能不使人们发生'沉重的负担'这类感叹。"一九八〇年讨论《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时,我在小组会的发言中，曾谈到毛泽东晚年的"左"的思想，可以从早期追溯。英文版《北京周报》于一九八四年四、五月间全文转载后，在国

外也引起反响，曾收到国外读者的来信。我接触过的三个外国研究中国革命的学者施拉姆、麦克法夸尔和索尔兹伯里，也都谈到这篇文章。国外研究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的专家甚多，专著数以百计。这种情况对我们实为一种鞭策。

《一个献身教育事业的人》（记傅任敢教授）一文，是在傅先生的追悼会上看到他的老友和学生们的挽辞后，有感而作的。这样一位正直的、勤奋一生的教育家，虽无赫赫之功与籍籍之名，其生平事迹，正好说明这样一个道理：为什么老一代爱国的、有民主思想的知识分子，必然会跟着共产党走，即令长期身处逆境，也不改变初衷。傅先生的女儿交给我许多第一手材料，反复考虑后，为存其真，行文时没有由我转述，而是将傅先生的友人、同事与弟子们的观感，以及他本人的自述，稍加整理，直接记录下来。文中附带说明，从这样一位老教育家身上，也可看出当年的“反右派”运动，有过怎样的不公正，又何等违背历史的正常发展。

一九八四年九月，收到筹建湘潭齐白石纪念馆的征募诗文专函后，使我想起为这位受世人尊敬的老人写一篇文章，借以叙说自己自幼酷爱美术，以及所藏珍品毁于浩劫的痛惜心情。五十年代跑琉璃厂时，田家英跟我说过齐白石的一些轶事，他去过老人的家。一次，老人怀着一袋子金器，满城驱车，要献与毛主席。当年忙忙碌碌，竟没有去拜望过老人，实在是憾事。

范寿康先生的猝然去世，太使人意外。先生回国之后，

不仅心情格外愉快，身体也日见强实，平时红光满面，可以不坐轮椅而持杖行走了。大家都以为他将成为望百寿星，也都希望他能写出新的著作，为祖国统一大业继续作出贡献。从岱年同志处得知，先生于一九二〇年就在《东方杂志》介绍马克思唯物论，更使我对先生增加钦敬之心，觉得于公于私，都应当写一篇纪念文章。值得欣慰的是，先生的重要著作即将出版，这就可以弥补国内对先生的长期隔漠了。

一九八四年四月卅日，接到吴觉去世的电话后，听见金明同志说，吴觉去世前，为自己一生坎坷，尤其是入党时间一直未能落实，很是感慨。讣告上说，遵照遗愿，丧事从简，不举行追悼会和遗体告别仪式。随后就收到他儿子深情的信和吴觉的生平资料。我才详细了解吴觉一生的动人事迹和不幸遭遇，同时感到五十年代中期在他身上出现的党内不正常生活，可以作为现代史鉴。这些，我都如实写在文章中了。不久前，收到南京工学院纪念吴觉的专刊《怀念与学习》（我的文章收集在内），见到名誉院长、江苏省政协主席钱钟韩的文章，其中写到："吴觉同志到南工不久，就主动辞去了自己所兼任的院长职务，并在民主推荐的基础上积极组建了院行政领导班子。他经常支持和鼓励我们独立工作，挑起领导担子。他一直以身作则，坚持党政分工的原则。当有些人为了行政上的事直接去找他时，他从不轻易表态，从而肯定了行政人员的职责和权威。"我的文章只写了他真诚坦率的性格，同知识分子相处

得好，重视知识和人才。这样善于处理党政分工，正是我们长期以来没有解决、也是当前深入全面改革的重大问题。这就不能不令人更加怀念吴觉了。

写完《想念你呵，文立徵》之后，有关立徵的一堆材料和他的表弟陈铁如整理成篇的《寻兄经过》，一直在我手头，这是一桩未了之事。这些材料和我写好的前一部分，曾经在一个刊物压了很长时间，大概是由于没有什么“文艺性”，终难采用。去年五月，我要了回来，下了个狠心，关门几天，整理成《文立徵烈士二题》这样一篇不伦不类的东西。应当感谢《中国》主编丁玲同志的慷慨，能够全文在该刊一次发表。该刊编辑曾拟改成《铁道游击队政委蒙冤记》这样一个题目，其实立徵兼任铁道游击队政委不到一年时间。“一二·九”一代的大学生，象立徵这样，在抗战期间，始终在敌后第一线打游击，是不很多的。尽管我尽了自己的努力，使这位既是书生更是战士的形象如实留在人间，但我总觉得我写的这两篇东西实在太单薄了，好在有一部《铁道游击队》的小说和电影为人们关注。我希望当年同文立徵一起生活和战斗的战友，能继续写出文章、材料或提供有关背景资料，使至今为鲁南人民怀念的战士，将来能有一部内容较充实的传记。陈铁如后来又寄我一篇《寻兄记补遗》，特附录于文后。

《重读张闻天同志的庐山发言》打印出来后，即分送一些同志审阅。刘英同志和《张闻天选集》编辑小组的同志都表示满意。关于同庐山会议有关人的怀念文章，最早一篇

是田家英，其后是周小舟和彭德怀。涉及到当年山上之事，我是很谨慎的，下笔是有分寸的，可说字斟句酌。这三篇文章发表经过，前面都已说及。可是，这篇文章审阅过程中却发生了一点意外的不愉快，好在历史已走到一九八五年，当代中国已进入全面改革了。感谢《读书》的编辑同志，使这篇文章在出书之前就能与世人相见。

我还不到五岁，父亲就去世了。年青的母亲带着三个孩子艰难地生活着。大概由于同父亲志同道合的亲密友谊，母亲常跟我们念叨六如、竹雅（方维夏）两个名字，表示她对他们的尊敬。我的老家平江长寿街曾是湘鄂赣老苏区的中心地区。一九三一年红军攻占长寿街的这一次，曾采取将地主家属迁移出境的政策。老家中有十多口老弱妇孺，或在迁移途中，或辗转逃到长沙我们家中，在一个短时间内，先后去世。这对我母亲在经济上也是一个不堪承受的负担。然而，我们从来没有听到母亲对共产党有过什么怨言，相反，我们从她的念叨中得知，六如伯的两个弟弟和儿子是国民党杀害的；她只要回老家，路过献钟，总要去看望"桓嫂"（六如伯的元配夫人），尽可能给予一些接济。一九七九年回到北京后，就想着要为六如伯写一篇纪念文章。直到去年夏天，才挤出时间，了却这一心愿。

《请读〈胡杨泪〉》和《胡杨泪》在《人民日报》发表后，引起很大的社会反响，钱宗仁本人收到成百上千封信，我也收到许多信。钱宗仁到《人民日报》工作后，关心他的人对他都寄予一种特殊的期望，希望他在新的工作岗位上有新

的贡献。这一点，我是决不怀疑的。虽然他还不是共产党员（他已写了申请），但早已具备一个共产党员最重要的品质：无私无畏，实事求是，目标坚定，忘我劳动；何况他还有广博的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知识，有文采才华，更有二十多年的艰苦磨练，意志如钢。我暗暗为他欣幸：终逢盛世，前程似锦。谁料到突闻噩耗。我永远不会忘记，在医院中见到的他那凄哀而无限期望的眼神。纪念集《胡杨泪尽》出版之后，相信钱宗仁的精神会留在人间。

一本书，一篇文章，一首诗歌，对青少年的心灵往往发生很大的影响，丁玲的《田家冲》于我就是如此。读这篇小说时，我只有十四岁，却终生难忘。丁玲比我大十多岁，是革命的长辈，多年的曲折道路和坎坷生活，使我们终于成为忘年之交。就象题目一样，《怀丁玲》只是表达了自己从少年时起就培育起来的这种感情。多年来很少读文艺作品，也缺乏这方面的知识，对她的作品难置一词。我们的交谈，文艺也不是主要的方面。我在她的家中，遇见过北大荒的农民朋友，他们之间感情自然，纯朴相通。丁玲是在城市长大的，长期在上海生活过，却能真正深入群众，同群众打成一片，她不止是去“体会生活”，而是同群众生活融为一体。以“异己”身份在北大荒十二年，能够在那里扎根，这是很不容易的。我在北大荒呆过一年半，这一点我很清楚。“文如其人”，作家的思想、品德，总是贯穿在自己的作品中的。研究丁玲的人，当会注意到这一点。她的重要遗作（如写南京幽禁生活的《魍魉世界》）正在由陈明

同志整理，希望能尽快与读者见面。

《怀念十篇》序言中最后写道："平生似与文字结了缘。一九五二年毅然转业到工业系统工作，仍不能解缘。现在晚年再次改行，这个缘分能否了结呢？我自己也不知道。"这是一九八二年十一月十四日写的。八二年开始，在中央组织部工作的三年，缘分并未能解除。现在退居二线，仍闲不下来，自己也确有想写的东西，与文字工作大概要结终生之缘了。

一九八六年五月九日

[General Information]
书名=怀念廿篇
作者=李锐
页数=321
SS号=10256153
出版日期=